落脚城市

Arrival City

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

[加拿大] 道格·桑德斯◎著 陈信宏◎译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必须四处游历，我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也因此养成了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我发现，这些落脚于城市的乡村移民，正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

搭乘地铁和电车，或是深入城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我得以细细观察面前这片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

到21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上一次人类大迁移，用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为西方带来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直接造成了人类在思想、治理与科技领域的彻底变革。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历史。对这种历史的冷漠，导致了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持续不断的暴动与骚乱；而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莽撞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正在摧毁数以万计人的生活与未来。

这个时代的历史，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造就而成的。

他们往往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继而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哪条路，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落脚城市

Arrival City

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



[加拿大] 道格·桑德斯◎著 陈信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脚城市/(加)桑德斯(Saunders,D.)著;陈信宏译,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书名原文:Arrival City
ISBN 978-7-5327-5670-4

Ⅰ.①落… Ⅱ.①桑… ②陈… Ⅲ.①散文集一加拿大一现代 Ⅳ.①I 71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413 号

图字:09-2012-026 号

落脚城市
[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著 陈信宏/译
责任编辑 / 张吉人
策划编辑 / 母语文化 王启宪 董天乐 Matrixsbook@gmail.com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彩印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3 字数 230,000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70-4
定价:35.00 元

自　序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到了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这项运动涵盖的移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多达二三十亿,约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免受到影响。就规模和范围而言,这项迁徙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后无来者;实际上,家庭生活因此而产生的变迁——不论是农村的大家庭还是城市的小家庭——将就此终结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核心发展:人口的持续成长。

上一次人类出现如此剧烈的迁徙潮,地点是在欧洲与新大陆,时间介于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结果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思想、统治、科技与福利彻底的改头换面。大规模的城市化造就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且随之带来前两个世纪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尽管如此,这种人类变迁的观点却从来不曾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的报纸或是20世纪初的国会辩论中。人口涌向城市以及过渡性都市飞速地出现,对许多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但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而城市化走偏了方向所造成的灾难——包括各种苦难、革命与战争——往往正是这种盲目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我们的思考未能虑及这种大量人口涌入的情形,结果新进人口因此陷入困境、遭到排挤、心

怀忿恨。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造就而成。他们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于是采取极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

我们今天如果犯下同样的错误，认为这种人口的大迁徙无关紧要，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杂音，或是其他人面临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关，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遭遇更严重的暴乱和冲突。这项大迁徙的若干影响早已出现在我们面前：外来移民在美国、欧洲与澳洲引起的社会紧张；伊朗、委内瑞拉、孟买、阿姆斯特丹与巴黎市郊出现的政治冲突。不过，许多变化与断层都完全没有受到注意。我们不理解这种迁徙现象，原因就是我们不晓得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也不晓得该看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该把当前这种新世界的核心摆在哪里，也没有合适的称谓加以命名。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必须四处游历，我因此培养了一种观察城市的习惯：搭乘地铁或电车到终点站，或是深入城市中心不为外人所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面前延伸的空间。这种地方总是令人深感着迷，忙碌拥挤、凌乱丑陋、环境恶劣，种种规划皆是临时拼凑而成，充满了新进人口与各种庞大的事项。我走访这些城市边缘地带的旅程不一定都是自主的选择：我曾因新闻事件而必须前往孟买北端、德黑兰尘土弥漫的边缘、圣保罗与墨西哥城市的山坡地，还有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里潜伏着许多不满情绪的各种社区。我在这里见到的都是原本生长于乡村的人口，心思与志向都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

我发现这种来自乡间的人口在世界各地都造就了极为相似的城市空间：尽管表象各自不同，但基本功能与人际关系的网络却都具有相同

的特性而易于辨认。此外，不论在发展中世界的贫穷地区还是西方富庶的大城市里，这些城市飞地的制度、习俗、冲突与挫折都有一套标准的形态。我们必须对这些地区投注远比目前更多的注意力，因为这些地区不但潜藏着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也是贫穷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在当前这个时代，随着外国援助的效果与基本目的遭到深切且理由充分的怀疑，我认为这些过渡性的城市空间将会带来我们所需的解答。政府与机构若希望认真持续的投资能够产生长久而不易销蚀的效益，最有希望的就是在这里，而不是宏观的国家或微观的家庭层面。

为了写这本书，我走访了约二十个这类地区，以便为世界各国的城市与乡村所发生的转变找出典型范例。本书无意一一列出人口迁徙的目的地，也不是人口大迁徙的全球指南。在利马、拉格斯、开罗、卡拉奇、加尔各答、雅加达、北京、马拉喀什、马尼拉等地，都可见到同样引人入胜的发展。此外，这也不是一部史无前例的著作。移民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都记录过本书中所描述的现象，而且许多学者也都慨然为我提供协助。

不过许多城市居民和领袖都没有意识到这项发展所带来的宏观信息：人类的大迁徙正体现于一种新兴的都会区域里。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即所谓的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波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的暴力冲突的爆发地。究竟走上那条路，则取决与我们是否有能力注意到这样的发展，以及是否愿意采取应有的行动。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的边缘 …… 1

六公里，中国 …… 2

塔村，伦敦 …… 20

第二章　由外而内：新城市的盛衰演变 …… 31

最初的开端：小移动，大迁徙 …… 32

寇赫瓦迪，印度勒德纳吉里 …… 32

诞生之痛：落脚城市的成形 …… 43

坎兰格查，孟加拉达卡 …… 43

发展停滞：无法落脚的城市 …… 53

深圳，中国 …… 53

迟来的立足机会：停滞不前的城市 …… 58

基贝拉，肯尼亚内罗毕 …… 58

改革：危立于悬崖边上 …… 64

圣玛尔塔，巴西里约热内卢 …… 64

第三章　立足于金字塔的顶端 …… 71

令人感叹的美国落脚城市 …… 72

洛杉矶，加州 …… 72

后移民国家的落脚城市 …… 81
外来移民的郊区化发展 …… 89
荷顿，弗吉尼亚；惠顿，马里兰 …… 89
第四章　乡村的城市化 …… 97
乡村陷阱 …… 98
达塔利，波兰 …… 98
最后的村庄 …… 105
水林，中国四川 …… 105
没有城市的乡村 …… 110
朵利，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 110
落脚村庄 …… 117
毕斯瓦纳，孟加拉锡尔赫特 …… 117
第五章　第一波人口大迁徙：西方今日面貌的形成 …… 127
现代世界的丑陋门户 …… 128
巴黎 …… 128
19 世纪的建构过程 …… 144
伦敦 …… 144
隐藏的落脚者 …… 154
多伦多与芝加哥 …… 154
第六章　一座落脚城市的死与生 …… 159
伊斯坦布尔 …… 160
第七章　起于市郊边缘的巨变 …… 197
尔撒圣殿，德黑兰 …… 198

佩塔雷,加拉加斯 …………………………………… 213
穆兰德,孟买 ………………………………………… 218

第八章 新城市与旧世界的冲突 ………………………… 231

空间的问题 …………………………………………… 232
金字塔小区,法国埃夫里 ………………………… 232
公民身份的问题 ……………………………………… 245
克劳兹堡,柏林 …………………………………… 245
空间与公民身份 ……………………………………… 256
帕尔拉,西班牙 …………………………………… 256

第九章 迁徙的终点:从底层到中产阶级 ……………… 265

不再被排挤的邻里 …………………………………… 266
佳丁·安吉拉,巴西圣保罗 ………………………… 266
帕拉博夫妇的家 ……………………………………… 285
孟买 ………………………………………………… 285

第十章 在都市立足扎根 ………………………………… 293

密集度,自发性,独立自主 ………………………… 294
斯洛特瓦特,阿姆斯特丹 ………………………… 294
土地,连接,治安 …………………………………… 306
卡拉伊尔,孟加拉达卡 …………………………… 306
仅求生存还是重振健全的城市? …………………… 316
松克里夫公园,多伦多 …………………………… 316

致谢…………………………………………………………… 330

参考资料 ……………………………………………………… 332

第一章

城市的边缘

六公里，中国

故事从一座小村庄开始。也许在外人眼中，这座村庄仿佛定格于时间之中，遗世独立，安宁静逸，亘古不变。村庄看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经过，瞥见村里坡地上层叠低矮的房屋和炊烟，必然觉得这里平静安详，充满了细腻而秩序井然的美感。在乡下，这里显然有着怡人的生活节奏，不受现代化的束缚。村中为数不多的简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顶端。畜栏里有几只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这个老人名叫徐钦全，正在寻找草药。他沿着梯田边缘的古老石子路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这是他祖祖辈辈走了十几个世纪的道路。在这里，他可以找到自己儿时就已知晓的各种草药：茎秆纤细的麻黄，用于发汗去除风邪；枝叶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补肝效果。他用小刀割下茎秆，装进布袋，再走回山丘顶上。爬到顶端之后，他停住脚步，略站了一会，望着北方扬起的尘土。在那里，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把一条狭窄崎岖的小径开发成宽广平直的大道。这样，往返北面重庆原本需要的一天的路程，不久后就将缩减至两小时以内。老人看着远方的树木被烟尘染成土黄色，他想着村里众人的生活，想着折磨他们已久的贫穷。这样的贫困导致他们的小孩夭折，使他们数十年来活在缺乏粮食的饥荒之中，接着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单调生活。那天晚上，在村里的大会上，他提出了一项改变山村居民生活的方法。今晚之后，他说，我们将不再是

个小村庄。

当时是 1995 年，这座村庄名叫“六公里”。这个村庄的外观、村里的家族，乃至仍然维持全人工耕种的小麦和玉米，在几百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村庄在缅甸公路修建期间获得“六公里”的称号，原因是缅甸公路的东方终点就在内陆大城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里，“六公里”却成了个虚幻的名称，因为原本通往重庆的桥梁遭到炸毁，最近的替代桥梁则位于好几公里之外，这座小村庄因此无法与任何城市和市场联络，只能自己种植作物为生。由于土壤贫瘠，农具简陋，村里生产的粮食一直都不够喂饱所有人。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造成居民丧生，儿童挨饿。在上个世纪的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座村庄失去了不少人。饥荒的状态终于在二十年以后结束，但存活下来的居民也只能依赖政府的补助勉强生活。一如世界各地的农村，六公里的村民从没认为乡下生活有任何安宁或贴近自然之处。在他们眼中，乡下生活乃是一种单调乏味乃至枯燥的生存状态。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快速进入了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因此，徐钦全老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他解救村庄的方法之后，现场毫无异议：村里所有的土地都将成为非农业用地。自此，六公里就不再是乡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乡村居民迁徙的目的地。

十五年后，六公里成了重庆市郊一公里处一个盘桓在四车道公路旁的幽灵，在密集耸立的公寓大楼之间，突然出现一片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只见一望无际的灰色与褐色方块在山坡上连绵而下，形成一团毫无章法的水晶结构，彻底淹没了地貌。靠近细看，才发现这些水晶原来是房屋与商店，是居民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

之上。在徐钦全提出改革方案之后不到十年，这座原本只有七十人的村落已经增加了超过一万名居民：十几年内，这附近的几座村庄已结合成一片居民多达二十万人的聚集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户口都不在这里。这里不再是一座偏远的村庄，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围地区，而是重庆市颇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庆市的人口多达一千万左右，摩天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二十万人口以及四百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这样的成长得到六公里这类地区人口增长的助力。像六公里这样由离开乡下的人口自行建构而成的聚落，在中国被称为城中村，重庆市周围就出现了好几百座这样的村庄，尽管市政府并不承认这些聚落的存在。这些地区的街道与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来源而划分；居民对于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邻居都称为“老乡”。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四千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不过，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许多达半数——最后还是会回到乡间村庄去，也许是因为都市生活太过辛苦，也许是因为衣食无着，也有出于个人喜好的选择。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幽静古径现在已经成了一条繁忙的街道，两旁是杂乱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卖手机的、肉贩、冒着蒸气飘散着呛辣香味的小吃店，还有卖衣服、卖工具、卖高速纺纱机的摊贩，热闹嘈杂，蜿蜒长达两公里，深入令人晕头转向的杂乱小巷与不知通往何处的阶梯，看来就像是把幻觉艺术之父埃舍尔的画颠倒了过来一样。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人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垃圾与废弃物似乎无处

不在，在每一栋房子的后面堆积成山。每一条巷道上都停放着不同规格的车辆：自行车、三轮助力车以及各种排量的小汽车。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举目所及完全看不到一丝绿意。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里面，都可听到生产的当啷作响。在山谷顶端，也就是徐钦全在 1995 年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地点附近，你会不禁注意到由煤渣砖盖成的长方形建筑，塞在一个陡峭的角落里，不断发出吵闹的声响，并且散发着怡人的杉木香味。

这里是王建一家的工厂兼住所。三十九岁的王建在四年前从八十公里外的南永村搬到这里，身上带着七百元人民币，是他前两年从事木工攒下的积蓄。他租下一个小房间，捡了一些废弃的木料和铁料，然后开始以手工制作传统的中式洗浴木桶。这种木桶颇受新兴中产阶级的喜爱。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第一批木桶，然后卖了出去，每个木桶能赚五十元人民币。一年后，他赚的钱已够他买些电动工具和一间较大的工作室。他把老婆、儿子、还有儿媳妇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孙子一起接了过来。他们睡觉、煮饭、洗衣、用餐都在工作室后方一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只用一张塑胶帘布隔开。比起他们当初在村里勉强居住的小屋子，这个空间不但更拥挤，也更缺乏隐私。

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要回乡下去：这里虽然肮脏狭小，生活却比乡下好得多。“在这里，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王先生一面用一条

铁皮带子拴住木桶，一面用连珠炮般的四川方言说着，“我们那个村头和我一样离乡背井的人，我觉得差不多有五分之一都是个人在创业。而且，基本上全部人都走了——只有老人还留在那里，已经成了空村子了。”

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仍然会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村里，供养他们仍然健在的父母。一年前，他在六公里买下了同一条路上的一家餐厅让他儿子经营。老王的获利空间很小，因为竞争非常激烈：重庆还有另外十二家洗浴木桶工厂，其中一家也在六公里。“我的工厂产量最高，”他说，“可是利润不一定是最高的。”因此他们还得存许多年的钱，并且祈求洗浴木桶业的热潮不退，才有能力买下自己的公寓，把孙子送上大学，并且举家离开六公里。不过，等到他们梦想成真的那一天，说不定六公里也已经成了他们梦想中的城市。

这座山谷看起来犹如一幅灰色的立体派画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筑里藏着许许多多在政府记录上并不存在的微小企业。在木桶工厂的同一条街上，可以见到一个大型冷藏库，一家粉末颜料搅拌厂，一家工厂以五六部大型机器输出刺绣团，另一家生产电动马达线圈，还有一个地方酸味刺鼻，许多十七八岁的小工人正弯着腰操作塑封机，制作吹气海滩玩具。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工厂，制作橱窗道具、塑钢窗户、工业用空调管，生产廉价木质家具、木质装饰床架、高压变压器、电脑车床加工而成的摩托车零件，以及不锈钢抽油烟机。这些以亚洲各地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工厂全都创立于近十多年，老板不是外来的乡村移民，就曾是第一波乡村移民的员工。

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住在六公里的所有居民，还有这个地区的十二万人口，都是

1995 年以来移入的村民。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他们经常把子女和老人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才有希望。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以及极度贫困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寄钱回家供养村里的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孩子日后到城里接受教育，而这几乎就用掉了他们全部的收入。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让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难以负担的开支，同时也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

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过程的落脚。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围的新兴区域，六公里也具有一套特定的功能。这里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活动的目的都在于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适应文化，融入主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落脚城市不但聚集了处于过渡期的居民——外来人口一旦到了这里，即可转变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里享有可长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因为这里的街道、住宅，还有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有一天都将成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路途中败下阵来，陷入贫穷的深渊，或是遭到捣毁拆除。

落脚城市和其他都会地区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不只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的乡村人口，也不只因为这里的市容充满了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不休，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

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受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如履薄冰——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六公里生产许多产品、贩卖许多产品，也容纳了许多人口，但这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都有着一项核心的目标，一个共同的使命。六公里是一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

从工厂聚集的山谷底部沿着蜿蜒的碎石路走上一小段陡坡，即可来到山谷顶端，而这里的水泥建筑更是密集。如果你走进一家小餐馆后面的巷子，在高墙围绕下穿越有如迷宫般的隧道与狭隘走道，即可抵达一座小小的灰色天井。这里是嘈杂混乱的贫民窟当中一个静僻的地点，摆着一张小桌，周围排列着木头矮凳。在这里，空气中弥漫着川菜的辛辣气味，不时可听到远处隐隐传来的车声、婴儿的啼哭声、吼叫号令的声音，还有广播声。桌子旁蹲伏着一个老人，身穿传统的青布外套和一双破旧的帆布鞋，头上戴着耐克棒球帽。他身边放着一顶斗笠，里面装满了他采集的草药。他采集这些草药的地点在山谷另一端一片鲜为人知的绿地，就在那堆五层楼高的垃圾山后面。原本的林间空地已经大半都被那堆垃圾山淹没了。

这个老人就是徐钦全，草药采集者及村庄元老。他仍住在六公里的中心，地点和当初一模一样，村庄转为都市为他带来了大量财富：他靠租房收入，买下了好几间楼层公寓供家里人居住。这些公寓一间就至少值七万五千美元（2007 年），相当于一名城市白领近十年的收入。

他独自住在这里，靠近他的草药生长地。这座村庄仍由原本的居民集体拥有，而且在法律上也仍然属于村庄。也就是说，除了这间房子以外，其他数以百计的住宅都不完全属于屋主所有，尽管许多人都向村里买下了产权证书，也靠着买卖赚进了不少利润。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下，租金与非官方土地价格都跟着水涨船高，于是这些身为房东的乡村居民也就得以通过出租、转租以及房产投机买卖而获得财富，而且这些资本活动都不算正式的交易行为，也不必纳税。他们经常利用藉此赚得的财富创业。市政府只要愿意，随时都可将这整个地区夷为平地，把十二万居民全部驱离，或是安排他们住进公寓楼，隔壁就有国营的成衣工厂，环境清洁舒适。中国已经对数以百计的这类地区采取过这种做法，毫不留情的摧毁许多家庭在都市边缘投注一切所得来的生活与经济基础。六公里的创立者自信他们至少还有十年的时间才会遭遇同样的下场。

重庆市一位人大代表曾告诉我说，他们有一天会把这座大都市转变为没有贫民窟的城市，把这些破烂的聚落改建成整洁的工厂园区及私人公寓。不过，他也说虽然他们希望城市化的速度愈快愈好，但如果要吸收这样的成长率所带来的庞大人口，这些高度密集的非正式聚落必然又不免出现人口的指数型成长。重庆周围虽然每天都有数千栋开发商建造的商业住宅楼正在施工，但住宅供给的预算却还比不上涌入的人口数量。而且，官方仍然把这些移入的乡村人口排除在保障性的住宅供给对象之外，除非他们能赚到足够的钱去购买一套商品房。落脚城市不是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在中国的内陆城市，这些扮演落脚城市角色的村庄虽然不受承认，却已经成了城市的成长计划、经济活动以及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的房客通常都一心想成为城里人，但只有极少数能够实现梦

想。”徐先生对我说，他的女儿在一旁准备着端午节的丰盛午餐。“他们赚的钱通常不够储蓄，生活支出对他们来说也变得太高了。除非这里的状况出现改变，否则他们有许多人都会不得不搬回去。我们都不想再当农民，现代中国也要我们成为城里人，但这个目标已经变得很难达成。”

的确，六公里的许多居民都像三十六岁的王珍蕾与三十四岁的舒伟东夫妇一样，晚上就睡在长三公尺、宽两公尺的房间里，隔间的石膏板垂挂在水泥天花板下方半公尺处的木板条上。这是一幢夫妻宿舍，里面隔出了十几个相似的房间，整幢建筑则是颤巍巍地耸立在一条恶臭的溪流旁。唯一的一扇窗户不但上了锁，而且还遮盖起来，只剩下顶端一条六十公分宽的开口，室内的照明来自赤裸悬挂的白炽灯泡。他们一天有十个小时，而且经常在周末，都待在隔壁的一间水泥房间里，在工作桌前缝制着衣物。这个房间没有多余的陈设，除了墙面上沾满线头之外，就只有一部彩色电视不停播放着连续剧。这家工厂共有三十张缝纫机，老板在1996年从一座偏远的乡村搬到六公里。他自己原本也是个成衣工人，开这家工厂之后对员工按件计酬，因此他的员工一个月的薪水介于两百至四百美元之间。宿舍是免费提供的(不是所有的工厂都有这种福利)。除了六公里的街道之外，他们并未真正见识过重庆这座大都市。每个月，他们留下四十五美元的伙食费和三十美元的零用钱，其他的薪水全部寄回村里，供养他们女儿的中学学费及生活费，也供养帮他们带女儿的父母。

从1993年开始，他们夫妇俩曾有十一年的时间都在深圳，那里的工人宿舍比较现代化，比较不那么幽闭。那座工业城位于珠江三角洲，在重庆以南一千五百公里处，许多成衣工厂为西方企业代工制造产品，不仅工作条件比较好，薪酬也比较高。不过他们却发现了一大缺点：深

圳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不论他们怎么努力存钱，还是永远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子。像六公里这样的贫民窟住宅是他们唯一可能买得起的选择，但在深圳那座特区城市里却没有这样的地方。此外，他们在深圳只有每年春节才能见到心爱的女儿一面。简言之，在深圳没有未来。经过一番痛苦的取舍之后，他们开始向北搬迁。这样，他们即可离家人近一点，而且女儿也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到城市生活：不过，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大半辈子都得在孤独阴暗的深渊里工作。

如同这里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他们赌上自己的一生，为的就是让儿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过，他们也知道这项赌注的胜算只有一半，甚至连一半都没有。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待在学校，上大学，长大以后就不必在这样的工厂里工作，”舒太太说，“可是我女儿如果上不了大学，我也能够接受另一个选择，让她和我们一样到这家工厂里工作，至少还是比待在村里好。”

在六公里，每二十个像他们一样的家庭当中，就会有一个辛广全家族式的故事。辛广全和他的太太抵达这里的时候，原本只是两个不识字的农民。他们有好几年都睡在建筑工地的木板上。后来才搬进水泥小屋，并且不断努力存钱。2007 年，他们搬到对街，住进四十六岁的辛先生和他的朋友所盖的一幢十几层高的公寓大楼。这幢建筑相当粗陋，墙面的红砖都没有上漆。大楼中央则是一道没有任何修饰的水泥阶梯。不过辛家人把这宽敞的公寓内部转变成了宫殿般的华丽装修：铺着美丽的瓷砖地板，屋内留下不少宽大的空间，墙上贴着明亮的壁纸，天花板上挂着现代风格的大吊灯，还有一张橘色的拼合沙发、一部大尺寸的液晶电视以及环绕立体声音响。辛先生脑门上的头发已经逐渐稀疏，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空闲时不是到市区购物，就是和同乡老友

一起抽烟打麻将。他过着货真价实的中产生活，也拥有货真价实的中产收入，完全看不出在不久之前他曾有六年时间的风餐露宿，没有钱也没有任何财产。

1992 年，就在中国的经济刚刚开放后不久，政府开始容许有限度的农民迁徙，于是辛先生也就从一百多公里之外的石龙村来到了六公里。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他们一家六口在原本的农村只能睡在一间狭小的泥地草屋里。当时重庆已开始出现大量的建筑工地，高楼大厦逐渐取代了古老的尖顶木屋，因此对建筑工人的需求量非常大，辛先生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双手、勤奋和他的太太。他太太负责为工友煮饭，他则努力工作，刚开始的工资是一天五十到七十美分，供应三餐，每五天能吃上一顿有猪肉的饭，而且可以睡在工地里。他们每天晚上裹着被子，和这个城市里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工人一起睡在那些高楼大厦的地基上。

他们把所有的收入寄回石龙村，有好几年的时间完全没见过自己的女儿。他们加入了人数多达一亿五千万乃至两亿的流动人口行列。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之下，户口登记在农村的人不得享有城市的住宅、福利和医疗保险，子女也不得就读城市里的学校。户籍制度在 21 世纪初期经过改革之后，外来人口虽已能够申请城市户口，但实际上几乎根本办不到，而且一旦申请了城市户口，他们就必须放弃村里的宅基地。第一代乡村移民极少有人达成这项目标，因为中国的小学教育、儿童医疗、福利以及失业保险制度都不足以保障新进城市居民极不稳定的生活。因此，中国现有多达六分之一的人口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登记在册的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

辛广全决心成为真正的城里人。1998 年，他召集了同乡工人组成了建筑施工队，开始以公司化的方式运作。他们没有注册，也没有接受

国家标准的审核，因为在当时要做到这两点必须拥有城市户口。他们的收入相当不错，达到每年一万五千美元的中产阶级水准，年景好的时候甚至可达一年三万美元。财务状况虽然稳定下来，辛先生和他太太却还是住在他们在六公里买下的一间水泥小屋里。

"我们在90年代末赚进第一桶金的时候，原本可以搬到比较好的地方，可是我们不想冒那个险，"他对我说，"首先我们必须让女儿念完学，并且让留在村里的长辈住进像样的房子——我们必须存下一大笔钱作为未来生活的保障。"

贫穷的村庄移民都必须存下相当大一部分收入以应对健康、教育和急用的需求，所以六公里才会有数以万计的居民都像辛太太一样，被困在苦闷的环境里，不进城市也不回乡间，与子女分离，又无法成为中国经济活动里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几乎完全没有触碰到这些人的生活，从而导致了两败俱伤的局面。辛先生靠着实行一套计划而打破了贫穷的障碍。他召集了他的施工队老板朋友中最成功的十四人，每人集资一万五千美元，共同在六公里对街兴建了三幢十层高的公寓大楼，并且为这个地方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国民新村。他们把其中一幢大楼里的小公寓租给农民——这是他对新来的乡村移民的称呼——藉此赚取租金；另外一幢大楼分隔成一间间的工厂场地以供出售，一楼还有店面；第三幢大楼则包含了十五间公寓的住宅，供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们居住。凭着这项计划，还有十五年来的咬牙储蓄，辛先生和他的友人终于得以实现在城市立足的梦想。

一个原本睡在水泥地上的家庭，竟能在十年间就成功闯入抵押贷款与购物中心的中产世界，不论在世界任何地区都是极为罕见的案例。更多人却是像濮军一样。濮军今年三十二岁，身材削瘦，个性腼腆，在六公里的山谷底部工作。那里由村民经营的工厂有好几十家，他就在

其中一家上班。这家工厂和邻近的其他工厂不太一样。不但安静、清洁、通风,而且并无一点阴暗,仿佛一座极简主义的大教堂。这里的三十名员工从事整理翻新变压器的技术工作。这些变压器都是精密且充满放射性的器材,大小相当于一部车。濮先生是个技术纯熟而且经验丰富的技师,原本住在四川东部的村庄,后来在村庄附近的职业学校接受教育,又在深圳的工厂磨练了好一段时间。这样的背景应该是通往中产阶级生活的绝佳条件。

然而,一天下午我在工厂里和他见面,他内心却充满了焦虑,默默思虑着一个可能将推翻他一切努力的打击。在我们见面时,他身上只有一百五十美元,心里盘算着该到哪里弄到五十美元凑齐这个月的房租。这个人在过去五年来从未花过一毛钱在自己身上。才三个月前,他还对他的两个小孩说,他们等到年底大概就可以搬到城里和他一起住了。

不过,意外却突然发生了。他六十一岁的父亲得了一种怪病,不仅难以诊断,而且必须不断吃药控制病情。濮先生的收入原本主要都用于供养他的孩子在村里生活,现在却为了支付父亲的抗癫痫药物而花掉三分之一。他遭遇过一连串的挫折,包括试图把村里的农田转型为果园却没有成功,第二个孩子意外出生,而且他的婚姻也宣告破裂。离婚的现象在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都不罕见:从乡村到都市生活的过渡阶段,对婚姻也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考验。濮先生和他太太虽然早已失和,但这段婚姻在几星期前结束之后,还是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他的太太在港式茶餐厅做服务员,一个月的薪水是一百五十美元,却因为想要独自生活而背负了不少债务。"现在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时候,"他直截了当的说,"我们不住在一起,我们只要住在一起就会吵架,然后就忘了彼此的共同目标——忘了我们的目标是要共同打造我们的

未来。突然间，我竟然必须靠着自己一个人养活三代。”

现在，如果不再出现其他问题，他预期自己还得等上三年才能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并且把他们送进城里的学校，就此终结他们家族的务农命运。每当工作不那么忙碌，他就会拿出一张又皱又旧的照片，看着照片里的子女——儿子濮明林，六岁，女儿濮冬琳，四岁——低声对他们说话。他有时候想他们想到心痛不已。“我希望孩子们有一天能够了解，了解我们为什么那么长时间都不在家，了解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他们学着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了解我们所做的牺牲。我相信我们可以弥补他们。我们希望为他们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他说了一句在落脚城市里被奉为圭臬的话，“我们一定要吃得了苦。”

这片由乡村移民在城市里构成的飞地，位于我们的视线边缘，存在于旅游地图之外，已成为这个世界下一阶段发展的场景，充满了勤奋与希望的动力，惨遭暴力与死亡的打击，备受漠视与误解所压抑。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着历史，但这些历史却普遍遭到忽视。这些创造历史的地区包括重庆的六公里、巴黎市郊的克里希苏瓦(Clichy-sous-Bois)、孟买市区内近百万人口的达拉维，以及洛杉矶边缘的拉丁人落脚城市康普顿——全都聚居着来自乡村的人口，全都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而且这些人也会寄送资源回乡，促成下一波的人口迁徙。落脚城市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名称：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法维拉、巴斯蒂、比东维勒、艾胥维亚、甘榜、盖奇康都、贫陋市镇、城中村，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则称之为移民社区、少数族群聚居区、市郊贫困地区、集合板块建筑区、中国城、小印度、西班牙人居住区、都会贫民窟，以及市郊移民区。此外，富有国家每年也从发展中国家吸收两百万人口，其中皆以乡村居民为主。

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原因是传统上的学术与官僚用词——如“移民门户”与“原始社区”——都掩盖了这类地区的动态与过渡性的角色，而足以对人产生误导。我们习惯于把落脚城市视为固定的实体，由一群廉价住宅聚集而成，里面住着贫穷人口，而且生活条件通常不太怡人。城市规划者与政府经常把这些城市飞地定义为静态的附属物，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套用前巴西总统卢拉的话，这些地区的居民乃是“一群从生态角度定义的群体，而不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

这种看法在西方导致了灾难性的城市政策。2005年巴黎暴动、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动乱、以及阿姆斯特丹在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暴力冲突，都是这种政策造成的结果。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这种看法带来的政策更糟，导致贫民窟清除计划，莽撞摧毁数以万计人口的未来。在一般书籍和电影当中，落脚城市则被描绘成这个乌托邦幻灭所衍生出来的后果：一个面貌一致的悲惨世界，穷人没有力争上游的机会，只能永远困在有如监狱一般的区域之中，被凶恶的警察压迫，被吸血的企业剥削，被福音宗教寄生利用。许多落脚城市一旦原本充满弹性的结构遭到剥夺，或是被国家遗弃之后，确实不免陷入这样的命运。然而若把这种现象视为落脚城市的常态，就不免忽略了这类地区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在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世界，成功的落脚城市都是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落后以及终结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键因素。

不论就任何可评判的标准而言，这场迁徙都是一项进步。乡村生活其实一点都不浪漫，今天，生活在乡村仍是造成人类过早死亡的最大根源，是营养不良、婴儿夭折与寿命缩减的最大来源。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统计，全球十亿挨饿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农民。乡村也是人口过度成长的主要来源，因为务农的家庭需要大量的人手才能维持

生活。世界各地的都市人口收入都比乡下高，而且经常高出好几倍；教育、医疗、饮水、卫生以及通讯和文化等资源，在都市里都比较丰富。此外，迁入城市也有助减少生态破坏以及碳排放，原因是聚居于城市缩短了交通距离，也增加科技的共享。一项重要研究曾经指出："城市提供了缓和甚至反转全球气候变迁冲击的机会，因为城市的规模经济减少了个人支出以及对资源的需求"。赤贫是乡村现象：全球各地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穷人有四分之三都住在乡下地区。全球赤贫人口在本世纪初大幅下降，在 1998 年至 2002 年间减少了九千八百万人，贫穷率则从 1999 年的百分之三十四降低到 2009 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个现象完全是城市化的成果：人口一旦迁入城市之后，即可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也能把钱寄回乡村。城市化不只改善了都市居民的生活，也提高了乡村的生活水准，为乡村提供所需的资金，把农业转为商业，从而带来有薪工作与稳定的收入。

落脚城市不论在形态和文化上都算不上城市，但我们绝不该因此视之为乡村地区。都市人通常认为落脚城市就是单纯把乡村的结构和习俗搬到城市里来。"看，一面是村庄，一面是高楼大厦，"印度裔美籍作家梅塔曾经听到他年幼的儿子这么说。当时这个孩子在孟买北部的班德拉，初次见到一片落脚城市的飞地紧邻于公寓大楼旁。父亲也赞同孩子的话——他指出了贫民窟的本质：城市里的乡村。一般人也认为洛杉矶的巴里欧都是墨西哥或中美洲乡村的翻版，中国人也认为他们的城中村是不折不扣的小村子。不过，这种看法其实误解了落脚城市的都市野心，及其快速变迁的本质，也没有正确认识到落脚城市如何重新定义了都市生活的本质。落脚城市的文化不尽然是乡村也不尽然是都市，而是融合了两者的元素——但经常是扭曲或怪诞丑陋的模样——迫切希望在这群志向远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当中找到安

全感的共同来源。我们通常以为人只要从乡村移居城市，就会直接从原本落后保守的乡下习俗转而接受精致世俗的都市习惯，但这其实是一种谬误的想法。在这项变迁的过渡时期，不仅充满了不稳定性，也需要紧密的人际关系与支援体系，而家庭与个人的凝聚力又因此受到威胁，所以经常会发展出融合各种不同元素而且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

由于一般人未能意识到落脚城市具备的功能，而这些地区又显得贫穷杂乱，因此也就经常被人鄙夷为恒久不变、无药可救的贫民窟。许多落脚城市刚开始的确是贫民窟，但并非所有的贫民窟都是落脚城市。实际上，最肮脏粗陋的贫民窟通常不是乡村向都市过渡变迁的地点。19世纪东伦敦那些恶名昭著的贫民窟，例如贝斯纳尔格林美，都是“捕蝇纸”社区，专门收容被都市淘汰的人口，并且从此把他们困在其中。在这些地区，几乎看不到来自乡村的移民。今天美国与加拿大太平洋岸的许多市中心贫民窟就属于这种社区，例如温哥华市中心东区和旧金山的田德隆区。在都市立足的管道一旦遭到永久封锁，落脚城市就可能在一二十年后变得沮丧而绝望。在乍得、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将近百分之百的都市居民都居住在存在了数十年的贫民窟里，因此这些地区让人跃入都市的跳板功能也就不免遭到遗忘(但即便在这里，也不难找到刚移入的乡村人口，而且贫民窟里也可以见到落脚城市的飞地)。20世纪美国境内的非洲裔贫民区原本是典型的落脚城市，因为美国解放黑奴之后出现了大迁徙潮，南方乡村成千上万重获自由的黑奴纷纷满怀乐观地出外寻找美国社会的中心。然而，他们的落脚城市却没有达成目标，原因是城市的资源都掌握在冷漠或心胸狭窄的白人手中，所以这些落脚城市的居民根本无法取得房产。此外他们也因为种族歧视与不良的城市规划而被排挤于经济与政治主流之外，而且政府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资源或制度的支持。这些落脚城市因此沦为叩

关失败的社区——当今许多落脚城市也都面临着这样的威胁。

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乡村到都市的迁徙潮都会产生落脚城市。乡村居民如果是因为遭遇战争或饥荒而在匆忙中迁往城市,就不可能精心从事投资与规划,也不可能像正常移民那样建立紧密的支持及联系网络。不过,这种迁徙通常只是临时性的,危机一旦解除,大多数难民就会返回家乡(但有些还是会留下来,或是展开周期性的迁徙模式,为日后的落脚城市奠定基础)。有些乡下人口,例如北美的菲律宾人,因为从事家庭服务型工作,所以不会聚居形成都市飞地——但这些人口仍具有虚拟的落脚城市功能。

此外,落脚城市的居民也不一定都是穷人。随着这些都市飞地的条件慢慢改善,并且发展出本身的中产阶级,也就会开始吸收拥挤的市中心迁出来的人口,而这些人也同样会发展出富足的中产阶级。当今纽约、伦敦、巴黎与多伦多的许多高级地段,刚开始也都是落脚城市;发展中国家的各大都市,诸如里约热内卢与伊斯坦布尔,也有许多落脚城市彻底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的聚居地。只要妥善经营,这个时代的许多乡村移民飞地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一般人对于落脚城市还有另一项更具杀伤力的思虑,认为这些拥挤的社区是都市杂乱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都市人看漫山遍野的贫民窟,看这些移民社区侵吞了森林,于是以为这些乡下涌入的人潮造成了无法控制的巨型城市。实际上,乡村迁往都市的移民虽然人数众多,却不是都市成长的主要原因。在发展中国家,每新增六千万城市人口,其中就有三千六百万都是城市既有人口的下一代,只有两千四百万人来自农村,而且其中又只有半数是真正的移民,另外半数则是因为自己的村庄被并入城市而成为城市人,就像六公里这样。落脚城市不但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反倒是遏制了人口增长。乡村居民移入城

市之后，家庭规模就随之缩小，平均每户至少减少了一个孩子，生育数经常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 2.1 人。如果没有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世界人口的成长速度将会快上许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根据联合国最近的预测，全球人口将在 2050 年左右停止增长。人口达到九十亿的高峰之后，人类数量将会不再年年攀升，马尔萨斯预测的人口危机将不复存在。这是城市化造成的直接结果：经过人口迁徙之后，城市里小家庭数量将超过乡村的大家庭，而落脚城市流回乡村的金钱、知识以及受过教育的回归人口将促使乡下地区的出生率下降。我们在伊朗这类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早已看到这种情形，乡村的城市化促使乡下与城市的生育率都下降至负数。城市化完成之后，世界各地的平均家庭规模都将降至 2.1 名子女以下，于是拥挤与资源竞争的问题都将转为人口零增长这类较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但仍然深富挑战性）。在最有可能的预测情境里，这项转变将会出现于 2050 年；在联合国较为悲观的预测情境中，人口高峰出现时间将延续十年，数量也将多出十亿。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取决于落脚城市，因为许多促成生育率下降的因素都在落脚城市获得实现：为女童和妇女提供教育、改善卫生状况、创造人身与财务的保障等。

落脚城市是一部转变人类的机器，只要让落脚城市充分发展，这部机器即可开创一个可持续的世界。

塔村，伦敦

“等我毕业之后，我要搬到那里去，在宁静的乡下种植自己所需的

所有粮食，"她说。刚刚她还和其他人讨论着麦当娜和玛利亚·凯莉，却突然话题一转，谈起了自己理想中的乡村生活。其他孩子不禁笑了起来，就像他们也喜欢笑她戴头巾的新习惯一样。

"你尽管去，"小她两岁的妹妹苏拉玛笑着对她说，"等到那时候，村里的所有人早就都到这里来了。"最小的妹妹莎玛坦诚自己也梦想住在乡下，但她梦想的地点是在英国，住在一栋大别墅里，周边没有邻居。就目前而言，这座小小的水泥广场和周围那些由她们认识的邻居所经营的商店，感觉就像一个舒适的窝，保护着她们，让她们不必面对随时笼罩在她们幼小心灵上的两股力量：一方面是家族村庄的传统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广场外那座难以接近而且经常充满敌意的都市。

塔法德一家从泥地小屋迁徙至英国生活中心，这项转变的主要功臣就是伦敦这座全球金融之都边缘一座令人厌恶的落脚城市。尽管这段过程花费的时间不到四十年，其挑战就许多方面而言却比中国农民所面临的还要艰难。这里的城市环境同样杂乱不堪，在这个讲着异国方言的异国都市合理寻得立足之地的机会更是渺茫。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整个家族就和过去数十年来一样，生活在位于孟加拉乡间的一片稻田当中的简陋木屋里，没有电，也没有道路。这个家族存了一笔钱，把十七岁的约瑟夫送到英国，设法找个工作生活下来。如同大部分的外来人口，他也找了在过去数十年来因为从事工业及货运港口工作而往返于英国与孟加拉之间的同乡帮忙。等到约瑟夫抵达的时候，英国的制造经济已经崩溃，于是他只好接下一份近乎奴役性的工作，为一个巴基斯坦家庭担任佣人，护照还被雇主扣起来。他把收入全部寄回村里。十年之后，他终于设法辞掉了这份工作，和好几万名后工业时代的孟加拉人一同改造了英国的餐饮业。20 世纪 70 年代，在经济萧条的伦敦，他找了最便宜的地段，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喱餐馆，靠着这家餐馆，

他存了一笔钱，得以把太太接过来，在伦敦成立家庭，并且开始存钱买房。

英国成千上万的咖喱餐馆几乎都是孟加拉人开的。这种餐馆虽已成为孟加拉人种族的刻板印象，把印度咖喱鸡饭这道菜肴（原本是苏格兰一座孟加拉移民落脚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明）推广成为英国最热门的餐点，却也的确成了孟加拉人翻身的依仗。由于在英国创立小型企业相当容易，取得贷款购置资产以及申请餐厅执照也不会受到歧视，因此孟加拉人也就得以避免陷入赤贫及依赖社会救济维生的处境，而能在英国移民法渐渐强硬的同时一面积累资本，一面为新进移民提供正当的就业就会，还可以凭借灼热的印度烤炉为子女建构未来的前途。这种小企业几乎是所有落脚城市赖以成功的中坚力量。一旦欠缺这股力量，或是法律禁止移民开设这种企业，落脚城市就常常不免沦为贫穷陷阱。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有三十万孟加拉乡村人口移入英国，塔法德一家正是其中一员。这些移民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来自锡尔赫特(Sylhet)的东北地区。那里不但偏远、贫穷，而且只有农业。现在，英国境内有将近五十万名孟加拉人，连同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子女，这些人口有半数集中在伦敦，其中半数聚居在伦敦市东部边缘的陶尔哈姆莱茨区。他们构成塔村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部分选区更属于多数。塔村这座落脚城市的功能主要在于金钱、资讯与人口的流动：此处的主要街道上满是汇款店、伊斯兰教徒的服务处、孟加拉旅行社、网吧、移民顾问公司、婚介等。所有这些企业，以及居民在闲暇时间从事的大部分活动，目的都在于维系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平衡关系。这就是落脚城市的作用。

孟加拉的乡下地区每年收到移民及其后代汇入的款项，金额将近一

百一十亿美元，与孟加拉的外贸收入相当，不论金额或发挥的效果均大于孟加拉每年收到的外援，而这些汇款最大的来源就是塔村的孟加拉移民。如同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这种金钱的流动具有两项重要功能：一方面把不断涌入的村民转变为财务稳定而且成功融入当地文化的城市人，另一方面也通过现金的流入提高乡村的城市化程度与文化水平，并且使其拥有自立的能力。随着落脚城市存在的时间愈来愈长，地位愈来愈稳固，汇回乡村的款项不论金额或频率都会逐步下降。不过，即便是巴西那些历史长达七十年之久的落脚城市，每个月也都还是会汇款回乡，使得乡村成为经济稳定的后农业地区。

对于塔法德一家人而言，变化却是发生得相当缓慢。他们在东伦敦一个高楼林立、环境阴暗、邻居又充满种族歧视的住宅区里住了十年，经营餐馆的收入却只够他们在柯弗利广场买下间小房子，同样只有两个卧室。柯弗利广场开发于 20 世纪 80 年代，原本是一片消除了贫民窟之后留下的空地，位于狄更斯笔下一个著名的脏乱区域内。于是，塔法德一家人也就住进了伦敦小孟加拉当中最密集的孟裔居民集中地。小孟加拉是欧洲一大落脚城市，从它象征性的边界砖巷（Brick lane）往东蔓延，涵盖斯比塔菲尔德（Spitalfields）、贝斯纳尔格林、斯特普尼（Stepney）与西汉姆等人口稠密的广大区域。不久之后，社会地位较高的居民又逐渐迁入埃塞克斯（Essex），于是小孟加拉也就包含了伦敦市东部边缘的大部分地区。

到了 1995 年夏季，小孟加拉似乎有崩溃的趋势。新纳粹的光头党员与孟加拉帮派的血腥冲突充满了报纸版面；塔村全面爆发结核病疫情，而这种疾病却是盛行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研究发现小孟加拉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不及四千五百英镑，三分之一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而获得学校供应的免费午餐，缺乏维护的住宅甚至出现崩塌的威

胁。整个地区不论在生活水准、卫生或教育品质等方面都在全英排名最后。此外，过度拥挤的现象也比全国平均值高出五倍，许多报导都指出这里常可见到三个儿童挤在同一张床上，而且男性失业率也比全国平均值高出一倍以上。于是英国把这些落脚城市视为一道社会问题，一座充斥帮派暴力与宗教极端主义，又落后又保守的孤岛，恶名昭彰的事例包括当地居民与光头党的冲突、对《撒旦诗篇》与伊拉克战争的抗议，还有一座座清真寺的尖塔取代了伦敦东区原本的基督教与犹太教堂建筑。欧洲与北美新兴的落脚城市虽然在水电、下水道以及网络连线等基础设施上一应俱全，有时候却不免对其原始住民显得陌生而充满威胁性，但亚洲的贫民窟则只在既有的城市居民眼中才显得如此。

在后来十五年间，随着第二代居民成大成人，第一代居民即把存款投注于教育和住宅，塔村于是出现大幅变化。今天，塔法德姐妹还是会经常坐在她们家的狭小住宅前和邻居聊天。大女儿拉吉玛已经三十三岁，她和丈夫阿苏德搬到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单身公寓，却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回娘家洗衣服，顺道探望两个妹妹。她们姐妹除了年龄增长之外，感觉上似乎仍和 1995 年那时一模一样。她们人生中的变化要到早上才看得出来，也就是她们出外工作的时候。拉吉玛走路到当地的政府大楼上班，她是教育局的家长协助专员。三十岁的苏拉玛搭乘公交车到一家中学上班，在那里担任数学老师。二十八岁的莎玛搭地铁到白银路(Whitehall)，在政府里担任主管，负责推动一项身份证的新方案。她们的兄弟扎赫尔现年三十二岁，是个工作稳定的汽车销售员，过着充满闲暇和娱乐的生活。最小的弟弟二十六岁，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仍由年迈的双亲照顾。三姐妹分别持有生物学、教育和公共行政的学位。她们操着一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音，但也带有伦敦东部色彩：在气氛轻松的时刻，她们说话常在句尾加上“对不”的口头禅。她们认

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并不打算生小孩，不然也要等到年纪大一点再生。而且，她们其中一人还背弃了一场娃娃亲，原因是她觉得对方配不上她。尽管如此，她们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她们戴头巾的打扮方式在东伦敦是常态，在孟加拉区却不免引人嘲讽，因为孟加拉奉行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女性通常不遮盖头部。奉行伊斯兰传统是移民第二代的潮流。落脚城市常可见到这类混搭文化，原因就是这些无根的孩子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传统文化能够为他们带来安全感和认同感。

在柯弗利广场四周，当初在 1995 年和塔法德姐妹一起坐在矮墙边的孩子，也都走上了类似的道路。她们有个邻居是六十岁的男子，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迈的多。他拥有两栋相邻的住宅，当初是在经历一场惨痛遭遇之后买下的。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独自来到英国，储蓄了好几年才开设了一家成衣工厂，雇佣了几十名孟加拉村民，后来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却因为成衣制造业萧条而破产，迫使他只能担任砌砖工人以及打零工糊口，没有能力把家人接过来。不过，他在东伦敦东区拥有的房地产救了他一命。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好几倍，他在过了三十年孤独又摧残健康的生活之后，终于得以把他的大家族都接到英国，并且过着舒适的生活。现在，他的子女、侄儿和侄女——其中超过十人都曾在这两栋房子里住过——都已成为医生、教师、公务员、电脑工程师。柯弗利广场的孩子都拥有一套相同的志向：被英国主流社会所接纳和认同，买一间房，并且永远不要在咖喱餐馆工作。几乎所有人都达到了这些目标，女孩的表现尤其出色。

这条小巷道上的孩子顺利成功，但其他地区的孩子却难以翻身，原因是什么呢？这条巷道本身可能就是部分答案。

“我认为不只是运气，应该和住在一个小广场有关，”莎玛说，“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名字，我们的父母从我们小时候就彼此认识，我们都上同

一所学校，从事同样的活动，一起出外露营。我们互相关怀。”在世界各地，落脚城市的成功或失败显然有一大部分和其外表形式相关——街道与建筑的排列，连接都市经济与文化核心的交通管道，建筑通往街道的方便性，学校、健康中心与社会服务的邻近程度，密集的住宅，是否设有公园与开发性的公共空间，居民是否能够在一楼开设商店并且为住户增加房间。

今天，塔村的许多孟加拉裔人口仍然住在塔法德一家所摆脱了的那种住宅，也就是地方政府在水泥空地上兴建的住宅大楼。尽管许多出人头地的家庭都来自这种住宅区，他们却声称这种环境遏制了他们的发展。四十二岁的莱拉住在贝斯纳尔格林的皮巴蒂住宅区(Peabody buildings)，她说：“我们完全没有找工作的途径，看不出自己有什么机会可以买到房子，也没有任何资产能够创业——我在锡尔赫特的村子里还比在这里好。”她没有搬走的唯一原因，就是她的孩子在学校表现得相当好，目前正在应聘电脑程序设计领域的高级职务。

伦敦的孟加拉裔人口落脚城市被描绘成一片充满犯罪、宗教极端主义与极差卫生条件的地方，虽然这样的描述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这里对于移民第二代却也充分发挥了融合功能。出生于伦敦的孟加拉后裔，这些咖喱餐馆老板与血汗工厂工人子女纷纷踏入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他们在学校里的表现优于聚居程度较低的移民族群，也远胜于英国本地的白人人口。在塔村，百分之四十六的孟加拉裔学生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所认同的五门课程都达到及格的成绩，仅略低于百分之五十一的全国平均，远高于该地区白人学生的百分之三十。他们一旦完成教育，摆脱低薪工作就容易得多。研究显示，外来移民在伦敦开创小企业比在其他欧洲城市容易的多，因此这里的落脚城市也就比较有机会成为成功的跳板，而不是贫穷的陷阱。对于这些乡村移

民而言，咖喱餐馆是种典型而且大致上非常成功的企业形态，是一种自我建构的经济与文化救援套件。不过，移民第二代却因为餐饮业工作辛苦，风险极高，且带有种族色彩的刻板印象，而摒弃了这门行当，转而投入金融、公务、教育及资讯科技业。不少落脚城市的第二代进入国内政治、媒体与学术圈，人数也愈来愈多。大多数人仍会把钱寄回村里，但愈来愈多的人只有遇到假期的时候才这么做。现在，每年从塔村迁往伦敦其他中产阶级区域的孟加拉裔英国人和来自锡尔赫特的乡村移民不相上下。换句话说，这个社区是一部运作良好的融合机器。

因此，一群学者把伦敦东区称为“进入英国社会之前的传统接待厅”，可说是相当贴切。实际上，过去十年来，大众对于塔村最大的担忧聚焦于其中的英国白人工人阶级居民。这群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乡村移民，成为一个孤立、缺乏自立能力又充满愤怒的下层阶级。尽管如此，落脚城市也不是对所有乡村移民都发挥了跳板的效果。许多人被困在这里，从事着没有前途的工作，住在公屋里，不曾受过教育，只拥有基本的识字能力，无法融入周遭社会。在伦敦的移民飞地里，向上层社会流动虽是常态，但有一大部分孟加拉裔人口却还是无法完全融入英国社会。

拉吉玛的丈夫阿萨德担心自己就会沦入这样的命运。他是拉吉玛的表哥（他的母亲和拉吉玛的母亲是姐妹），当初还没学会多少英语，家人就在伦敦帮他找了个新娘——主要是因为移民法收紧之后，这样的婚姻即成为村民在英国团聚的必要手段，但这种做法也复兴了孟加拉人一种几乎早已淘汰的保守习俗。现在阿萨德在东伦敦新兴的热门产业工作，也就是一家以美国南方州名命名的炸鸡外卖餐馆（招牌上还注明“依照伊斯兰律法屠宰”的字样），每天面对油锅十几个小时。如同这里的若干年轻人，不论在英国或孟加拉文化里他都显得格格不入。他

是落脚城市令人唏嘘的副产品，是错误政策下的产物，原因是制定政策的官员未能彻底了解这种社区的运作方式。

尽管如此，伦敦的这座落脚城市还是运作的相当不错，不但优于柏林、巴黎及阿姆斯特丹等地的这类社区，也为美国的拉美裔落脚城市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的榜样。经过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的重大教育失败之后，这座落脚城市现在已建立了一套健全而且充分利用资源的教育体系，不但有许多针对外来移民设计的特殊课程，也有认真教学而且熟知移民需求的教师；塔法德姐妹都把她们如今具备的优势归功于国立中学的教育。此外，真正的公民资格也确实可得；这座落脚城市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居民都拥有英国公民的身份，远高于德国土耳其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而且，这样的差异不只呈现在合法公民身份上，也表现在事实公民的地位上：尽管八卦小报仍不时刊登耸人听闻的标题，英国社会却愈来愈把落脚城市视为同胞国民的来源，而不是外来的威胁，在大城市尤其如此。在英国，百分之八十二的孟加拉裔人表示自己的种族与宗教背景并不影响工作机会，但德国的土耳其人只有百分之五十四这么认为。塔村东侧的斯比塔菲尔德已成为深受英国富裕人口喜爱的用餐地点与画廊集中区，也是艺术家的聚居处，从而把原本的落脚城市变为既有都市居民的休闲去处，而不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孤立流放地。

尽管如此，小孟加拉当中成就较高的第二代人口仍然迫不及待要逃离这个社区。对他们而言，落脚城市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已不再需要这里的支持网络。

“你要是在塔村待得太久，一定会头昏脑胀，”塔法德姐妹里年纪最小也成就最高的莎玛说，“我需要和各式各样的人士来往，不只是孟加拉人。”拉吉玛仍然梦想着离开英国——但是以成功专业人士的身份离

开。苏拉玛打算呆在东伦敦，买一间房，协助改善这个社区。这正是衡量一座落脚城市的标准：只要其中的人口有进有出，而且居民不论选择离开或是留下，都经过这里的滋养而资历成熟，并且为都市生活做出贡献，那么这座落脚城市就确实发挥了效果。要了解我们如何能够促成这样的成果，就必须详细检视世界上各个落脚城市的诞生、存续、成功、失败与衰亡。

第二章

由外而内：新城市的盛衰演变

最初的开端：小移动，大迁徙

寇赫瓦迪，印度勒德纳吉里

每年六月，孟买孱弱的年轻人都会远离水泥地和人行道上的石板，他们从城市北部那片密集住宅区的铁皮屋顶公寓和塑胶板搭建的小屋里涌出。这些多达数十万的年轻人都住在落脚城市的边缘，他们还不完全算是这里的居民，认为自己仍是乡下人。现在，在印度最大的水稻收成季节开始之际，他们又再次恢复了村民的身份。他们聚集在达达尔车站(Dadar station)，掏出储蓄已久的一叠叠卢比钞票，买下三等车厢的火车票(往返各需要一美金)，然后搭上康坎铁路的慢车，所有人挤在长椅上，脑袋伸出装了铁栏杆的车窗外。在吱吱嘎嘎的声音下，火车往南沿着阿拉伯海驶入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ta)的竹海与稻田之中，开始了长达八小时的旅程。

桑杰索卡现年二十岁，但外表看起来年轻得多。他在果阿邦(Goa)以北的勒德纳吉里跳下火车，背上的棉布袋装着他全部的家当：一条被单、一套换洗的衣物，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卢比。他情绪非常兴奋：过去的一个月，他都住在孟买北部的一家邻近火车站的茶店里，他的小房间只有四个平米大小，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现在，他终于回家了，参加一年一度的水稻收成与相亲季。他跑向一名骑在摩托车上等他的朋友，脚上陈旧的塑胶拖鞋在雨季造成的水塘里啪嗒啪嗒作响。他们骑车穿

越丛林里的道路，进入一片肥沃的空场，地面上是深红色的土壤，周遭满是浓密的绿叶。他虽然十一岁就去了城市，而且大概一辈子都有可能待在那里，但这里仍然是他的家。

如果你想亲身体验人口大迁徙的强烈冲击，亲眼目睹这个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乡村移往城市的初阶阶段，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相反方向的移动人潮中去，搭乘火车、船舶、大巴以及种种你叫不上名字的交通工具，在秋收的季节回到乡村去。这种归乡的旅程正是这些新进城市的人口最团结的时刻，而他们也最有可能在这时候建立起有助于他们在城市里永远落脚的人际网络。此外，也是在这时候他们最能意识到自己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中心地位。他们前往城市落脚，是一种乡村演变过程的一部分，刚开始不免受到季节的掌控，由个人为社群建立连接。除了战争地区之外，绝对不会有大批的乡村家庭一同迁入城市。城市化不是这么发生的，19 世纪欧洲和北美洲的城市化过程也不是这样。人口迁往城市的过程，总是个人或小群的乡村人口来回折腾，在农业与经济、气候与政治的拉扯下往返。

城市经济一旦衰退，例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在城市里还未真正落地生根的大批劳动人口就会迁回原来的乡村。近年来，中国的珠江与长江的三角洲地区都有大批的农民工迁回农村。英国与爱尔兰的波兰人口，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各个城市的乡村人口，也都同样出现了这种返乡潮。不过，都市生活的知识与人际网络不会因此消失。一些落脚城市的先驱们还待在城市里，与乡村保持联系，等待移民的周期性时间窗口再次打开。这是一种相互而且来回往返的移动，一方面促成乡村的城市化，另一方面也重新激发城市的活力。这是一种筛选机制，可让最有雄心也最有能力的人留在城市，其余的大量人口——通常占乡村移民人口的一半——则最后只能返回乡村。

桑杰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滑下陡峭的红土小径，冲向寇赫瓦迪这座小村庄。这里就是他的家乡，那些由土壤与木柴堆砌而成的小屋聚集在一条水位高涨的河流旁，位于一座树木浓密的山谷底部。无论在外人还是村民眼中，这里都是一片狭小但肥沃的天堂。儿童脱光衣服跳进河里，即可抓到肥硕的鱼儿；树上长着芒果和椰子，而且今年的水稻收成也相当好。桑杰受到热情的迎接，他母亲已经一年没见到他了，而且自从他十一岁离家至今，也已经将近十年半。他的母亲阿鲁纳为他准备了米粉与乳酪等丰盛的午餐，餐后还有芒果和菠萝蜜。他的家人围坐在泥地上，背后靠着一袋袋稻米，听着他讲述在城市里的见闻。

他的祖父西塔拉姆现年将近七十岁。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意识到自己的家族需要有一个现金来源——这是他们祖祖辈辈以前从来不曾考虑过的问题。在新铺设道路的吸引下，他率先踏上历时十四小时才能到达城市的旅程。他的村庄还得等上十年后才能享受到铁路、电话以及电力等便利的设施。

“我靠农田赚不到什么收入，”他说，“虽然还够维持生活，但我们有时还是免不了挨饿——如果遇上收成不好的时候，我们有些日子就没有东西可吃。所以，我原本只是想用钱买几头牛。”有史以来，这些靠种地糊口的农民首次需要现金。此外，他们简陋的小屋也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在他们眼中也愈来愈不卫生。他们一得知有瓦斯炉这种东西，也觉得自己有需要买一台。他们的村庄出现了学校，于是书本也成了必须购买的东西。就这样，他们的需求愈来愈多。西塔拉姆的水稻赚不了现金，这么少的收成，运送到市场的成本还高于全部卖出的价格（对于许多小农而言都似乎如此）。于是，他长途跋涉前往孟买，在一家杂货铺找到了工作，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九点。他把他妹妹接了过来，从事保姆工作，两人一起住在维帕勒（Vile Parle）的一间水泥地板

的小公寓里。在那个时候，维帕勒是孟买北部市郊一座繁忙的落脚城市，其中的居民几乎都和西塔拉姆一样，完全为自己的乡村而活，每个月把钱寄回家，每隔几年才回乡探望亲人。1969 年，他们在村里盖了一栋坚固的新房子，屋顶铺着他们储蓄了三年才买下的陶瓦。他们与孟买的既有社区发展出紧密的连接。西塔拉姆返乡娶了村里的一个女孩，却经常长达五六年都见不上一面。他们只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达胥拉斯，一辈子都待在村里种植稻米，照料着家中的农耕生活，父子合力赚取看似愈来愈多的现金。

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乡村与城市之间愈来愈频繁的往返移动就是城市大迁徙的开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南美、中东、亚洲与非洲的制造业经济繁荣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连续的遍布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风潮，于是散居乡间的农民开始考虑利用在收成期之间的空当到城里工作。另一方面，农民也感受到了若干新出现的压力，种地开始需要购买种子与化肥等原料；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在道路与电力的吸引下出现了想要拥有车辆和电器的念头；更重要的是，电话与收音机开始传播信息，因此偏远村庄的居民也都知道城市里的收入远高于乡村。一开始，政府为了促进工业成长而鼓励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在那个时候，确实需要让缺乏生产力的农民迁出人口过剩的乡村，为工厂补足劳动力。

到了桑杰出生的时候，这种模式已经开始转变。他在学校待到了十六岁——当初他的父亲压根就没有这种机会。不过，桑杰从十一岁开始就每年抽出几个月的时间到孟买打工，从事各种基本工作。而且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家中必须搬到孟买的成员。他迁往城市的举动还受到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政党湿婆神军党的协助，这个政党不但为乡村挖基铺路，也帮助村民到城市中谋生。学校毕业后，桑杰在茶叶店里找

到工作，每天从黎明做到傍晚，晚上则带着他那袋家当，和另外三名年轻人一起睡在茶叶店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现在，桑杰已经几乎确定会成为每年从乡村到孟买定居的十万人口当中的一员，他们有百分之九十二都宣称自己再也不想回乡村居住，就算在城里面失业也一样。这些人几乎全都是从自己从小到大成长的乡村直接迁往大城市，途中没有中转站——当今世界各地的迁徙模式几乎都是如此，海外移民也是。桑杰家乡的有些邻居也搬到了孟买，在建筑工地工作，这些工地的所有工人都是直接来自乡村。从古到今，世界各地的大城市的新进人口几乎都是乡下居民。

在孟买这类地区，工作的定义已经大幅改变。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是以专业性的终身制为主，再搭配少数的低薪服务性工作。现在，这些城市已迸发成一片复杂庞大的工作之海，除开一小批仍然存在的终生雇佣制员工之外，更多的都是各种非正式工作：没有执照的小型商店或摊贩、包括保姆及运输业的服务性工作，还有建筑和小型制造业的短期工作。过去一向认为这种非正式的经济不值一顾，只是工业经济边缘的寄生物，然而，现在这种经济却涵盖了发展中国家四分之一的工作，在北非达到三分之一，在拉丁美洲达到半数，在印度达到百分之七十，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这种劳动工作通常比较缺乏保障，也没有工业工作所提供的社会安全福利以及长期就业保障——但这种工作职位最大的好处，就是几乎所有刚来到城市的人口都可以从事。整体而言，这种非正式的自营经济虽然比较混乱，也通常不纳税，但比起原本的终生职业，却能够为乡下移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来源。自营工作是落脚城市的起点，现在也成了全球的常态。

“在我祖父那个年代，你必须找到一份职业，”桑杰说，“现在则是找

些工作来做。”

目前桑杰是家里的一大现金来源：他每月寄回家一千五百卢比（约三十二美元），是茶叶店薪水的四分之三。家人把这笔钱花在煤油、木柴、店里、厨具、牲畜饲料、教科书与医药——现在这一切在乡村都已经成了必需品。这笔钱让他的两个妹妹能够待在学校念书。两年来，他存下的钱已经足够盖一座牛棚，增添家里在乡下的收入。他每年返乡探亲一次或两次，都是在收成季节或假期的时候。他非常想念家乡，每个月都会到孟买住处附近的电话商店打电话给家人，他的家人则会到一个拥有家庭电话的邻居家里接听。他正在存钱买手机，他村里已有七八个人拥有这种东西。在这个满是非正式工作与简陋商店的城市世界，手机已经和煤油一样，成了穷人生活的必需品，不仅仅是他们联络家人缓解乡愁的工具，甚至也是他们枯寂生活中唯一的娱乐来源。

桑杰一家人接触城市生活与工作虽已接近六十年，但仍然是仅够糊口的农民，不过他们对此已非常满足。孟买的劳动工作使得他们那片面积极小的稻田得以微微提升产量（但仍然仅够自给自足），也让他们得以拥有暖气、电灯、教育、收音机、也可以收看村里的电视。如同经济学家纳拉扬（Deepa Narayan）所言，发展中国家的乡下贫民靠着农耕、商业与移民回款等“联合收入来源”规避不同层面的经济风险。城市原本只是他们所运用其中的一项工具，但其文化与习俗却在不久之后对乡村造成了城市化的影响。就文化上而言，桑杰家里的男性成员都是城市人：他们说的语言是孟买那种掺杂了北印度语的马拉地方方言，喜欢讨论城市政治与宝莱坞的八卦消息，在村里的社交网络也包括了其他在城市里居住过的村民。不过，尽管他们在落脚城市的边缘生活了几十年，却没有人想要永久迁入落脚城市。桑杰很可能会是第一人，原因是他和祖父之间有一项难以察觉却非常重要的不同：以前，到

城里工作是为了支持乡村的家人生活而不得不去;现在,乡村却成了支持桑杰的力量,也是他在城里打拼事业的安全网。在城市里立足已成为其首要目标。

遇到休息日,桑杰就会攀附在市郊火车的车厢外,横跨孟买所在的半岛,享受探访同乡朋友的乐趣。寇赫瓦迪的年轻移民还没聚集于同一个乡里。其中有许多人——也许多达半数——最后还是会回到村里。对于桑杰村里绝大多数的邻居而言,到孟买工作是一项进入陌生世界的重大变化。他们将远离村庄至少十年以上,甚至整个余生都将待在城里,只是偶尔才能回到逐渐陌生的家乡探望家人。

许多人在城市里的起步都与阿恰娜·科尔卡顿颇为相似。这个十六岁的小女孩小时候和桑杰住在同一条路上,家里是一间泥土与杂物堆砌而成的小屋子,同住的家庭成员包括她的父母、叔叔、阿姨,还有哥哥与妹妹。三年前,一种不知名的病害摧毁了寇赫瓦迪即将收获的几乎所有农作物。阿恰娜和他的哥哥与妹妹,是科尔卡一家人当中最早搭乘火车沿着康坎铁路北上到城里找工作的成员。

现在,阿恰娜住在戈尔甘(Goregaon)一间中产阶级的大公寓中,晚上就睡在客厅的抛光大理石地板上。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孟买西北部地区,她为一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夫妇担任家庭保姆。这对夫妇在宝莱坞电影业从事编曲工作,他们的家族同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因此通过当地的人脉网络找到了阿恰娜。阿恰娜一周工作六天,负责烹饪、清理与维护家中的整洁,晚上就睡在夫妇卧室对面,早上必须比那对夫妇早起准备早餐。

阿恰娜从事这项工作完全没有报酬。她的雇主和印度许多中产阶级夫妇一样,把她囚禁在封建制度的残迹里,承诺保障她在城市里的生活,并且在收获季节到来之前汇些款项维持她家人的生活。更重要的

是，她大概十八岁会和村里的男孩结婚，而她的雇主保证届时帮她支付嫁妆及其他花费。嫁妆向来是贫穷农民的一大负担，在印度最为严重，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多多少少存在。印度自从1961年就禁止嫁妆陋习。尽管如此，对于许多贫穷家庭而言，嫁妆仍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笔单一开支。嫁妆的内容通常是一辆摩托车，或是相当于一年收入的黄金和现金。对于日常生活不仰赖现金的农民而言，嫁妆是一项极大的负担，也经常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嫁妆金额迅速攀升，几十年前，嫁妆只需要一小笔钱和一头牛即可。于是年轻女孩的父母也就必须背负这项沉重的负担。阿恰娜的雇主声称他们是帮阿恰娜把薪水存起来，而她也乐于接受这种安排，但这种雇佣模式仍然符合普遍认知的奴役定义。由此看来，阿恰娜显然会在婚后返回家乡，因此她迁入孟买的经历也就会像许多人一样，纯粹只是偶发的短暂现象。她也一心想要返回家乡。

“我很想念竹林的味道，还有我们在村子里一起唱歌，”她一面清理着地板，一面对我说。尽管如此，却还存在另外一个强大的力量吸引着她在城市里永久定居下来，只是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而已。这股力量就是她二十一岁的哥哥阿南特，他已经在孟买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的维帕勒已是孟买机场附近一片混杂了林荫大道与拥挤贫民窟的区域，我就在这里的一间密闭空调的病理实验室与阿南特见面。他在孟买的起步过程甚至比桑杰或他自己妹妹的经历都还要吃力。这名又高又瘦的年轻人和他妹妹同时来到孟买，住进了他叔叔的单身公寓。这个叔叔在城市里住了二十年，自认为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城市人。阿南特和他叔叔待在家里一个月之后，终于在一家生产弹簧的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份工作非常辛苦，工资又低得令人乍舌，一个月只有一

千两百卢比(二十五美金)。后来,他又到了一家办公室清洁外包公司工作了四个月,彻夜清洁打扫,领取每个月两千五百卢比的薪水,仍然完全不够他自立生活。不过,他的运气却有一天突然转变,就和许多传奇的乡村移民一样。一天清晨,他正在清理一间健身房,和一名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富有医生聊了起来,也帮他调整杠铃的重量。他们在健身房聊得相当投机,不久阿南特就被那名医生聘为助手。他在实习期间的月薪是三千卢比(六十三美金),因此得以存下一笔钱,在价格高昂的孟买贫民窟房地产市场中,找到比较好的位置,买下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他说他想念家乡的水稻和牲畜,但发现都市生活能够给予他的家人以前根本梦想不到的选择,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让全家人都搬到城里。

过去数十年来,大多数的政府和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像桑杰、阿恰娜与阿南特这类人口的往返迁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尽管拉丁美洲、非洲与亚洲的大城市都充斥了贫民窟及其他自发性的落脚城市区域,一般人却都还是认为这个世界鲜明的划分为乡村和城市。城市里虽然有乡下工人,但他们却被视为一群暂时过渡性的人口。学者与官员都普遍认为,乡村居民就算偶尔到城市打工,也仍然终生都会是农民。因此,尽管有农村政策与城市政策,却没有关心到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处。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英国地理学家及移民学家斯凯尔顿(Ronald Skeldon)研究了秘鲁库斯科(Cuzco)乡村居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往返首都利马的旅程之后,从中发现了一项模式。来回往返的迁徙活动的确是发生中的事实,只是时间经常横跨好几代人。不过,最终会出现一个关键变化点,于是整个家族乃至整座村庄都把生存与投资的目标转向城市,从此不再依赖农业。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移民转型。有时候,这种

现象需要好几代人才会出现，有时候则只需要几年。时间长短的差别似乎主要取决于通讯与教育：接受过学校教育并且拥有城市资讯来源的人口，通常不会再来回折腾，迟早会彻底转型为都市人。

斯凯尔顿发现，在这项转型的核心中，存在着一种特定的都市空间。“不论来自哪个乡族，最早的移民通常都会先定居在利马的中心地区，”他写道，“过了数年之后，他们一旦在城市里站稳脚步，就会外移到城市外缘的新兴区域或年轻板块。市郊聚居地来源乡族的链接一旦建立，移民通常就会直接落脚于这些聚居地。”这段文字精确地定义了落脚城市。

几乎同时间，美国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检验了欧洲与北美农村居民迁徙至城市的历史，结果发现人类迁徙不只有一种类型。以前总认为迁徙的决定取决于推力与拉力的作用，所谓推力就是生活艰困与饥荒等问题，逼的乡下居民不得不离乡背井；拉力则是城市诱人的就业机会，吸引着人口向城市移动。蒂利指出，这两种因素虽然通常都确实存在，但迁徙的决定却很少与这两者有关。他发现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迁徙有三种主要类型。首先是循环式移民，例如法国利穆赞(Limousin)的石匠，数百年来每年都会从乡下的农场前往巴黎市中心拥挤的落脚城市，在冬季从事城市里的建筑工作，但每年也会有少数几个人永久定居下来。另外还有职业移民，到城市里从事技术性工作或是进入政府或军队服务。这些人多多少少都会永久定居下来，但他们通常不再是乡下农民，相比之下人数也不多。第三种迁徙类型则是他最重要的发现，也就是数量最多的连锁式移民。这种迁徙活动“通过一套社会架构，由迁徙目的地的人口为新移民提供援助、资讯及鼓励，而促成一组组相关的个人或家庭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

就这样，他发现了世界人口大迁徙背后的中心机制。这种移动不

是拉力与推力造成的结果，也不是经济结构下的被动牺牲（这是另一群学者的推论），而是乡村与城市之间创造出来的一种新文化。这正是像桑杰这样的季节性移民被吸引进入城市而转变为城市人的过程。从原本的循环式移民转为定居人口，从而协助其他人的迁徙活动，他们因此而能够在城市里建立一个更为稳固的村民基地，打造一套非正式的制度，使得更多村民能够持续流入城市，也使得移民转型得以发生。

此外连锁式移民也需要属于其本身的特殊都市空间，由这个空间主持连续不断的双向移动。蒂利指出，连锁式移民“通常会造成相当比例的实验性迁徙，也会促使大批人口流回来源地。在迁徙目的地，连锁式移民通常也能够造就持久的社会关系，由相同出身的人口构成。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类移民会组成都市村庄。”这种持久性社区与都市村庄就是落脚城市最纯粹的形式。一旦从这个角度理解落脚城市，即可看出这种社区对城市和农民发展的重要性。落脚城市不只是贫民窟，收容遭到城市淘汰的失败者，也不只是短期劳动力暂时栖身的地方，而是城市重生与活力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套筛选机制所产生的结果，则是世界上最有创意也最有韧性的人。虽然一般人常以为贫民窟的居民是资本社会的失败者，但迁入这些简陋社区的个人与家庭却是乡村至城市大乐透彩票的赢家，是乡村的顶尖精英，是一群志向高远的人中间最成功的成员。“来自乡村的移民带有非常高的志向，通常比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志向更高，”研究贫民窟学校与社会情况的巴西学者古德斯（Pattica Mota Guedes）说，“他们一直都拥有离开城市返回乡村的选择，多达半数以上也确实这么做。在城市待了下来的是最坚韧也是最聪明的人，而且他们能够承受许多的变化。”或者，就像肯尼亚一名城市规划官员所说，“贫民窟的居民普遍都比城市人口来的坚韧。”

诞生之痛：落脚城市的成形

坎兰格查，孟加拉达卡

首先来的是带着锯子和开山刀的男人，开辟了城镇边缘低洼的沼泽地。接着来的是家庭，推着一车车的砖块与木材，穿越泥土小径来到他们买下的小片土地，建构起初步的地基。往后几个月则是到处捡拾可用的材料，把泥土、树枝、木板、铁罐和塑料片混合在一起，砌出一套单间小屋的雏型。在达卡西南角这个快速扩张的区域，在这座几年前还满布着沼泽农地的岛屿边缘，房屋都采取东亚风格的建造方式，盖在竹子搭成的高架上，以免被不可避免的洪水冲垮。再往前走一段路，洪水就不那么常见了，因此房屋也改以砖块和木板盖成。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中国重庆以及尼日利亚拉哥斯，同属目前全球成长速度最快而且移民人数最多的都市，其贫民窟房屋的密集程度极为惊人。房舍彼此紧邻，围绕着小小的中庭，孟加拉语称为“巴斯提”，由土地的所有人建造而成。在这里，季节性的暂时迁徙转化为顽强的永久聚居地，于是，一座落脚城市也就因此诞生。

接着来的是杰纳尔·阿贝丁。这个年轻人身穿熨烫笔挺的衬衫，充满耐心。他提着一只小工具箱，走在小径上，家家户户一一拜访。他是这个新兴社区和大都市之间的第一道连接。他向新来的家庭打招呼，询问他们的名字，写在塑料封皮的账册上。他提供忠告，也散播各

种消息,包括街坊的传言、社区面临的威胁或是工作机会。他聆听对方讲述他们的经济困难,然后收取一小笔钱。他在房屋外面做上记号,并且许下承诺。

杰纳尔是有线电视收费员,因此也是这座新兴贫民窟里极具权势与影响力的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线电视是这里最早出现也最可靠的公用设施,比起自来水、邮递服务及下水道,时间上早了几年乃至几十年。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不论南美、亚洲或是中东,有线电视收费员都是贫民窟里的一大影响力。在孟买庞大的贫民窟里,有线电视收费员是犹如黑帮分子般的人物。他们是地下帮派的代表,握有放贷以及左右政府施政的权力。他们的一句话,即可决定贫民窟里的某个地区是否遭到拆除。在巴西的贫民窟,每个家庭平均拥有一点五部电视,百分之十四拥有计算机,百分之七拥有互联网,于是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也就成了贩毒帮派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杰纳尔握有的权力比较温和;他十八岁那年,在担任有线电视安装员的父亲协助下,买下了他目前服务的区域,自行连接上有线电视干线,然后又凭着自己的双手在这座不断扩张的贫民窟里铺设有线电视缆线。他是企业、房东、房客及其他地下人物的中间人。他提供三十个频道的套餐选择,每个月收取两百塔卡的费用,相当于三美元。这三十个频道的节目包括印度音乐剧、孟加拉肥皂剧、波斯湾新闻报导与英国板球赛转播。每一座“巴斯提”都至少有一部电视播放着这些节目。若在晚上穿越贫民窟,就会发现四面八方都是一簇簇蓝色的光芒,到处都飘荡着嘈杂的音乐。

在这个过度拥挤的亚洲贫民窟里,居民都是从乡村迁徙而来,赚着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在这种环境下,有线电视业竟然能够经营得如此成功,也许会让人觉得是种古怪又难以理解的反常现象。但我们

如果这么认为，则是因为彻底误解了落脚城市及其居民的本质。在外人眼里，这里显然是个失败者聚集的社区，居民只能住在最脏乱鄙陋的住宅里：建造于高架上的房屋外墙粗厚、摇摇欲坠，而且就立在开放粪坑上。房屋之间阴暗的走道不到一米宽，挤满了牲畜和没人照顾的儿童，而且到处都是垃圾。不论是西方人还是达卡这类大都市的居民，都认为这样的地方必然是失败者的最后栖身之处，其中聚居的都是遭到工业社会淘汰的底层人口。不过，这样的看法却忽略了一项事实：这里的居民认为脏乱只是暂时性的现象。他们不但努力投入各项投资，整个社区也致力于追求理想的目标。有一天，这里将会成为一个环境清爽的社区，地面平整，拥有充足的灯光照明，享有合法的地位，卫生清洁，而且和都市完全连接。居住在达卡这个角落的两万人口，以及占了达卡人口总数百分之四十的五百万贫民窟居民，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多年的奋斗与储蓄才来到这里。他们进军城市，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规划、计算与思考的过程。这种现象可以见证在欣欣向荣的有线电视业上（有些从业者也已开始提供互联网服务）、热门的手机服务业、信贷来源的繁杂网络，以及激起了初步消费主义的电器与家具商行——尤其是井然有序的房地产市场，可让贫民窟居民购得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落脚城市的贫民窟能够促成向上的社会流动，至少也能让人设法抓住社会流动的机会。套用联合国一个机关的说法，这些社区不是“绝望的贫民窟”，而是“充满希望的贫民窟”。

杰纳尔·阿贝丁懂得这一点。他亲眼看着坎兰格查的后街小巷，从原本临时搭建的杂乱住宅，发展成为一座恒久的现代化城市社区。他首先见证了那些孤身在城市里工作居住了许多年的男男女女，宣称自己拥有某一处房产；接着是每个月寄回乡村的一包包现金；再后来则是他们的家人跟着迁徙而来。许多人都在几个月之后就离开了这里，

有些是因为挫败失意而打包回乡，有些则是搬迁到更接近市中心的贫民窟或是环境较好的邻里。穷人搬家相当频繁，落脚城市在兴起之初都充斥着不停的移动与变化。杰纳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住在这条街上的人都很穷，他们都来自巴里萨尔区。”他描述的对象是一排快速兴起的简陋小屋，其居民来自南方一百二十公里处的一座沼泽农耕区域。“这里的男人都是司机，但他们存了很多钱。”这座岛屿以三轮车(tuktuk)司机众多而闻名，三轮车则是达卡主要的大众运输工具。这种工作的体力负荷极大，从业者早逝、沉溺于毒品与酒精以及罹患艾滋病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可以让贫穷的新进移民在短时间内赚得像样的收入。男性通常会先从事这种工作几年然后再转入工业或建筑业任职，虽然收入较低，但比较能够兼顾家庭。愈来愈多的女性则是在达卡当红的成衣制造业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孟加拉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其中的落脚城市都使得女性逐渐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她们在这些社区中也扮演了重要而醒目的角色。

沿着杰纳尔的电视缆线走了一段路，我遇见了瑟琳娜·阿克特。二十二岁的她外表优雅而严肃，在三周前刚从邻近孟加拉国西部边界的切尼达(Jhenaidah)来到这里。她的单间住宅是一对来自北方的夫妇建造的，但那对夫妇还来不及把门窗装好，就因为对城市生活幻灭而搬回了乡下。现在瑟琳娜身穿色彩鲜艳的纱丽(这是孟加拉国女性传统服装)，正忙着为她的家人装修室内空间：一张床垫摆在床架上，还有一两米的地板供她三岁大的孩子睡觉；后面有个小小的烹饪空间，设置三口瓦斯炉，上方则有个收纳物品用的阁楼。她和另外五个家庭共享一座泥地庭院和一组火力较大的户外炉火。

“这里的空间比乡村小得多，但生活条件比较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她对我说，“我一有了孩子，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到达卡来。我们在

这里没有家人陪伴，但我们在城里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乡，他推荐我们住这栋房子。我们家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

三年前，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健康的男孩。她居住地的儿童过得并不好：那里经常会发生季节性的饥荒，主要是因为农田投资不足，又缺乏管理，以致当地的家庭每到冬天就出现缺粮的现象。再加上邻近的恒河支流经常泛滥成灾，儿童死亡率和慢性病发生率也就高得惊人。瑟琳娜的父母虽然被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她和她先生却决心不让他们的儿子在冬天挨饿。她的先生在达卡做粉刷工作，刚开始只能睡在人行道上。他寄回家的钱不但足够家人在冬天买米吃，还在三年后存到了将近七百美元，足以在贫民窟的“巴斯提”买下一个单间小屋。他们选择到这里的原因就是这条街上的居民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村里，构成了一面完善的社会网络。凭借着粉刷房屋，她的先生每个月可以赚得三千五百塔卡（五十美元），这是落脚城市典型的薪资，刚好足够每天吃两顿饭，寄钱回乡村，并支付每个月十五美元的房贷。这样的收入虽然够他们应付目前的生活，但他们还必须赚更多钱，才有可能打造理想中的未来。瑟琳娜想要到一家成衣厂工作，以便存钱让儿子上私立中学。不过，她如果要去工作，孩子就必须有人带才行。所以，她可能得先找到合适的小学才能开始工作。她的计划就在这一点上和坎兰格查这个地区产生了冲突，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贫民窟的房子价格比较便宜：这里位于达卡的市界之外，所以居民享受不到达卡市的学校、用水、下水道及各式设施及福利。这条街上及附近的所有居民，都在赌，赌这座移民社区将会成为一股强大的人口与政治力量，而迫使达卡市政府将其纳入市区。这样的期待颇为合理，因为达卡先前也曾对其他几个贫民窟采取这样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有不少比这里更大也更根深蒂固的贫民窟，则是遭到了拆除的命运。

同所有落脚城市一样，这里的居民也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奋斗。落脚城市是世代沿袭的发生地，父母经常为了替孩子争取较好的机会而牺牲，一辈子生活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这里的生活比在村里辛苦，也比较没有时间放松，可是现在我可以为我儿子怀抱梦想，”瑟琳娜说，一面带着儿子到位于几百公尺外的抽水泵，在出水口下替他洗澡，“我不谈我的梦想——梦想只要一看就会消失无踪。可是我一定会送他去上学。我会找出办法的。”

她的决心对她会有帮助，但在这座充满敌意的都市里，在这个并不真正了解落脚城市的世界里，她面临的挑战却才刚刚开始。

落脚城市建立在一种相互矛盾的逻辑上：身为外来的乡村移民，在都市里又没有真正的收入，绝对住不起都市的房子；然而，要摆脱外来乡村移民的身份，又一定要先在都市里找到地方住。这项矛盾有两种解决方式。首先，你可以仰赖同乡的人际网络帮你在都市里找到一个暂时的栖息之地；然后，你需要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并且以远低于市区的价格买一间房子，唯一方法是找寻卖相最差或者城里人不屑一顾的房源，例如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或缺乏公共设施，或者因为地理、气候或卫生因素而被视为无法居住的地方，诸如里约热内卢或加拉加斯（Caracas）的悬崖边，东亚备遭废水污染的卤咸地、垃圾堆、铁路或国际机场的边缘，以及许多城市脏乱恶臭的河畔冲积平原。

20世纪40至70年代是落脚城市最早的兴盛期，当时取得土地的主要方式就是自行占用。乡村移民通常成群聚集在市中心的廉价宿舍，然后直接占用一片无主之地，画出道路，搭建房屋，盼望未来的发展一切顺利。这样的土地通常是属于政府的公有地，或是缺乏登记资料。到了这段时期结束之际，“土地侵占”在拉丁美洲已成为一套完善的体制，而且这种做法也散播至中东与非洲，还有亚洲的部分地区。土地侵

占被视为暂时性的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遭到侵占的土地，甚至是反复遭到拆除并夷为平地的区域，都已发展成完全城市，居民多达数十万，不仅有政府机构，也有富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与内部经济。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Dharavi，人口八十万）、卡拉奇的奥兰吉（Orangi，五十万）、加纳的阿矢曼（Ashaima，十万）、秘鲁的埃尔萨尔瓦多（Villa el Salvado，三十万）以及自行建立的伊斯坦布尔市郊（超过一百万），刚开始也都是外来移民占地聚居的简陋社区，现在却已纷纷成为颇为成熟的都市经济体，其中由移民经营的工厂多达好几百家，产生的经济输出也非常可观。

不过，土地侵占活动在目前已经罕见得多，这样的演变也事出有因。首先，当前的土地通常都已属私人所有，业主身份明确，不像土地公有制，也不像发展中国家早期的土地归属那样模糊不清。第二，几乎所有的乡村移民都希望对自己脚下的土地能够享有明确的所有权。他们要求所有权必须清楚明白，至少也必须获得保障，并且享有保证占有权，就和中产阶级的业主一样。因此，坎兰格查这类地区的贫民窟小屋，绝大多数都可供私人拥有，而且经常成为房贷竞争、资产投机以及其他各种房产买卖的金融操作对象。这种所有权也许缺乏正式登记，没有法律上的地位，却是落脚城市居民人生中的核心要素。“不论土地使用类型或者住宅质量，劣质住宅都在现行市场上广告、出售及出租，”一群学者调查贫民窟的住宅状况之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今天，城市郊区的土地主要都经由市场交易取得，即便在较为团结的非正式地区也是如此。”落脚城市的住宅虽然形象低落，却绝非免费，甚至也不便宜。贫民窟里的土地价格通常比富足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还要高（但分割的面积却能够比这些富有地区小得多）。此外，贫民窟居民为水、煤气和电这类商品付出的价格也通常是最高的，因为这些资源必须由卡

车运送过来，而且通常由当地企业垄断。在城市立足是一项昂贵的投资。

瑟琳娜·阿克特和她的邻居把一生的储蓄和精力全部投注在落脚城市，自然不会希望这里只是一座恶臭的贫民窟。不过，就目前而言，有个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处，享有基本水源(尽管距离遥远)、安全网络以及若干程度的工作机会，已经是她能力所能达到的最佳成果了。往后几年的发展，以及孟加拉国各级政府与各个机关的政策，将会决定坎兰格查这个角落的未来：一种可能是陷入停滞与孤立，变得愈来愈绝望，充满暴力与贫穷；另一种可能则是成为一个愈来愈稳固而恒久的都市社区，为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并且产生一群稳定的中产阶级，足以确保这座都市未来的活力与安全。

由于落脚城市普遍遭到误解与猜疑——经常被人鄙夷为停滞不变的“贫民窟”，而不是变动活跃的地区——以致各国政府在过去六十年来都一直致力于遏阻落脚城市的形成。但一开始的情形并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外来移民占地聚居的都市飞地原本是受到容忍的。当时工业成长速度极快，似乎再多的乡村移民也不足以填补都市短缺的工人，而且各国也都明了城市化的价值。后来，随着都市经济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变得愈来愈不正式，从事制造业工作也不再是乡下移民的主要目标，政府与国际组织于是执着认定“过度城市化”的情形已然发生。当时许多学术界人士对农村生活怀有理想性的浪漫想象，因此这两种观点也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效果。

如此一来，政府政策于是以遏制人口大迁徙为主，采取的手段包括劝止或阻碍村民移入大城市，不然就是把这些移民人口分流到其他地区。这种政策极少发挥作用，但在这类政策当中，效果最强烈而且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这项制

度彻底阻绝了任何城市化的发展（但仍阻止不了千百万的农民在城市里落脚立足，因此在较为开明的政策出现之后，许多落脚城市也就立即随之成形）。其他的威权国家，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与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也以实质措施遏阻了人口的迁徙。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一旦禁止或限制乡村至都市的人口迁徙，通常也见不到经济成长。没有城市化，经济就会随之停滞，人民也常因此挨饿。

其他政策也同样有害又缺乏效果。印度尼西亚强迫六十万户家庭从爪哇岛中央的村庄迁往较为偏远的地区，部分原因是为了巩固政治控制力，部分则是为了避免城市化。这项做法不但有碍于雅加达的快速都市化，甚至还可能加速了人口向都市的移动。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越南、坦桑尼亚、巴西及南美安第斯山脉各国，也都曾经采取大规模的措施，把人口安置在城市以外的地区，但同样无助于减缓或降低都市的发展，而且经常对经济及千百万人的生活造成严重损害。落脚城市仍然不断出现，却因为政策的打压，以致无法蓬勃发展，也无法转变为正式而舒适的都市社区。针对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Dar es Salaam）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进行的研究发现，管制迁徙活动的法律导致穷人的生活更糟，而且又造成深层次的腐败情形，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想要迁徙的人就必须贿赂官员，如此又进一步导致落脚城市的犯罪现象更加恶化。

巴西的军事政府大概是各国当中最致力于遏止落脚城市形成的政权。他们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做法：把北部农民大批移入亚马逊盆地；兴建中转性的目的地城市，新首都巴西利亚即是一例；提供补助强化既有的中型人口聚居中心；立法禁止一切国内迁徙活动：设置路障与检查站阻止人口迁移；并且增加全国预算以促成“人口的合理与宽松分布”——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而，这种种措施却都阻止不了里约

热内卢与圣保罗等大城市出现贫民窟，而且发展的速度还高居世界第一。一般人经常只看见这些“法维拉”的暴力与脏乱现象，而忽略了一项事实：这些地区的移民没有人返回家乡，原因是这里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好，他们的未来也比较有希望。

人类学家帕尔曼（Janice Perlman）最早看穿一般人对落脚城市的误解。她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待在里约热内卢的“法维拉”，从事当时热门的“边缘性”研究，研究对象是其中的农民迁徙人口。她原本预期这些移民都是“在孤独而失根的情况下从乡下来到这里，还没准备好也没有能力彻底适应都市生活，因此总是充满焦虑，一心想要返回家乡。为了自我防卫，他们把自己隔绝在一小片乡村式的飞地里”。不过，在她1976年的突破性研究《边缘性的迷思》（*The Myth of Marginality*）里，她却得到了以下的发现：

“经过仔细检验所揭露的真相，其实复杂得多……在表面的脏乱之下，隐藏着一个精心规划的社区，不但善于利用有限的住宅空间，也采取创新的建造技术，在城市规划者认为太陡峭的山坡上兴建房屋。恒久的砖造建筑，全都是一个个家庭累积储蓄而来的成果，点缀着这个地区。他们都是一点一滴、一砖一瓦地把房子建造起来。”

帕尔曼指出，这些一般人认知中的边缘地区，其实都是“奋力追求地位提升的社区”，建构这些社区的人是“活力充沛、诚实正直、充满能力，只要获得机会，就能主动发展自己的邻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法维拉将会自然演变成为富有生产力的社区，与城市彻底结合”。但她也提出警告，指称这些充满活力的社区有陷入困境的趋势。“简单来说，他们具备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忍，与爱国者的价值观，”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所缺乏的，乃是实现梦想的机会。”

她的观点，还有其他与她认知相近的南美学者所提出的看法，逐渐

吸引了巴西领导阶层的注意，尤其是后来在1995年当上总统的经济学家卡多索。20世纪80年代末期，巴西对这种现象首度展开深入研究，结果发现迁入都市的移民不但为原本的农民创造了更佳的都市生活，而且法维拉的居民在城市待了十年之后，经济与社会地位平均也都高于本来的城市居民。换句话说，不受阻碍的落脚城市是种极为有效的发展形式，效果优于目前已知的各种经济、社会及人口控制政策。

到了20世纪末，许多经济学家与部分政府都已意识到，农村至城市的人口迁徙不仅不是贫穷国家的问题，还是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实际上，世界银行在2009年针对这项议题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研究，结果发现削减贫穷与促成经济成长最有效的方法，乃是鼓励人口迁徙，促使都市人口密度成长至上限，并且促成最大都市的成长——前提是乡村移民抵达的都市区域必须获得大量投资，也必须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历史上首度彻底承认落脚城市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在许多地方，官方的态度仍然远远落后于这项宏观的认知。即便迟至2005年，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仍然向研究者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限制乡村至都市的人口迁徙活动。

发展停滞：无法落脚的城市

深圳，中国

十六岁的姜淑芳独自从广西省山上的村庄来到深圳，在一家电子

厂找到工作，也在这里坠入了爱河。她的男友性格腼腆，比她大了六岁，轮班时间和她相同，但座位在另一张组装台上。他名叫骅长战，来自更内陆的湖南省。在这片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异乡的工厂群里，大多数人都是还没有孩子的年轻人，工作生活也经常孤独又缺乏朋友，于是这对情侣到哪儿都如影随形。两年后，由于工厂倒闭，他们只好一同前往深圳的劳动机构与就业中心，找寻理想的工作机会：也就是月薪至少在一千八百元人民币以上（两百六十三美金）的工厂，而且有两个以上的空缺。一般人也许会认为这两个年轻人会找个地方同居，但尽管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结婚并且共同建立家庭，同居却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在找房子，"姜淑芳一面看着中介的租房广告，一面对我说，"可是我们宁可住在不同宿舍，而且是小宿舍，一个房间住四到六个工友，因为这样便宜的多，也方便的多。我们如果住公寓，就绝对存不了钱。"

她说的没错：他们如果搬出上下铺的宿舍而另觅住处同居，就会毁掉自己经由储蓄而在城市里立足发展的机会，更不可能到其他城市买房子共同生活。他们虽然交往了很久，感情也极为稳定，两人单独共处一室的次数却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他们两人都喜欢深圳的热闹生活与较高的工资，也希望能够找到方法定居在这里，但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在这里真正扎根。除了房价高的无法负担之外，这座城市的一些政策，也让外来务工人员对在这里生养小孩备感艰难，不论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都一样。理论上，这里虽然领先中国各地，并且最早废除了严格的市民户籍登记制度，但实际上，却只有具备技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富有的人才有可能取得居住权。在这座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只有占百分之十五的两百一十万人口拥有深圳户籍，所以也只有

这些人的子女能够就读市内的学校。姜、骅二人根本没有机会取得户籍。他们的未来和他们想要建立的家庭，只能在其他地方落脚。对此其他的千百万农民工也都得出相同的结论。

深圳位于中国大陆的南部，与香港隔着后海湾对望，是全球特地兴建的落脚城市当中最大的一座。直到 1980 年，深圳还只是一座小渔村，人口也仅有两万五千人。后来邓小平宣告这里为第一座经济特区，不受劳动力迁徙的限制，并可自由采行市场经济政策。于是，这里随即成长为一座工业集散地。根据官方资料，深圳的人口到了 20 世纪末已接近九百万，但实际上应该超过了一千四百万，其中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乡村移民，聚居在工人宿舍里。深圳诞生了一群繁盛活跃的中产阶级，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高科技产业链，和一所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这里是 Ipod 和耐克运动鞋的产地，也是西方世界许多成衣和电子产品的制造地。

尽管如此，就绝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今天的深圳却不能称之为一座完全成功的落脚城市。经过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和发展狂飙之后，深圳的发展也出现了瓶颈。这里的人均收入与城市生活水平虽然都是全国最高，但这几年来却不断流失劳动力。这些人大多都是去往了比较接近家乡的内陆城市，尽管工资只有深圳的一半，却能够住在像六公里这样的“都市村庄”里。在每年的春节假期，深圳至少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都会遵循古老的传统返乡休假，但在 2008 年春节后，深圳的官员却惊讶地发现有接近两百万人没有回来。尽管这座城市仍有大量的需求——这个职位空缺数字在 2009 年底达到七十万——却有百分之十八的移民劳动者决定离开。深圳政府的官员把最低月薪从四百五十元人民币提高到七百五，再调高到九百，却无助于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 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导致深圳面临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工人短

缺，政府于是宣布再次提高最低月薪至一千一百元人民币，这项承诺同样没有显著效果，官员对此困惑不已。有些人猜测中国的低工资制造业竞争力已然走到了尽头，但没多少人提得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只要和深圳的外来民工稍微相处过，就能够理解其中的问题。这里有数百万工作人口在密集的公寓区买了房子，带着家人定居下来——但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具备专门技术的商人、工程师、白领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对于平凡的工厂打工者而言，这是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的梦想。此外，这里的外来移民也不像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那样能够开设小商店或小工厂。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北京与重庆，乡村移民都聚居形成上千上万人的村庄，其中的居民主要来自同一地区——例如六公里就是这样。在这样的社区里，他们可以找个简陋但还能居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然后在一楼的店面开家小店铺、小餐馆或小工厂，就和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一样。

这种自主形成的社区在深圳已不复存在。2008 年，我原本想要走访深圳仅存的一座这种村庄，叫做民乐村，位于深圳西北部的郊区，结果却发现只剩下一片早已夷为平地的狭长土地，那块土地上正在兴建更多密集的公寓大楼。这些小公寓对于月薪五千人民币以上的白领而言也是勉强才能负担得起的住宅，对于一般工厂的打工者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座村庄的打工者们丧失了他们的店铺和住宅，于是都搬回了原本的乡村。这种模式不断累积起来，就在深圳形成了重大的危机，导致数以百万的打工者流向充满落脚城市的内陆城市，而不得不提高基本工资的做法，又导致成衣制造业的订单因此流失，被达卡等其他工资较低廉的城市夺走。

这项危机在 2008 年因为大批的农民工出走而达到高峰之后，中国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暨农村专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干预措施，震

撼了深圳市政府的相关官员。秦晖向深圳官员发表演说，宣称这座城市若要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鼓励贫民窟的发展。“大城市存在这种地区一点都不可耻。恰恰相反，深圳和其他城市都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地区的存在。如此一来，包括外来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群才能够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他对深圳官员说道，“要保护这些人的权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在指定区域里自行搭建住宅的自由，从而让他们的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建立这些地区，大城市即可更加体贴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态，并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福利。”他提到了一亿四千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全年都不得不和他们的一亿八千万名家属因异地相隔而造成的性压抑的危险现象，并且指称深圳的市民包括官员，一方面享受着农民工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想要在城市压榨了他们宝贵的青春之后，把他们统统赶回原本的乡村。他说，当前的“乡村移民没有搭建住宅的自由，也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中国应该终结这种自私的现象。”

在世界各地，学者与官员都开始理解到农民移民社区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而不是必须消除的问题。过去十年来，官员的态度已出现了大幅改变。但是，夷平落脚城市的贫民窟仍是孟买与马尼拉这类城市当中极为常见的做法。这种拆除行动摧毁了落脚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功能。遭到驱逐的贫民窟居民就算获得安置在公寓大楼里——这是亚洲与南美洲常见的做法——也不能够再依照社区的需求而开设店铺、餐馆和工厂，而且也无法重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有机网络。这些人从此失去自立自强的能力，他们的社区发展也因此陷入停滞。

2005 年，孟买展开了一场拆除贫民窟的激烈行动。这些贫民窟占据了孟买百分之十四的土地面积，例如铁轨与机场的边沿或是国家公园，聚居了全市一千两百万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但这场拆除行动的打击对象却明明白白是落脚城市的核心价值。孟买官员帕提尔向记者表

示:“我们要让这些人对肆无忌惮的迁徙活动所带来的后果心生恐惧,我们要组织他们涌入孟买。”

当然,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什么效果。不到一年,几乎所有的贫民窟又都得以重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北京市政府在1999年开始推行城市美化运动,拆除了两百六十万平方米的都市村庄,全都是由外来移民搭建的住宅、餐馆、市场和商店,结果这些社区不久之后又再度出现。可以这么说,政府也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无用功。拆除贫民窟的行动虽然深受媒体瞩目——实际上也应该如此,因为这种做法造成的苦难极为深厚——但现在也极为罕见: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亿人,每年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人遭到拆除行动影响。那些蛮横的城市规划者虽然永远不会消失,但宏观事实毕竟无法推翻:新的人口会创造新的经济体,唯有这些人能够以由下而上而且自发性的有机方式建立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经济体才能达到最佳发展。城市都想要外来移民,而且不想沦人和深圳一样的命运,变成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成为一个没有人称之为家的地方。

迟来的立足机会:停滞不前的城市

基贝拉,肯尼亚内罗毕

尤尼斯和她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共同睡在一个房间里,长宽分别为十公尺与七公尺,墙壁由红土、石头与垃圾的混合物堆砌而成,涂在

树枝交织而成的骨架上干燥成形，墙壁上方顶着一片铁皮屋顶。他们的家是个狭小但温馨的空间，有三个小窗户，墙壁上覆盖着色彩鲜艳的布料与塑料板，还有一个煤气炉、一部CD播放机、一台电视、几张椅子、几根赤裸的日光灯管、一书架的教科书和几件迷人的装饰品，采用传统的狮子主题。尤尼斯用悬挂的布帘把这栋小屋内的空间隔成两个房间。她的儿子——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二十一岁——睡在布帘的一侧，另一侧是她和五岁的女儿睡觉、煮菜的地方。这是个非常狭隘的居住空间，周遭充满了噪音、恶臭、可怕的黑暗与暴力犯罪。

这栋简陋的土屋位于一片类似的，聚集在一块两公里的土地上的住宅当中，房屋之间紧密相邻，只有狭窄的巷道相隔，巷道上满是泥土、垃圾与人类排泄物。这里是基贝拉(Kibera)贫民窟的一角，是一片迷宫般的住宅区，臭气冲天，人口密度高得难以想象，建造于内罗毕市中心附近的一座垃圾山上。基贝拉的居民将近一百万，大概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最大也最恶名昭著的贫民窟，其中的疾病感染与政治及帮派暴力的规模都庞大的令人害怕。2007年底，基贝拉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政治暴力活动，卢奥族的(Luo)成员把基库尤族(Kikuyus)逐出了这个社区，以致这里的种族隔离现象更为严重，生活环境也更加危险。

如同非洲大多数的贫民窟，基贝拉也是一座如假包换的落脚城市。这个社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当初一群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努比亚人老兵战后成为无家可归的游民，于是肯尼亚殖民政府拨了些公共用地让他们建造家园。这里虽已存在了九十年之久，却在后殖民时代成为城市化的重要推手，把整座乡村都送进了城市当中。这里的生活环境虽然极为恶劣，却为肯尼亚及邻近国家那些问题重重的乡村提供了关键的现金来源，也把社区的居民成功转变为都市人。

“我现在是内罗毕居民了，我会说这里的语言，也懂得怎么在这里当个女人。”尤尼斯说。她从小在肯尼亚西北部的干燥地区种植玉米和马铃薯。在那里，她全家人住在一间草屋里，一天通常只能吃一顿粥。随着关于城市的消息散播开来，而且一连串的饥荒又重重摧毁了他们的村庄，她和她的丈夫意识到，如果他们要让自己的子女活下去，就必须和位于四百公里外的城市建立关系。

她的丈夫在1996年先到了城市。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可是还未来得及找到工作，就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疾病而去世——这种情形在非洲都市的乡村男性移民当中并不罕见。2001年，尤尼斯和她的儿子一致认为她应该迁往城市，靠着一位在基贝拉定居的同乡村民帮她找个把房子租给她的房东。

“我们试着想要重新活一次，看看人生会不会有所改变。”她回忆道。按照村里的部落习俗，她在先生去世后必须嫁给他的弟弟，但她却因为搬到城市而逃脱了这一命运。在城市里，她不但能够摆脱乡村那种限制性的服装规范，也得以摆脱宗族宗教。她非常珍惜能够自己赚钱的机会，在贫民窟外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担任女管家（这座贫民窟就围绕在内罗毕主要的高尔夫球场外围）。往后几年，她得以把孩子一起接过来。现在，尽管城市里有许多暴力掠夺的现象，他们还是决定在这里扎根发展。

“要我回到村里去，”尤尼斯说，“除非是我死了。”

欧伦波一家的居住环境非常恶劣。为了取得用水，尤尼斯必须走到七十五米外的一座供水站，付钱用水管在塑料桶内装满水。这座供水站由贫民窟的其中一个供水帮派设置。和城里面较为富有的家庭所支付的用水费用比起来，这里的水价高达二十倍（这样的价格差是世界各地贫民窟的典型现象）。她每个月也必须支付一百五十先令（两美

元)，才能到五十公尺外排半个小时队伍使用粗陋的公共厕所。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相当普遍的飞行厕所，也就是把排泄物装在塑料袋里，趁着夜晚抛出窗外，为基贝拉充满恶臭的环境火上浇油。前往不到一公里外的市区，是一趟极为艰难的旅程，因为这里满是危险而脏乱的巷道，缺乏桥梁与火车等交通设施。这里几乎没有空间可供尤尼斯这样的居民开设小生意，尽管她满心希望这样做，而且大多数空间都受到暴力帮派或种族黑手党控制。这里没有几家免费学校，而且学费高得吓人，尤尼斯就因为付不起学费，只好暂时不让最小的儿子上学。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男性找到像样工作的机会不多，导致街头上数以千计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转向偷窃、贩毒或酿造私酒。这样的社会环境阻碍了基贝拉发展成为成功的落脚城市。

为了能够住在这里，尤尼斯每个月付给房东十七美元，约是她月收入的一半。这名房东手下出租的房屋多达数百间，但这些房屋下的土地不是他的私有地，而是市政府的公有土地，所以他的业主身份也和尤尼斯购买房产的机会一样虚无缥缈。所有权缺乏保障，正是基贝拉这类地区不成功的原因：居民如果无法拥有自己的住宅，就很难克服环境，改善生活。

解决问题的办法，至少就理论上而言，实际很简单。在尤尼斯的小屋视野所及的地方，有许多高楼耸立在地平线上。这些灰墙红顶又有小阳台的高楼，是一项庞大的贫民窟改建计划所兴建的一部分。理论上，基贝拉的居民将会被安置在这些稳定、卫生，而且完全属于他们所有的公寓住宅里。这是联合国人居署发起的计划，其总部距离基贝拉不远，步行即可抵达。联合国在这里设立机构长达三十年之后才有办法发起这样的改建计划，可以让人看出解决贫民窟的问题有多么不容易，而尤尼斯自认永远不可能有机会住进这些住宅，更显示了其中的问

题一点都不简单。

这项计划称为肯尼亚贫民窟升级计划，简称肯升(Kensup)，是圣保罗、伊斯坦布尔与北京这类都市典型的贫民窟改建计划。就某些方面而言，这项计划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转变了美国内陆城市的类似计划：社区一旦被选中，其中的居民就会被迁入暂住区，住几个月或几年，等待他们原本的住处被拆除，改建成有排水管、独立厕所、自来水及电力的现代化设施的公寓，而居民搬进这些公寓后只需负担一小笔贷款，费率和他们先前租房的支出差不多。比起肯尼亚及其他许多国家先前采用的措施，这是一种改良的做法。以前，这些国家都是大规模地摧毁贫民窟，彻底驱逐其中的居民，声称贫民窟居民都是城市贫穷的元凶，对贫民窟放任不管将鼓励更多的移民前来。这样的拆除计划(在今天仍然在世界各地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继续进行着)不免会破坏小型企业的网络、摧毁终生储蓄而来的资金、并且把人口打散成数百个较为不稳当的小型贫民窟，或是导致这些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此，肯尼亚政府在2000年承认贫民窟的住宅应该受到改善而非摧毁，的确算是一项革命性的改变。

许多这类改建计划的问题，就在于政府没有意识到条件比较好的住宅必然拥有较高的市场商业价值，而且贫民窟的居民也和中产阶级成员一样，把自己的住宅视为获得平等地位的来源。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居民都持续而且痴迷关注着自己住宅的价值，因为房地产市场正是他们摆脱贫穷最有效的手段。对于自己的房产拥有完全的合法所有权，可赋予人在社会中向上攀升的能力；一旦获得所有权，贫民窟居民即可拥有他们从来不曾有过的地位和权利，其中之一就是出售房产的权利。政府建造的公寓住宅如果不比贫民窟的简陋房屋更大，而且有公用的水电管线，那么这些住宅即可在其他的落脚城市的居民间进行

买卖。不过许多贫民窟改建计划，就像很多类似的早先计划一样，其兴建的公寓也是按照肯尼亚法定住宅标准，设计皆合乎中产阶级的需求，至少拥有两间舒适的卧室，因此最后设计出来的结果都是三房公寓，价值远远超越贫民窟的住宅。贫民窟的居民随即意识到他们有两种方法可以享用这种价值：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两个房间租给其他家庭，自己住在第三个房间（导致住宅空间变得比原来的贫民窟住宅更小也更缺乏隐私）；另一种方法则是卖给中产阶级家庭（采用一种灰色市场的秘密契约，以规避贫民窟发展规划委员会对这种交易的禁止）。这种买卖带来的获利，足以让贫民窟居民支付子女的大学学费或者用来创业——但他们也必须再次搬回贫民窟的简陋小屋。因此，推行贫民窟改建计划的结果，总是造成贫民窟的边缘出现一片中产阶级的聚居地。

问题不仅仅如此。落脚城市不仅是一堆住宅而已，其中的居民形成繁复紧密的联系网络，并且利用其中的空间做生意并经营非正式企业，藉此在社会中得以向上游动。“贫民窟通常被人称为大型露天市场，”南非城市规划专家赫泽梅尔（Marie Huchzemeyer）在她研究基贝拉改建计划的报告中写道，“外人无法精确预见干预行动将对其中的社区、家庭与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无法确定他们获得收入的方式以及获得基本服务的途径会出现什么改变。”

像肯尼亚这类计划所建造的建筑，通常只是纯粹的住宅，这些建筑内部与周围都没有空间可供经营店铺、作坊或者小工厂。这种住宅没有任何实际机会可让人扩大居住空间或者把部分空间转为商业用途。更重要的是，这种住宅与街道隔绝开来，住户无法与经过的路人做生意。正如美国公共住宅计划以及法国市郊住宅大楼，没有商业空间的住宅可能会导致住户永远无法自立。

尤尼斯对于这项住户计划毫无信心。她不认为自己能有机会获得

升级的公寓住宅，而且她认定这项升级措施将毁掉她自从2001年以来所获得的小小进步。

“邻居很重要，”她说，“你只要和他们相处的好，就可以靠他们活下去。建立这样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朋友是很关键的。”她并不急着装修住处，而是把所有额外的钱都投入儿子的教育。二十一岁的伊曼目前主修裁缝，十九岁的约翰学的是理发。这两个年轻人都怀有雄心壮志，希望自己能够努力赚钱，让家人摆脱贫民窟。

“孩子看事情的角度和我不一样，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住的房子和城市里其他住宅不一样，”尤尼斯说，“我们也许有一天能够搬进比较好的房子，因为我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以后一定能够赚钱买一栋好房子——我的指望都放在他们身上。”

改革：危立于悬崖边上

圣玛尔塔，巴西里约热内卢

德尼尔森·苏萨二世是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顶着一头卷曲的短发，脸上挂着一道腼腆的微笑。十二岁的他，从小就从高处俯瞰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那社区(Copacabana)的繁忙街道。他家住在一间以木材和铁皮搭建而成的小屋，唯一的窗户正在悬崖上方，可以望见底下繁忙的商业区，距离这座山坡社区的底部只有几百米远。不过那里德尼尔森却没有去过几次。只要到那里，就是踏进了里约这座柏油城市的市

区。德尼尔森居住的圣玛尔塔是一座拥挤的“法维拉”，人口多达一万，全部聚集在一片陡峭的山坡地上。自从他学会走路以来，就懂得离开圣玛尔塔必须遵循哪些规则。首先，他必须走下七百八十八阶台阶，穿越无数危险的步行道，下降五十五层楼的高度，行经成堆的垃圾、石洞、悬崖酒吧与数百间颤巍巍耸立在陡峭悬崖上的简陋房屋。接着，他会遇见红色命令的年轻成员——红色命令是个贩毒帮派，“法维拉”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他们支配——向他们说他想到城里去，于是在“法维拉”街道入口处佩带着九毫米手枪站岗的青少年就会指示，让德尼尔森平安通过。在走出贫民窟的路上，他会经过快克街，沿街摆着许多张桌子，桌上堆满了准备批发给经销商的可卡因砖，右手持突击步枪的十五岁少年在旁看守。德尼尔森一旦从城里回来，这些身怀武装的青少年就会搜查他的袋子，确认他没有到城里购买煤气罐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凭借这样的控制手段，红色命令即可确保“法维拉”里的所有居民都必须以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的价格向他们购买这些物资。通过搜查之后，德尼尔森就得爬上陡峭的山坡回家。这样的旅程可是一点都不让人愉快。

乍看之下，德尼尔森的生活正是巴西各个法维拉的典型故事，就像《上帝之城》这类电影以及无数杂志与电视报导所呈现的：这些贫民窟充满了无尽的暴力与劫掠，居民则是一群失落而且备受压迫的下层阶级。世界各地由外来移民众居的都市飞地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巴西法维拉的只是情形更加严重。这种观点把法维拉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商品，其中是一群困顿潦倒而且命运无可改变的穷人，生活在体制的底端，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不过，这样的看法却忽略了落脚城市的宏观背景，也就是建立并推动落脚城市发展的众多家庭所踏上的旅程。暴力与穷困是他们在旅途上遇到的阻碍，是种不自然而且可能致命的外

来侵害。这里的人并非“边缘人”，而是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力量，只是暂时寄居在社会的边缘，以便追求更高的目标。

德尼尔森的父亲出生于巴西东北角的帕拉伊巴州(Paraiba)，他的父母是那里的甘蔗采收工，住在一间简陋的木屋里，生活极端贫困，也毫无保障。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波迁徙潮来到里约。圣玛尔塔原本只是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山坡小聚落，结果因为这波移民而发展成一座完全的落脚城市，拥挤混乱，以泥土、木材与铁皮搭建的小屋聚集在这片不宜人居的陡峭坡地上。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成人都在山坡下那座观光城市里担任脚夫、门房、清洁人员以及饭店员工。尽管生活环境艰困，而且不时发生的泥石流每隔几年就会夺走若干居民的性命，圣玛尔塔却是一座运作得相当顺利的落脚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这里每个年代都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得以摆脱脏乱的贫民窟，迁往周遭较为舒适的地区，甚至是中产阶级的邻里。圣玛尔塔由一个颇具效率的社区委员会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获得了电力、供水与排水管线，似乎为这里的居民提供了获取正式市民资格的管道。

后来，随着巴西的经济沦入破产的处境，其军政府又在20世纪80年代垮台，人口于是不再流动，法维拉也愈来愈孤立于都市之外。就在巴西国力衰退的同时，毒品帮派趁机掌控了贫民窟。他们采取暴力统治，对贫民窟的各个方面实行彻底支配，篡夺了社区委员会的权力。红色命令成为男性就业的唯一选择，但这种生活非常危险，以致圣玛尔塔的许多年轻人未满二十一岁就已丧生。尽管如此，尽管返回乡村相当容易，圣玛尔塔的居民还是几乎没有人考虑返乡生活。在这里，他们对自己住处底下的土地享有稳固的所有权，生活状况也比乡村来得好。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在这座充满暴力的毒品工厂内过着与外界隔离的生活。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些繁荣兴盛的落脚城市，遭到

帮派控制的巴西法维拉见不到各种繁忙的店铺和小企业。除了酒吧之外，圣玛尔塔几乎完全没有商业活动，也没有毒品以外的工作机会。德尼尔森的父亲就被卷入了这个深渊，而德尼尔森也认定自己在年满十四岁以前就会靠着枪械维生。

然而，这一切却在2008年底出现了剧烈变化。就在圣诞节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德尼尔森蜷缩在屋里的泥地上，他的母亲因恐惧而高声尖叫，只见数百名重装宪兵对这座法维拉发动突击，冲上七百八十八级阶梯，以突击步枪和机关枪不停开火，射杀及逮捕所有帮派分子及许多旁观民众。就这场突击行动本身而言，其实只算是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的军警搜捕行动，只不过这次的手段更加激烈而已。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与以往不同。五周后，巴西总统卢拉走访了圣玛尔塔，并且发表一场演说，宣称圣玛尔塔是他改革法维拉的试验台："我们目前采取的做法，就是让穷人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感觉得到国家的存在……过去只有警方以粗暴的手段介入……现在我们推出了巴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计划，要促成贫民窟的都市化，提供基本的卫生与住宅建筑。"卢拉兴建了一条铁路，为圣玛尔塔的顶端提供了运输设施，还设立了一座现代化的幼儿机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并且在山顶上打造了一座附有照明设备的足球场(这是贫民窟首度出现的休闲场所)。政府人员为圣玛尔塔装设了街道照明设施与无线网络，建立了垃圾收集系统，并且展开一项大规模计划，把所有房屋改建成实心砖砌成的住宅，配备卫生设施以及防土石流的地基。警方没有在突击行动结束后即撤手走人，而是在山顶设置了一座要塞，并进驻警力，推行所谓的社区警卫，只不过这些警察的装备包括了突击步枪与全身防弹衣。过去，这个社区除了警方突击行动之外，从来不曾感受到政府的关注，现在却突然获得了国家提供的实质福利。这正是肯尼亚政府因为缺乏财力而无法在基贝拉贫民窟落

实的计划：把贫民窟的所有住宅与周遭的基础建设一并升级，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没有把任何人搬迁出去。

2009年初，圣玛尔塔的结构又被进一步的改变。这项改变虽然透明度较低，影响却更为深远。实际上，这项改变就是卢拉政府的强力政策，以便在短短几个月里达成一般落脚城市花费数十年所做到的成果：让贫民窟居民彻底融入都市生活。首先，一群统计学家和分析师前往贫民窟，进驻山脚下新成立的职业技术学院。他们进行详尽的人口调查，并且绘制一份地图，画出每一处房产，注明其实体状况与需求。接着，圣玛尔塔的居民收到了两件他们从来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出生证明与住址。这两者为他们赋予了正式的市民资格，能够享受福利，也能在合法经济体系中工作，同时也必须缴纳税金和电费。法维拉居民对此深感震惊，也颇有怨言，因为他们从来不曾缴纳过这类费用，而且有些人也根本负担不起。圣玛尔塔的外围建造了一道高墙，界定其既有的范围，也为其中的居民提供明确的房产所有权证书。劳动就业秘书处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为法维拉居民和里约当中有招聘需求的工厂及企业牵线。“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这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纳西门托表示，“这里的居民只从事过非正式的工作，不然就是在街头上叫卖为生，而且垃圾都是直接抛出窗外。我们必须设法介入，为他们提供成为正式市民的管道，让他们的生活上轨道。一旦有了真正的身份证与地址，他们的人生就增添了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没有这样的措施，国家的力量在法维拉里唯一的展现就只有警方的突击行动了。现在，我们把重点放在教育、小企业和就业上，他们也就逐渐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一份子了。”

这里的居民对于政府机构的大幅进驻充满了恐惧和疑虑：最主要是害怕政府虎头蛇尾，在几个月后就又撤走，以致红色命令再度回来掌

权。不过，社区里也开始弥漫着一股自豪的气氛——过去，这个社区仅有的自豪，只有在狂欢节上才能以浮夸而新潮的方式展现出来。现在，德尼尔森不再沉郁地谈着自己只能成为红色命令成员的灰暗未来，而是夸耀他母亲在山脚下的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她在那里担任地板清洁工，但光是身在那栋建筑里，就已是一种正式资格的象征，也代表她已在这座都市里找到了立足点，而这正是圣玛尔塔的居民奋斗了二十年的目标。

当然，圣玛尔塔的转变是一项示范计划，只有几十座贫民窟获选，能够得到如此大手笔的改建。里约仍然有数以百计的这类社区，许多甚至比圣玛尔塔还要贫困。不过，这项计划成功的机会相当大，因为其基础乃是建立在落脚城市的基本功能上。只要能够消除一项障碍，只要国家能够把城市的基本成果提供给落脚城市的居民，那么落脚城市就可以自行运作，如同一条从冰坝中释放出来的河流：这些居民都懂得该怎么做，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努力了许多年，而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将成为城市的一份子。各个发展中国家实行贫民窟升级措施已有二十年，虽然成效极大，可惜只有少数的示范地区获益。在一个社区已经建造完成之后才填补基础建设，必然付出昂贵的代价，但如果不这么做，那么犯罪猖獗与政治动荡的结果将会造成更高的代价。只要小型的干预手段，例如装设路灯或者补助私人运输公司为贫民窟提供公交车服务，即可造成重大改变，把这类社区转变为吸引人居而且充满生产力的地方。完整的房产所有权与政治公民资格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算这些权利必须伴随着缴税的义务。

巴西的都市贫民已经达成了在城市里立足的目标，但这样的进程在其他大陆上才刚刚起步。南美洲是战后最早出现乡村至都市大迁徙现象的地方，比亚洲与非洲整整提早了四十年。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

初期，南美洲的人口已有百分之四十居住在城市里，比亚洲与非洲当今的城市人口比例还高。在后续的五十年间，这个数字又进一步倍增，因此今天南美洲已成为发展中世界第一个彻底城市化的地方：其人口迁徙已差不多完成。巴西的都市人口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之四十五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百分之七十五——几乎已和欧洲一样高。这点足以解释拉丁美洲的贫民为何生活水平与平均收入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高了十倍。

巴西的经验显示了政府一旦忽略或误解落脚城市，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过，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巴西的法维拉通常能够顺利运作，把好几百万陷于困境里的贫民转变为拥有工作而且融入都市生活的城市人。近年来，巴西的法维拉已催生了一大群成功的新兴中产阶级，其中包括成长于圣保罗一座贫民窟的卢拉总统。卢拉是落脚城市产生的第一代政治人物，还有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他们的支持者即是以这些移民人口为基础。

不过，巴西仍有数以百计人口密集的贫民窟，至今还是受到毒品帮派的控制，也足以令人警惕。过去数十年来，巴西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阻止、消除、隔离或漠视落脚城市，结果这些打压措施终究还是不免遭到反弹：落脚城市如果遭到外界的不闻不问，又被剥夺了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自然就会产生自我防卫的政治发展。在巴西，这种发展就是毒品帮派的猖獗；在孟买，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则是伊斯兰的宗教激进主义。落脚城市希望融入正常社会，希望获得接纳。只要拥有适当的资源，落脚城市就会繁荣兴盛：如果没有，就可能爆发我们不乐见的后果。落脚城市绝非静态僵固，而是充满活力，沿着发展进程积极前进。至于这样的发展进程究竟会通往哪里，就要看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第三章

立足于金字塔的顶端

令人感叹的美国落脚城市

洛杉矶，加州

萨尔瓦多的小村庄埃尔帕隆只不过是一排农村小屋，散布于一条泥土路旁，周围环绕着一块块狭小干旱的牧地与一片片森林。这些小屋大部分都还没有电力或自来水，村里几十位居民的食物来源就是自己种植的蔬菜和饲养的家畜，还有玉米薄饼、米饭和豆子。儿童自六岁就开始工作，和家人一起长途跋涉，参与季节性的咖啡采收活动。这些居民的生活就是到处找寻农耕以外的收入，并且谨慎避开当地周期性爆发的暴力冲突。“在那里，我们随时都必须绷紧神经求生存，”马欧·马丁尼斯说。他在冲突不断的 20 世纪 80 年代成长于此。

洛杉矶的南雷东多大道(South Redondo Boulevard)与西亚当斯大道(West Adams Boulevard)的交叉口周围绝不可能让人误认为是乡村，但这里却与埃尔帕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布满了狭小的平房，前方有着迷你草坪，间杂着主要道路旁的工业与商业大楼，全部掩藏于圣塔莫尼卡高架公路的阴影下。这个地区的正式名称是西亚当斯，许多洛杉矶居民则称之为中南区的北部角落。这里是一片灰色的炎热社区，车满为患，看不到任何公园或绿地，是洛杉矶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而且也最贫穷。过去，这里原本是非裔美国人聚居的贫民窟，在洛杉矶白人居民眼中是个犯罪猖獗的危险地区。那里没有经济活动可

言，道路上唯一的招牌就是防备森严的酒类店铺与支票兑现商店。1992年，这里爆发了暴力冲突，警察殴打黑人市民罗德尼·金(Rodney King)而引发暴动，导致数十栋建筑遭到纵火，又有更多人遭到劫掠。男人手持猎枪，站在自家门前的小草坪上或是空荡荡的商店前，竭力捍卫自己的承租空间，并且发誓尽快搬离这个地方。

然而，在那场暴动的二十年后，这个角落却已经脱胎换骨了。现在，这里的狭小平房都已重新上过漆，也打理得相当整洁，前面有赏心悦目的花园与围在铸铁栅栏里的花圃，后面有生气蓬勃的菜园。这里的街道也已变得更为活跃、多彩多姿，可以见到许多店铺、小型工业与热闹的市场和餐馆，妆点着热情洋溢、色彩缤纷的招牌与展示品。这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美丽的社区，而且也不尽安全，但已变得整洁得多，快乐得多，也充满了乐观的气息。现在这里的居民以村民为主：住在这里的人，十个中就有六个出生于拉丁美洲的乡村，而且邻居通常是同村的老乡。住在这里的萨尔瓦多人每个月都会到西联公司汇款，这几乎就是埃尔帕隆最大的现金来源。这些由美国寄来的百元钞票改变了埃尔帕隆的住宅外观与质量，也让当地的家庭得以享有电力和电视。在西亚当斯的这片萨尔瓦多人聚集地里，居民都互相帮助对方迁徙到这里，找寻租屋、谋取工作、存钱、做小生意、雇用额外员工以及买屋。除了这个与乡村紧密相连的网络之外，附近的街道和邻里还有数百个类似的网络，分别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与墨西哥相互连接，于是洛杉矶南区与中南区也就因此成了一片由众多落脚城市交织而成的区域。这片杂乱的市区不但改善了中美洲乡村的生活环境，也极有效率地把这些乡村移民的后代转为地道的美国人。

1991年，就在这个社区因为暴动而被硝烟与枪声淹没的几个月前，马利欧从埃尔帕隆来到了洛杉矶。他的两个阿姨，维多莉亚与玛塔，在

20世纪80年代初就为逃避村里的暴力而来到了这里。维多莉亚借着从事各种低微的劳力工作而赚得不错的收入，还存了一笔钱，得以通过移民中介把马利欧接到美国来。几乎身无分文的马利欧于是住进了她位于英格尔伍德（Inglewood）的房子（这个地区也遭到暴动重创）。在这座动荡沉郁的城市里，马利欧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和一群褐色皮肤的男子到处打零工，建筑、搬运，任何工作都来者不拒。不久之后，在这里已经立稳脚跟的同乡就让他到他们的商店或工厂工作，也把公寓出租给他。他一方面寄钱给仍在埃尔帕隆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另一方面也存了一笔钱，把他十几岁的女儿接了过来（这个女儿是他在萨尔瓦多短暂交往过的一名女子所生）。

20世纪90年代末，他在一家韩国人经营的霓虹招牌工厂找到了工作，结果发现自己在霓虹灯管弯折、塑料成型以及排版设计上是天生好手，推销的表现也不错。韩国老板相当赏识他，于是把这门生意的不少秘诀传授给了他。他存了一些钱，爱上了邻居当中一个名叫比亚的危地马拉女子，结了婚，然后定居在亚当斯大道以北一栋分租平房的后院公寓里。这是他一个事业有成的萨尔瓦多友人手下的房产。在工厂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在一个暖和的傍晚散步回家时，才突然意识到周遭的街道两旁都已布满了粗陋的店铺、餐馆、小型工厂、进口货商店及新创立的企业，全都是拉丁美洲移民经营的事业。他发现他的同乡村民对于招牌正有迫切的需求。

于是，他凑集了一千五百美元，在2000年租下了一间最便宜的店面，位于遭到暴动摧残的十字路口，距离他的住处五六个街口远，悬挂起一面颜色鲜艳的横幅布条，上面写着“JM塑料与招牌公司——定制设计——横幅布条——磁性广告牌”。他没有银行贷款，也没有经营计划，只因一项推动重建计划，降低了区域划分与企业合并规定的严格

度，于是创立小公司的成本与难度都减少了许多，而马利欧也从中获益不少。他花一百五十美元买了一部二手电脑，开始锁定各个拉丁美洲店铺挨户推销。

这样的店铺多得数都数不清。在暴动过后的十年间，洛杉矶市中心许多原本由黑人房客向白人房东租屋居住的地区，都变成了拉丁美洲人的落脚城市，其中的居民都为了买下贫民住宅而努力奋斗。像中南区、克伦肖、华兹与康普顿这类以功能不全而恶名昭彰的社区，都在乡村移民涌入之后成了西班牙语人口聚居的都市飞地。这些乡村移民虽比先前的黑人居民更贫穷，但他们的眼光和发展策略却有所不同。洛杉矶的贫穷黑人市民都致力于摆脱这个社区，一有机会就赶紧迁往市郊，和之前的白人工人阶级一样；但这些西班牙语人口却是努力在此扎根，设法买屋创业。

这种现象有一部分是文化差异的结果——美国的白人与黑人都渴望在都市外围拥有一片大草坪，但拉丁美洲移民一旦有了一笔钱，则是宁可在市中心创业谋生。另一方面，这也是落脚城市造成的现象。中美洲的村民在此建立个人与经济的支持网络，开创深入都市经济核心的管道，目的不只是维持生活与找到工作，而是要建立结构完整、秩序井然的落脚城市。他们在这方面于 20 世纪 90 年代获致了极大的成功，把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连同整个东区以及东南部的大部分区域，都变成了一大片的落脚城市。在暴动期间身处洛杉矶的人，一定不认得这座城市当今的模样。洛杉矶中南区的佛罗伦萨(Florence)与诺曼底(Normandie)，原是 1992 年暴动的爆发点，其拉丁裔人口比例却从 1990 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增长到了 2000 年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在后续十年间又进一步上升。这群热衷于购买物业的人口涌入之后，原本嫌恶都市的居民即得以迁往较为富庶的市郊黑人社区。佛罗伦萨与诺曼

底的黑人人口因此减少三分之一，从百分之七十六降低至百分之五十三。中美洲移民殖居洛杉矶的核心地区之后，为洛杉矶东区和市中心既有的拉丁裔贫民窟以及兰巴特(Rarnpart)与银湖(Silverlake)等西语人口聚居地增添了人口影响力。这些都是在20世纪70与80年代之间由乡村移民聚居的社区，后来产生了富庶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地方，马利欧发现需要招牌的人非常多。

今天，马利欧的招牌制作商店仍然是位于亚当斯大道与豪瑟大道交叉口的狭小店面。不过，这段尘土飞扬的贫瘠走廊已变得极为繁忙，满是小型工厂和商店，人行道上随时都热闹不已。"我当初根本没什么钱，挑上这里做生意只是因为这里便宜，"他说，"可是现在我连想都不会想要放弃这个地方——这里正位于一切活动的中心。"他的商店周围全是其他乡村移民经营的事业：一家水电材料行、一家瓷砖与陶器制作坊、一家计算机维修的工作室、一家大型手工烘焙坊，还有一家与马利欧合作的展示柜制造商。马利欧也悄悄扩张了他的生意规模。他以八千美元买了一部海报输出机，能够印出深受餐馆与市场喜爱的全彩照片广告牌。他有两个全职助手，太太比亚也辞掉基督教救世军的工作和他一起经营这家公司。通过拉丁裔人口的人际网络，他们创立的这家店面企业接到了不少大生意：例如玩具公司美泰，就以每件作品三千美元的价格请他为若干玩具系列制作照明广告牌。随着生意发展兴隆，家庭成员也跟着增加，现在，马利欧和比亚有个七岁的儿子，名叫乔纳森，融入美国文化的程度远高于他父母那个时代。他在家虽然说西班牙语，却从来不曾到过萨尔瓦多，对那里的文化也几乎一无所知。

马利欧和他居住的洛杉矶社区所经历的演变，纷纷出现于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城市外围，在租金低廉的郊区，在公共住宅计划区，以及北美与欧洲城市里遭到遗弃的市中心飞地。历史上的最后一波大移

民潮，把全球居住在乡村的半数人口迁进城市，不但改变了亚洲、南美与非洲都市的面貌，富庶西方世界的都市也同样经历了转变。大多数的西方人都不了解，他们的城市所出现的变化，其实是人口从乡村迁徙至都市造成的现象。各地移民的收入与绝对贫穷程度容或不同，但他们面对的挫折与机会，担负的危险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却都一模一样。

不论在巴黎市郊还是阿姆斯特丹与柏林的移民居住区，在孟加拉国人聚集的伦敦东区还是巴基斯坦人聚居的布拉德福德，或是洛杉矶与纽约的西语系人口社区以及华盛顿、亚特兰大和悉尼的市郊移民聚居地，那些租住公寓、购买房屋以及经营店铺的人口主要都是来自乡村的移民。对于这些社区而言，定期寄钱回乡是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洛杉矶的落脚城市在这方面的规模远远超越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洛杉矶至少有六家银行专门提供就美元而言金额极小的房屋贷款，以便这些中美洲移民能够在家乡的村庄里购买房屋。这是目前当红的跨国资产交易活动，背后的推力是一群热切追求经营企业、接受教育以及买屋置产的人。

洛杉矶是美国首要的落脚城市聚集群，将近半数的人口都出生于其他国家（而且都以乡下为主）。就这方面而言，北美只有多伦多足以和洛杉矶相提并论，多伦多在加拿大也扮演着和洛杉矶类似的角色。人口统计学家把洛杉矶称为门户城市，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广泛成功的落脚城市：其中的贫穷社区把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与上层劳动阶级成员送往较为富庶的社区，而这些人口流出的速度与贫穷村民的流入速度不相上下。这些社区的人口不断流动：洛杉矶每十年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流出，每经过一个世代就成为一座全新的城市。学者曾经针对洛杉矶移民人口进行大规模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人口抵达洛杉矶

的时候都非常贫穷,贫穷率接近百分之二十五。但他们一旦在这里定居下来,贫穷率就迅速下降,尤其以定居之后的头十年下降速度最快,通常可降到百分之十以下。尽管如此,这些社区本身却仍然维持在贫穷的状态,甚至变得更穷。自从1990年以来,移民人口的财富虽然不断增加,移民社区的贫穷率却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洛杉矶社会学家麦尔斯(Dowell Myers)指出,这种现象正是美国落脚城市成功的结果:由于落脚城市不断把受过教育的第二代送往较为富庶的社区,并且一再收容新来乍到的村民,而形成"抵达、向上流动、离开这样不停重复的循环,所以这些社区本身才会显得比实际上贫穷。"在任何一个时刻,对于居民特色的衡量都包括了最贫困的新进移民,却没有纳入较为富庶的落脚城市毕业生,麦尔斯说:"贫困人口流入的数量一旦成长,或是奋斗有成的人口流出的数量增加,城市的经济状况都会因此衰退。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现象:社区的向下沉沦和居民在社会中的向上攀升正是反向指标。"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外人误以为城市里的移民聚集区充满贫穷与绝望,于是对这些地区真正需要的政府投资也就不免产生误判——世界各地许多以移民为基础的城市都面临了这种严重的政策问题。落脚城市真正需要的是协助工具,以便其中的居民能够获得资产、教育、保障与创业机会,并且和广大的经济体系建立连接,但政府却经常把这些社区视为贫困地区,而采取种种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投入社工、兴建公共住宅以及实施都市改建计划。

然而,只要实地走访这些社区,即可看出这些地方并非不断沉沦,而是成了个人、家庭与乡村转变提升的平台。这些地区的投资金额非常惊人。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的拉丁裔移民拥有住宅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四十五点三。以洛杉矶偏高的房价以及这些地区低微的收入来

看，这个数字确实让人咋舌。拉丁裔的洛杉矶市民读完大学的比例几乎倍增，从1970年的百分之九点五提高到2000年的百分之十八点八。洛杉矶史学家戴维斯（Mike Davis）对于拉丁美洲那些陷入失败而且备受压迫的贫民窟原本抱有极为悲观的看法，对于他自己城市里的贫民窟进驻拉丁裔人口却深感兴奋："陈旧凄凉的狭小住宅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斑驳的外墙重新粉刷，凹陷的屋顶和门廊拆掉重建，枯黄的草坪重新种上了仙人掌与杜鹃花。七万五千名左右的墨西哥与萨尔瓦多业主的血汗产权拧合成一股无与伦比的建设力量（与白人逃离市区的情形正好相反），致力把这个颓废的社区恢复成整洁体面的模样……他们也有绝佳的天分，能够把死气沉沉的城市空间转变为充满欢乐的社会空间。"

到了2005年左右，中美洲落脚城市移民的迅速投资与社会流动已成为洛杉矶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力量。一方面，中美洲村民对市中心住宅的需求，为在此定居已久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带来了大笔的售房收入。他们的住宅在1965年的华兹区黑人暴动之后就已没什么价值，而且长达三十年来一直如此，却突然之间涌现了一波持续不断的需求。如此一来，市郊外围黑人社区的住宅也出现了需求、持有与投资的增长。于是，许多数十年来只能租房居住，一直处在失业与缺乏自立能力情况下的黑人家庭，也因此得以重新开始。

另一方面，新兴的落脚城市也自行发展出了非常有效的政治结构。在其他建立已久的西语系人口社区里，由拉丁组织构成的网络在数十年来已慢慢产生了影响力；现在这些新兴社区又为这个网络增添了不少生力军。这样的发展终于促成维拉莱格沙（Antonio Villaraigosa）当选洛杉矶市长。他是洛杉矶东区拉丁移民权力网络的产物，也是第一个得以掌管美国大都市的落脚城市之子。他的父亲原本是个贫穷的墨

西哥农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战后的初期城市迁徙潮跨越了美国国界，在 City Terrace 安顿了下来。这里是洛杉矶东区数一数二的最早完善运作的落脚城市。维拉莱格沙从洛杉矶东区的经济、教育和政治网络中崛起，成为市中心新进居民政治抱负的投射对象，是乡村移民城市运动的领导者，而且取得了最高的权位。

在亚当斯大道的社区里，马利欧不但借着广告牌生意储蓄了好几万美元，还寄了大笔金钱回埃尔帕隆维持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生活，并且不惜砸下重金让女儿归化美国籍。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马利欧和比亚终于决定要买一间房。他们决心要待在这个街区，住在移民同胞之间，共同建设这个邻里。他们这项决定唯一的不寻常之处，就是马利欧竟然等待了那么久才终于要拥有自己的住宅：将近二十年来，他一直都租住在公寓或后院小屋里，房东和他一样都是乡村移民，但他们却都在存款远比他目前还少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不动产市场。

原因就在于美国对待移民态度的转变。美国在 1987 年通过《尼加拉瓜人调整与中美洲人援助法案》，给予二十万名左右来自冲突紧张的中美洲国家的人口特赦，让他们得以归化美国籍。但由于马利欧是在 1990 年之后才从萨尔瓦多来到美国，因此也就无法受益于这条法案。尽管他是个成功的生意人，太太和女儿都是已归化的美国公民，却一直找不到方法能够成为合法的美国人（目前他正以家乡村庄里仍旧暗流潜伏的冲突为由提出庇护申请）。过去，美国曾为大批非法移民给予特赦，把他们从没有正式身份也不必缴税的地下工人转变为合法公民，让他们能够全心投入这个社会。目前洛杉矶市民当中仍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处于类似的状况：他们不敢或无法把自己的所得投注于自己居住的社区；尽管活跃于经济体系里，却受困于不上不下的窘境；虽然已在这里落脚，却无法真正立足。这种公民身份的含糊暧昧对于落脚城市

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导致原本应该充满机会的社区沦为威胁。

后移民国家的落脚城市

在洛杉矶看到像马利欧的中美洲农民，或是在伦敦东区看到像塔法德一家这样的孟加拉国村民，对许多人而言都是一种反常现象，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就是政治错误造成的后果。在这个国界管制、高科技信息经济与选择性移民政策的时代，我们常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民应该没有理由大批涌入西方的大城市，形成一块块移民聚居的都市飞地。在许多西欧国家，还有加拿大、美国与澳洲，政府对落脚城市的反应不是促使其功能发挥得更顺畅，而是假设来自乡村的迁徙潮不会发生，不然就是以为能够靠着禁止或打压的方式阻绝这种发展。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从乡村到都市的人口大迁徙，不但将在本世纪彻底改变发展中世界，也将是南方与东方世界的移民人口涌入西方城市的主要来源。这项流动在某些国家也许会因为遭到打压而减缓速度或暂时中止，但不论就经济或政治上而言，这些人在西方城市立足乃是无可避免的结果。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今天，在北美、欧洲与澳洲的城市里，乡村移民的人口已多于20世纪初的任何一个时期。每年都有五百万人从大致上都是乡下地区的发展中世界迁入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国家。

落脚城市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重大现象，和发展中国家的落脚城市相比，其中的居民其实都是同一类人。世界上的地区约有一亿五千万的居民是外国出生的人口。在欧洲，这样的人口占了百分之八，在

北美占了百分之十三，在澳洲则是百分之十九。这些人通常都生长于乡下。欧洲与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乡下地区的村庄或区域城市，而且多多少少都是直接迁入大城市定居。我们虽然无法确切计算从乡村至都市的移民人口数（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处的官员对我说，他们非常想要取得这样的统计数据，可是搜集这种资料的难度高得难以克服），但经由观察，我们可以知道西欧与美国的新进人口以及加拿大与澳洲的外国出生公民，都以出生于乡村的人口为最大宗。迁入美国的大部分移民都是拉丁美洲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来自乡村，共有一千八百万人，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加上这些移民的后代，他们的人数就达四千万，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四。欧盟的合法公民中有四百五十万人来自北非，三百万来自非洲其他地区，五百万来自中东与土耳其，两百五十万来自南美洲，一百七十万来自印度次大陆；这些人口大部分都来自乡下地区。

欧盟的内部移民也有一大部分是从乡村迁往都市。西欧城市当中来自波兰、罗马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来自乡下地区。此外，欧洲也有五百万至一千万的外来移民仍未取得正式居留权，其中大部分都来自非洲、中东与东欧等邻近区域的乡下地区。不论在人口的流出端还是流入端，这种从乡村到都市的迁徙模式都有其例外：哥伦比亚与埃及等地曾在动乱不安的时刻有大批城市人口流出，美国与加拿大在近年来也出现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人口的乡村至乡村迁徙现象，亦即中美洲的农民到美、加的农场上工作。不过，这些现象正因为是例外，所以才引人注意。跨越海洋及国际边界的迁徙活动比国内迁徙困难得多，迁徙结果也比较恒久，因此跨国移民选择的目的地通常都是城市。至于市民至少有一百万人是外国出生的城市，则大部分位于世界上较为富庶且已彻底都市化的地区，例如墨尔本、悉尼、新加

坡、香港、迪拜、利雅得、麦加、麦地那、莫斯科、巴黎、伦敦、多伦多、纽约、华盛顿、迈阿密、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旧金山与洛杉矶，

我们针对移民的辩论，通常都把焦点放在不必然的问题上，着重于我们应该允许哪些情形发生，却忘了投注心力规划如何应对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政府限制或阻止移民，或是仅限具备特定技术的人口移入，绝对是种合理的做法，不论就政治或经济方面而言都是如此。造成这样政策的理由可以是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也可能是社会出现文化冲突，或者纯粹只是民众对人口拥挤反感。然而，我们应该了解这类措施不可能长久。就长期而言，西方国家还是持续会有非技术性的移民流入；而且，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这些人口仍会有一大部分成为落脚城市的居民。加拿大与澳洲等国虽然暂时遏制了来自乡村的移民人数，却不可能长久维持这样的状况，而且恐怕也不会希望如此。在 21 世纪，乡村移民会是西方城市的一大特色。

这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经济因素：在当前这十年以及往后的整个 21 世纪，西方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不论在技术性或是非技术性领域都一样。造成这种短缺现象的因素，乃是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人口迅速老化。维持本国出生人口稳定的生育标准是平均每个家庭二点一名儿童，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生育率都已滑落到这个标准以下，所以领取退休金以及享用政府服务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攀升。这是个支出高昂的问题，但有一项简单的解决方法。只要引进工作年龄的外来移民，他们缴纳的税金即可弥补节节高升的国家支出。当然，政府也可以提高税赋、削减服务或者调升退休年龄，但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移入，生活水平就不免下降，政府也将无力支应重要的服务与政策。就目前而言，为了替 2008 年与 2009 年遭逢信用危机的企业提供支持，英国与美国预计至少有十年会持续耗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之二到百分之四。因此，外来移民虽然不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必要手段，但政府缺钱与人口成本提高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将使得引进外来移民成为痛苦程度最低也最能够获得选民接受的选项。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在2009年从事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30年，美国的劳动力需求将比国内的工作年龄人口多出三千五百万人，日本的这个数字将在2050年达到一千七百万，欧盟在2050年达到八千万。加拿大就算每年固定引进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名外来移民，也将在2010年末出现一百万人的劳动力缺口。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西方各国失业率高涨，也只是暂时延缓了这项长期的人口问题而已。在经济衰退情势最糟的几个月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大量的工人短缺现象。澳洲商业领袖在2009年底呼吁快速增加外来移民人口，以便填补维多利亚与西澳省数十万的半技术性职位空缺，并且提出警告，指称工人短缺人数在未来十年将增加到一百六十万。2009年底，加拿大虽然失业率持续攀升，却有百分之十四的企业遭遇非技术性及半技术性工人的短缺而导致业务难以开展(受到技术性工人短缺影响的企业为百分之二十九)。经济一旦恢复成长，美国与欧洲同样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届时引进外来移民将是唯一简单的出路。

乡村移民会持续出现的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上的因素。外来移民及其子女和孙子女，将会成为公民、选民、政治人物，乃至内阁首长与领袖人物，在涉及其家人与同乡的议题上将不计党派与意识形态而团结一致。社会学家乔帕克(Christian Joppke)在《开明国家为何接纳多余的移民》这份研究中指出，控制外来移民的流入，向来只有极少数国家做得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不论哪个大陆，只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都会出现限制性政策目标与扩张性结果之间的落差，也就是说几乎所有限制或阻止外来移民的政策都不免失败，因为这些法律规范的对象早

已成为活跃的国民，并利用落脚城市做为自保的平台。

在美、德、法这类国家执行零移民政策期间，同样还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低技术性移民迁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都不免意识到有数以百万计的潜在纳税人生活在政府的掌握之外，虽然赚取着收入，却没有缴税，不但造成许多灰色家庭，他们的子女成年之后，也不免产生许多法律上的矛盾。最后的结果，通常就是给予大赦。美国在近几十年来已向好几百万的非法移民授予公民身份(最近的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与德国也同样为数十万未登记的移民施行过类似的大赦。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这类赦免措施。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移民改革与管制法案》，最早在1986年由国会提出，目的在于彻底阻止拉丁美洲的乡村人口跨越美国南部国界。然而，到了这项法案通过的时候，美国商会与农业游说团体所施加的压力却把法案内容变成了一项大规模的特赦，为将近三百万名非法移民赋予合法公民身份，还结合了一项新方案，允许低技术性移民依据西方各州的农产业所要求实施的工人方案入境美国。这项工人方案后来又促成了另一场大规模的特赦。往后十年间，金里奇(Newt Gingrich)领导下的保守众议院又试图翻转《移改法案》，而且获得广大反对非法移民的民意支持，但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上个世纪90年代进入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还多，合法与非法移民人数都大幅上升，共达三千一百万。经济发展需要人，也得到了这些人。

许多国家一旦意识到工人短缺是长期上无可避免的现象，就会采取第二种选项：把教育和技术程度较低以及来自乡村的人口剔除于迁人移民之外。澳洲与加拿大是首先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推出计分积点的移民制度，只有在语言能力、高等教育、特殊技术或保证投资的存

款金额等方面获得高分的人口才得以入境。这种做法确实带来了一群比较中产阶级也比较有文化教养的移民人口，但是却忽略了一项严重问题。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通常集中在低技术性与半技术性领域（例如制造业），并不适合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移民。2009 年金融危机处于高峰之际，欧洲与北美出现严重工人短缺的领域包括家政服务、农业、运输、建筑、旅游、餐饮服务业以及一线社会工作。全球电焊工短缺早已达到二十万人，半技术性制造工人的短缺数预计将在 2010 年达到一千四百万！

不但许多国家都将在未来被迫允许大量低技术性与半技术性移民迁入，而且不久之后就必须互相争取这些移民。人口统计显示全球各种类别的工人人数都迅速减少——东欧与中欧的生育率都已降到人口增长率以下，终将造成劳动人口来源的消失。截至 2010 年，中国在各领域都已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短缺。印度不但经济快速成长，生育率也急速下降，所以也不再会是劳动力的可靠来源。中国早已推动计划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印度次大陆输入工人，与波斯湾国家和美国展开了工人竞争。比之设法阻止移民潮涌入，北美和欧洲各国恐怕反倒得努力争取移民人口。

引进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精英填补这些职缺，不论就人力资源还是外交政策而言都是一种浪费，因为这些外来移民在自己国家里就读的大学，通常都受到外国政府的赞助，目的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医学、法律和技术知识。这些补助方案造就的人才如果都到西方城市担任旅馆柜台职员或屋顶工人，就等于是彻底浪费了这些奖学金。

这种情形正发生在加拿大、澳洲以及其他仿效这种计分制的国家（英国于 2005 年开始实行）。2008 年，加拿大国内受过大学教育的外来移民竟有高达百分之六十点一从事着只需有学徒的程度即可胜任的工

作——大材小用的比例是加拿大出生的工作人口的一点五倍。为数众多的人在这里无法适得其所，原因是这个经济体需要劳动技能，而不是专业学识。在加拿大的长期贫困移民当中，百分之四十一都拥有大学学历。换句话说，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过去一个时代以来所引进的都是不符社会需求的工人。

因此，这些国家仍然持续有大批乡村人口经由合法管道人境定居，并且聚居形成落脚城市飞地，这样的现象虽代表了社会政策的挫败，却具有缓解经济需求的效果。实际上，技术性移民通常是发展中国家里出身乡村的城市人，而且只要这么一个人取得移民资格，就会从家乡的村庄或是该国的落脚城市把配偶与亲戚等一整群人际网络一起带过去。计分制度极为严格的加拿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官方统计，每年二十五万的外来移民有百分之五十七都是经济类移民——主要是高度技术性的工人与愿意投资数十万美元的商业投资移民。但在2005年，这个类别的移民共有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六人，其中却只有五万五千一百七十九人是主要申请人——也就是真正具有技能或财产的人。其余的七万八千五百六十七人都是主要申请人的子女、配偶、父母或其他人口，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不会说移人国的语言，而且直接来自乡村。此外，每年另外还有六万两千两百四十六名移民——比按照计分制度人境的移民还多——是家庭类移民，也就是既有的外来移民从本国接过来团聚的父母、配偶及其他亲人。根据观察，这些人口当中有极高比例都来自乡下。（另外还有三万九千八百三十二名移民是难民或其他人道救援对象，这些人口也通常都来自乡下。）因此，加拿大的外来移民其实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经过计分制度的筛选，其他移民人口都比较属于落脚城市的成员。

在其他国家，这种藉由依亲人境的乡村移民比例更高。在美国，百

分之三十九的外来移民都是家庭移民(也就是家庭团聚类的移民),这个比例在英国是百分之四十九,在法国更高达百分之八十三。不过,这些移民也正切合这些国家的实际就业需求。加拿大政府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些计分移民的亲人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却胜过计分移民本身。高技术性的主要移民与低技术性的依亲移民比较起来,前者落入低收入贫穷状态的比例较后者高出了百分之十八。

随着外来移民的文化冲突在21世纪初变得愈来愈激烈,落脚城市也成为宗教与政治敌意的寻衅焦点,政府于是开始打压家庭团聚移民,藉此阻止乡村移民入境。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与德国都试图限制家庭类移民,但顶多只在短时间内有效。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竞选时承诺压制这类移民,于是在2007年施行了各国当中最严苛的限制措施,要求依亲移民必须接受DNA检测,证明的确是计分移民的直系血亲。不到两年,这项措施就遭到废止,法国移民部长贝松宣称这种做法是个愚蠢至极的主意。

这类限制措施之所以无法成功,部分原因是基于先前提到的经济与政治因素,但另外还有第三个理由:外来移民一旦无法把自己的亲人与乡村邻居等人际网络一起带过来,就比较容易陷入孤立而缺乏社交生活的状态,沦入犯罪行为及社会保守心态。家庭团聚式的移民一旦遭到限制,或是国家仰赖短期的客籍工人方案吸引低技术性工人只身入境——正如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加拿大与澳洲当今的做法——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家庭的团聚一旦受到限制,落脚城市及其支持网络就无法成形,人口的行为也会因此改变。布罗德斯(Dennis Broeders)与安格伯森(Godfried Engbersen)是鹿特丹伊拉斯谟斯大学的学者,他们针对在禁令限制下无法把亲人接到身边团聚的外来移民从事研究,结果发现这

些移民因为没有家人网络的支持，以致被迫“仰赖非正式而且愈来愈趋向犯罪化的网络与体制”。婚配婚姻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婚配对象通常是外来移民的表亲，不仅住在偏远的乡村，而且两人素未谋面。就算这些移民的来源国是婚配习俗已经逐渐消失的孟加拉国与土耳其等国家，他们到了移入国之后还是不免采取这种婚配做法。因此，西方国家成功遏止落脚城市出现的措施，其实反而导致了宗教保守主义、性别压迫与组织犯罪。这类现象不是外来移民在发达国家里立足而造成的结果，反而是未能成功立足所导致的后果。我们一旦为落脚城市提供资源，并且给予它茁壮发展的机会，落脚城市就会成为抗拒这种偏激现象的力量。

外来移民的郊区化发展

荷顿，弗吉尼亚；惠顿，马里兰

在美国首都市郊两条四车道公路的红绿灯交叉口处，十九名褐色肌肤的男子聚集在一座灵恩派教会的停车场入口，年纪有老有少，每人或站或坐，不然就是倚靠在一面低矮的砖墙上。在这片矗立着加油站、小型卖场与单层楼政府建筑的狭长地域里，来来往往尽是车辆，只有这群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与墨西哥的男子在室外闲逛。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都静止不动。后来，一辆小巴在他们身旁停了下来，车内与车外的人员以粗浅的英语交谈了几句，然后其中两人就上了车。这辆小

巴正要去从事搬运工作,似乎是一件房屋的活计,工作时间为半天,每小时工资十美元。二十分钟后,剩下的这群人看到警车经过,于是蹲下身子,躲在树丛和矮墙后面:站在路旁等待打工机会,原本是落脚城市新进居民的成年礼,也是初步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在当今的弗吉尼亚州的荷顿却成了违法而且危险的行为。

直到1980年,荷顿这座市郊小镇还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居民都是说英语的白人。这群下层中产阶级的民众聚居在这里,从事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附近的轻工业工作。不过,如同美国的许多市郊地区,这座小镇的性质与功能也几乎在一夕之间彻底转变。到了2000年,这里成了外来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区,居民只剩下百分之四十七是白人,西班牙裔人口超过四分之一,亚洲人口则占了百分之十四。航空工业的工人都迁出了小镇中央的公寓住宅区,利用房地产市场扩张的机会在更外围的郊区买下房子。华盛顿里人口密集的拉丁裔聚集区和中美洲的乡村的人听到了消息,得知荷顿租金低廉,公寓和小型住宅颇为舒适宜人,附近又有丰富的服务业工作机会。于是,支持网络逐渐成形:小商店、西班牙语教会以及联谊社团都陆续出现。更多人移居过来,互相协助对方安顿下来,也逐渐成为当地商人眼中良好的劳动力来源。在21世纪初,荷顿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座如假包换的落脚城市。

外来移民往市郊移动是北美与澳洲一种新兴的剧烈变迁现象。2005年,美国的外来移民住在市郊的人数首度超过市中心区,而且多出将近一倍。这项趋势转变了市郊的面貌。现在,少数种族占了市郊居民的三分之一,比起1990年的百分之十九高出不少。现在,有近半数的西裔美国人都住在市郊,学者称之为熔炉社区或族裔郊区。尽管大部分的注目焦点都集中在带着技术、储蓄及高度文化资产迁入市郊的亚洲移民,但他们的人数其实没有中美洲与墨西哥移民来得多。中美

洲与墨裔移民在第一波的市郊迁徙潮当中,就在快速扩张的郊区填补了建筑、景观与服务业的工作空缺。这些人口迁居市郊的原因,大多数都与家庭及村庄网络有关,因为这些网络会在房价低廉的郊区建立连锁移民的立足区,把一小群工人迅速转变为密集的大批涌入人口。一名华盛顿地区的官员称之为表亲症候群。经济学家也观察到了一种外来移民促成定价机制,从而造成市郊化的效果:第一波来到城市中心地区的移民因为数量极为庞大,以致落脚城市房租上涨、移民工资下跌。于是,在下一波的乡村移民眼中,都市近郊不论在工资与租金方面都显得比较吸引人。

这个模式在加拿大的大城市里更是鲜明可见。加拿大每年三十万名移民中有百分之四十都涌人多伦多,2008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人口几乎全部定居在市郊,彻底翻转了 20 世纪 70 年代移民聚居于市中心的模式,在这些定居于市郊的移民当中,较为富有的城市至城市移民都来自印度次大陆与中国,定居地点在外围郊区;乡村至都市的移民则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定居地点在近郊的落脚城市,诸如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特松克里夫公园(Thorncliffe Park)与怡陶碧谷(Etobicoke)南部。这种移民定居模式改变的一大原因就是市中心住宅区的高级化,使得近郊成为最后的低廉租金飞地。多伦多大学城市及社区研究中心的玛迪(Robert Murdie)发现,这种现象造成了一种有害的后果,导致多伦多的外来移民愈来愈孤立,种族之间的隔离现象也愈来愈严重,使得这座城市往日以人口融合闻名的声誉因此蒙尘。

市郊突然转变为落脚城市,对于既有人口通常是一大冲击。这种现象可能唤醒沉睡的郊区,带来新的创业型经济、新的文化与新的景点;也可能激怒已有的白人居民,因为他们向来认为外来移民只会聚集在市中心区(其中有些人的上一辈可能就是为了躲避外来移民与少数

族群而迁离了市中心)。在荷顿,这种现象造成了庞大的政治冲击,影响范围遍及全州。这项冲击一开始看起来毫不起眼:只是成群的男子站在街头找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初,荷顿的落脚城市才刚开始成形,新进男性移民都会聚集在埃尔顿街与阿拉巴马大道的交叉口,就在他们居住的公寓大楼附近,找寻当场拿现金的工作。当时对于计时、计日与计周工人的需求相当大,因此这些移民站在街头上都不会空手而回。十五年后,这种外劳聚集于户外的现象引起了社会与人道方面的疑虑,于是在镇长欧雷利(Michael O Reilly)的率领下,荷顿镇议会投票决议利用镇资金以及当地一家教会非营利机构的人员成立一座室内临时工中心。这项决议引来了反移民势力的抗争,例如在荷顿设有分部的民兵团体(Minutemen)。他们宣称政府利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协助非法移民是不可接受的事情。这项成立临时工中心的提案接着成为2005年弗吉尼亚州长选举的焦点议题。在这场丑恶的选战当中,共和党候选人基高尔(Jerry Kilgore)以反对荷顿提案做为选战主轴,把荷顿变成了抗议州政府援助非法移民的保守象征(结果他以些微差距败选)。

后来,在一份为时两年的补助合约下,这座临时工中心终于在一幢前警察局建筑开张。然而,才不过几个月,荷顿的居民却在一场单一议题的选战当中以一面倒的态势扬弃了原任镇长欧雷利,选出反对移民态度强硬的德班提斯(Stephen De Benedittis)。他不但在2007年关闭了临时工中心,把工人逼回街头,还下令镇上的警员参加联邦政府训练地方警察执行移民法的课程。他还推行一项针对拉丁裔移民的分区法令,规定若有四名以上无血缘关系的人士同住一屋,就必须被驱逐出境。镇府每年都会收到两百件左右的不服申诉。

然而,这项反扑却忽略了荷顿移民热潮最重要的效果。街头上的

那些男子有许多人都是未经登记的移民，而且极为贫穷，是来到这里的中美洲村民当中最贫穷也最缺乏人脉的少数人口。但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过得好很多。在第一波移民涌入之后的十年里，荷顿镇里百分之五十三的外国出生居民都已持有房产，与华盛顿地区本国出生人口的住宅自有率(百分之六十二)相差不大。外来移民在社会中向上攀升的能力极为惊人。尽管如此，这项反扑还是产生了影响：拉丁裔人口经营的企业难以起步，大批移民也于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另寻去处。荷顿的经济因此备受打击。

面对市郊转变为落脚城市的状况，还可以有另一种反应方式。位于华盛顿另一侧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也在20世纪80与90年代期间经历了同样戏剧性的转变：华盛顿地铁终点站的惠顿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白人居民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市郊地区，外来移民的比例却在2000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与荷顿的状况相同。在萨尔瓦多人口带动之下，这里的落脚城市社区包括了越南人、牙买加人、菲律宾人、秘鲁人、墨西哥人以及来自中美洲其他地区的移民。

但与荷顿不同的是，蒙哥马利郡的选民和官员并没有把这些移民视为威胁，而是当成振兴市中心没落区域的机会。他们成立了一座临时工中心，并且发起一场形象塑造运动，使惠顿在华盛顿地区成为著名的多元种族文化中心，拥有多彩多姿的节庆与美食，并打出一吃就上瘾的口号。他们利用分区规范与企业办公室鼓励及协助移民创业者开设餐厅、市集与缤纷多彩的商店，也在市府制作的广告中广为宣传。惠顿的一名官员把这个市郊区域的自我形象描述为接纳和善用移民潮，方法则是推广其多元种族交融的新潮氛围，于是这里感觉上就像是真正的都市环境，却又没有城市的各种问题。

这种推广活动确实重振了惠顿的中心地区，但如果不是社区居民

同意投注资源促进落脚城市的发展,就不可能获致这样的成果。这里的官员不但明白乡村移民的涌入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也知道只要愿意花钱引导移民社区的发展,即可获得较佳的结果。落脚城市不会自然繁荣兴盛,通常需要投资。惠顿进行的投资,就是为落脚城市建构平行的社会服务体系,包括一项由公私部门合作提供的基层医护服务,称为健康计划,还有一座人员充足的职业培训中心,不但配置有懂得多种语言的服务人员,并且开设计算机培训、法律扶助及语言课程。这些措施带来的结果相当突出:现在惠顿的经济由于外来移民经营的小企业而非常繁荣,而且移民的住宅自有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二,与华盛顿地区白人居民的住宅自有率几乎相同,并且在首都地区居冠。

当然,2008 年的金融海啸就是因为房产太容易取得所造成的后果,黑人与拉丁裔人口的住宅抵押拍卖率也是最高的。少数种族聚居的市郊遭受重击,不仅有些经济状况较佳的拉丁裔人口丧失了房子,最贫穷的新进移民也因为高度仰赖建筑及房地产产业谋生,而突然失去了就业的主要来源。不过,经济衰退对于落脚城市的基本运作逻辑并没有影响。在 2008 年底至 2009 年之间,拉丁美洲移民虽然大幅减少了寄回家乡的钱财数目,但没有人迁返家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房屋持有者当中的拉丁裔人口比例在 2008 至 2009 年间并未下跌:虽有许多人的房屋遭到拍卖,却也有许多较为成功的移民购屋置产,于是两相抵消也就大致持平。尽管如此,这对于华盛顿外围市郊而言仍是一段非常艰困的时期。在荷顿造成的结果,就是大批移民在充满敌视的公众情绪下纷纷迁离租金低廉的邻里。

蒙哥马利郡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样。民众和官员都明了外来移民是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因此同心协力设法帮助他们留下。马里兰州盖瑟斯堡(Gaithersburg)是蒙哥马利北端的一座市郊小镇,外来移民的人

口组成与惠顿颇为相似。当地一个由官员、民众及社会运动人士组成的联盟发起了一场敲门运动，致力于协助出身乡村的移民免于被逐出家门的命运。一名官员指出，他们的想法就是“前往移民的住处，通过友善的敲门运动与他们互动，以他们的语言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向他们告知社区聚会的信息，协助他们获取政府与非营利机构提供的服务……询问移民家庭是否具备能对邻居提供帮助的技能”。这项运动获得一套金融与企业服务网络的支持。这些服务对于镇上的纳税人而言虽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们却视之为一项明智的投资。蒙哥马利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主任阿卢瓦利亚（Uma Ahluwalia）向当地记者说明了这种做法背后的思考逻辑：一个家庭如果因为房屋遭到拍卖而被驱离家门，就必须被安置在汽车旅馆内，一夜花费纳税人一百一十美元的税金，安置期通常为四十至六十个夜晚；相较之下，为他们提供短期的租金或房贷协助显然划算得多。此外，官员也认为，让经济活跃的外来移民留在当地，并且让他们的企业保持健全，是这座市郊小镇繁荣发展的核心要素。

落脚城市在都市郊区的发展可以有两种途径，蒙哥马利所揭示的正是其中一种。在世界各地，对待落脚城市的态度都是一种抉择：建构社区的未来，或者确立社区没落的命运。如果现在不进行投资，那么等到下一波移民到来，环境情势就会直接为我们做出选择。我们如果不关注这些新进人口，市郊就会成为充斥残酷与暴力的地区，把我们内心的恐惧化为现实。

第四章

乡村的城市化

乡村陷阱

达塔利，波兰

每天下午放学后，十七岁的加西亚会草草抛下一句波兰式英语俚语向她的朋友道别，然后骑上单车，驰骋四公里的路途来到她的村庄边缘一片寂寥的原野。到达那里之后，她就用一条头巾把一头赤褐色的秀发包扎起来，与她的父亲会合。她的父亲体格壮硕、头发灰白，已经事先驾着马拉木车来到了这里。她从马车上拿了个十公升容量的桶子，走到原野中央，蹲在一头啃着草的母牛底下，桶子放在两膝之间，开始两个小时的辛苦工作。首先必须完全手工为所有母牛挤奶，然后再把沉重的桶子提回家。这是她每天下午的工作。每天早上，她也必须一早起床帮忙处理农场上的其他杂事。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生活，日复一日，疲惫辛劳，随着自然的韵律而行。

不过，加西亚却是欧洲最后一代的小农，她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她和另外数百万年轻的农民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东侧，但也正是他们将会终结这套已经存在数千年之久的体系。实际上，在全球各地，当前这个时代已经宣告小农生活将画下句点，加西亚只不过是其中居住在最西端的成员而已。小农生活的终结，最早将发生在欧洲，亚洲会在数十年后，非洲也几可确定会在本世纪结束前出现这样的发展。

正如当今世界各地的小农，加西亚发现影响自己生活最大的要素

不是农业产品，也不是粮食市场，而是落脚城市的推力与拉力。加西亚的父亲名叫马雷克，现年五十三岁，从先人手上继承了这片十六公顷的土地，位于波兰东端，邻近比亚韦斯托克市(Bialvstok)与白俄罗斯边界。他的农场就当地标准面积而言算是非常大(比之欧洲其他地区的标准面积却非常小)，但大部分的土地都无法耕种：一半以上的面积都是树林、草地与沟壑。可以耕种的土地只有七公顷，和一般的波兰农场差不多，所以也无法完全支应他们家所需的收入。在西方世界的这个角落，农场的大小几乎和亚洲的一样，但亚洲的湿地却肥沃得多。波兰的农场有百分之六十都不足五公顷，小于一公顷的也超过三分之一。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小农农业：超过百分之四十四的波兰农场，生产的产品都只够或是主要供农夫一家人使用；还有百分之十则是完全没有产出。波兰的四百万农民是欧洲仅存的小农人口当中人数最多的一群。不过，相较于前苏联时期的东欧，他们确实具备拥有明确土地所有权的优势：在前苏联统治期间，波兰只针对最大的农场进行集体化，其他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仍由小农持有。

波兰的小农农场在土地的使用上非常缺乏效率。务农人口虽然占了全国人口的将近五分之一，农业却只为波兰贡献了百分之四点七的经济收入——而且这些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百分之五的农场，也就是其中最大的几座。这是经济资源的一大浪费：波兰的乡下劳动力只有百分之三是雇佣农业工人，更有五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具有生产力的商业性农业所雇佣的人数必然较此多出许多。而且，这也是土地的一大浪费。欧洲农场平均每公顷生产的粮食约是波兰农场的五倍。

一如世界各地的小农农业，加西亚一家人的农场也不具经济可持续性。两公顷的土地充当牛的牧场；剩下的五公顷则用于种植小麦、燕麦与大麦，不但是家人的粮食，也是牛的饲料来源；此外还有一片菜园。

牛奶虽然必须花费许多力气挤出，每个月却只带来八百兹罗提（两百八十美元）左右的收入。扣除各种开销之后——其中以肥料为最大宗——马雷克真正放进口袋里的钱还不到一半。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就算再加上波兰政府与欧盟提供的每年每公顷四百兹罗提（一百四十美元）的补助，也还是一样不够。然而，他却可从大女儿那里取得一笔金额高出许多的收入。他的大女儿名叫玛格姮，现年二十三岁，正在华沙主修护理，固定会把打工收入寄回家。如果没有这笔来自城市的金钱，他们一家人将不得不抛弃农场。实际上，他们也的确打算这么做，但是必须先等到马雷克可以领取政府养老金的年纪。他们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坚守这座农场，纯粹就是为了取得养老金的资格。

“我只是要拿到养老金，然后我女儿就会把这里结束掉，”马雷克一面和他女儿把装满了牛奶的水桶搬上木车，一面跟我说，“我已经五十三岁了，还剩七年，就这样了。这里所有人都是在等着领养老金。这就是未来：大家都必须离开。我的家族已经在波兰生活这么久了，我可不要我的女儿继续住在波兰。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不过，就目前为止，他们和其他四百万波兰小农仍然受困于一项精心维系的平衡当中，无法抛下自己的土地。养老金制度的小型农场无法凝聚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事业。而且，在2004年的西向移民潮爆发之前，这个制度遏制了这四百万名小农放弃农耕迁入城市。波兰实行了一项昂贵的农村政策，目的就在于避免人口涌入落脚城市。

波兰的反城市化措施，是在1990年后不久开始推行的。这项措施的核心就是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这套养老金制度，简称KRUS。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农业扶持方案，KRUS在政治方面也是基于对家庭农耕与农场之美的浪漫想象，在经济方面则是基于一种顽强的心态，

希望阻止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在波兰及其他许多社会，包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乃至当今的印度，都经常以维持小农阶级取代谋求社会进步的远见。

在充满别扭的波兰社会的转型期，波兰的小农人口反倒在一波令人惊愕的城市至乡村迁徙潮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在1989年以前，波兰的城市里满是国营工厂，生产各种毫无市场也几无经济价值的产品，目的纯粹只是要让躁动不安的人民有事可做，以免加入团结工联的抗议运动。政府负债、恶性通货膨胀迫使国家关闭这些工厂之后，数十万人涌回原本的乡村，以便取得享有农业养老金的资格。

在这十年的转型期间，波兰的三百万失业人口有三分之二都住在都市，而且华沙也有严重的住宅短缺现象，因此回归乡村显然是明智之举。就这方面而言，KRUS可以说是一项颇为精明的方案：不但为波兰提供了与福利国家类似的社会保障，又不必为了支应完整生活费用而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由于养老金领取人本身的农场就能够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又免除了政府发放房租补助的必要，因此波兰才能以合理的成本安抚百姓情绪，而不至于在转型期间爆发动乱。

男性只要年满六十岁，在农场上工作过三十年以上，并且在退休之际同意放弃所有土地，只留下住处周围一公顷的面积，即可获得领取KRUS的资格。不过，养老金领取人放弃的土地可以过户给家人，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这么做，因此农地也就极少有机会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大农场。就波兰乡间的标准而言，KRUS的给付金额算是相当不错：每月六百五十兹罗提（一百七十八美元），已足够支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如果夫妻两人同时都在领取则更显宽裕。这是一项昂贵的方案，在本世纪初期就占了波兰经济的百分之四。这个方案的用意虽是在创造较大的农场，造成的主要效果却是把未满六十岁的小农全部

绑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完全没有改善农业经营或进行创业的动力，不论在农场上还是城市里都是如此。一份研究因此指出："KRUS 制度其实是一套没有创富机制的社会福利方案，无法为过剩的劳动力提供转任非农业工作的诱因。"

十五年来，华沙、弗罗茨瓦夫(Wroclaw)与格但斯克都一直没有落脚城市，也没有落脚城市带来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数百万充满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人口，就这么被困在无法耕种的农场上，永远过着古老的农业生活。2004 年，波兰成为欧盟的一员，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连接——这个世界位于欧洲的另一端，有着许多供人落脚的大城市。一夜之间，波兰农场的经济逻辑突然改变了。

等到加西亚家的姐妹完成学业并且迁离波兰之后，他们家的农场可能就会变得像邻居一样。他们的邻居是五十五岁的普林斯基，在贫瘠的沙质土地上盖了一栋简陋的小屋，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一座农耕企业。农场补助连买肥料都不够，而且普林斯基先生也只有年老的太太和年少的女儿可以帮忙耕种。不过，只要看看这个家庭的收支情形，即可看到小农农业的新面貌。农场收入与欧盟及波兰提供的补助，每个月只有几百美元。不过，史纳斯基夫妇的两个女儿每月寄回家的钱却远多于此。这两个女儿年纪分别为十九和二十七岁，在英国担任家庭服务工作。她们每月大概寄四百美元回家，从而成为普林斯基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支柱。

如果说波兰的政策有一部分目的在于避免大批农民涌入华沙与格但斯克形成落脚城市，那么这些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为西欧的落脚城市准备了一群珍贵的劳动力。在波兰于 2004 年加入欧盟之后的三年间，随着人口开始拥有移动的管道，一两百万的波兰国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来自乡村——纷纷涌入英国与爱尔兰寻找工作，担任

服务生、建筑工人、家庭佣人、儿童托育人员、司机、店员与工厂工人。伦敦有不少区域都成了波兰人的落脚城市：一区从西边的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与伊令(Ealing)这两个老旧的波兰人口飞地向外蔓延；另一区位于北边的哈林盖(Haringey)与恩菲尔德(Enfleld)这两座自治市，其中每一条主要街道上的数十家店面都只标示波兰文，废弃的圣公会教堂则用于举行波兰语的罗马天主教聚会。落脚城市的功能在这里鲜明可见：各个专门的波兰机构分别为居民提供协助、婚姻、住宅与汇钱回乡等服务。一夜之间，波兰人在英国与爱尔兰成了最主要的少数族群，而且备受当地民众的喜爱。许多波兰人都说他们只是暂时待在这里，时机成熟就会搬回家乡；有些人则是结婚创业，逐渐在此扎根。这种充满生产力的城市化虽在波兰遭到长期的压抑，现在却在其他地方大幅出现。

这些年轻的乡村移民每年寄回家乡的金钱超过一百一十亿美元，占了波兰经济的百分之二点五，几乎比其他任何产业还要多。这些由国外汇回的钱，加上波兰政府的养老金及其他政府补助，已成为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截至 2004 年，波兰的乡下居民只有百分之二十七从农业上赚取基本所得，其他人等于都是从城市收取钱财。伦敦与都柏林的薯条店员与厕所清洁工取代了波兰政府，成为乡下小农生计的主要支持力量。

自从 2004 年取得欧盟成员国身份直至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波兰的技术性工人可说完全出走国外。只要是具备技术能力的人，不论是水电工、砌砖工人、外科医生还是核磁共振摄影技师，都纷纷离乡前往西方。农场的经济逻辑从此大幅改变。以前，KRUS 是农场收入的主要来源，小农家庭自然世世代代都要守住一座农场。现在，下一个世代却不再有理由死守着土地。普林斯基不再把农场传给子女，而打算在

自己去世之前申请领取欧盟的造林补助，把所有土地种植为树林，以便换取每年几百美元的津贴。加西亚的想法则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把她父亲的土地卖给一座大型的商业农场。那样的农场不但有拿工资的农业工人，对于土地的管理也完善得多。

土地的买家到最后可能会是邻村提克尼的村长切列波维茨。他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协助村民摆脱小农经济，并且帮助留在村里的居民把农地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农场。他自己也打算成为农场经营者：1991 至 1992 年间，他曾在纽约非法工作，存了一笔钱，从而把自己原本只有五公顷的地扩展为二十五公顷。现在，他又利用欧盟的补助买了七公顷。“我敢说波兰的一百五十万座农场当中只有半数是真正的农场，”他说，“其他只是等着领养老金的农民——我认为这样的农民现在已经多达半数。再过五到十年，我敢说这个人数就会降到四分之一。现在，比较活跃的农场都自然取代了比较小也比较缺乏生产力的农场。我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绝佳的案例。”

始于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把好几十万的波兰人口送回了东边，每个人都带着储蓄、人脉和技术回到家乡。大多数人都不是回到原本的乡村，而是前往波兰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21 世纪的波兰与东欧人口造就了学者所谓的一百八十度旋转：他们迁徙到大西洋的城市使自己城市化，然后不是回到乡村，而是带着储蓄和创业知识回到自己国内的大城市。他们的出现化解了波兰欠缺技术性工人的景象，而且这些落脚城市的返国人口也促成了格但斯克、华沙与波兰硅谷——即弗罗茨瓦夫、克拉科夫(Cracow)与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的经济复苏。这时候，波兰首都已开始经历真正的城市扩张，华沙周围原本的乡下区域纷纷成为从西方归来的乡村移民的聚居地。正因如此，波兰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才得以成为欧洲少数没有遭受重击的地方，不但经济持

续成长(尽管幅度有所缩减),也维系了对外贸易的水平。经过长久的延迟,以及政府的极力阻止之后,波兰终于还是出现了应有的落脚城市。

最后的村庄

水林,中国四川

到了睡觉时间,六岁的濮明林把四岁的妹妹冬琳抱了起来,放在草席上,躺在他和他们五十六岁的祖母何苏秀中间。他们三人蜷缩在灶火的余烬旁,薄墙另一边的猪圈里睡着两头肥猪,不断隔墙传来规律轻柔的呼噜声。墙上的蜂窝隐约发出蜜蜂的嗡嗡声,隔壁房间则传来他们祖父较为刺耳的打呼声。这就是当今水林村仅有的居民了。实际上,今天中国大部分的乡村也都只有这样的居民:儿童、牲畜、祖父母。十四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人口,包括所有儿童的父母,都已背井离乡外出工作,只留下寂静的夜晚、空荡荡的房间和深邃的思念。

他们黎明即起,冬琳和明林熟练地生起灶火烧开水,用小手把柴枝推进炉里添火。六点半,冬琳爬上祖母单薄的背,明林抓着她满是老茧的手,三人一起踏上半小时的路程,走在稻田间狭窄泥泞的小路上,前往村里的学校。十一点,祖母又会到学校接孩子回家吃午餐。兄妹俩总是坐在门前,一面吃饭,一面看着祖母在田里工作。下午两点,她又会带他们到学校,五点再把他们接回家,这段两公里的路程一天就得走

上八次。

“我从没想过自己到这个年纪还得养一双孩子，”苏秀一面说，一面捡着煮汤要用的鸡蛋，“因为我的儿子在重庆过得不太好，所以没办法把我们接过去，让孩子到城里的学校上学。可是我不介意。他们现在和我很亲，也很听话。他们晚上都会对我说奶奶，不管你到哪里去，我都会跟着你。”这对兄妹似乎非常崇拜他们的祖母，在田里总是黏在她身旁。不过，他们还是非常珍惜爸爸每天打来的电话。

这对兄妹是濮军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提过的那位三十二岁的变压器技师。自从将近四年前冬琳才几个月大以来，他就很少见到他们。不过，濮军很爱他的孩子，在重庆赚取的收入大部分都寄回三百公里外位于邻省四川的村子里，以供他们生活开销。近来，他一年寄回去的金额大概有一百五十美元。他收入比较好的时候，寄回家的钱还让他父母得以把原本由泥土和茅草盖成的小屋改建成渣煤砖造屋，并且有坚实的水泥地基，安然度过了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房屋前方的房间是一个没有上漆的水泥空间，里面摆着一部彩色电视，连接着屋顶上的天线，而且孩子也几乎每天都用濮军给他们的手机和他通电话。2005 年，他把所有积蓄投入一批橘子树，希望藉此生产商业作物而大幅改善他父母的生活。然而，那年夏天一场严重的干旱导致这些树全部枯死，于是他们只好又回头种芥子、稻米和谷物供自家人糊口，而且每年卖一头猪。“他很贴心，人又单纯，”他的母亲一面把孙子从一堆种子旁赶开，一面这么说着她儿子，“他只想找个办法让孩子和他住在一起。”

中国这整个世代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一年顶多只能见到父母一次，通常就是二月春节期间的短短几个星期。在社会方面，这种现象造成这个世代的儿童都以祖父母为认同对象，也经常形成深厚的祖孙情

感，以致这些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就必须面对这些代理父母的年老与死亡，年纪轻轻就失去唯一保护及爱护他们的人。这些孩子从小就与父母分隔两地，又背负着通过受教育帮助全家人摆脱贫困生活的重责大任，因此压力常常沉重得难以负荷。不仅如此，乡村也同样承受着深沉的压力。

中国的乡村通常不是农业生产的中心，而是社会缓冲区域。这种现象一般称为离土不离乡，以乡村家园取代缺席的国家力量。对于一亿四千万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稳定居所的落脚城市民工而言，乡村是唯一能让孩子上学以及取得医疗协助与儿童托育的地方。对于乡村移民来说，这类服务的收费都高不可攀，大部分的人都负担不起。至于面积足供三代同堂居住的城市公寓住宅，更是只有极少数最为成功的打工者才有可能住得起。不过，即便是已在城市里顺利立足的乡村移民，尽管他们能够送子女上学、拥有舒适的住宅，又享有都市的各种便利服务，却还是有必要保住在乡村的根。中国的国家退休金少得可怜，劳动阶级又几乎都没有私人退休金——濮军的父亲是名退役军人，也曾任村官，每个月的退休金却只有十四美元，而且这个金额已比大多数人来得高。此外，流动人口根本享受不到失业保险与福利，乡村出生的人口也不被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涵盖。有人估计可能有五亿人口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济。对于大多数落脚城市居民而言，乡村及其足供糊口的作物，就是他们仅有的社会安全网。

像濮家这样的家庭之所以留在农田上，还有另外一项中国特有的原因。根据官方规定，农业至今仍是公有事业。不过，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农户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成为自主农业生产者，可以自由使用、贩卖或交易自己的作物，所谓的公有其实只是名义上而已。尽管如此，集体组织所有权为了土地的最

佳利用而重新分配土地。如果农村委员会认定一个家庭不再活跃于田地上，即可没收该户的土地，分配给较有生产力的对象。如果集体组织决定促进乡村的非农业经济（理论上是个很好的构想），就会针对已经迁入城里的家庭而将其土地没收。换句话说，家庭其实不是真的拥有自己的农地，所以不能把土地卖掉而取得完全迁入城里所需的资金。2002年的进一步改革把贩卖土地的行为合法化，但在大部分乡村里还是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此一来，就算乡村家庭的成员早已彻底城市化，也还是为了保有自己的社会缓冲而不得不持续经营农地。

2004年后，中国乡村最大的收入来源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城市汇回的金钱。这些钱大多用于支持乡村的家园，因为乡村已成为儿童托育及长辈退休养老的处所。这种汇钱回乡的压力，就是落脚城市居民难以存钱买房的主要原因。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看到了中国的落脚城市有多么依赖乡村。2009年初，据估有两千万落脚城市的打工者（居民总人口数约为一亿五千万）抛下城里的住处而返回了乡村。不过，到了2009年9月，随着经济复苏，当初离开北京返乡的移民又有百分之九十五回到了城里。乡村发挥了失业保险的功能，但代价则是家庭的离散。

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离散家庭使得乡间变得令人无法理解。中国的商业性农场所生产的粮食虽然已足供全国使用，政府囤积的谷物与猪肉也足以应对长达数月的全国大饥荒，但农业却一直未能充分发挥潜力，成为庞大的出口产业，主要就是因为土地仍是一片片零碎的非商业化农田，只具备社会功能，却无法满足营养或商业方面的需求。现在，中国约有两亿户农家，农田面积人均只有半公顷左右。城市地区寄回的钱财，加上农田收入的增加，已让四亿多名几乎全是乡村居民的中国人口得以摆脱绝对贫穷。尽管如此，在仍然受困于绝对贫穷的家户当

中，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住在乡下地区。

因此，中国的乡村移民全都深陷于一种无尽的矛盾当中——乡村与落脚城市的社区互相支持着对方最薄弱的地方，导致个别移民、家庭乃至整个社区都无法拥有长久而稳固的家园。牛津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在一项重大研究中指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漂泊无依的人口缺乏效率地流动于落脚城市与乡村之间，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社会协助、公共住宅与就学安排等措施以促使乡村移民在城市里永久定居下来。"有些农民虽然已在落脚城市扎下稳固根基，购买了房屋，生意也经营相当顺利，"却因为缺乏这类措施而不愿或无法放弃乡下的土地，以致留在乡下的人口难以扩张农业生产的规模，也难以获取土地所有权，因为释出的土地不足以应对乡下的人口变化。"

这种仅剩儿童与祖父母的乡下区域在中国称为空巢，但同样的现象早已出现在世界各地，原因是小农农业被迫充当社会安全网。在罗马尼亚，空巢已因相关因素而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议题。数百万名工作年龄的小农都迁往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落脚城市工作，却发现那里的学校系统和社会服务机构都不对新进移民开放（即便是欧盟内部的移民也不例外）。在意大利，警察与法律体系甚至对落脚城市的住户充满敌意。因此，罗马尼亚的乡村也都是由祖父母抚养小孩，并由小孩的父母从遥远的城市寄钱回来支持他们的生活。

尽管如此，我们却愈来愈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流动人口正建构着真正的落脚城市，利用各种策略让自己成为城市的永久成员。这种现象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戏剧性迁徙后更是鲜明可见。在不久之前的 2002 年，中国移居城市的乡村移民只有百分之七能够把家人接到身边。这些数字目前已逐渐增加，不少乡村都因为落脚城市的蓬勃发展而彻底衰亡。冬琳与明林还有他们的祖父母所居住的水林村，就已迅速朝

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已经过了单纯输出移民工人的阶段,”水林村的退休村干部濮泽世对我说,“现在,大家都想方设法要彻底离开乡村。”2000 年,水材村还有两千五百人,现在已剩下不到一千人,而且这些人口不是超过五十岁的老人,就是不满十五岁的小孩。村里的老人告诉我,这一千人当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是真正的永久居民,其他人都在找寻着离开的方法。孩子的祖母何苏秀对我说,她已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放弃她的家族已经居住了几百年的家园。

“只要军儿的工作状况能够改善,能够克服他的财务问题,我们很愿意搬到重庆去定居下来,”她说,“我们老了,还能下田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也不要我的孩子过着种田的生活。我们如果能够全部搬过去,军儿就可以和他的孩子住在一起。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这样。我知道这样对村子不好,可是这个村子从来就没有多好过。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生活一直都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对村子没有任何亏欠。只要有一天能够离开,我就再也不会回来。”

没有城市的乡村

朵利,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人口迁居城市也许摧毁了小农生活的样貌,但我们绝不该因此以为乡村只要与城市断绝往来即可保持平静。我在骄阳炙人的印度中央地区就鲜明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一座村庄,同样满是泥土与牛

粪的小屋，却因为在外墙上漆了一幅来往车辆都可清楚看见的招牌，而在周遭的村庄当中显得特别醒目。这幅招牌写着："本村出售中，含所有房屋、牲畜及农场。"

朵利(Dorli)是一座人口只有两百七十人的小村庄。我和许多来到这里的访客一样，一开始也把这段由马拉地文写成的标语视为一种抗议的表现，或是争取注意的手段。瓦尔达(Wardha)正是甘地发起印度独立运动的基地，所以在瓦尔达的郊区出现这么一句政治主张显然也算得上适得其所。我被人带着走进一间以牛粪铺成地面的小屋，墙壁漆着带有欢乐气息的浅蓝色。在这间单房的小屋里，十几名或老或少的村民和我一起蹲坐在床铺与电视之间的地上。他们说这座村庄的确真的在求售，因为他们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计算与争论之后，发现村庄的前景一片黯淡。他们真的希望有人能够把这整座村庄买下来，也希望能有某个企业家出面和他们接触，因为全村的四十个家庭都在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断定从事糊口农业是死路一条。与其跟着乡下贫穷现象的恶性循环陷入谷底，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看看能否摆脱乡村，加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藉此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既然可以借着自己的土地获得新生活，又何必坐着等死呢？我们全都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发现，把整座村庄卖掉是摆脱土地的最佳方法。"四十一岁的钱德拉塞卡一面翻开村庄的手写账册，一面这么对我说。他的胡须修剪整齐，衣服颇为陈旧。他是村里少数识字的居民之一。他认为这些田地和房屋有可能获得印度最大的公司塔塔集团收购，而且这家总部位于孟买的工业集团也许会以两千万卢比(四十万美元)的价钱买下这座村庄。如此一来，村里每家即可分得一万美元——这么一笔钱对他们而言堪称天文数字，但也几乎可以确定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期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之前，村里每一家还可能赚

得到一天两美元的收入，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里的家户收支却都处于赤字状态。如同世界各地贫穷乡村里的小农，朵利的居民也生活在债务的沉重负担下。村里每个家庭平均积欠银行及私人钱庄五百美元，接近于他们一整年的收入。而且，债务的金额仍持续不断上升。

“我们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有人买下我们的村庄，我们就到城里去做生意，”钱德拉塞卡对我说，“城里就连人力车拉夫赚的钱，也够让孩子上学，还可以买煤气炉回家煮菜。在这里，我们只能让孩子上乡村学校，我们的太太也必须自己生火做饭。所以，我们会利用这笔钱搬到城市，那里的生活至少会比这里好。靠着种地根本没办法让孩子受教育。我们的孩子顶多只能念完小学而已。如果要再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我们就必须到城里租个房间，还要负担交通费和书本的费用——这样实在太贵了。我们过去二十年来一直活在盼望当中，每年都祈祷着能有好收成。我们不要死，我们宁可住在贫民窟里。”

他口中的鲜明对比不只是纯粹的比喻而已。除了卖掉整座村庄，或是出售自己身上的重要器官(其他乡村曾有居民尝试这么做过)之外，要在这个地区摆脱乡下陷阱的唯一方法就是策略性的死亡。20 世纪末，维达尔巴地区(Vidarbha，朵利就位于其中心附近)各地的农民因为作物歉收与债台高筑而发狂，又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家人生活在营养不良的状况下，于是发现了一种避免全家人彻底灭绝的策略。在贫穷的印度棉花田里，根本找不到什么自杀的工具：播种、犁地及收成都是靠着双手辛勤完成，连刀子也很少看到。这里的男人都是等到傍晚时分，走到自己的田地，坐在地上，望着周遭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然后仰头灌下一公升的农药。

这种自杀行为随即盛行了起来。根据孟买经济学者米什拉(Srijit Mishra)的一项研究，马哈拉施特拉邦贫穷男性农民的自杀率在 1995

至2004年间几乎四级跳，从每十万人中十五人自杀增加到五十七人以上；至于非农田地拥有者的贫穷工人，自杀率只从十七人上升到二十人（女性更是从十四人下降为十一人）。在朵利周围的若干地区，自杀率飙增至每十万人有一百一十六人自杀，超过全国男性自杀率的八倍。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数字有所下降。米什拉指出，自杀者有百分之八十七都背负债务，而且金额平均相当于一座小农场在丰年的一年收入。值得注意的是，百分之七十九的案例都是喝农药自杀。现在，这个地区每年仍有数以百计的农民走上绝路。只要走访维达尔巴地区的任何一座村庄，当地人都能够向你指出有哪些家户最近发生了自杀事件。

我走访了二十几户发生过自杀事件的人家。他们虽然分布在不同村庄，却都同样住在低矮的泥土小屋里，大部分都享有电力，其中不少户也拥有电视机。他们的故事都大同小异：本来面积就不大的农地变得愈来愈小，作物收成迅速衰退，只能向种子与肥料经销商购买昂贵的耕作原料，不断向国营银行与黑市钱庄借贷以支应农耕成本，现代化带来的便利果实又造成了缴不完的账单——电力、电视、不断攀高的嫁妆与婚礼支出，偶尔还有购买机车这类不自量力的消费行为。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完全缺乏农耕以外的收入来源：不同于其他许多地方的小农，印度中部的棉花农夫没有从城市汇来的钱财。在这个时代，家庭农场仅仅具备了为都市经济提供缓冲的功能，因此在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地区，农民既然无法直接获得都市汇回的金钱资助，就只能勉力挣扎求生。毕竟，当今的农业体系已和都市生活形成平行依存的状态，等于是印度城市里那些贫民窟的支持网络。

可惜的是，这个地区的农民大部分都无法迁往贫民窟。那格浦尔(Nagpur)是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但也需要一天的艰苦跋涉才能抵达，而且要在那里开展生活也必须先有一笔储蓄。此外，由于这个地区的

经济活动以棉花为主，所以这里的通讯管道都是通往孟买，但孟买和这里的距离光是搭火车就需要二十个小时。季节性移民与连锁式移民的现象在这里还没展开。我在朵利和邻近的村庄随意见了一些村民，结果发现他们甚至从来没听过有谁搬迁到城里去。在相关知识都匮乏的情况下，迁徙根本是不可行的选项，这里的每一座村庄都拥有至少一部电视和一部手机，来自城市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党人员也不时会来走访，但城市对他们而言仍然遥不可及。狭小的土地和死气沉沉的经济导致这里的农民根本无法迁徙到任何地方去，即便是邻近的瓦尔达与钱德拉布尔(Chandrapur)也不可能。

在印度的媒体上，农民自杀现象被归咎于许多因素。全球化与美国政策更是当前流行的批判对象：毕竟，棉花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已自20世纪的高峰大幅崩跌，部分原因就是美国补贴该国的棉花农，另一个原因则纯粹是全球市场上的棉花已经供过于求。收益下降对棉花农自然有害，但要稍微检视一下任何一个棉花农民的收支状况，就足以推翻这种说法。我发现，就算棉花价格仍处于历史上的高点，大部分的自杀农民仍然达不到收支平衡，他们赚的钱仍然避免不了债务节节高升。他们的田地太小，产出太少，种植棉花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有些报导把棉花农的困境归咎于基因改造作物的财务成本与产量下降，还有这种作物所需的商业性肥料。不过，这些农民面对的问题早在基因改造科技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实是根源于现代农业的基本成本当中。地力衰竭几乎是全球普遍的现象：由于农民把绿色革命的技术都用在不具可持续性的小型作物上，又缺乏适当的知识，导致过度施肥又欠缺养护，于是十年前的大量收成已沦为永久的荒瘠。过去十年来，这里的农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收成大幅缩水，支出又不断上升。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绝望、负债与自杀。在接近大城市的其他地区，面

临同样困局的农民却得以避免这种命运。那些地区的经济情势虽然一样艰困，但农民却和达利村的波兰小农一样，受到落脚城市的亲人——也就是那格浦尔与孟买的贫民窟居民——汇钱资助。如果没有都市资金的输入，这种小农农业根本毫无意义。

在这个地区，除了自杀农民留下的那些身心俱疲的家人之外，最令人难过的景象就是少数几座规模与资金水平足够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场。这些农场拥有数十公顷的田地，采用现代作物管理技术与水土保持策略，不但土地肥沃，获利良好，而且雇佣了大量劳动力。对于其他农村住户而言，这些农场等于是不断提醒着他们，只要有一些外来的投资与储蓄，农耕其实很容易成为可靠的生计来源。“在这里种田要维持良好稳定的生活并不难，重点是要有足够的土地，而且要适当的经营。”五十五岁的沙尔玛说。他的十公顷农地雇佣了四十五个员工，每人工资一天一美元，一年可为他赚进将近一万美元。重要的是，他和他父亲利用他们迁居孟买的收入为这座重新振兴的农场提供资金。

一个世代以前，这个地区的农民几乎全都有机会像沙尔玛先生这样拥有成功的农耕事业。他们的土地面积够大，平均都超过八公顷，当地也有充裕的农业劳动力，而且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绿色革命带来了高产量的种子、作物管理方法与农耕知识，不但永久终结了印度的大型饥荒，也使得市场农业真正具有商业上的可能性。这里应该出现的发展，就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在 18 与 19 世纪期间发生的状况：较有野心的农民扩张土地、雇用员工、增加产出，土地较小的农民则把农地卖掉，不是迁徙到城市里，就是到经营有成的商业农场上担任工人，于是城市经济与农产业双双繁荣兴盛，相辅相成。

不过，这样的转型需要与城市经济具有活跃的关系，而印度的贫穷乡下地区却在许多方面被剥夺了这种关系，最明显可见的就是提倡甚

至理想化小型家庭农场的政府政策。而最激烈的后果——同时也是导致自杀危机的直接因素——就在于土地持有情形上。在1947年印度分裂之后，这个地区的农场家庭就扬弃了长子继承制度，不再由长子继承整座农场并任由其他儿子成为农场工人或迁往城市，而是把土地分给有意继承农场的所有儿子。如此一来，这个地区的田地面积随即大幅缩小，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型农场导致失业率升高、产量减少，根本不可能从事商业化的经营。

我拜访了查普通尔一家人，他们住在雷哈奇这座繁忙拥挤的村庄，住处距离田地一公里远。1970年以前，他们家的田地原本有三十五公顷，后来祖父分给了四个儿子，其中一人分得十二点五公顷，其余三人各分得七点五公顷。接着，这群兄弟又把土地分给他们的儿子，于是每个人分得的田地大小都不超过三点五公顷。今天，在他们的家族当中，有些成员的田地只有一点二公顷。这样的土地面积非常小，即便是贫穷的农场工人也存得起买地的钱，而能够放弃稳定的薪水，转而从事高风险的小农地耕作(种子商贩也说服了许多人这么做)。拉玛吉是家族里的孙子辈，从父亲手上继承了一点二公顷的田地。他在2007年花了三百美元购买棉花种子与肥料，但在秋季收成之后，卖出棉花的收入却只有四百美元，而当年的收成量已算是一般的水平了。扣除成本之后，剩下的一百美元根本不够家人吃饭，更别提还要偿付五百美元的贷款。尽管他在镇上有些比较富有的兄弟会给他一些钱，却没有落脚城市提供的帮助他摆脱小农生活或是其他的财务支持。那年七月，他的太太慕克塔发现他死在田地里，手中紧握着农药罐。

“印度需要的是多一点农场工人，少一点农民，”维达尔巴的农业学者苏贝达尔(Anand Subhedar)说，“我们目前已造成了这种状况，导致农民必须借贷赌收成，但近年来收成却从来没有好过。他们如果只是

单纯领薪水，状况一定会好得多。”不过，这样的转变很难发生，因为印度人对于拥有土地非常狂热。他们认为土地是女神，经常向她祈祷。“农民不晓得该怎么投资钱财为自己开创比较好的未来，”苏贝达尔说，“所以他们只会傻傻地等，等到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为止。”

落脚村庄

毕斯瓦纳，孟加拉锡尔赫特

毕斯瓦纳位于孟加拉国的锡尔赫特地区，地点比印度的朵利还要偏僻，与各大城市毫无联络，土地面积狭小，人口稠密，按理说命运应该和朵利差不多。然而，锡尔赫特这个位于孟加拉国东北角的地区，虽然几乎完全都是稻田，却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这里的人口就不断前往伦敦及其他英国大城的落脚城市定居。根据估计，英国的孟加拉裔人口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来自这个小小的地区，而这样的连接也为这里的泥土村庄带来了令人惊讶的变化，原因是人口与金钱的来回流动转变了这里的经济。在锡尔赫特，落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了极具戏剧性的终极阶段。

开车进入毕斯瓦纳，第一眼的印象就和孟加拉国其他大型农村没什么两样。到处可见摇摇欲坠的铁皮木屋，一间房屋就聚居着十几个人，全都是一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穷人；儿童在稻田里捕鱼，成人拿着镰刀割稻、拉人力车，不然就是兜售着各式各样的物品。乡下的贫困

生活是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不过，一旦进入繁忙的村庄中心，即可发现这座村庄的状况恰恰相反：这里有数十间高达数层楼的商店，甚至还有一座大型购物商场，名叫阿尔赫拉，不但有电动手扶梯，还有烟灰色玻璃窗与冷气空调，里面卖的商品包括鞋子、电子用品、化妆品与西式马桶，全都是稻田乡村里从来不曾见过的东西。村里还有餐厅、快餐餐馆与土耳其旋转烤肉小吃店，许多都挂着英文招牌，取着像伦敦炸鸡这样的店名。此外，这里的房地产经纪公司也多得令人吃惊。这是一座高度城市化的乡村。不同于孟加拉的其他六十四个区，锡尔赫特区的乡村绝大多数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则来自于村庄外围。沿着稻田之间的狭窄道路开车前进，可以看到地平线每隔几公里就矗立着一现代化住宅，三四层楼高，通常有着装饰性的屋顶、以华丽的围墙包围起来的花园，还有与王宫不相上下的环形车道，而且全都采取波斯湾或达卡富裕地区的那种奢华建筑风格盖成。一旦接近这些耀眼夺目的宅邸，即可发现许多都是空屋，内部的陈设也相当简单。尽管周遭的贫民窟住宅区挤满了人，稻田里也满是工人，这些房子却就这么空在那里。

这些住宅是“伦敦人”的房屋，屋主都是早已不住在此地的家庭。在锡尔赫特，只要是到英国永久定居的人，都被称为伦敦人。这些宫殿般的住宅通常造价好几万美元一幢，不过，若是在西方建造同样规格的房屋，价格必然高达数百万。这些房屋一年通常只有几个星期有人居住，就是伦敦人的亲属来这里玩的时候。伦敦人的宏伟住宅旁通常还会有一栋豪华的平房住宅，同样是由英国汇回的资金兴建，里面住的是伦敦人待在乡村里的家属。由这些住宅向外扩散，则是较为简朴的房屋，由人数众多的工人与仆人居住。这些劳动人口有些是当地人，有些则是从遥远的地方迁徙到这里，他们之所以涌向这些大住宅周围的田

地，原因是他们的生计就仰赖伦敦人汇回的金钱。

移民英国的锡尔赫特人虽然通常住在公共公寓住宅，赚取的薪酬比英国的最低工资高不到哪里去，但这样的收入还是足以让他们在锡尔赫特享有相当于封建主的地位。村民都把他们视为富有的捐助人，他们回乡探访的时候也经常表现出有如贵族般的傲慢神态。他们的财富带来了就业机会与建筑业的兴盛，把这个地区的村庄变成人口集散地，有其本身的移民潮，甚至也有小型的落脚城市。典型的伦敦人家庭都拥有十几公顷以上的田地、几项大规模的建设计划、几家商店，在道路铺设与清真寺建筑计划中可能也都持有股份。一个伦敦人家庭可以为十二至一百名锡尔赫特居民提供直接收入，也会从孟加拉国的贫穷地区吸引数十人来到毕斯瓦纳，而这些人口通常就住在殖民地，也就是由伦敦人建造并持有的出租住宅区。

在毕斯瓦纳的一片广大稻田里，我遇见了一群收成工人在田地里弯着腰，手拿镰刀割稻，再把割下的稻子捆成一束。他们一天从事这样的辛勤工作长达十个小时。二十三岁的塔利克和这个团队里的大部分成员一样，都来自杰马勒布尔(Jamalpur)这个极度贫困的北部区域，距离这里两百多公里远。他到这里的稻田工作半年，以便支应妻儿的生活所需。杰马勒布尔有季节性饥荒的问题，居民至今仍有死于营养不良的危险。在收成季节，塔利克每月可以赚得三千塔卡(六十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支付殖民地的房租与饮食。剩下的两千塔卡，乘以收成季节的四个月就是八千，是他在杰马勒布尔的田地工作一年收入的两倍以上，足以让他的家人图个温饱。塔利克这个工作团队由三十岁的阿里负责督导，他是个贫穷的毕斯瓦纳居民，来自非伦敦人的家庭。他住在村里一间比较舒适的小屋，在收成期间赚取的薪酬约是工人的两倍。

他们的老板是伊斯朗，是一个他们视为地主的年轻人，住在所谓的蓝屋里——也就是伦敦人住宅旁一栋整洁而现代化的平房，周围环绕着一道围墙，还有一座维护得相当美观的花园。四十年前，这里的田地原本只有四分之三公顷，由住在这里的家庭耕作收成。随着一代一代不断分割田地，这里也逐渐迈向与印度中部相同的危机。后来，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一家的家长前往伦敦，在工厂里工作了几年，然后在北伦敦开了一家外卖餐馆，正逢经济繁荣而赚了不少钱。他利用这些钱盖了那栋蓝色平房，并且把自家的田地扩张到二十五公顷。他的儿子苏费·米亚赫出生于伦敦，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房地产兴盛期从事小规模房地产开发业，然后利用自己赚得的钱盖了蓝色平房旁的那栋伦敦人住宅，也在当地开发了几片住宅区，并且在毕斯瓦纳开设了一连串的商店与出租店面。他一年只从伦敦回来探访两次，而这些投资就是他利用短暂的返乡期完成的。

现在住在蓝屋里、督导着这座小王国，负责雇佣收成工人以及为他们提供住处的管理者，是苏费·米亚赫的外甥，也就是二十一岁的地主伊斯朗。他是个沉默寡言而且个性温和的年轻人，因为父亲去世导致他们家无法和其他人一样移民英国。伊斯朗虽然喜爱西方的摩托车夹克、鞋子与足球队，英语却一直学得不太好，也还没有在伦敦找到结婚的机会。不过，他倒是成了个监工，还是个小小的企业家：他利用舅舅从城市寄回乡村的钱，还有其中一家出租店面，在毕斯瓦纳的中心开了一家店，贩卖在伦敦流行的跑步鞋。和他同住在蓝屋里的还有他的母亲、三个妹妹，以及一个目前就读中学的弟弟。他平常必须花不少时间清洁维护那栋伦敦人住宅，以备他舅舅随时回乡使用，尽管他舅舅现在已愈来愈少回来。维护这栋住宅的花费为一个月一万五千塔卡(六百美元)，其中九千塔卡(一百八十美元)用于支付两名住在屋子里的全职

佣人的薪资。这两名佣人分别为五十六岁的马苏克与二十五岁的阿美德，他们来自邻近的霍比甘杰区（Habiganj），原本是小农，后来则为了赚伦敦人的钱而搬到毕斯瓦纳。他们各自都把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薪水寄回家，每年回家探望太太和小孩两三次。

西方经济于2008年陷入信贷风暴，英国也面临房地产市场衰退的状况之后，伊斯朗的舅舅也从原本定时寄钱回乡改为偶尔送些礼金，后来则是连礼金也销声匿迹。建筑工作因此暂停，整个投资案从此只能仰赖毕斯瓦纳当地的收入支持，而当地收入的主力即是来自店面的租金。当地成千上万的家户都遭遇了这种外来资金断绝的现象，于是地方上的经济在突然之间从封建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导致缺乏生产力的事业不得不倒闭。结果，伊斯朗的鞋店同样只好关门大吉——他遣散了六名员工，结束营业。整体而言，他们家族直接或间接雇佣的员工当中，至少有二十几人因此失业。他们原本只是出于农民的自尊而不肯舍弃田地，于是顺便把农场当成慈善事业经营。现在，他们却突然必须从财务角度思考农场的未来，于是伊斯朗决定每年收成三次，甚至设法改种市场作物。

毕斯瓦纳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发展呢？一方面，这里从原本的小农经济转变为一种高度依赖性的馈赠与崇仰经济：由英国的落脚城市汇回的钱财支持着一套特殊的经济体系，主要目的在于满足虚荣心，而不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人类学家加德纳（Katy Gardner）针对锡尔赫特的经济与社会体系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现伦敦人汇回的金钱有一部分用于兴建道路与学校、购并土地或是投注其他生产性投资，但同样多的另一部分则是用于兴建庞大的住宅、华丽的店面以及从事各种炫耀性的投资，以便提升家族的地位，让留在锡尔赫特的家族成员得以享有较佳的婚姻机会，并且造就现代化与财富的可见象征。

不过，在这种炫目的表象底下，还有另一种较具可持续性的发展。孟加拉国学者西迪格(Tasneem Siddiqui)针对这些乡村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结果发现从伦敦与达卡的落脚城市所流回的金钱与知识，在乡下地区创造了消费市场(追求消费的心态与赚钱的机会原本在乡村里都不存在)，也在锡尔赫特对高产量农业进行投资。这是一种由女性带头的进步发展。在循环移民的协助下，乡村妇女经常率先投资灌溉、手工业与农业营销。有些伦敦人的投资取代了政府的功能：除了数十所由移民兴建并由村民担任教职员工的英语学校之外，毕斯瓦纳还有四所专科学校，兴建及运营的经费全部来自伦敦人汇回的金钱，而且全都经营得相当不错，招生人数皆达到满额，原因是当地居民为了提高孩子未来获得移民资格以及与外国对象结婚的机会，所以都热切投资于孩子的高等教育。英国的移民法规愈严格，这些学校的利润就愈高，对于新近迁居英国的孟加拉国移民也显然产生了提升文化资产的效果。不过，伦敦人的其他投资，如果对当地村民较无价值，就不免在经济衰退期间画下句点。伊斯朗开设那家跑步鞋店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现他的品味以及满足伦敦人的创业抱负，而不是在毕斯瓦纳开拓市场以及创造就业机会。他的亲属一旦不再寄钱回乡，这家商店也就经营不下去了。

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体系之下，伦敦人于是得以大幅收购土地。尽管伦敦人家户在这里只占了三分之一，却拥有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不过，他们自己也早已不再务农，伦敦人的亲属有百分之八十四以上已不再直接从事农耕工作，而是从商店、建筑工程、交通运输及其他来源赚取收入。至于他们的田地，则是租给别人耕种，尽管这样的租金和他们新近累积的财富比较起来根本微不足道。现在，大部分的家户每年都只收成一次稻作，雇佣的工人介于五至十人之间；另外，也有百分之

十左右的家户——虽然为数不多，却不容忽视——则是任由田地闲置荒芜。在这个粮食短缺现象严重的粮食净进口国里，这种现象不禁令人侧目。

不过，农业已不再是乡村居民最明智的谋生方式。现在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由一小群人经营小型或中型的商业农场，为数较多的人口担任农场工人，另外更多的人口则从事非农业的乡间工作——这样的转变至少已开始由小孟加拉这座落脚城市逐渐促成。乡村去农化的现象，同样也可见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与中东较为发达的地区。落脚城市对乡村造成了都市化的效果，包括文化与经济组织两方面。

毕斯瓦纳已具备了所有元素，可以转变成较具可持续性的乡村生活，拥有高产量并且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商业性农场。这里的土地已经集结为大片田地，基础设施已获得改善，资金来源也早已就绪。不过，人口外移仍是这座村庄最核心也最主要的功能，最大的投资也完全用于以兴建各种庞大乃至荒谬可笑的建筑物来夸耀迁徙活动本身。这种村庄，连同其中大而无当的住宅以及荒废的田地，在发展中世界与西方落脚城市具有紧密联系的地区已愈来愈常见，尤其是在墨西哥、北非与中国的珠江及长江三角洲。

然而，这种经济体系及其特有的建筑与就业形态，都完全只是落脚城市第一代居民带来的产品。出生于落脚城市的第二代居民就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动机要汇钱回乡或是在乡村里建立自己的地位。落脚城市第一代居民的后代通常不会再延续这种都市与乡村之间的连接。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些直接的实质联系一旦消失之后，先前涌入的金钱与剧烈的结构变化在乡村造成的效果是否能够持久。锡尔赫特正是个值得观察的实例，因为这里的人口大量移居英国已有五十年之久的发展。移民持续汇回的金钱已逐渐缩减为偶尔一次或是策略性投资，伦敦人

住宅屋主回乡小住的频率也愈来愈低，随着移民汇寄回乡的金钱逐渐萎缩，村庄里的中产阶级景象看似也将慢慢消失。一名学者在巴基斯坦的米尔布尔（Mirpur）深入检视了当地同样仰赖英国的经济体系之后，把这种村庄描述为“资金充裕但发展不足”，繁荣的现象“仅仅建立在汇寄回乡的金钱不断流入的基础之上”。

不过，像毕斯瓦纳这样的村庄其实很有可能成为商业性农业的运营中心。就目前而言，由于伦敦人汇回的金钱仍不断流入，因此达成这种发展的诱因并不强。自从 2000 年开始，数十名年老的孟加拉国人开始从伦敦搬回毕斯瓦纳安度退休生活。英国政府与私人企业发给他们的退休金，由毕斯瓦纳的标准来看，堪称是一笔极高的收入。他们将是带着这么多钱回乡的最后一个世代，有些当地居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规划未来的出路，以便将来能够自立生活。

不过，这不表示发展中世界的小型农场就一定必须或应该全部合并成欧洲与北美那种大型的商业化企业。有些小农的田地显然面积小得耕种起来毫无实益，但大体上而言，经济学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贫穷国家的小型农场其实效率比大型农场来得高，获利比较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比较多(但在像波兰这样的地区则是刚好相反)。他们需要的不是面积庞大的土地，而是投资：只要投入基本的资金与知识，即可将糊口农民的农场转变为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商业性农场。实际上，农业投资不足正是当前世界上最严重的一个问题，2008 年的粮食短缺就证实了这一点。改变已开始出现！例如中国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对农场提供的大规模投资，就已逐渐将该地区转变为一大粮仓，而这也正是那个地区本来就应该扮演的角色。不过，在大部分地区，二度绿色革命所需的投资都将来自乡村与遥远城市之间的连接。

对于有些人而言，伦敦人汇寄回乡的金钱是转行的种子资金。在

纳加尔(Raj nagar)这座村庄里，我认识了四十七岁的贝巩，她有三个兄弟姐妹和两个孩子在伦敦工作，主要都在咖喱餐馆上班。一开始，他们汇回的钱让她那片十一公顷的稻田数十年来首度种满水稻。后来，她发现自己的生活完全仰赖这些国外汇回的钱，而且种田起伏不定的收入也不可能维持她的生活所需。她用两年的时间，把这些国外汇回的钱储蓄下来，然后和留在国内的亲人一起在村里开了两家商店，一家卖手机，一家帮人装百叶窗，田地则卖给一个对现代农场管理技术深感兴趣的邻居。“以前，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伦敦汇回来的钱，我们每个月也都仰赖这笔收入，”她说，“现在那边汇回来的钱已变成像礼金一样，只有节日才有，原因是他们在伦敦有六个孩子要养，所以生活也变得比较辛苦。不过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这些生意的收入都不错，所以我们已经不必依赖伦敦那边的钱了。”

这也许正是乡村的理想结局：由少数人经营有利可图的农场，其他人则在农场上工作或是在当地从事服务业谋生。欧洲的人口迁徙就是这么终结了小农村庄，我们也可以盼望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的地区。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也取决于它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经营不善的落脚城市可能把乡村变成一座监狱，经营不善的乡村则可能导致落脚城市失控。

第一波人口大迁徙：西方今日面貌的形成

现代世界的丑陋门户

巴黎

珍·布维尔是个身材羸弱的女孩,她在1879年十四岁那年首度穿越巴黎刚建好的外墙,身上穿着她仅有的两套衣服,带着一些盥洗用具,包在一条头巾里,心中满怀着乡下移民对都市的期待。她在几个月前和母亲一同靠着马车和双脚从隆河谷地长途跋涉来到巴黎,但后来她母亲在巴黎市郊从事染织的工作一直不顺利,于是在失望之余返回了她们曾备受饥荒所苦的村庄,只留下珍孤身一人待在城市。珍继续向前迈进,投入挤满了外来移民的巴黎市中心。她所参与的这场迁徙浪潮,正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股由乡下涌向城市的移民潮。在西方世界长达一百二十五年的转变过程中,她正在这高峰之际来到巴黎。19世纪期间,法国首都的人口以来自乡下的农民占大多数,而珍也正如这些数十万名的农民一样,只想找个赚取现金收入的机会以便寄钱回乡,并且有个可以睡觉的地方。

她找到的是现代世界第一座庞大的落脚城市,但不是最大的一座,因为不论面积、规模、人口密度、繁忙与肮脏混乱程度而言,伦敦与曼彻斯特在当时都早已远远超越了巴黎。不过,巴黎绝对是最具爆炸性的城市。政府对于人口大迁徙潮的对应犯下重大错误,最早就是始自巴黎,而且至今许多政府仍然不断重蹈覆辙。此外,落脚城市也是在巴黎

最早成为足以改变国家的政治力量。

珍走进一片迷宫般的街道，这里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不敢涉足的地方。在雨果、巴尔扎克与尤金·苏(Eugene Sue)等人的描写下，这片街道已成了一般人心目中肮脏、堕落、凶杀与破败的代名词；而且，在1789年、1830年、1832年、1848年与1871年，这里也陆续成为一场场改变历史的猛烈暴动与革命的主要舞台。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这个区域是堕落之人的收容所，是都市人逐梦失败的藏身之处，是人类兽性残迹的汇聚之地。不过，珍却看出了这个地区的真正本质：数百万人的暂时栖身处。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比毫无希望的乡村稍微好一点点的生活环境，于是暂时待在这里，找寻着在都市里永久定居的机会。

她的第一个住处是个小房间，唯一显眼的特征就是一张上面空无一物的木板床，和窗户下一条流淌着人类排泄物的小沟。这幕情景正呈现了落脚城市最糟的一面，就像她的冷酷雇主一样。她在一年内陆续换了几个家庭佣人的工作，却都不尽如意。后来，她发现和她来自同一座村庄的远亲在巴黎的第九区从事针线行当，于是他们帮她在当时极为兴盛的成衣业找到了缝制衣物的工作。那里的工厂不论外观与功能，都和当今深圳或达卡等地的工厂没什么两样。珍在那里工作的工时极长，薪资平均一天二点五法郎。

找到这份工作之后，她也和欧洲各地的落脚城市居民一样，对自己的收入与支出精打细算，一面储蓄，一面寄钱回家，并且不时留意能够改善自身境况的机会。她的开销控制得非常严格：在每周十二至四十法郎的收入当中(她的工作是按件计算，所以收入的波动相当大)，她在饮食上花费八点四法郎，房租三法郎，治装费三点七五法郎，剩下的则是寄回村里或是储蓄起来。“为了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住处，我愿意牺牲一切。”她写道。

不过，对于一个没有一分一毫余钱，也没有换洗衣物的女工来说，要买一张床以及一间屋子所需的各种物品，实在是一笔庞大的花费……我的志向就是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并且存一笔钱在乡下买栋小房子……我要在那里度过晚年。要实现这个梦想我就必须拼命缝衣服，于是我也充满热切地不停工作。

我租了一个小房间，预先付了三十法郎，包括给门房的小费。这个房间又小又简陋，却有一个让我极为欣赏的特色：相当干净。墙面都粉刷成白色。虽然不舒适，但毕竟是我可以栖身的地方。我也带了几件厨具和碗盘，所以可以在家吃饭，在饮食上多省点钱。

珍加入了许许多多工人的行列。这些工人以女性为主，全都住在巴黎街道旁的公寓住宅，而且都是在第六、七、八层楼。他们的房间大部分没有窗户（因为住宅按照门窗的数目课税），一间房里通常可住上十几个人。有些相邻的公寓还有走道相连，形成与地面街道相互呼应的天空街道，出入的人口全是来自乡村的移民。在部分区域，巴黎的落脚城市即是以这种垂直分层为特色，既有的都市阶级住在低楼层，来自乡村的移民则住在最高的两三个楼层（电梯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之后，这个顺序就翻转了过来）。

到了珍·布维尔的时代，巴黎已经发展出具有明确特征而且隔离独立的落脚城市。出生于都市的上层与中层阶级逐渐集中于西部的社区，出生于乡村的工人、求职者与失业人口则住在市中心的若干区域以及东北部、东部与南部位于旧城墙外的新兴落脚城市。随着奥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及其后继者所规划的巴黎市中心逐渐成为一片由林荫大道与广场交织而成的美丽网络，占人口多数的落脚城市居民也就愈来愈往外围移动。

珍·布维尔的人生也受到这种水平与垂直的分层影响。她住在巴

黎市中心后街小巷的高楼层住宅，这片社区主要位于第九区，周围满是长期住宿旅馆与加尼斯（garnis：按照行业分类的周租型宿舍）。这些住宿设施一直存续到20世纪60年代，然后才随着巴黎的乡村移民被强制迁居至市郊外围的新建水泥公寓大楼而消失。

如同欧洲大多数的落脚城市居民，珍也永远不会返回乡村，顶多只回去短暂探访个一两次——结果讶异地发现自己已经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巴黎落脚城市带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把法语转变为法国的通用语言。在珍·布维尔的时代，法国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口懂得法语，说得流利的人数更少，而且以长期在巴黎工作的人口为主。大多数人都只会说地区性的方言，例如奥克西坦语（Occitan）、勃艮第日耳曼语、布列塔尼语及瓦龙语（Walloon）。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的法国公民才懂得国家的官方语言。她的巴黎邻居也没有一个人打算返回乡村。几百年来的循环与季节性迁徙已经为乡村与城市建立了连接。中世纪以来的循环式迁徙涉及欧洲各地的数十万人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逐渐消退，形成永久的聚落。萨瓦人（Savoyard）农民在冬天到巴黎担任烟囱清洁工与马车司机；石匠与建筑工人来自利穆赞的农田；女佣和妓女也在冬天从布列塔尼过来。后来，随着巴黎市区的环境变得比较宜人，郊区反倒愈来愈拥挤之后，愈来愈多的农民就都开始在耕种季节期间待在城里。到了19世纪末的二十五年间，在珍·布维尔的有生之年，欧洲的乡村移民虽然原本预计会再返回乡村，但大多数人却都在城市里终生定居了下来。

珍·布维尔虽然不回乡村，却得以借着分期付款买了一张床，并且靠着严格的预算控制与自律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远离落脚城市，邻近于中产阶级。不过，这个过程花了她数十年的时间。

珍的迁徙活动充满了希望，生活却过得不快乐。她的父母是法国

东南部的农夫与制桶工人，在19世纪70年代摧残法国葡萄园的根瘤蚜疫情中不幸破产。在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她的父亲把太太和孩子送到城里去工作，自己留在乡下经营农场，但却愈来愈仰赖珍从城里寄回的钱。

珍·布维尔在巴黎靠着同村移民的人际网络，在城里取得稳定的地位，这正是19世纪欧洲人口大迁徙的典型现象。此外，当时的迁徙人口也以女性为主。一般印象虽然都是年轻男子到工厂工作，然后再把家人从乡村接到城里，实际上先到城市的却往往是女性。史学家蒂利发现，家庭服务是19世纪的乡村移民进入都市最常见的管道（今天也是如此）："大体上而言，迁居都市的农民在服务业与商业当中找到了底层的就业机会……实际上，过去两百年来，对于欧洲的乡村移民而言，最重要的都市就业类别很可能是家庭服务。只是因为一般的观察都过度聚焦于男性和制造业，以致掩盖了这项事实。"

首次爆发

到了18世纪晚期，就在现代落脚城市诞生之际，乡村居民迁徙至城市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早已存在了好几千年。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城市形态的聚落首度出现于波斯湾，不久即散播至亚洲与欧洲。自从那时开始，人类就不断从乡下迁往都市。在接下来的五千年间，无可计数的小农与好几十万的地方精英都迁往了都市，虽然迁徙原因以季节或就业考虑为主，但也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城里待了下来。不过，乡村移民飞地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成为城市里值得注意而且深具影响力的

特征。在那之前，城市向来与农耕人口具有直接关联；自此之后，落脚城市即成为西方政治变革的驱动力。

这项变迁有一大部分与疾病脱不了关系。在这五千年里的大多数时间，大都市一直都是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谓的人口收集槽：吸收大量的乡下移民，收容他们几年时间，然后在他们还来不及繁殖下一代或真正安顿下来之前就把他们全部杀死。在免疫、卫生及医疗等知识发展出来之前的时代，城市汇集了各种无可治疗而且足以致命的文明疾病，诸如天花、麻疹与腮腺炎。这些传染病都只有在人口密集的社区里才会因为人与人的接触而散播。除了这些疾病之外，城市每隔几十年还会遭遇鼠疫这类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摧残。在每一座大型城市里，死亡人数都超越出生人数，儿童死亡率尤其高：在早期的现代都市里，儿童顺利长大成人的比例很少超过百分之五十。

因此，18 世纪中叶的欧洲都市每年成长率仅有百分之零点二。1750 年的西欧整体人口，比起黑死病首度袭击欧洲之前的 1345 年只稍微多了一点点，意大利许多城市的人口数甚至自从罗马时代以来就不曾增加。伦敦在 18 世纪的死亡率极高，尽管每年平均涌入六千名乡下移民，人口却一直维持在六十万人。城市就像军队一样，死亡人口的速度几乎与吸收人口的速度不相上下。

18 世纪下半叶，尤其在 1780 年之后，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了改变。伦敦的新生儿受洗人数在 1790 年首度超越死亡下葬人数，这项趋势在 1801 年之后更是大幅加快。其他欧洲城市也随即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全球商业与通讯愈来愈密集，使得欧洲各地与亚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开始具备相同的免疫能力，于是先前许多致命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纷纷减弱为地区性的传染病（而且感染对象仅以儿童为主）。这种新兴的免疫能力促成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暴增——其他

的助力也包括了结婚年龄下降以及作物养分提高。在欧洲与中国，人口成长率在1750年之后都提高了五至七倍。欧洲人口从1700年的一亿一千八百万成长至1801年的一亿八千七百万，在下个世纪又再次倍增。

这些新增的数千万欧洲人口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因为欧洲直到19世纪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住在乡下。不过，土地支撑不了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扩张。在许多地方，例如西部与西南部的德国，农民因为习惯于分割土地由各个儿子分别继承，导致田地变得愈来愈小，生产的作物连一家人都喂不饱(当今的印度中部就是如此)，于是，这些无以为继的农民就被迫流向城市。在其他地方，由于土地只传给长子，所以其他子女也不得不离开乡村。“1750年后出现的人口大幅成长，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沉重且难以负荷的压力，”麦克尼尔指出，“太多的过剩劳动力成年之后变得无处可去。不久之后，许许多多的乡下人口为了在都市边缘谋求生计而涌入城镇，导致城镇过度拥挤；另一方面，乡村的可耕地也都早已受到占用。法国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爆发的。”

法国大革命——或者该说是促成革命的特定事件——乃是发生于一种新式的城市空间，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城市里住满了新近来自乡下的移民，是个租金低廉的地区，为居民提供了繁复的互助网络，而且这些网络通常依照居民的来源地或职业划分。史学家哈夫顿(Olwen Hufton)为当时欧洲新出现的这种乡下移民聚居地提出了生动的描述：

每座城镇与都市的街道或社区都受到乡下移民及其家人朋友的逐渐渗入乃至完全占据。这些区域总是极为破败、潮湿、欠缺照明与供水，也最受政府机关的忽略，但能够找到廉价的住宿地点……这些人口聚居中心通常也是重要的大小教堂与修道院的所在地，因为这些地方

都是最古老的社区,在中世纪期间原本是爬满了老鼠与虱子的贫民窟……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也都邻近于港口、码头,可见移民挑上这些地区乃是有其策略考虑。这么一来移民如果必须在城市里乞讨为生,有什么地方会比大教堂或修道院更适合呢?许多加尼斯的房东都是比他早一步在城市里立足的同乡,他说不定还可以得一点贷款……他的姐妹与表姐妹都在城市里担任女佣,兄弟、叔伯、表兄弟与朋友则是担任侍从与男仆,而且这些亲友都居住在繁荣的区域。他如果想到街头上找零工,或到码头去担任搬运工、挑水工人或跑腿小弟,也必须知道该上哪里找才行。

法国在18世纪是欧洲人口最多也最先进的国家,最早经历了落脚城市的冲击。巴黎在1789年官方统计人口是五十二万四千人,那年农村发生了一场严重饥荒,迫使数以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求现金收入,于是巴黎的人口也随即膨胀至七十万。支持革命的财政部长内克(Jacque Necker)对市中心的描述,在今人眼中看来竟与21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出奇的相似。他在当时写道,市中心的居民乃是"旅店与宿舍的漂流人口……数以千计来自周围乡下的村民,在经济需求的驱使下到首都的城墙内寻求庇护"。

1789年七月十四日早晨,这些人口在拥挤得令人心惊的巴黎历史中心醒了过来,其中许多人都睡在十五至二十人一间的加尼斯房间里,而且天一亮就必须把床让给白天的房客。由于面包价格飙涨,许多人在前一天都没吃东西,并连续两天必须穿越暴动与趁火打劫的人群。他们都聚居在西堤岛还有市政厅与中央市场附近的区域,以及市郊成长迅速的落脚城市——也就是旧城墙外那些人口稠密而且烟雾弥漫的社区。圣安东尼郊区满是制革厂与工作坊,不但情势最不稳定,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此外,这里也位于巴士底狱的正后方。住在这里的男

男女女，一定每天都会前往位于此处中心的格列夫广场。这座广场不但是死刑的执行地点，也是各种行业及家庭服务的露天就业市集。在那一天，大多数人一定都没有找到工作，因为过去十年来促成落脚城市大幅扩张的建筑热潮已突然陷入停滞。如果是在过去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必然会返回乡村，但饥荒导致他们无处可去，所以只好留在巴黎，无精打采又满腔愤怒。

七月十四日冲入巴士底狱又洗劫了市政厅的巴黎群众，几乎全是落脚城市的居民。史学家路德(George Rude)详细审阅逮捕纪录之后指出："烧毁围墙的那群男男女女主要都是住在首都市郊的平民百姓"——换句话说，就是巴黎最大的落脚城市当中的核心居民，也就是那群仍未与乡村断绝关系且纪录显示一大部分都没有职业的居民。这些乡下移民正是所谓的无马裤汉(Sansculottes，指法国大革命期间劳动阶级的激进分子，因为这些贫民不像贵族一样穿着时髦的马裤，而出现这样的称呼)。因此，法国大革命最主要就是一场落脚城市的起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法国大革命仍然持续为落脚城市的重大事件。"在革命初期，巴黎群众推动着革命运动前进，"一名观察家指出，"其中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大部分都来自刚从乡下移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这些无马裤汉后来在1793年把雅各布宾党送上权力的宝座，也进一步强化了革命的效果。

不过，乡村移民虽是法国大革命的催化剂，却无从享受革命带来的果实。在往后十五年影响深远的动荡当中，革命运动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改善乡村移民的生活条件与社会地位(造成反效果的措施倒是不少，例如固定面包价格)，也没有改善他们聚居地区的本质及空间规划。恰恰相反的是，法国大革命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让农民待在乡村，并且确保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1789年八月四日的夜

里，三级会议成了欧洲第一个正式废除封建制度的政府，发布法令限制贵族与教士控制乡下土地的权力，分割大面积土地的所有权，并且通过分割土地的做法而为农民赋予自身耕地的所有权，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不过，当时根本没有什么乡下投资的来源。在许多地区，跨时代的土地分割导致了不适合从事商业性耕作的零碎农地。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营造法国农民的田园形象，实际上造成的人生却短促、艰辛、充满疾病又经常遭受饥荒之苦。这种现象又导致农民背负许多债务，不然就是必须仰赖极为类似于封建制度的体系。这种完全把注意力集中在乡下的做法，可说是注定了后续百年间混乱的城市发展，不但落脚城市动荡不安又备受忽略，乡下地区更是贫苦不堪。

最糟的是，法国的农场经济无法随时为城市供应足够的粮食。即便在收成情形最好的时候，巴黎的面包价格仍然比伦敦高出许多——巴黎工人花费在面包上的支出达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伦敦工人则是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之间。在那个时期，巴黎的粮食暴动相当常见，但在农业实行商业化制度的国家，则通常没有这种问题。这点至少是法国社会不稳定的部分原因，1848 年的革命（这革命几乎完全由落脚城市促成）、1830 年的七月革命，还有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兴起（成立地点就在蒙马特这座落脚城市），都是在大规模饥荒与面包价格飙涨之后而发生的事件。法国聚焦于农地分配而非城市改革，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乡下地区的稳定，付出的代价却是经济政治稳定的严重丧失。

圈地运动的城市化震撼

在欧洲其他地区，一种同样深刻的转变也产生了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剧烈的效果。在斯坎迪纳维亚的低地国家、德国、尤其是英格兰与威尔士，农民都纷纷学会了一种称为密植耕种法的创新手法，不但增加产量，也把农业转为一种雇佣大量员工的产业。从 16 世纪开始，接着在 1750 至 1850 年间普及于英格兰与欧洲西北部，农业经由若干创新而成了一项高产量的产业：大规模排水、灌溉以及使用肥料，钢犁、播种机与脱谷机等新科技的出现，牲畜饲料改善以及选择性育种，新式的休耕作物与饲料作物促成作物的轮种，并且广为种植马铃薯、大头菜与甜菜等高产量粮食作物。

就许多方面而言，密植耕种法乃是欧洲人口成长潮的绝佳搭档，每公顷土地所需的劳动力远多于传统农业，有时甚至达三倍，因此增加了乡下地区的就业机会。此外，密植耕种法也生产许多倍的粮食，终结了土地不足以支持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也大大降低粮食短缺与饥荒发生的可能性。城市人口的迅速成长为经济作物创造了庞大而且利润丰厚的市场，也为农场主转向密集商业耕作提供了强大诱因。

密植耕种法需要把公有的牧地与草地清空，结合成一大片的土地，并且圈禁起来。居民的生活因此遭到剧烈甚至悲剧性的侵扰，这些居民包括农民、乡下工人，还有打零工的贫民与游民。经济研究显示许多人的境况因此改善，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农民，因为他们能够取得耕地的所有权，从而成为高密度耕种农民及雇主。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

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突然转向商业性农业的做法，就整体而言似乎是一项有益的发展。“圈地可为成长的人口带来更多粮食，让更多的土地获得耕作，增加乡下地区的就业机会；此外，圈地农场也为19世纪的新进展提供了基本架构。”一份重要的历史研究提出了这么一项结论。

不过，糊口农业的瞬间终结，加上那个时代的高出生率，造成了数千万的过剩人口。这些人纷纷在自愿或遭受强制的情况下离开乡下，涌入都市寻求工作，而且不只是国内的都市，还包括了大西洋对岸的都市。有些人是在绝望之余才迁往都市，从而导致乡下的贫穷现象也大量移入都市，造成的后果正反不一。

爱尔兰摆脱小农农业的过程乃是由野蛮的殖民法律促成，因此残酷与非人性的程度远非西方其他任何地区能及。举例而言，被驱逐出土地的小农如果原本拥有的土地超过四分之一英亩，就不得享有任何协助，也不能获得救济院的收容。这种强制乡村转型的做法并未促成健全的商业性农业（爱尔兰一直必须仰赖进口粮食），后来又加上1845—1849年间的马铃薯大歉收，导致至少一百万人死于饥荒或疾病，另外一百万人则在毫无工作机会的情况下逃往英国与北美的落脚城市，使得爱尔兰流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不久之后，曼彻斯特、利物浦、布莱福德、伦敦、纽约、芝加哥与多伦多等地的落脚城市就都出现了相当比例的爱尔兰人。

这波人口迁徙潮来得又突然又猛烈，一时之间把落脚城市转变成一般人心目中那种毫无希望的贫民窟。在19世纪上半叶的几个时期，流离失所的乡村家庭大量涌入都市，以致城市工资大幅下降到非人道的水平。更糟的是，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间，英格兰北部的磨坊工人大部分都是儿童与妇女，因此工资又比一般水平更低。地板底下的下水道与位于紧密相连的房屋之间的露天水沟，是疾病传染的一大来

源,因此西欧的落脚城市在1830年至1860年间就经历了三四次的霍乱大流行,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直到19世纪下半叶推行卫生、住宅与人道改革之后,才总算终结了这种灾难。

其他国家如果跟随法国的做法,确保农民生活在田地上的权利,欧洲的状况会不会比较好?另一方面,英国在短期之间强制促成商业性农业与城市化的转型做法,在以小农为主的西欧与南欧各国有没有可能造成较高的生活水平?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臆测,因为这也正是当今亚洲、非洲与南美洲各国政府所提出的问题。

英国与法国两种不同做法的一大区别,就是农村与都市生活的差异。在法国,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文化与经济方面都愈行愈远,英国的这两种人口则是渐趋融合。19世纪60年代期间,法国经济学家拉维尼(Leonce Guilhaud de Lavergne)指出,英国乡村与城市的薪资待遇水准几乎完全相同,"伦敦居民与坎伯兰郡居民的生活方式"看不出任何差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劳动人口有百分之四十一受雇于农业,国民收入也有百分之三十五来自农业;在英国,农业只雇佣了百分之八的工作人口,产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在这个世纪里,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乡下人口几乎全都受到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布莱福德、伯明翰、谢菲尔德及其他工业中心的吸收。在欧洲人口大迁徙于1914年画下句点之际,英法两国的卫生、识字与教育水平虽难分伯仲,但英国的平均收入(包括落脚城市的工人)按照购买力衡量却比法国高出了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让人感叹的是,英国在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幅度高达法国的两三倍,但这样的人口增长却没有带来沉重的社会压力,从而对英国的国家体制造成威胁。当然,英国在这段时期的前半段也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动荡,造成像彼得卢屠杀事件(Pe-

terloo Massacre)这样的官民冲突；而政府对待落脚城市居民的态度顶多也只是漠不关心，最糟的状况更是野蛮又不人道。然而，这些新进的城市人口并没有饿肚子，整体而言也不觉得自己永远受困在没有出路的泥沼当中。在城市里立足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所以暴力也就很少成为他们的选项。

乡下地区的生存状况对于落脚城市的政治性质具有直接而且强烈的效果。落脚城市的居民如果是因为遭遇粮食危机才被迫迁离乡村，接着又饱尝这种危机所导致的粮食价格飙涨与失业之苦，这么一来他们通常就会采取行动。当时的革命人士经常误以为这种行动带有其他意义。这点在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是鲜明可见。他在这部作品中试图解释 1848 年的巴黎暴动为何没有化为他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变革，而把责任完全归咎在农民以及巴黎落脚城市的乡下移民身上。他认为后者只是一群缺乏阶级意识的流氓无产阶级，不像出生于城市的工人那样懂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如同当时的小说家，马克思也没有注意到当时真正的社会驱动力乃是乡村移民，而不是城市工人。

欧洲落脚城市的重大时代

到了 19 世纪中叶，欧洲的都市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当初试图为这些城市赋予形状、秩序、城墙与大道的君主与规划者心目中的样貌。当初那些富丽堂皇的设计不是遭到庞大的落脚城市所淹没，就是显得相形失色。这些落脚城市在市中心蔓延开来，并且吞没了市郊地

区，以致官方划分的区域和各区的地标建筑变得微不足道。

柏林优雅的市容规划于18世纪，由霍亨索伦王室聘用的规划师设计出一条条排列整齐的大道。不过，这样的规划也抵挡不住汹涌而至的乡村移民带来的改变，只能臣服于无可控制的人口成长速度——从1816年的十九万七千增加到1841年的四十三万一千，接着在1871年又再次倍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将近两百万人。德国乡间在19世纪已见不到农民的踪影，虽比英国的圈地运动晚了将近一个世纪，发展速度却更快。除了市中心少数几个特别重要的区域之外，柏林仿佛是一整座落脚城市：1885年，粮食供应业雇佣的男性员工有百分之八十一出生于乡村，建筑业有百分之八十三点五，运输业更超过百分之八十五。这些人都是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迁入这座空间无法扩张的都市，于是大批人口也就只好硬塞进有限的空间里。到了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柏林已然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城市。

维也纳、华沙、布拉格与圣彼得堡周围都有许多为了满足住宿需求而迅速兴建的廉价住宅，柏林的落脚城市则是以一种更为简陋的此类住宅为基础。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称之为经济公寓住宅，建筑史学家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将其描述为冷酷的人类仓库："方块状的建筑，通常五到七层楼高，内有数个中庭做为采光井，但这类中庭却又通常过于狭小，根本透不进多少光线……正如这种建筑的名称所暗示的，兴建这类住宅的目的就在于争取最多的房租收入，尽管其外表通常还是涂上灰泥也缀上装饰板以保持城市街道的文明表象。"

如果说中欧的落脚城市是稠密到令人抑郁的社区，把多得令人咋舌的人口塞进窒闷拥挤的公寓大楼里，那么西欧与英国那些规模更大的落脚城市则是毫无秩序和条理可言，把人丢进一排排恣意蔓延的简陋小屋里。这些小屋简陋得几乎算不上是住宅，散布在城镇的边缘，充

斥于市中心外围的磨坊与工厂附近的废弃空地。

伦敦与巴黎的落脚城市虽因脏乱而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不朽的名声，但最令人震惊的恐怕是侵占了巴塞罗那的那一大片贫民窟住宅。这是一项规模大得令人不敢置信的都市危机，因为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地区不同，在19世纪早已大幅工业化。这里的工厂所支付的工资是马德里的两倍，西班牙与法国南部的农民都大批涌入，原因是他们的耕地在人口成长与饥荒频繁的情况下已不能够再耕作。在18世纪中叶至1854年间，巴塞罗那的人口从三万五千人成长为十七万五千人，全都居住在旧城墙内这片相当有限的范围里。绝大多数的居民于是都只能住在环境恶劣至极的贫民窟内。这里不但被公认为欧洲最肮脏的城市，而且极易爆发疫病感染与霍乱流行。巴塞罗那的落脚城市遭受各级政府忽视的情形比巴黎更严重，因而成为激烈动乱的温床，起义、革命与暴动等现象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不断，纷乱不安的情形在欧洲恐怕无出其右。因为这样的危机，也因为城市规划师厄尔德方斯·西尔达（Ildefons Cerda）的过人长才，巴塞罗那于是成为最早把落脚城市纳入城市规划的地方。西尔达把城市范围向外延伸，规划了著名的埃克萨潘区（Eixample），不但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也为整个时代的乡下移民提供了拥有立足之地的机会，在今天埃克萨潘区甚至已经成了一种艺术典范的风格，一个游人参观的目的地，甚至被宝马拿去借鉴其设计风格，尽管当初的规划仍不足以适应20世纪初的落脚城市人口大爆炸，却为将来的城市立下了一个典范。

19 世纪的建构过程

伦敦

布维尔从隆河谷地动身前往巴黎的五年前,英格兰东南部也有两名佃农从一个村庄的茅草小屋出发踏上了一场同样迫切而艰苦的旅程。1874 年,在最后一波圈地运动的影响之下,一对名叫威尔与露西·洛克的年轻夫妇被逐出了他们的农舍。他们把少数几件家具打包起来,扛在背上,从卢顿(Luton)走了五十公里的距离来到快速扩张的伦敦市郊。

他们抵达的地点是伦敦的落脚城市。这是过去十年间从摄政运河边缘邻近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之处向外扩散而成的社区,这里一排排的房屋都是由投机商人兴建,盼望下层中产阶级沿着刚开通的地铁线路从伦敦市向外迁徙,能够在这里买屋定居。不过,这类人口的人数根本不足以填满市郊的空间,尤其是伦敦在洛克夫妇抵达的一年前才刚开始经历一场漫长的经济衰退。建筑商在 19 世纪期间一再发现,真正庞大的人口移动潮不是从都市外流,而是从乡间涌入。这些房产商兴建的社区,就像伦敦不断向外蔓延的边缘区域,也成了落脚城市贫民窟。

洛克夫妇出身的乡村位于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现在他们来到了伦敦,发现自己周遭的人口原本都是来自乡村的商人、农夫或工

人，而且故乡都在他们的村庄附近。于是随即融入这片紧密的社群网络，从而找到了工作。露西在当地到处可见的帽子店里找到了茅草编织工的工作；威尔则因善于照料马匹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为铁路公司担任马夫。他们夫妇俩赚的钱都比在乡村里高出好几倍，后来终于依附着中产阶级为自己打造了颇为舒适的生活。

英国各地的数百万人口都与洛克夫妇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到伦敦。这是有史以来乡村人口移入都市最大的一波迁徙潮，创下的纪录直到20世纪末才被打破。当时伦敦的城市规模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城市，而且在整个19世纪期间，伦敦随时都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市民是在市区以外出生。到了1901年，这座大都市的乡村移民已多达一百三十万人，比起短短五十年前的七十五万人可说是大幅飙升。在19世纪下半叶，每年都有五万人从乡下涌入伦敦，而且其中最大的群体乃是女性：1881年，伦敦的男女人口比例是一千人对一千三百一十二人，主要就是因为许多女性都从乡下来到伦敦从事家庭服务工作。

19世纪的伦敦因其东部与南部的贫民窟而恶名昭彰。这些社区塞满了阴暗恶臭的房屋，地板下是开放的排水沟，屋里毫无新鲜空气。这些房屋都是由不住在当地的房东租给这里的居民，房租以面积计算，价格比伦敦市中心世袭贵族居住的梅菲尔区(Mayfair)还高。这些贫民窟的卫生状况极糟，经常爆发霍乱疫情，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和童工的比例也相当高，因此成为狄更斯小说以及激进社会改革的象征。

不过，这些贫民窟并非伦敦的落脚城市。史学家杰利·怀特(Jerry White)仔细研究人口统计资料之后，发现伦敦的赤贫人口与乡下移民不是同一群人。“新进移民没有在伦敦市中心落脚，”他写道，“乡下出生的伦敦人似乎对于住在伦敦边缘最感自在，也就是在1840年至1880年间出现于这座大都市周围的环状地带。从18世纪承继而来的中心

区域古老又动荡不安，已成了伦敦劳动阶级的聚居处。这种现象在这个世纪当中随着时间过去而益发鲜明。”流离失所的人口不是外来移民。几乎公认的拜什那尔格林是伦敦东区最破败的贫民窟，但这里的居民在伦敦出生的比例却是全市当中最高的：在1881年为百分之八十三点五。“贫穷与困苦是自己造成的现象，”人口统计学大师布斯(Charles Booth)在当时写道，“不是外来的问题。”当然，在人口涌入数量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就统计学上而言，19世纪在伦敦土生土长的劳动阶级民众应该几乎每个人的父母都至少有一人是乡村移民。因此，我们也许应该把伦敦东区与南区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描述为经济捕蝇纸。落脚城市的居民一旦无法通过力争上游的严酷考验，就不免受困于这些地区而无法脱身。

伦敦的落脚城市其实形成于市区的外围，也就是乡下移民当初来到伦敦的栖身之处。19世纪上半叶，季节性工人在半乡间的市郊地区兴建了这些都市飞地。每到季节变化的时刻，通往伦敦的道路就挤满了乡下的商人：来自德文(Devon)的运砖工、来自东岸的造船工，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女佣。此外，伦敦与伊斯林顿(Islington)及哈洛威(Holloway)这几座以贩卖牲畜为生的区域，还有切尔西与富勒姆等市场性农耕飞地，也持续有着劳动人口的来回流动。在当时，什罗普郡的农场妇女会步行到富勒姆，在那里的农场找到工作，每天把农产品运到柯芬园，然后在季节结束后再步行返回什罗普郡。这条循环途径存续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因为生活条件与交通运输的改善而让许多人得以在富勒姆定居并且组织家庭。哈克尼与拜什那尔格林则为来自东部的乡村移民发挥了类似的功能。爱尔兰人也从事了类似的迁徙活动，单身男子到伦敦市郊的马铃薯与小麦农场上工作，再把赚的钱寄回爱尔兰，接着慢慢渗入市区，在圣吉尔斯白教堂形成庞大的爱尔兰人

落脚城市飞地。饥荒在19世纪40至50年代之间促使数以万计的爱尔兰人涌向伦敦，流入这座大都市周围那些发展失败的落脚城市，住进拥挤不堪的出租公寓住宅，从而造成这些社区贫困不宜人居的形象。不过，经济协助他们摆脱了困境：到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人口整体而言已充分融入了伦敦的生活当中。

在19世纪下半叶，伦敦的铁路终点站周围发展出了规模前所未见的落脚城市。来自威尔士与康瓦耳的移民在帕丁顿附近定居下来。不久之后，邻近村庄的乡下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其中最贫穷的人口都是在绝望的情况下被迫离开乡村，而他们的落脚处通常在贫穷的城市飞地，包括北肯辛顿与诺丁山，其中诺丁山原是养猪户的聚集地，后来成了恶名昭彰的贫民窟。接着涌入这些地区的则是铁路工人与市区贫民窟的居民，因为城市更新而被迫迁离原本的居住地。来自北部与苏格兰的移民，以及为数众多的爱尔兰人，则是涌入康登，住进从尤斯顿、圣潘克拉斯及国王十字等车站向外扩散的出租公寓住宅，其中有些移民乃是加入了建造这些车站的庞大工人人口。艾塞克斯的乡村居民来到伦敦，然后向外扩散，贫穷的工人定居在码头附近，比较富裕的工匠与技工则是在雷顿、西汉姆、沃森斯托等地入住力争上游的乡下移民飞地。不少下层中产阶级的书记和办公室职员，也纷纷从市区迁往这些地区。来自肯特的移民栖身在德普特福（Deptford）与格林威治。南部也聚集了同一个阶层的外来移民，在兰贝斯（Lambeth）与南华克（Southwark）形成较为贫穷以及不那么贫穷的落脚城市。

伦敦的许多落脚城市贫民窟原本是由房地产开发公司兴建而成，目的在于为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提供洁净的市郊住宅区。不过，由于房地产投机泡沫以及开发商高估了有能力买屋的职员人数，以致许多社区一开发完毕就成了乡村移民居住的飞地。例如梅利本区（Maryle-

bone)的利森格罗夫(Lisson Grove)、位于摄政公园西北方的波特兰镇(Portland Town)与北肯辛顿等地区,都在开发完成之后就立即沦为满是出租公寓住宅的贫民窟。这些郊区的若干街道更因破败肮脏而成为伦敦最声名狼藉的地段。哈洛威的坎贝尔路、坎伯威尔(Camberwell)的苏丹街以及肯特镇(Kentish Town)的利彻姆街,虽然当初都是由开发商兴建而成,也经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却全都成了犯罪与暴力的代名词。

不过,伦敦的市郊也有自主形成的贫民窟。在19世纪,坎伯威尔、德普特福与哈洛威等地都曾在不同时期成为赤贫的乡下移民的大型栖居飞地(其中也混杂了遭到淘汰的市区人口)。对于大多数移民而言,社会流动虽然仍是一个的确可见而且具体的目标,乡下移民却不一定能够在迁入城市之后获得生活水平的改善。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家巴纳多(Thomas Barnardo)指出,伦敦有成千上万的孩童在街头游荡,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大批移民迁入伦敦造成家庭离散的受难者。不论在任何时期,至少有半数的妓女都是出生于伦敦之外。伦敦和世界各地一样,人口迁往城市几乎总是会带来生存的改善,但这样的改善并非没有风险。

伦敦在19世纪下半叶因为慈善团体与政府机构大量兴建公共住宅而著名。这些住宅计划通常带有令人景仰的崇高理念,却没有顾虑到涌入伦敦的外来人口的实际需求,以致经常造成反效果。首先,这样的住宅一直不够多。到了1905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兴建,伦敦的九家公共住宅公司与集团所兴建的房屋只足以容纳十二万三千人,“相当于大伦敦地区一年半的人口增加数。”此外,慈善住宅的所在地通常不在落脚城市里:西敏区的居民有百分之八以上住在公共住宅区,伦敦东区却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地理学家理查德·丹尼斯(Richard Dennis)指

出，公共住宅反倒强化了伦敦对各阶级人口的空间区隔，而且这种模式似乎在欧洲各地一再出现。不论在伦敦还是巴黎，城市规划都对落脚城市的成功发展毫无帮助。

在哪儿落脚？

从乡村涌向城市的第一波人口大迁徙潮在所有政府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发生，而且这些政府也无法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在这波长达一百二十五年的迁徙潮结束之后，许多政府都因此垮台或遭到推翻，也有不少新政府因此诞生，而当今的终极人口迁徙潮也正产生着一样的效果。

欧洲的落脚城市至今仍然备受争议。维多利亚时代的落脚城市拥护者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认为这种社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完美引擎，带来无尽的机会，不论任何阶级地位的人士，不论他们来自学院、作坊与农舍，贫穷的小屋还是富裕的宅邸，都可以在这里努力奋斗从而在科学、文学与艺术等领域功成名就。也有人认为聚居在落脚城市的数百万人口乃是在残酷而且不公不义的情况下被逐出恬静稳定的农耕生活，而陷入长达数个世代的贫困生活，居住在脏乱而且充满疾病的环境里，从事奴役般的工作，并且沦为消费主义的受害者。这种负面观点不但可见于狄更斯与恩格斯的著作，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史学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也把这整个时代视为一场悲剧。

第一种观点对穷人面临的痛苦挣扎与严酷惩罚视而不见，而第二种观点则是毫不关注他们的迁徙动机，因为我们只要仔细观察 19 世纪

的任何一座都市，即可发现其中的新进移民并非都是消极的受害者，而且落脚城市的社会机制通常是一种绝佳的集体工具，能够把生活水平提升至贫穷乡村的标准之上，甚至更高。

现在，我们已能够凭着事实评断这两种观点的对错，因为社会流动的分析技术已在过去二十年间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而且分析的目标包括跨世代流动（子女的生活水平比父母高还是低？）与同世代流动（你的生活水平比起出生当时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英国社会史学家安德鲁·迈尔斯（Andrew Miles）曾经针对流动问题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全面而且纪录最详尽的研究，他发现19世纪落脚城市的本质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在19世纪中叶之后，社会壁垒变得愈来愈容易跨越，而且两种社会流动的现象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都有所增加。

在19世纪初期，每三个人当中有一人能够摆脱自己出生时的收入阶级；到了19世纪末，已是每两个人有一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成果。在那个时候，英国已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以及八分之一的上层专业及管理阶级人口，都是原本出身于下层阶级的人士，而且绝大多数都利用伦敦与曼彻斯特的落脚城市作为在社会中力争上游的管道。按照迈尔斯的衡量，当时的社会流动程度比20世纪末还高。

不过，这样的社会流动仍然有其限制。涌入都市的穷人虽然大多数都能够在一个世代内从缺乏技术的贫穷工人提升到生活较为舒适稳定的技术性工人或商人，却只有百分之五的劳动阶级男性在20世纪初能够晋升为中产阶级。这点主要与房地产所有权有关。在19世纪的欧洲，劳动阶级要买下自己脚下的土地几乎是无可想象的事情，即便是其中地位最高的成员也不例外。因此，对于乡下移民而言，舒适的工匠阶级生活通常就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高成就。

促成这种社会流动发生的是混乱而重视商业的落脚城市，不是秩

序井然的乡村或地方市镇。在19世纪中叶,落脚城市从陷阱变成了逃生门。经济史学家隆恩(Jason Long)发现,在1851年至1901年间的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中半数的儿子所在的阶级都与父亲不同,而且向上流动的比率较向下流动高出百分之四十。

不过,不同于斯迈尔斯的想法,这种现象不纯粹只是个人自立自强或凭着一己的聪明才智而达成的结果。实际上,社会流动现象增加的时期,也正是公共教育、童工法律、卫生与住宅改革以及基本社会福利出现的时候,而且许多研究都发现这两种趋势具有相辅相成的现象。的确,在第一波人口大迁徙潮期间,可以划分出落脚城市的两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48年以前,当时都市生活虽然深具吸引力,但在都市中奋斗失败的机率也高达一半左右。第二个时期是1848年之后,当时人口追求更佳生活的成功机率已较失败机率高出许多,就算无法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至少也能由子女达成。

1848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那年遍及欧洲的革命与暴动潮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存续和经济秩序,落脚城市随即在历史上首度成为官方重视的对象。改革出现的速度并不快,通常也没什么效果,但毕竟开始影响了穷人的盼望。在那一年,英国颁布了第一道《公共卫生法》,禁止了童工,并且提出了第一项真正的公共住宅计划。这些改革还要过好几十年才会真正全面推行,也才会获得足够的资金投入,但对社会流动已经产生了渐进而显著的效果。近来的几项研究引用了大量纪录,发现这类改革遏止了贫穷的继承以及永久赤贫现象的出现,而且公共教育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也造成社会流动现象的增加。真正转变了19世纪落脚城市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干预。在1848年以前,落脚城市原本是贫困匮乏的地方;但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政府的投资与外界的关注,落脚城市成为推动进步与成长的强大动力。

横越大西洋的迁徙活动

如果想要确切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就必须横越大西洋。这片海洋两岸的差异非常大。如果说世纪末的欧洲落脚城市为贫穷的乡村人口提供了一个微薄的机会，可让他们追求较佳的生活，那么这样的机会在新大陆上即可说是十拿九稳。在整个 19 世纪期间，北美提供的向上流动机会广泛得令人吃惊。一项研究发现，美国非技术性工人的儿子有百分之八十一得以从事比较高等的职业，英国则只有百分之五十三，而且美国的向下流动比率也比较低。

欧洲各地的居民都清楚知道这一点，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也不例外，他们因此而做出的反应也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庞大的一场国际迁徙潮。在 1800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五千万名欧洲人永久离开欧洲大陆找寻新家园，暂时移民的人数更高达六千五百万。到了 19 世纪末，欧洲人口已有整整百分之二十迁往美洲、澳洲及南非。这些移民有半数以上都在美国落脚。在 1846 至 1890 年的这段关键时期，涌入美国的移民有将近半数都来自英国与爱尔兰。

这也是一场从乡村涌向都市的迁徙潮。前往美国、加拿大、澳洲与新西兰的欧洲人口并没有先移居他们本国的城市，而是直接从乡村迁往新大陆，通常依循邻居和朋友所踏出的路径。到了 19 世纪末，百分之八十的移民都早已有亲人在新大陆等着迎接他们。如同史学家莫克(Leslie Page Moch)所记载的，横越海洋的移民不仅是来自乡村，而且是来自最偏远也最贫困的乡村："在意大利，这些地点就是米兰北部与

东部位于阿尔卑斯山附近的省份，还有南方亚平宁山脉周围的省份。西班牙与葡萄牙最有可能迁徙国外的人口，就是大西洋岛屿（加那利群岛与亚速尔群岛）和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多山地区的居民……北欧的移民最有可能来自挪威中南部与瑞典中南部的山区、奥兰岛与丹麦的博恩霍姆及罗兰法斯特（Lolland-Falster）这两座岛屿。苏格兰高地也在19世纪初迁出了超乎比例的人口。"这些偏远地区的人口都无从获得国内都市的工作信息，因此对他们来说，移民国外和移居国内都市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记录显示，促成大多数欧洲国家移民人口激增的力量主要是乡下的人口与经济变化，而这样的变化也驱使许多人迁居自己国内的城市。实际上，欧洲城市一旦出现劳动力短缺，涌向新大陆的移民人口也随之减少，因为农民认为迁居国内的落脚城市比较经济。这些移民可不是无知又绝望的农民，盲目地找寻着机会，而是握有充分信息的人口，精心计算着如何从乡村转换至都市的生活。

而且，他们追求的几乎总是城市生活。尽管有少数人从欧洲的农场迁徙到新大陆上面积较大也比较肥沃的田地（而且因为采用机械耕作使得务农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大多数人却都想要彻底放弃农耕。在1880年，迁居美国的外国移民只有百分之十住在乡下地区。

隐藏的落脚者

多伦多与芝加哥

1905年,约瑟夫·索恩觉得自己受够了伦敦南部伯蒙齐(Bermondsey)的劳动阶级贫民窟——这里是他和太太发现自己与伦敦的落脚城市格格不入之后所暂时栖身的地点。于是,他签署了一份在农场上工作一年的契约,藉此换取航行至加拿大的机会。他把收入都寄回家里。后来,他在多伦多市区工作了一年,存了一小笔钱,从而在市区外的荒芜地区买了一小片土地。这块土地位于一个没有受到政府管辖也没有经过勘测的地区,名西尔弗索恩(Silverthorn)。多伦多的官员对这个地区一无所知,却有许多人在此秘密定居。约瑟夫找了一支铲子,在地上挖一个洞,盖上铁皮屋顶,就把这里当成了家。几个月后,他的太太和五个孩子也从伦敦来到了这里,于是他收集了许多木材和纸板,在土地上盖了一间两房的小屋。

他身旁四周满是类似的简陋小屋,一望无际,全都由屋主自建,而这些屋主也都是新进的欧洲移民。这一大片贫困社区在许多方面都与亚洲当今的市郊贫民窟颇为相似,不但把多伦多围绕在中间,终究也淹没了这座都市。提到北美的落脚城市,我们通常会想到纽约下东区的廉租住宅区,但实际上,欧洲的乡村居民也一样会在都市外围的郊区自行打造不受政府管制的区域,并以此作为进入都市的跳板。

索恩一家人的邻居当中有个姓史威夫特的家庭，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从乡村来到这里，而且几乎毫无财产。他们从房屋拆除后的杂物堆里买了一批二手木材，由马车运到他们选定的住处，然后盖了一间两房的小屋。史威夫特从小在这片扩张迅速的社区长大，他这么描述自己的生活环境：

“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始有排水沟出现，而且经常淹水。传统的室外厕所是唯一的卫生设施，每户人家都有一间这种厕所。当时没有所谓的收垃圾……大家都只能尽量设法把自己的垃圾处理掉。有些人用烧的，有些人用埋的，有些人则是到处乱丢。”

位于当今多伦多市中心的约克区，这种由简陋小屋聚集而成的贫民窟并不是例外。多伦多东侧、北侧及西侧的市郊也都满是这种沿着土路兴建而成的人口聚居中心，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排水沟。这些区域分布的地区包括了当今的恰陶碧谷、约克、强克逊、北约克、东约克、达文波特(Davenport)、布罗德维尤(Broadview)、考克斯维尔(Coxwell)等地。这些贫民窟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的数十年间推动了多伦多的成长。其他许多北美都市也同样都出现了这种孟买式的聚落，居民不经许可即自行建屋聚居。

我们对北美落脚城市这种非正式的特性之所以能够有所了解，必须归功于加拿大地理学家哈里斯(Richard Harris)。《没有规划的市郊》(*Unplanned Suburbs*)当中，他翻阅了房地产记录，结果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居民自建的市郊住宅占了多伦多所有住宅的三分之一以上——后来的学者更估计这类住宅在经济大萧条之前占了多伦多所有住宅的半数。这类区域向来是都市生活中极为醒目但极少有人提及的特色，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多伦多市政府才合并了这些社区，铺上平坦地面，设置各项服务，并以标准形式重建了大部分的

住宅。

在北美许多地区，来自欧洲乡下的好几百万移民(原本生活在乡下的美洲黑人也展开了他们本身的大迁徙潮)都复制了这种经典的开垦方式。虽然这种贫民窟在多伦多的数量最多，但在芝加哥、密尔沃基、底特律及后来洛杉矶的蓝领市郊，这种社区也同样是一大特征。居民未经许可而自建的简陋住宅，在这些城市的新建筑当中高达三分之一。在经济大萧条之前，这类住宅是芝加哥外围郊区的主要景观，分布的范围包括当今的岩石公园(Stone Park)、橡木林(Oak Forest)、伯恩赛德(Burnside)、罗宾斯(Robbins)、盖瑞(Gary)的大部分地区、黑格维施(Hegewisch)、加菲尔德(Garfield Ridge)及蓝岛(Blue Island)等区，还有西部与西南部的许多地方。

这些区域最突出的特征，除了自发性的形式与杂乱无章的样貌之外，即是几乎所有居民对自己住处的土地都拥有所有权。当初投机商人以每块地两百美元左右的代价买下这些农地与林地之后，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把这些土地分割出售，但政府与银行通常都承认居民手中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所见到的，只要政府愿意提供协助，土地所有权即可带来社会稳定，通常也可激发中产阶级的活力。

北美洲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期间之所以和欧洲不同——也和当今的北美洲极为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许多新进的贫穷移民都对自己的住宅拥有所有权。在加拿大与美国(澳洲很可能也包括在内)，蓝领工人取得住宅所有权的比率远高于其他社会阶级。史学家莱温妮克(Elaine Lewinnek)指出，在1870至1902年间，芝加哥居民有四分之一都拥有住宅的所有权，而这项比例在该市比较贫穷的社区更达到将近百分之五十。努力攒钱储蓄以便买下一块地或者支付一间小屋

子的首付款，对于当时来自乡下的劳动阶级移民而言几乎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在波士顿、底特律、纽黑文与多伦多等地，低收入人口拥有住宅所有权的比例也和芝加哥差不多。此外，黑人与妇女拥有房产的人数也多得惊人。

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向上流动的比率极高。这项趋势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告结束。当时城市都已明确划分区域，也受到了比较严格的管制，导致取得住宅所有权与房贷的难度变高，于是从下层阶级晋升中产阶级的管道也就转变成较为困难的高等教育和借贷成本。

挥别过往

在欧洲，农耕的工业化持续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逐出土地，人数在20世纪初达到高峰。这些人口虽然大部分都顺利融入了欧洲与北美的落脚城市，却还是有不少失败者，在欧洲大陆较为边缘的地区尤其如此。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也愈来愈趋火爆。

在这段时期接近尾声之际，一个年轻人出生于巴尔干半岛的一座农村。他在九名子女当中排行第二，没有继承到任何土地，在家乡附近也找不到工作，于是设法通过当地杂乱的落脚城市跻身城市生活，最后也没有成功。后来，他只好加入一群打零工的流动人口，住在城市贫穷地区的边缘。在富庶的奥匈帝国里度过这段羞辱性的经历之后，这名年轻人和他周遭的民众因此变得愤世嫉俗。这个名叫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的年轻人，后来对费迪南德大公夫妇扣下扳机，引发了长达

三十年的战争。他这项激烈行为不但呈现出中欧复杂扭曲的政治情势,也反映出许多欧洲政府不了解城市里那些庞大的新社区或是聚居于其中的乡村移民。如同当初揭开这场长达一百二十五年的转变序幕的革命运动,为这项转变画下句点的枪声也是落脚城市的产物。

等到枪口的烟雾散去之后,世界已经改变。战争比和平更强而有力地促成了西方的城市化,而当初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时出现的创新做法——包括护照与出入境管制——则从此成为民族国家的永久特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随着新近苏醒的南半球与东半球国家开始把乡村居民送往国内与西方的落脚城市,护照与出入境管制等措施也成为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这场历史上最终的人口大迁徙虽然在迁徙人数和距离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其发展模式却极为眼熟,令人不禁心惊胆颤。

第六章

一座落脚城市的死与生

伊斯坦布尔

天一亮，你就在平和静谧的山坡村庄中醒来，然后沿着满布石头的小路走下山谷，在唯一的一条铺面道路旁等待了一会儿，然后搭车在一条崎岖颠簸的柏油小径上行驶好几个小时，沿着丝绸之路的路线来到亚洲大陆的最西端。这时你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称为后宫(Harem)的地方。这里虽然叫做后宫，却没有任何诱人的殿堂或温香软玉的东方幻影；实际上，在后宫只能见到许许多多毫无特色也毫无装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随时都是一片嘈杂与繁忙，到处都是以炭火烤着简易餐点的摊主以及叫卖物品的小贩。伊斯坦布尔乃至后来整个土耳其的重大转变，主要就是起源于这个地方。

后宫是一座客运车站。人口大迁徙潮不但在这里发生得最为剧烈，而且也比东方世界的其他地区早了几十年。在世人还没注意到的时候，人口迁徙潮已在这里首度建造了一座规模与势力足以接管国家的落脚城市。从后宫展开的这项浪潮，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伊斯坦布尔，也让人又兴奋又害怕地预见了即将席卷半个地球的风潮。如果你从后宫展开观察，即可见到世界各个都市的未来。

后宫客运站兴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土耳其的现代道路系统首度让人得以有效率地横越广大的国土。自此之后，后宫客运站就成了涌入人口的主要着陆点。这些不断涌入的人口都来自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部与东部的乡村，通常只用塑料袋装着仅有的家当。在四十年间，这群移民大幅增加了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人口，从 20 世纪 50 年

代末期的不到一百万扩增到当今的一千四百万。在1973年建造了第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桥梁之前，后宫原本是丝绸之路中段的最后一站。时至今日，这里对许多人而言仍是最终目的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每年都有五十万的乡村移民到这里定居。现在，尽管伊斯坦布尔总是号称人口爆棚，每年却仍有二十五万以上的移民来到后宫，继续增添这里的人口。

后宫的所在位置虽然接近伊斯坦布尔的中心，但伊斯坦布尔的边陲却始于这里，不论就象征意义或实际功能而言都是如此：尽管很少有人这么做，但如果你在这片柏油地上停下脚步，视野即可跨越船满为患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望见欧洲那一侧的伊斯坦布尔，远眺蓝色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在那个充满传奇的伊斯坦布尔旧市区，在都市立足已久的居民都不晓得对岸有这么一座灰尘弥漫的客运车站，而这可能就是他们之所以对市郊的爆炸性发展震惊不已的原因。文学与传说中的伊斯坦布尔，过去的拜占庭与君士坦丁堡，当今只不过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一小簇绿地和几个古老的圆顶，就像一座小小的博物馆，陷在一片稠密而且成长迅速的人类聚落之中，而且这片区域的面积远比市区大上许多倍。

后宫在土耳其现代史上虽然深具重要性，本身却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特色——只有几栋低矮的水泥建筑，还有几座简陋的售票亭，分属几家互相竞争的客运公司所有；一旁的小贩兜售着热腾腾的芝麻包；地上散置着一堆堆的行李袋和纸箱，客运司机则站在水泥地上，高声宣布着车辆的沿途停靠站，“比莱吉克、埃斯基城车子再过五分钟就要开了，快快快——风景优美的比莱吉克！”外来移民不分昼夜不断从客运上涌出。他们经历长达二十个小时的车程才来到这里，然后又立刻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市内不会标示在游客地图上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二十年

前还不存在，只是一片片的牧草地，却在一夕之间变成人口拥挤稠密的巨大城市。

外来移民找到了落脚处

1976年初冬的一天晚上，一个名叫萨布里·柯席吉特的年轻人抵达了后宫。性情腼腆、蓄着胡须的他已不是第一次来到伊斯坦布尔，因为他家虽然在土耳其中部的锡伐斯(Sivas)拥有一片谷物田地，那片地却土壤贫瘠又面积狭小，产量起伏极大，所以他的父亲必须经常到这座大城市担任季节性劳工，有时候也带着年纪还小的儿子一起来。但这一次，已经三十一岁的萨布里却是打算在此定居。他决心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为他刚成立的家庭打造一个新家园，而且他心中也有着一股模糊的志向，希望促成更大也更剧烈的变动。另一方面，他却身无分文。

在他父亲的时代，一旦来到后宫，必然就得搭乘渡轮横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往欧洲那一侧的伊斯坦布尔，在工业区里暂时安顿下来，跻身土耳其为数愈来愈多的工业劳工。在这些劳工当中，虽然有些是季节性移民，但大多数都已在都市永久定居下来。20世纪50年代是土耳其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大部分贫穷国家开始开放经济的半个世纪之前，土耳其就已感觉到从农业经济快速转变为城市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痛苦与压力。土耳其总理曼德里斯(Adnan Menderes)以令人赞叹的魄力致力于终结该国以小农为主而且仅够糊口的农业体系，在1951年至1953年间为乡下地区提供了四万部牵引机，并且补助工业经济，还兴建

了一套现代化的公路网，取代古老丝绸之路的泥土小径。这项改革极为成功，远比大多数国家更早开创了工业化农业。不过，曼德里斯却没有为大批农民放弃土地而涌入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现象预先做好准备。经济体系已经准备好了：土耳其的工业繁荣需要大量的安纳托利亚劳工，但这些劳工却没有地方可住，领的薪水虽比乡村的水平高出许多，却完全不够应付城市的开销，而且国家又没有任何福利制度能为他们提供协助。

于是，在总理曼德里斯鼓励他们自行寻求出路的情况下，这些新进的都市人也就找出了建造栖身之所的方法。一名观察家描述了他们的做法："在工厂里工作的劳工完全无意在附近盖房子：市区的住宅通常为平房，并且附有一座花园……如此一来，他们建造的聚落就不是为了市场价值而开发的社区，而是居民为了自用而自己建造的住宅。这种占用土地的行为虽不合法，却被视为是种正当的举动，而且不只是占用土地者这么认为。"

到了1976年，这种权宜做法已然根深蒂固。因此，萨布里来到这里的时候，相当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市区和其他乡村移民聚会。这些人都是和他志同道合的农民，大部分都属于锡伐斯地区常见的少数民族阿拉维人(Alevi)，其中有些则和他一样具有库尔德血统。这些聚会充满了欢乐与希望的气氛，所有的男男女女都非常乐于勤奋工作。然后，萨布里离弃了欧洲一侧的伊斯坦布尔，踏上通往安卡拉的道路，来到一处再也看不到房屋的地方，然后在一处渺无人烟、满是石头的谷地里停了下来。"当时这里什么都没有，看起来很可怕——只有树木、岩石、沙土、垃圾，甚至连一条像样的步道都没有。"他回忆道。就这样，萨布里和他的移民同伴决定在这里安顿下来。

1977年初，如同千千万万的土耳其乡下移民，萨布里也在市镇边陲

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地方盖了一间不该存在的小屋。屋子虽然粗陋，但足以遮风挡雨。萨布里明白自己已成了什么样的人。这类房屋出现于20世纪50与60年代期间，也就是土耳其工业鼎盛发展之际。当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较为富裕的居民以鄙夷之意为这种住宅及其形成的社区取了个名称，结合了土耳其语的夜晚(gece)与抵达或定居(kondu)这两个词语，称之为盖奇康都(gecekondu)。许多年来，盖奇康都一直是位于都市边缘的一股危险力量，而且这个名称也充分反映了这群夜间抵达的人口在包围都市之后为市区居民带来的震惊与恐慌。随着20世纪60年代趋近尾声，原本的震惊逐渐转为一种心不甘情不愿又微带恐惧的接纳。盖奇康都的居民不但是都市迫切需要的劳动力，也是选民及潜在的纳税人——后来证明这点极为重要。

"当时这里只是个空空荡荡的地方，只有树丛和石头，就这样。"萨布里回忆着，坐在他朋友的双层玻璃窗商店里，就位于他的办公室楼下，而且周遭早已成为都市里一片人口稠密的中心区域。在1977年，这里原本是一座满布石头和树林的深谷，远远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边界之外。在这里，蜿蜒崎岖的土路通往一座肉品加工厂、几座采石场，以及伊斯坦布尔郊区的垃圾掩埋场。当时这座谷地看起来一片贫瘠，根本不宜人居，陡峭的谷壁看起来也不适合兴建房屋。这里没有水，也没有下水道，道路颠簸得无法行车，只能搭乘牵引机前往伊斯坦布尔。不过，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却根据过去二十年来的经验，注意到了这里有一项他们极为重视的特质：所有权模糊不清。

萨布里的朋友大部分都和他一样是来自锡伐斯的阿拉维人，在几个月前刚来到伊斯坦布尔，通过法院发现了这座荒凉的谷地。这里在早年被称为赫期巴期庄园(Hekimbasi Estate)，是一大片闲置的农地，自从1874年以来即属于一名奥斯曼帝国的亲王所有。奥斯曼帝国在

1923年瓦解之后，世俗化又现代化的凯末尔政权把土耳其转变为共和国，法律不再允许皇室拥有土地，于是这片土地就成了土耳其财政部的财产。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那名亲王的后代提起一连串的诉讼，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终于审判完毕。在这期间，亲王的后代一再想把部分土地卖给私人买家以支应诉讼开销，却又因此引发更多诉讼，争议他们是否有权这么做。由于这片土地名义上属于政府所有，因此就像当时伊斯坦布尔周围的其他空地一样，依法不准用于公务以外的用途。

“这里本来是伊斯坦布尔最边缘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是都市的郊区。这里甚至算不上是边缘，和伊斯坦布尔的边缘之间还隔着一大片地。”亚斯兰(Sukru Aslan)对我说。他写过一本书，记述这个地区的历史。我们站在一条陡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道路上，望着这里如今填满了整个山谷的五层楼建筑，他说：“现在，你甚至可以把这里视为伊斯坦布尔的市中心呢。”

理论上，这片土地可说是任人取用；但实际上，要住进这里却是一项困难至极甚至足以致命的工程——不但需要军事化的策略和黑社会的人脉，还必须面对激烈的革命冲突。到了20世纪70年代结束之际，这项夜间打造住宅的任务已把萨布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把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作为边缘挑衅力量的落脚城市

1977年二月的一天傍晚，一群男子搭着牵引机来到谷地边缘，带着

基本的工具。天黑之后，他们开始用铲子挖掘干燥坚硬的土壤，为房屋的地基挖出一条条沟渠。天亮之前，他们在表面铺上一层薄土，以免引起路人和警察的注意。第二天晚上，这群人运来了他们附近一座工厂内用泥土制成的红砖。他们彻夜筑起墙壁，没有使用灰泥，而是在外墙涂上泥巴，然后装上简陋的门窗，再盖上铁皮屋顶。这群人在天亮之前离开，利用白天睡觉休息，再继续帮助别人盖房子，看着一个个家庭搬入这些新建筑。正如盖奇康都这个名称的字面意义，一座社区就在一夕之间诞生了。

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占用荒废的城市土地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现象，因为贫穷国家忙着应对停滞不前的全球经济与难以负担的高额债务，于是都不再推行国家资助的住宅改革，而任由乡下移民自求多福。在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这种行为被称为入侵，不但执行效率媲美军事行动，而且还发展成一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运动。

萨布里和他的朋友听闻过这类策略，但认定伊斯坦布尔过去几年来纷扰混乱的占地做法不可能让他们拥有长久的住屋。过往盖奇康都的做法风险太高了：政府和警方担心每年涌入的数百万居民将来会要求享有自来水和下水道等设施，于是大幅提高了警觉，只要一看到出现萌芽就立即加以拆除。另一方面，在这种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兴建住宅已成了一种地下行业。“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盖奇康都黑帮，”萨布里对我说，“必须定期交保护费，然后那些黑帮分子声称他们会和官员协商，以免盖奇康都遭到拆除。他们会花钱和政府官员一起吃大餐。那些人很暴力——他们向盖奇康都社区的居民敲竹杠，再把他们收的钱拿去赌博。”

为了抗拒帮派与政府，萨布里和他的同伴开始定期聚会，计划如何建造他们的社区。他们举行了一场选举，成立了好几个人民委员会，萨

布里也当选为其中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他们决定以较有规划与条理的方式建造他们的社区，以免像以前的盖奇康都那么杂乱。他们画出街道规划图，甚至还预留了小公园的空间——这在土耳其的占地自建社区里是前所未有的特色。这些聚会吸引了学生和左派的政治活跃人士，他们志愿提供自己的技能，从而为这座社区带来了一股革命气息。萨布里在这些聚会上建立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也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意见，逐渐卸脱原本身为农民的寡言个性，开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还不忘以自我解嘲的幽默点缀其中，于是民众也开始聆听他的发言。这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到了 1977 年，盖奇康都已经愈来愈不平和，因为第二代居民长大之后已没有他们父母当初那样的工作前景，和市中心的文化又缺乏连接。于是，政府也对盖奇康都社区愈来愈充满敌意，认为这些社区是反政府活动的温床，而且其中通常聚集了阿拉维人、库尔德人及其他抗拒政府管制的少数族群。

乡下移民想要争取城市空间，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个人实质具体的存在。数以千计的家庭实际住在都市边缘的自建房屋里，不但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也足以让土耳其政府任由这些社区待在原地，有时甚至还会为其提供便利设施。在 20 世纪 60 与 70 年代之间，特赦法律让数以千计占地自建的社区就地合法，为其中数以千万计的居民赋予缴税的义务和投票的权利，让他们得以彻底参与经济活动（但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就像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涌入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口一样，萨布里和他的邻居也盼望自己能够成为获得承认的市民。

那个月，他们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挥汗工作，在谷地的一个角落建造了三百间房子。到了 1977 年底，又增添了三千栋房屋。全都住着前来寻求财富的外来移民，来自土耳其中部与东部的贫穷地区。委员会决议，各区最贫困的村民将可优先取得房屋。他们将进行调查，确认这

些家庭是真的有需求，而不只是单纯想要捡便宜。

这个社区已经成长得相当庞大，因此需要取个名称。1977 年劳动节，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上的年度劳工集会共有十五万人参加，又因为遭到极左派的敌对政党渗透，而发生了暴力冲突。警方开火镇压，群众随即惊慌奔逃。那天结束之后，据估计有三十九人因中弹或遭践踏而丧生。这起事件掀起了土耳其社会的骚动，尤其是阿拉维人与库尔德人，因为他们觉得政府为了倡导狭隘的国民认同，对他们的打压愈来愈不遗余力。在几天后的一场聚会上，村民投票决议把他们的社区命名为五月天社区，而萨布里也支持这项决定。取了这个名字之后，这座社区于是成为一大挑衅。

与旧市区直接冲突的落脚城市

到了这个时候，政府官员与城市居民已对盖奇康都深感恐惧。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城市规划师眼睁睁看着每年数十万的乡村移民涌入市镇边缘的空地，摧残他们精心规划的住宅区、绿地和基础设施。伊斯坦布尔人口的性质已出现了改变：原本以单一族群的世俗居民为主，现在市郊却聚居了数百万的阿拉维人、库尔德人以及虔诚的逊尼派教徒，不但妇女都戴着头巾，而且他们的政治立场不论是极左或极右，都显得极为陌生。最糟的是，他们的社区都是恣意搭建的杂乱建筑，拥挤在伊斯坦布尔那些老旧高雅的大道旁。一名规划师针对伊斯坦布尔写道："在城市里非法占地居住的人口一旦从既有的都市社会承继了都市的政治控制权，由于这群人缺乏城市居住经验，也不曾受过城市维护的训

练，又不具备相关的行政知识，必然无法善加处理非法占地问题，因此城市里的各项关键服务也将逐渐衰颓，终致崩溃瓦解。”

然而，如果有人从中国、印度或南美的落脚城市来到这座谷地，一定会觉得这里的环境简直称得上是豪华。盖奇康都的住宅平均面积都在五十至九十平方米之间，全都是排列整齐的砖墙建筑，后来甚至也铺上了石材地板。这些住宅通常有庭院或小花园。土耳其主流建筑师和当时城市规划专家虽然都认为这种建筑丑陋又不卫生（当时卫生水平确实不高），但这些未经规划的房屋后来却以其紧密扎实的美感以及不怕地震的先天设计而备受称许。“典型的盖奇康都区域都由附有花园或庭院的一到两层楼高建筑构成，”一名盖奇康都的爱好者在三十年后写道，“而且总是采取不规律的排列型态，每块地之间隔着狭窄的步道与通路。这种空间是长期凝聚而成的结果，为居民带来一种特殊的环境性质。这种环境为住宅周遭环境的使用方式提供了多样性与弹性，在室内与室外之间造就了可轻易变动的空间，也创造了社交的机会。”在既有的城市居民眼中，只觉得市郊冒出了上百万座乡村。实际上，盖奇康都有些方面虽与乡村生活无异，但这里的房屋及其周遭环境却一点都不同于这些居民当初逃离的村庄。一名土耳其史学家指出：“盖奇康都的住宅并不是纯粹复制乡村的房屋，也不是传统建筑方式的产物，而是新的发明。”

五月天社区的新居民在这里享有的经济机会，远比干旱贫困的安纳托利亚乡村多出许多。他们在这里的收入相当不错，因此得以把大笔金钱寄回家给留在村里的亲人。不过，就许多方面而言，在这里生活却也艰苦得多。“他们必须步行十五分钟去取水，再把水提回家，”史学家亚斯兰回忆道，“直到1979年，大伊斯坦布尔地区才在这里建了一条水管……接用电力是违法行为。工程师和左翼人士帮忙把电线拉到这

里，算是窃电。这里没有车辆能够通行的道路，只有一条仅够通行牵引机的山上小径。所有的面包和粮食都由牵引机载运到这里，直接在车上贩卖。”

这里比成人多的孩子是个更大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萨布里已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小孩搬到了五月天社区。长达几个星期，孩子都在街上游荡。后来，居民终于自行兴建了学校，政府甚至还提供教师。“那是个很奇特的现象——非法的社区，却有合法的学校，还有政府任命的校长。”萨布里回忆道。后来，企业家提供了客运和小巴，让当地居民得以前往伊斯坦布尔市区。就实体建设而言，这里已愈来愈像是真正的社区了。

不过，就政治上而言，这里却一点都不平静也不舒适。土耳其的政治认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向来受到家长式政教分离制度的支配，却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成为各方竞逐的对象。一大部分的压力乃是来自落脚城市，因为这些社区都已开始依据意识形态吸收乡村移民。有些盖奇康都社区的居民满是右翼民族主义者，而且都与灰狼组织关系紧密——该组织为右派政党国家行动党的法西斯主义前锋组织。有些社区的居民皆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支持宗教激进主义的国家发展党。另外有些社区则属于左派社区，其中又以五月天社区最受瞩目。在土耳其政府眼中，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聚落乃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这时正值冷战高峰，土耳其也似乎有陷入共产革命的危险。

萨布里的偏远谷地在1977年夏季开始出现于新闻头条。在山坡上一座女性习惯戴头巾的社区里，一群伊斯兰政党支持者在一片私人土地上兴建了一座清真寺。住在德国的业主对他们提出起诉，于是伊斯兰教徒纷纷进驻清真寺以示抗议。警方虽然加以监控，但没有出面干预。他们对市郊的政治情势深感忧心，但他们担忧的对象不是那些

宗教激进分子，而是五月天社区内的阿拉维人、库尔德人及左翼分子。“我们不论在种族或政治交易上都属于少数族群，而且我们又住在市镇的边缘，”萨布里说，“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外人。尽管我们想要融入土耳其社会，他们却把我们当成侵略者看待。”

在那个漫长炎热的夏季，五月天社区成了许多激烈冲突的发生地点，冲突对象包括右派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帮派，还有警方与土耳其军方。当时发生了不少谋杀案，嫌疑犯包括社区居民和外人，报纸上的报道也指称这座社区已成了应予规避的危险地区。面临市郊节节高升的暴动现象，伊斯坦布尔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因此宣称他们必须采取行动。于是，五月天社区的居民也准备对政府展开抗争。

1977 年九月二日清晨，萨布里带着妻子还有分别为五岁与十岁的两个儿子，沿着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走向社区边缘。他要求孩子捡拾石块和枝条，或是任何能够丢掷的东西。警方派出大队人马，全都头戴白色头盔，身穿防弹背心，而且手持枪枝。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装甲车辆，后面又跟着推土机。这场战役持续了一整天。最后，五月天社区共有十二名居民丧生，数十人受伤住院，社区也被夷为平地。

后来房屋虽然重建，但萨布里的生活却没有变得比较好过。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大部分的阿拉维人一样都属于左派，但落脚城市第二代青年所采取的恐怖极端主义却让他感到触目惊心。右派与左派的激进团体以及各种宗教教派都纷纷控制了不同的盖奇康都社区，并将这些社区宣称为解放区，不论其中的居民是否支持他们的理念。五月天社区的墙壁涂满了各种口号，都是左派与激进团体的杰作——这些团体包括革命之路、解放组织，以及进步青年联盟。“他们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军事基地，就在社区的中央。从此以后，士兵就随时都驻扎在这里了。”梅赫梅特说。他是个满怀理想的教师，在 1977 年三十五岁的时候

来到这里，协助成立了第一所学校。“在他们兴建那座基地之前，连警察都进不了这个社区。他们根本是在打游击战。”

在媒体上、国会里以及学术讨论当中，萨布里和他的邻居成了乡村人与城市人对决的象征。盖奇康都的居民不再被描述为乡下移民，而是一群深具威胁性的人口，摧毁了城市的价值观、习俗制度与社会秩序。

不过，当时密切观察情势发展的人士却都明白，这些社区并不是落后的乡村文化在市镇边缘的复制品，而是一股全新的政治势力，由乡村移民的子女出生于都市郊区。他们的农民父母通常对政治漠不关心，因此对这样的发展也不免震惊。“这些年轻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法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又缺乏工作机会，也和传统家庭的价值观脱节，”一名伊斯坦布尔精神病学教授在 1978 年指出，“他们觉得孤立又无力，因此极易成为极端组织的吸收对象。”

市郊的社会秩序又进一步崩溃。萨布里发现他的人民委员会一方面致力于一项乌托邦式的任务，亦即为贫穷村民重建社区；另一方面又必须从事另一种较为吃力的工作，也就是抵挡各项外来威胁——包括政府进一步的拆除活动，还有其他移民聚落的保守人士与伊斯兰激进团体愈来愈趋暴力的侵略行为。帮派在街道上巡逻，遇到在政治立场上站错队的年轻人就加以殴打；对方若是没有政治立场，更是打得毫不留情。

旧城区接管落脚城市

1978年一天午后，人民委员会以及这座社区的乌托邦理想突然遭到彻底铲除。萨布里称这起事件扑朔迷离："五个右派的家伙走进这里的一家咖啡厅，宣称这整座社区原本都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口吐粗言，身上还带着武器。我当时没有在场，是后来听别人说的。后来发生了一场斗殴，结果这几个人就被人发现陈尸在石矿里了。"警方调查之后，指称人民委员会与萨布里是谋杀这五人的嫌疑犯——萨布里称这是警方的阴谋。在村民的协助下，萨布里只身逃亡，把妻儿留在社区中央的盖奇康都住宅里。往后三年间，他就躲在土耳其东南部的非法社区，距离伊拉克边界不远。

他逃亡藏匿之后的几个星期间，暴力冲突更升高到了极端的程度。数十件类似的事件深深煽动了盖奇康都居民的情绪，甚至连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和安卡拉都不免受到影响。1978年十二月的一天，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小镇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i，其中许多居民都来自先前的五月天社区)，左倾的阿拉维人与法西斯主义激进组织灰狼爆发冲突，并且随即升级为暴力事件，导致超过一百人丧生。几天后，坦克开入伊斯坦布尔外围郊区的街道，不但施行严格的宵禁，士兵也持枪在各座落脚城市里巡逻。政府对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几个省份宣布了戒严令。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也不足以遏制暴力的扩散。戒严令施行后，据报道上记载土耳其城市里每天平均有十六个人死于枪口或炸弹

之下。土耳其军方对国家领袖愈来愈没信心，并且认定这种混乱现象完全是盖奇康都社区里那些外来移民造成的结果。《纽约时报》在伊斯坦布尔的采访报导指出:“这些社区成了恐怖分子的招募中心与战场，而把土耳其推向无政府状态。”根据军方的说法，到了 1980 年，盖奇康都已经聚集了两万名右派与左派的活跃极端分子。

1980 年九月十二日，暴力冲突倏然终止。土耳其军方宣称国家的世俗状态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发动了一场预谋已久，这是 1960 年以来的第三次政变。约一百名国会议员及政治领袖遭到监禁或软禁，总理与反对党领袖都包括在内。军方将领接管各部门，军官也直接掌控了各个社区。反对派的政治立场，不论是否激进，都被宣布为非法，而且法律的执行严格又迅速。后来，多达二十五万人遭到拘捕，其中许多人更是遭到刑罚。乡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迁徙活动戛然而止。现在，民众都必须携带证件证明自己的住处，就像中国采取的户籍制度一样。盖奇康都社区原本写满口号的墙壁都重新粉刷，居民也说这些社区都变得极为寂静，静得令人毛骨悚然。

盖奇康都构成的非法问题就这么瞬间解决了，但这样的解决方法后来却对土耳其的权力结构产生了出人意料而且充满反讽的影响。政变之后不久，政府即宣布所有社区都可就地合法。军官奉命在每个社区里任命三名代表，这些代表则奉命聚集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一间拥挤的会议室，每个社区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都标示着社区的名字。一名高阶军官在会议室里到处游走，浏览着这些陌生的社区，突然见到了五月天这个刺眼的名称。他在这张桌子前面停下脚步，转身面对那三名代表——全都是萨布里先前的同志——命令他们立刻撤掉名牌，把社区名称改为——凯末尔社区，以土耳其世俗政权的革命之父为名。

萨布里的藏身地点愈来愈少。军方为了把人口土耳其化，不断把

土耳其东部与南部乡村的库尔德人与阿拉维人驱赶出去。萨布里逃亡了三年之后，军方终于在 1981 年于土耳其东南部逮捕了他。审判过程相当简短。他在三条罪名上都被判有罪，其中包括身为政治团体的成员。他在监狱里待了五年，不但不时遭到殴打，也与自己的家人以及他所建立的社区完全隔离。

落脚城市的转型

他在 1986 年踏出监狱，搭便车回到他的房子。一开始，他认定自己必然转错了弯，不然就是来到了市区而不是乡村移民聚居的市郊。"那里看起来和我当初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回忆道。街道变得比较窄，建筑大了许多，而且漆着鲜艳的颜色，人行道上的商业活动更是繁忙不已。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车辆。盖奇康都那些赏心悦目的屋顶已经不复得见，许多都已受到较高的建筑取代。

往后几天，萨布里和妻儿慢慢重新彼此熟悉，也获得老邻居的热情欢迎。这时他才意识到，这座社区不只是名称和外貌出现了改变，这里的居民、政治立场、环境氛围、在伊斯坦布尔当中的地位，以及在土耳其国内所扮演的角色，都已彻底翻转。在萨布里坐牢期间，土耳其的落脚城市经历了世界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转型。

军事独裁统治在 1983 年结束，但未来的前景并不被看好。军方领袖虽在那一年举办选举，却事先颁布了一部高度限制人民权利的宪法。大部分的知名领袖人物都被禁止参与政治，许多政党也被宣告为违法

政党。这场选举由奥扎尔(Turgut Ozal)及他刚创立不久的祖国党获胜。奥扎尔是个曾经参与军事政府的经济管理师,所以看起来应该也只会是个忠于军方的官僚。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他却大幅改造了土耳其,对国际贸易与投资开放本国经济,将货币体系现代化,把经营惨淡的进口经济政策改为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且建立了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与政府体制,最具革命性却又最不引人注意的一项,乃是他针对城市郊区那些充满愤怒又漂泊无根的占地自建社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上任之后不久,奥扎尔颁布了第二八零五号法律,对盖奇康都社区的占地居民给予特赦。不过,这次的特赦与20世纪60及70年代期间的特赦不同,不仅把占地居民转为合法纳税人,还让他们对自己临时搭建的房屋及其底下的土地取得所有权。这些夜间抵达的人口原本因身份地位不明而深感不安,与城市居民严重对立,却在一夕之间成了不动产所有权人,而且与经济体系利害相关了。

把自建的房屋转变为房地产商品的效果立竿见影。来自安纳托利亚乡村的移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有如洪水般不可抵挡——从而保证了这里的地价必然上涨。经由这么一个简单的举措,盖奇康都的房屋随即从国家的威胁变成了国家福利的工具,也是福利国家的简易替代品。正如一名土耳其作家指出的:“对于至少两个世代无法受益于国家社会安全制度的家庭而言,盖奇康都住宅成了最重要的社会安全物品。”

奥扎尔明白这项资产会被当成种子资金,让贫穷的农民得以开设小生意、累积存款、赚取租金收入,也可以抵押给土耳其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以来获得资金。他在市郊为一群未来的新兴中产阶级打下了基础,但他当时大概也想不出来这样的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尽管如此，他倒是意识到这种做法能够有效解除落脚城市的政治威胁。1988年，他向一名记者吹嘘说自己赢得了市郊的支持，凭借的手段是把对革命运动热情变成了房地产所有权带来的平凡喜悦："我们发给这些人土地证书，使他们拥有了土地。现在，他们的房屋和街道都整洁干净，也有儿童的游乐场和年轻人的运动设施，因此他们都把票投给我们，而不是投给左派。"

正如奥扎尔在这段话里隐隐提到的，重点不仅仅是给予所有权。伊斯坦布尔的行政当局投注了大量预算为这些新近获得合法地位而且缴纳不少税金的社区填补基础建设。他们的房地产财富并未自动转为企业财富。要促成这样的发展，必须要有学校、运输网络、与城市经济的连接，以及生活的基本要素。到了1987年，伊斯坦布尔的盖奇康都住宅已有百分之七十四通上了自来水。（尽管大多数在夏季都不免遭遇长时间的停水状况），百分之九十具备室内厕所，百分之九十一拥有电力。

由于军事统治结束，农民又有了在城市里拥有房地产的可能性，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因此动起了离开乡村的念头。在1984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间，伊斯坦布尔每年至少涌入五十万人。土耳其的各级政府都一心想要赢得市郊那些新进选民的支持，因此把1984与1986年的特赦法律也适用于最近迁入的盖奇康都居民。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土耳其的盖奇康都居民已有将近百分之八十不是拥有住宅的所有权状，就是持有政府发给的证明文件，终将能够对自己居住的房屋拥有正式的合法所有权。这样的人数极为庞大。到了1989年，盖奇康都社区已占据了伊斯坦布尔的三分之二面积。当初萨布里为了躲避警方追捕而逃亡的时候，他的社区原本位于都市最偏远的边缘地区，现在却几乎成了市中心的一部分。在今天的

地图上，凯末尔社区约位于通往伊斯坦布尔的道路的四分之三路程处，社区范围极广，一片片屋顶紧密相接，从马尔马拉海一路延伸至黑海。

土耳其已成为一个落脚城市的国家。光是在该国最大的三座都市里，盖奇康都的住宅据估计就有两百万间，其中居住的人口至少有一千零二十万人。土耳其人口居住于城市的比例在1950年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了1986年已上升至百分之五十。在各大发展中国家里，土耳其可能是第一个跨越这条界线的国家。

这项改变令伊斯坦布尔的既有居民深感震惊，以致他们一时之间不晓得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出人意料的新伊斯坦布尔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突然出现，使得当地人大吃一惊，"一名对外来移民较为友善的城市居民写道，"为了克服自己瞠目结舌的反应，我们于是用独特一词来说明这一切现象：一项规模如此庞大的灾难就只降临在我们身上。"当然，这句话就历史而言并不精确：伊斯坦布尔人口暴增的灾难其实与19世纪欧洲及北美都市出现的变化极为相似。不过，这种转变对于伊斯坦布尔的精英人士而言的确是一项政治灾难，因为他们突然为一群暴发户似的新兴中产阶级所淹没，这群人不但妇女都戴头巾，而且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也呈现出一种陌生的形态。

对萨布里而言，他所遭遇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灾难。他的社区经历了多年来的军事统治，接着又突然被纳入都市社会当中，于是其中的居民已不再狂热于政治。如同一名观察家所言："阿拉维人的身份认同取代了左派的立场认同。"许多占地居民取得土地所有权之后，可以把房子卖给外人，赚取一大笔利润。现在，凯末尔社区共有五万名居民，其中许多人都不晓得这里曾是反抗活动的中心。逊尼派教徒虽是土耳其人口中的多数，其中的贫穷成员却与受迫害的少数族群一样成了社会的下层阶级。尽管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但萨布里不得不承认奥扎

尔确实没错——他的同志(更别提他自己的家人)已成了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民众,满心只想维系自己的资产价值。他对我说:“改革把我们全都变成了资产所有人,因此也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全都开始以业主的心态看待事情。就这样,我们建立了一套小资产阶级的文化。”

不过,他接着却咧嘴一笑。“我不后悔——我们没有懊悔。”他说,而且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1989 年,这个社区首度得以参与市政选举。他代表一个左翼政党参选,结果囊括了百分之七十五的选票。他上任之后,又执行了另一项变革,再次彻底转变了这个社区的外貌与性质,并且从此消除了盖奇康都这种住宅区。

奥扎尔总理在 1983 年颁布的土地所有权法悄悄推出了一种效果极为强大的创新措施,称为改善方案。为了把这些区域纳入都市,并且消除其中最不卫生或最简陋的住宅,这项法律允许以三种方式改善混乱的贫民窟。首先,他们可以选择保存的做法,让既有的盖奇康都房屋合法化,改善其硬件设施,再设置各种公共服务设施。第二种选择是更新:以公寓大楼取代既有的住宅。第三个选项则是拆迁:把整个社区卖掉、夷为平地,再把土地转卖给开发商。

奥扎尔没有预料到的是,盖奇康都的居民几乎没有人选择保留自己的住宅。对于绝大多数的居民来说,把他们自己搭建的房屋改建为公寓住宅,不仅可大幅提升房价,又可带来持续不断的租金收入。另外有些人则是在自己从没见过的大笔金额诱惑下,把房子卖给一群开发商;届时不但可拥有其中一户公寓的所有权,也可分得其他户的出租收入(这是土耳其常见的做法)。有些人就算原本想要继续住在附有庭院的小屋子里,也在不久之后改变了主意。“我本不想拆掉我的盖奇康都房屋而改建成公寓,”当时一名社区居民表示,“可是如果邻居都这么

做，我就必须跟着这么做，不然我们的房子会完全照不到阳光。”

改善方案施行之后，凯末尔社区即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1989 年，一名认同左翼理念的伊斯坦布尔市长允许萨布里的选民兴建高达五层楼的公寓。所有人都充分利用了这项权利。“你如果在 80 年代末期来到这里，”史学家亚斯兰说，“还会看到四处都是附有花园的盖奇康都房屋——可是那项许可一通过之后，所有人都拆掉原本的房子，改建成较大的建筑。这种变化是一时之间同步发生的，就像盖奇康都本身一样。大家发现自己的土地价值提高了，于是他们说：让我们来好好利用每一寸空间吧。原本带有理想性的心态，突然间转成了利润导向的心理。”

今天，凯末尔社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占地自建的聚落，除非你知道该看什么地方。在后街小巷里，偶尔可以见到一栋老旧的自建房屋，但这样的房屋现在也漆上了美观的色彩，铺上了红瓦屋顶，上面矗立着烟囱与卫星天线。现在，这里每二十幢建筑里大概有一栋这种房屋。大体上而言，繁忙的街道旁都排列着一栋栋粉刷油漆过的现代建筑，几乎全都正好五层楼高，一楼是店面，二楼以上的楼层都有阳台（也同样装满了卫星天线）。一条兴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多车道公路划过谷地底部，嘈杂的路肩矗立着老旧的盖奇康都房屋，有些因为土地拨用而被切成一半。这一次，居民没有对政府发动激烈抗争，而是领取了大笔补偿金，毫无怨言地搬到比较舒适的盖奇康都社区去了。

萨布里在一个炙热不已的夏天向我讲述了这段故事，当时正值一场全国性选举的前夕。他代表极左翼的自由与团结党竞选国会议员，而且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参选。在他的竞选总部周围，繁忙的街道上满是该党的旗帜，总部里则充斥着许多意见人士与劳工的图像。我到这里来采访他之后，他就带我到楼下一名朋友开的茶馆喝茶。他的朋友坐在一张豪华的硬木办公桌后方，正对一面设计繁复的双层玻璃

窗——这种商品在这些前农民当中愈来愈受欢迎，正足以显示这个社区的繁荣发展。

今天，萨布里头发稀疏，蓄着一道浓密胡须。他虽然态度随和，偶尔却也不免显露出义愤的情绪，尤其是提到军方怎么对待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及阿拉维人的时候。我们后来谈论到土耳其的变化，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市郊的聚落，他的愤恨仿佛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姿态，说话的时候嘴边还带着微笑。“这里的选民已经不再是革命分子了，这点我承认——金钱已让大家背弃了过往的原则，他们的票也不难买。”

的确，这座过去名为五月天的社区虽然还是有不少人投票给极左派，而且人数远比其他社区来得多，却已不足以让萨布里或他的同党同志当选。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他们就再也不曾胜选过。2007 年，多数的选票都投给了过去的敌人：共和人民党的凯末尔主义者。萨布里的政党在全国吸引了百分之零点一五的选票，在这里则是排名第二，但与当选者的投票数仍然相差甚多。他说，由此可见得他的社区确实已被资产阶级文化征服了。

这时我才突然想到要问他：他当初自己亲手搭建的那间盖奇康都房屋怎么了？看起来还是和当初一样吗？还是他也加装了双层玻璃窗？我能不能去参观？他腼腆地一笑，目光垂向地面，然后指向繁忙的道路对面。在一个位于道路转角处的黄金地段上，矗立着一座庞大的五层楼建筑，一楼有一家鸡肉餐馆、一家熟食店、两家手机行、一家服饰店和一家旅行社，楼上则是二十几间大型出租公寓。这整幢建筑想必可带来惊人的租金收入。“我的房子，”他语气平静地说，“现在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

我故意调侃他：“所以，你那些年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的结果，就是自己也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而且还是可怕的收租阶级。”他皱了皱

眉头，然后仰起头开怀一笑，举手指向天空："绝对不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绝对不会接受小资产阶级这个标签！这个标签绝对不可能贴在我身上，我向来都是共产主义者。"

如同当初和他一起占地居住的邻居，萨布里对于自己经历的命运转折也仍在调整着心态，只是他的表现可能比别人有趣。他们原本是一群趁着夜里在市郊掘地建屋的非法居民，之后成为市郊的一股危险势力，最后却变成了土耳其主要经济与政治阶级的成员。

新移民遭遇落脚城市

如果要了解土耳其的落脚城市在获致成功之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发展，就该踏出萨布里的竞选总部，朝着山坡上走，穿越几个街口，来到一条较为混乱的街道，然后在一家名叫希望的茶馆里找个位子坐下来。在这家茶馆的仿乡村建筑里，手工削砍而成的板凳铺着布巾，墙上刻意妆点着充满田园气息的图画。这就是土耳其人所谓的民俗茶馆，是一种在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的落脚城市愈来愈受欢迎的设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迁居这里的人口，都喜欢到这种茶馆消磨时间。

端上饮料的服务生是个英俊壮硕的男子，蓄着一口修剪整齐的胡须，名叫科莫·多甘。这是他的店，但这个店面和他住的公寓一样，都是租的。如果说萨布里那个世代都成了生活奢华的房东，那么科莫这一代的人则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永久的佃户。他在 2000 年接下这家店之后不久，就以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的名字，把这里取名为希望。和他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所注重的就是努力工作，赚钱养活家人，而

不是依照某种意识形态的理想建立一座乌托邦。他一样在后宫下车。当时是1993年,他二十三岁,而他的家乡——位于土耳其远东地区的埃尔津詹(Erzincan)——已变成一个难以谋求生活的地方。那个地区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地震,军事与种族方面的冲突无穷无尽,他的家人又没有足够的钱能够真正经营农业。他知道埃尔津詹的许多居民,包括他的几个叔叔伯伯,都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社区里,于是他就搭上一辆客运,横越全国前来一探究竟。

20世纪90年代期间来到伊斯坦布尔市郊的数百万人口,和先前四十年间来到这里的移民,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他们同样来自农业已不再需要劳动力的乡村,也同样是到城里寻求比较好的工作机会。不过,他们抵达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构成的绝佳平衡,到了90年代已陷入停滞,原因是过高的政府债务导致货币迅速贬值,以致经济陷入动荡。由国营企业提供长久稳定的工业性工作早已成过眼烟云,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性的贸易导向经济,机会虽然增多,工作保障却不如以往。

这些新进人口也与过去的移民不同。如果说上一代的移民是受到就业的希望所吸引,那么现在这群庞大的外来人口则主要是在乡村贫困的逼迫下而不得不远离家园。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土耳其东部尤其如此,军方在那里废除数百座村庄,驱逐了所有居民。这些受害者被迫举家迁徙,也没有机会调整于城市生活的形态和韵律。"新进人口的贫穷程度极为严重,甚至没有能力搭建盖奇康都住宅,"一名观察家写道,"空地也极为缺乏,民众只能在既有的旧盖奇康都社区里租屋居住。"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盖奇康都社区的租屋房客在居民比例中已达百分之八十。

科莫跟着这些第二代移民奠定的路途前进:他先在一间家具行里

找到工作，然后租下一间老旧的盖奇康都住宅。这栋房子是他叔叔的，他叔叔也是当初在70年代期间打造了这个地区的其中一名革命分子。实际上，科莫租下的只有半栋房子而已：叔叔在山谷底部搭建了这栋房子，后来公路开始铺设，他就兴高采烈地领了补偿金，让自己的房子被切割成一半。科莫花了点钱把剩下的房子翻修得适合人居住，并且安装了一架卫星天线，然后把母亲和妹妹接过来一起住。不久之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这栋空间狭小又嘈杂的房屋，于是他便找了一栋在社区里到处可见的五层楼公寓，租下一间位于三楼的住处。

他在家具行里工作了两年，接着到一家保险公司的地方办公室上班，后来又接手经营一所学校里的自助餐厅。他的太太原本从事秘书工作，后来转而担任会计。科莫这一代的土耳其人不论背景多么传统，都已认识到夫妻两人都必须工作。高中校园的对街有着一家废弃的茶馆，科莫租了下来，向一个朋友买下一家老旧乡村酒吧里的各种陈设物品。他的儿子出生之后，他就漆了一面招牌，上面写着希望。这两份工作刚好互补，但收入不足以让他买房。

对于这个世代的许多人来说，购买房产是一项遥不可及的目标。房屋中介店面的广告牌就证明了房价上涨的幅度有多么惊人。“盖奇康都，三房，六万新里拉，一百七十平方米……盖奇康都，所有证书齐备，八万五千新里拉。”换句话说，这些当初凭着石头、劳力和希望所搭建而成的简陋住宅，售价竟高达四万至五万五千美元，而且邻近地区的房价还要更高。以工厂工人的薪资而言，一年能有一万八千美元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世道显然出现了变化，而且变化的不只是地价而已。

科莫和他的不少顾客在充满乐观的21世纪初期似乎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土耳其快速复苏的经济当中缓慢跻身下层中产阶级之林。而

且,始于2008年的经济衰退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伤害,因为金融风暴对信用与就业市场的重击并未波及到土耳其。他们是一群致力向上攀升的外来移民。尽管如此,他们对当初建造了这个地方的理想主义者却没有什么认同——实际上,他们表达出来的态度主要是鄙夷。

也难怪:因为这里严重缺乏国家的福利、良好的学校、运输网络与社会服务,以致乡村移民无法让他们的子女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由放任的发展导致这座社区毫不关怀下层阶级的需求。科莫和他的顾客指出,光是拥有房产并无助于促成良好的公共设施,而且由于政府未能提供这些服务,导致这里的政治情势变得相当不稳定。如同这里大部分的居民,科莫也听闻过萨布里的名声和传奇经历。他向我说明他自己后来为什么背弃了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的激进政治团体应该搞清楚实际状况,并且多想一想,"他说:"卡在中间的都是一般的普通百姓。"

科莫说,他在1993年刚来这里的时候,那些反抗分子已经对自己的房子获得了所有权,宽广的街道也变得愈来愈狭窄。私人土地虽然带来繁荣,却也带来了自私的心态:所有人对于自己名下的土地都要使用到极致,因此在人行道、公园乃至半公共的广场上都盖起了房子。大家都不肯为了兴建公园或较好的学校而牺牲自己的土地或捐助金钱。土耳其没有市税的制度,所以国家的协助乃是一种政治恩惠,但这座社区却无福享有这样的恩惠。一名学者观察到财产私有制度与政府的缺席已改变了土耳其落脚城市的外貌:"盖奇康都区域原本满是低矮房屋与屋侧花园的空间特色已经消失了,新兴的环境在开放空间与公共及半公共空间方面极为贫乏。"

在科莫眼中,这是一种对于该社区价值观的背叛。"兴建文化中心、公共图书馆及公园的理想全都被摧毁了。现在,整个社区就是一堆

堆的水泥。现在租金虽然低廉，但大家都因为尝过金钱的滋味而堕落了。他们忘了自己也曾经贫穷过。”

落脚城市寻得本身的政治立场

尽管军政府忧心忡忡，但五月天社区在成立之初所标举的政治思想却从来不曾成为土耳其的政治主流，甚至作为反对势力也不成气候。左翼人士的成就高峰达成于 1989 年——萨布里就是在那年的选举获得掌权的机会——当时一个社会民主政党横扫了伊斯坦布尔的选票。不过，那股左派势力乃是属于一座古老而且逐渐消失的伊斯坦布尔：其政策的诉求对象都是在真正的企业里握有正式职务的选民，而不是盖奇康都居民，因为这些居民几乎完全生活在灰色地带。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危机，才出现了一个致力于落脚城市的政党，而这个政党也承诺将超越单纯的房地产所有权，为社区提供各种必要的协助和支持。这个政党甚至还取名为福利党。

该党推出的市长候选人是埃尔多安，他在许多方面都可算是典型的盖奇康都居民。严格来说，他并不是来自边缘地带，而是生长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贫穷区域卡萨帕萨(Kasimpasa，那里比当今的盖奇康都社区还要贫穷)。不过，他的人生却是标准的外来移民生活。他的家人从土耳其东北部的日泽(Rize)搬迁到伊斯坦布尔。他们发展出了外来移民的文化，信仰虔诚，头戴头巾，埃尔多安的少年时期都在街头卖芝麻圈面包，努力在都市里求生。

他在 1994 年的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几乎所有伊斯坦布尔市

中心的居民都对此忧心不已。埃尔多安的福利党所获得的支持来自远位于旧市区外的神秘地区,而且他也不是土耳其都市居民心目中可以接受的候选人:他公开表现自己的虔诚信仰,他的太太也戴着头巾。当时所有人都习惯称他为伊斯兰主义者,至今仍有些人这么称呼他。

到了1994年,伊斯坦布尔的既有人口在选举中已不再具有任何影响力:他们已经遭到了外来人口的淹没。在那场选举中,有百分之六十点四的选票来自盖奇康都社区——这是盖奇康都社区的投票数首度超越市区。到了那个时候,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据估计已有将近百分之七十五和盖奇康都有关,也就是说根在乡村,又有在市郊生活过的背景。外来人口已成为权力的唯一来源。如同一份投票结果分析报告所指出的:"伊斯坦布尔的那群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乡下,至今仍然处于乡下与都市生活的转变阶段,而且生活于各种非正式的环境条件当中:他们总算找到了代表自己的人物。"

埃尔多安在20世纪90年代踏入处于真空状态的土耳其政界,在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未能满足大部分人民的需求之际成为伊斯坦布尔市长。当时经济状况极糟,更在1994年彻底崩溃,于是整座城市在许多人眼中已沦为一片满是垃圾的地方。他的能力与魄力相当吸引人,连凯末尔社区的居民都投票给他。

福利党确实为落脚城市带来了不少贡献。该党的竞选办公室以各种不同方式承担了原本应由国家扮演的角色,为自由放任的城市经济填补了不少缺陷,让乡村移民获得支援。一名观察者记得该党戴头巾的妇女团队,在社区里协助病患寻求病床,在冰天雪地的冬日发放食物,向新婚夫妇赠予小礼品,协助凑集丧礼费用。该党的诉求刚好也迎合基本保守心态的喜好。乡村移民因为害怕都市的各种危险与家庭稳定性的瓦解,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抱持这种保守心态,如果住在落脚城市

中较为危险且不稳定的区域，就更是如此。福利党试图把通奸行为入罪（但没有成功），该党的部分女性候选人也不顾凯末尔政权的禁忌，而在头上戴着头巾。乡村移民虽然不一定都抱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却因为长久以来的习惯，而习于看到女性戴着头巾，并且表现出娇弱的姿态。在这些移民眼中，城市里显然充满了摧毁家庭的危险力量，福利党则带来了一项不同的选择。

1997 年，在军方的坚持下，福利党遭到宪法法庭裁定不得参与国家政治。埃尔多安因为发表煽动性的演说而坐了十个月的牢。2001 年，土耳其再次面临金融崩溃，福利党也随之分裂为两个政党：其中的伊斯兰主义者组成了幸福党；埃尔多安和他的盟友向来都对社会与经济政策比较感兴趣，于是组成了正义发展党。不久之后，正义发展党就被称为外来人口的终极政党，是盖奇康都的全国代表。这个政党显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领导土耳其。

在凯末尔社区上方的山坡还有另一个社区，称为苦水社区，是新政治势力的集中地。这座社区的名称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取的，当时抵达这里的村民彻夜挖渠掘井，结果冒出的水却几乎不能喝。今天，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成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这里的生活基本上受到土地登记员的控制；这个人拥有庞大的政治权力，可以把人宣告为合法居民，允许他们享有医疗照护、学校教育乃至住宅的所有权。他对我说，每天都有五六个刚从乡村来到这里的家庭会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去年迁入这里的人数约有一万八千人。

居民表示，外来移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涌入的时候，这里原本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虽然这个社区的妇女习于戴头巾——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伊斯坦布尔极为罕见，至今在公共场所仍属违法——却不是因为她们的宗教信仰特别虔诚。这里的几位女性向我说明指出，

这项习俗其实是出于实际的需求(因为这里的女性大多务农,必须在安纳托利亚的大太阳下劳动),而不是对伊斯兰教的深切信奉。尽管如此,在这里还是经常会看到头巾,而且突出于店面上方的清真寺尖塔也比其他地方来得多。

经济崩溃之后,苦水社区的家户都迫切需要协助。不过,伸出援手的却不是政府,而是正义发展党那群头戴头巾的妇女团队。今天,这个社区里到处都可见到新政治势力带来的影响。土地登记员是幸福党的党员,在他的办公室里可以见到一幅非常特殊的景象:在强制悬挂的凯末尔肖像上方,挂着伊斯兰教的经文。在同一张办公桌上,他一方面发放福利证书,另一方面也收取筹建清真寺的捐款。

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犹如这座社区的输血系统,把新鲜的血液注入地方上孤立穷匮的家庭。在埃尔多安二度当选总理之前,我在一位名叫卡达巴尔的年轻女性引导下在这里待了一天。她是个研究生,身穿白色洋装,头戴时髦的白色头巾,带着我走在社区里的后街小巷。她喊得出这里每一个家庭的姓氏,也认得每一栋房屋及其背后的历史,而且可以任意穿越任何一道门。她采访一个人家,走进他们租住的一栋破败不堪的盖奇康都房屋,默默帮助他们取得一张政府发放的证件,可让他们家的儿童取得免费药物。另一个人家收到一盒食物;又一个人家则收到一笔慰问金以协助他们因对变故。她说自己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没有意见,但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是受到信仰的驱动。“我们的宗教信仰认为,一个人如果看到邻居饿肚子还能安然睡觉,那么这个人绝不是属于我们的一员。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

这就是正义发展党在街头上服务民众的方式。卡达巴尔负责服务二十几个家庭,上司是三十六岁的阿里,他在街角处拥有一家业务鼎盛的小家具工厂。他手下共有三十名员工,负责为七百户人家提供财务、

医疗与行政方面的协助。伊斯坦布尔有好几百名像阿里这样的人员。正义发展党从事业发达的支持者处获取捐款，再以这些款项投入到党内的援助机构。“在这里调和贫富关系的是正义发展党，”图内尔说，“你应该把我们视为一种疏通管道。”

哈玛斯与真主党这两个伊斯兰组织虽然也采取同样的社区组织做法，但正义发展党的领导阶层却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和这两个组织相提并论，而比较喜欢提及塔马尼协会(Tammany Hall)时代的美国民主党(塔马尼协会是美国民主党内成立于18世纪末的组织，不仅在纽约拥有庞大的政治影响力，也协助以爱尔兰人为主的许多外来移民崛起于美国政界。)他们经常声称自己的党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就像是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与基督教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说宗教是他们的象征，但不是基本社会目标。埃尔多安在2003年首次当上总理之时，城市居民都不相信这一点，而且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披着羊皮的宗教激进分子。土耳其这群立场温和而且受过教育的少数族群，在长达八十年间勉力维系着中东唯一的世俗民主国家(尽管偶尔不免出现军事政变)，因此怀抱这样的恐惧确实有其特定的背景。不过，他们对正义发展党的疑虑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对落脚城市的害怕，他们提出的也是那套耳熟能详的说法，指称落后的乡村移民把充满宗教与压迫气息的乡村文化带进都市的国际性场合中来。

不过，埃尔多安赢得一场接一场的选举，却没有鼓吹大众支持政治伊斯兰主义。实际上，他显然把大部分的精力投注于让土耳其融入欧洲、健全国家的经济、打破政府与东南部的库尔德人之间的僵局，以及设法遏止法院惩罚政治异议分子。他过去虽然推动通奸法，后来却也通过一项戏剧性的女权法案，不但禁止名誉处决，还把强暴列为重罪，即便是婚姻中的强暴行为也不例外。这是中东伊斯兰地区这类法律当

中最强硬的一项。显然，除了宗教保守主义之外盖奇康都也产生了其他的力量。

2006年，声名卓著的土耳其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发表了一份引人瞩目的大规模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里，这个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非党派学术智库指出，正义发展党的支持度虽然水涨船高，土耳其却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政治愈来愈缺乏兴趣。参与研究的学者于1999年在全国抽样访查了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后来在2006年又再次进行访查。支持伊斯兰教法的人口在1999年原有百分之二十一，到了2006年已下降至百分之九。认为国内应有伊斯兰政党的人口也从百分之四十一下跌到百分之二十五。此外，不同于一般的预期，习惯戴伊斯兰头巾的妇女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也从百分之十六下降至百分之十一。（至于包覆得更严密的罩袍，穿戴人口更从百分之三远降至百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情操却在一个领域里逆势上升：自认为"首要身份是穆斯林，其次才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人口大幅增加，从1999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增加至2006年的百分之四十五。这种现象可以描述为宗教信仰的个人化。如同欧洲与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宗教已成为一种个人认同与荣誉，是一种自我肯定而且超越于国家之上的团体身份，而不是一种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全面性的社会控制。

明显可见，这些变化乃是盖奇康都的移民文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在这些融合了乡村情感与都市情调的社区里，个人展现伊斯兰认同的做法在经过八十年之后又再度成为土耳其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伊斯兰认同也成为土耳其政治的一部分。不过，土耳其也正是在这里对欧洲开放，对贸易开放，也开放了一种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个人生活。就某方面而言，这项成就乃是落脚城市的胜利，不仅征服了全国的政治与人口，也征服了整个国家的心智。如同一名土耳其观察家所写

的:"接纳外来移民使得盖奇康都这种原本为了自助而建立的代用城市变成了如假包换的大都市——开始仅是在城市发展方面如此,接着扩展至文化与政治,最近更延伸到经济方面。"

落脚城市吸收旧城区

站在苦水社区望向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不免注意到一幅不协调的景象:十栋公寓建筑,紧密围成一个圆圈。这些公寓可不是在市郊到处可见的那种巨型混凝土公共住宅,而是高雅的玻璃外墙建筑,带有美观的玻璃阳台,就像鹿特丹或加州圣塔莫尼卡的那种公寓大楼。这十栋建筑犹如古怪的海市蜃楼,坐落于一片混乱的盖奇康都社区与轻工业街道的中心,仿佛在这些贫穷的住宅当中炸出一个大坑洞,然后在洞里植上这么一簇闪闪发亮的建筑。一道高墙把这十栋公寓建筑所在的飞地和周围的房屋隔离开来,只有乘车才能进入墙内。访客必须在安检门留下身份证件,然后才能把车开入地下停车场。安检门上方的一块招牌以英文标示着这座住宅区的名称:辛帕斯中心生活社区。

一旦进入这片高墙内的空间,即可看见一座非常不同的社区。这里的街道都是石板路,而且打扫得极为清洁。到处都可见到佩戴着警长般徽章的保安人员。中心的圆环满是绿意,环绕着一座大喷泉,喷泉中央还有一个供儿童游乐的小岛。社区里有一间健身房(门口的招牌以英文写着:"健康俱乐部")、一座土耳其浴场、一家医疗中心,还有一所占地广大而且人员充足的托儿中心,全都为社区内三百八十六间公寓住宅的居民专门设置。销售经理佩克表示,这里的居民几乎全都是

生长于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家族已在都市里居住了好几个世代。他们之所以搬到这里，原因是旧市区已经变得太拥挤又太昂贵，基础建设也老旧不堪。市中心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真正的穷人聚居地（这些人远比盖奇康都的居民还要贫穷），以致犯罪与毒品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市郊社区则是向来以不怕地震著称。

像辛帕斯（Sinpas）这样的企业就是特地在这里迎合他们的需求。在过往的盖奇康都社区里，辛帕斯已成为一大势力，悄悄买下许多居民自建的房屋，并与地方官员交涉开发权，然后再拆除这些房屋，改建成中产阶级的住宅区。在这家公司精美的彩色目录上，封面印着英文标题："辛帕斯爱情故事"，里面展示的这些自成一格的住宅区，全部都以英文命名：水都市、伊斯坦布尔宫殿、伦敦宫殿以及令人惊喜的前卫花园之类。有五六家大企业都在开发类似的住宅区。

这种产品非常吸引土耳其国内一群全球化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与欧洲及北美的中产阶级比较相似，而不像过去那群由国家主导的土耳其中产阶级。落脚城市的成长，以及其房地产价值的上涨，促成了这个阶级的人口从市区外移至市郊。在过去二十年来，土耳其一份研究报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指出："中高收入族群对市郊地区愈来愈感兴趣。他们在市中心区已不再觉得安全舒适。私有汽车的增加与高速公路的铺设也有助于改变中产阶级的住宅偏好。"

三十岁的塞妲和她三十四岁的丈夫阿梅特住在其中一栋建筑的四楼。他们两人都在跨国药品公司的土耳其分公司担任中层员工：阿梅特在诺华药厂担任销售员，塞妲在辉瑞药厂担任营销人员。我拜访他们的时候，她正请了六个月的产假在家照顾他们三个月大的孩子伊吉特。他们在 2004 年以十七万两千美元买下这间两房公寓，储蓄了将近四年才存到七万四千美元的首付。就投资的角度而言，这是一项明智

的举动。到了2006年底,他们这栋大楼里同样大小的公寓售价已涨到二十六万两千美元。就生活经验而言,他们则是在诧异之中发现了市郊的存在。

“两年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区,”塞妲说,“我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外围的地区——我以为到了这么远的地方,应该早就超出市区范围以外了。”他们公寓的室内装修没有什么特色,就和所有没有文化根基的第二代新富阶级一样:新买的家具、洁净的硬木地板、一套笨重的环绕家庭影院,墙上挂着几张别致的照片,并且有大量的留白空间。塞妲说他们之所以搬出旧市区,除了买不起他们在那里看得上的公寓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犯罪与停车因素。“这里是外围郊区,让我们得以远离那一切,”她说,“住在这里很好,有二十四小时的保安,也有很多的停车位,而且还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福利设施。到市中心只要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那里购物。”

我问他们对这个新社区——包括其多彩多姿的过往以及充满神秘气息的后街小巷——有什么感觉。他们有没有尝试过几家比较知名的小吃店?这个地区的著名家具店有没有吸引他们光顾?塞妲与阿梅特对我说,他们和这里大部分的邻居一样,都从来不曾踏进盖奇康都社区里。他们从停车场开车外出,穿越盖奇康都社区的几条街道,然后就朝着市区开去。他们搬到这里已有一年半,从来不曾徒步行走过邻接于他们社区的几条街道。“我们对这区其实不熟,”塞妲说,“我们只知道这个住宅区。”

这些在跨国企业上班的全球化的中产阶级,都住在像辛帕斯中心生活社区这样的住宅区里。他们和周围那些较为贫穷而且必须仰赖生意头脑谋生的盖奇康都中产阶级几乎可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不论就外表还是文化上而言。尽管如此,这两个群体的相似性却愈来愈鲜

明。他们同样对凯末尔主义的旧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不感兴趣。毕竟，那些旧政治人物在各项议题上无穷无尽的争论——包括库尔德人问题、人民表达非土耳其异议主张的权利，还有塞浦路斯问题——已导致土耳其的经济付出庞大代价。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都乐于和欧洲整合，只不过盖奇康都的中产阶级希望戴着穆斯林头巾融入欧洲，辛帕斯的中产阶级则宁可戴着伊夫·圣罗兰的围巾。

2007年，这两群中产阶级虽然表面上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却首度开始将他们的利益合而为一。有史以来第一次，土耳其的旧中产阶级有一大部分都把票投给了埃尔多安的正义发展党。不少土耳其人都看出这场选举的结果是个转折点，是落脚城市与全国的价值观相互调和的现象。政治作家谢诺贾克(Zafer Senocak)认为这是一起关键事件："来自乡间而在社会中向上攀爬的人士已经坐上了餐桌，而且他们甚至也不想把别人挤开。"

另一方面，载满乘客的小巴仍然持续驶入后宫。来自安纳托利亚乡村的移民人口已经稍有减少，但每年仍大概有二十五万人涌入伊斯坦布尔，有些人认为城市根本承担不了这样的人口成长率。在伊斯坦布尔的最边缘，仍可见到几何形状的盖奇康都屋顶如同冰晶般向外扩散。现在空地已难找得多，主要只有北方的林地与水源保留地以及靠近欧洲的私有农地(价格极为高昂)。有些人宣称盖奇康都的时代已经结束。作家也先(Orhan Esen)指出："不同于原本的盖奇康都社区，这些新式区域不是一群人口集体聚居于提供就业机会的工业中心，而是一个个贫穷的家庭在偏远地区暂时找到了个权宜的落脚地点。那里没有任何城市环境，也预见不到任何未来的利益……那里是失败者的聚集地。"

看到这样的状况，我们确实可能会忍不住想要宣告落脚城市的冒

险之旅已然结束,并且认为最近这一波占地区域确实因其贫穷而明显可见得是失败者的聚集地。伊斯坦布尔市政府似乎就是这么认为,因此发动了一项大规模的贫民窟清除计划,理论上希望以高楼大厦取代所有粗陋的建筑。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些聚集在市镇边缘的失败者并没有选择返回贫穷与压迫的乡村生活,而他们当前的生活状况也没有继续走下坡。我们更必须记住一点:"失败者的聚集地这句话在1946年也曾经挂在许多人的嘴上。结果,正是当年那群失败者改变了中东的面貌。"

第七章

起于市郊边缘的巨变

尔撒圣殿，德黑兰

德黑兰这座大都市从阿勒布尔兹山脉白雪皑皑的山峰奔泻而下，直达卡维尔盐漠的盐滩，其中的建筑物随着高度递减而从钢骨玻璃大楼转为石头与木材搭建的房屋，最后则是沙石与泥土堆成的栖身之处。你如果来到这座都市的南缘，然后继续向外前进，穿越几公里乌烟瘴气的工业区，抵达盐漠的边界，将会发现这里繁忙不已，到处都是兴建中的住宅，随时都有人抵达或离开，车辆挂着遥远省份的车牌，隐秘的新区域从沙地里纷纷冒出。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就是在这里寻得群众支持与推动的力量。今天，在更偏远的边缘地带，新一代的伊朗人正从土地上爬起来，试图在都市里起步。他们对政府的失败深感挫折，说不定也为下一波的巨变埋下了种子。

在德黑兰的尽头，就在市郊之外，建筑与沙地交融之处，一簇约两百间杂乱搭建的房屋嵌在一片看似任性形成的沙漠里，隔绝于一大片荒地之中，围绕着一座小小的土丘。这座土丘乍看之下仿佛是自然形成的地貌，但只要注意到丘顶的旗帜与唤礼员通报礼拜时刻的扩音器，即可发现这原来是一座波斯圣殿，建于八百年前，供奉的对象是被世界其他地区称为耶稣基督的先知。这座圣殿称为尔撒圣殿，其周围的区域也以此为名。

十五年前，这座土丘是这片地面上唯一的特征。后来，这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一两栋房子。21 世纪初，街道与电力也开始进驻这

个地区，原因是这片土地的地主说服了地方官员允许他分割土地，或者至少对他这样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的房屋起初只是用手工砖块砌成的粗陋建筑物，水塔直接设置在屋顶上。不过，有些屋主慢慢增建了铸铁大门，并且在外墙涂上灰泥，甚至贴上大理石。天然气、电力与自来水的管线逐渐接通，但水仍然必须由卡车运送而来。卫星天线倒是随处可见。

“这里是个居住的好地方，因为这里是当今的乡村移民买得起房子的少数地区之一，只要他们花掉许多年积蓄就可以。”亚法·阿萨迪说。他是尔撒圣殿的居民，现年四十岁，经营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这里共有三家房地产经纪公司，看起来虽然不像是这里会有的企业，却是这座落脚城市灰尘弥漫的主要街道上最明显可见也最成功的商业形态。“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小商人或工匠，或是自己接活的建筑工人、机械工、技师。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乡下地区，是农夫的儿子——他们学会一项技术，就藉此为自己争取都市化的机会。”他一面喝茶，一面对我说。这里的地价一开始非常便宜，只要一千五百美元就可以买到土地，再一千五百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栋小房子。这么一来，就可以把家人接来同住。2000 年左右，这些房屋的售价已涨到三千至四千美元，现在更高达两万美元。“目前生意很好，”亚法说，“搬到这里的农夫之子当中，有些人运气比较好，也利用自己的房屋创业。早年迁居这里的人都过得不错，晚一点来的就比较辛苦。”

二十八岁的苏荷拉在 2005 年从伊朗西部偏僻的卢里斯坦（Luristan）来到这里，她就完全没有这种乐观的心态。我们在一家门可罗雀的咖啡馆顶楼坐了下来，她的眼睛盯着地板，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因愤怒而涨红着脸。“我的父母放弃一切，就为了到这里来，还把赚的钱都攒了起来才总算把我送进大学，”她说，“可是现在他们什么都没

有，没有工作，只有这栋沙漠里的房子。我和我的朋友在这里都很孤单，学校里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们当初得到的承诺那么多，结果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她身材娇小，总是腼腆地避开别人的目光，戴的头巾仅仅符合法律的最低要求，是一条露出头发的鲜红色不良头巾，上一代的乡村移民绝对不可能戴这样的头巾。话说回来，他们也不可能发表对政府不满的言论。不过，我在这里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对艾哈迈迪·内贾德表达了已久的深切愤怒，因为他当初就是因承诺改善都市穷人的生活而当选。私底下，有些信仰虔诚的人也提及自己对伊斯兰革命的失望。

2009 年夏季，德黑兰这片贫穷的边缘地带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抗议发源地。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的胜选充满争议，在选举结束后动荡不安的几个月里，这里没有抗议游行，没有人在窗前悬挂标语，也没有占领建筑物的事件发生。这类事件主要发生在德黑兰中部与北部的中产阶级区——参与者都是学生，因为他们比较没有身家财产的顾虑(但仍有部分学生在抗议活动中丧生)。这里出现的是比较不那么明显可见的变动。在太阳下山之后的夏夜里，南方市郊的居民纷纷爬上公共街道旁的屋顶，同声缓慢念诵着:"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外人也许会以为这样的举动是在对政府表达信心与支持。实际上，这种行为在伊朗却是禁忌的异议之举：当初 1979 年的革命就有这种在屋顶吟诵口号的活动；上世纪 80 年代，这种行为在德黑兰南部的这些市郊小区里成了反过来嘲讽政府的举动；在 2009 年，这种现象更是蔚为常态，以致革命卫队巴斯杰(Basij)发动屋顶突击行动，对念诵口号的民众加以逮捕，甚至迫害。

尔撒圣殿的居民大多来自卢里斯坦的乡村或是伊朗西北部的偏远地带，有些是土耳其裔人口或其他非波斯裔的少数族群。先抵达的都

是男性，他们在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期间在德黑兰工作，在距离市区最近的市郊租屋居住。一旦存够了钱——或是利用家里的农耕收入——就到尔撒圣殿买地建屋。近来从乡下或是德黑兰市中心来到这里的人口，则只能租住这个偏远地区的房屋，而房租上涨的速度比收入增加的速度更快。有些原本的居民在这里住了不到十年，就为了把屋子里所有的房间租出去而搬回乡村，因为外来移民找得到的工作，薪资都比不上房租收入。

德黑兰的所有贫穷居民都知道这些边缘区域的房产价格为什么快速飙涨，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这座都市致力于遏止新区域出现，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措施。实际上，伊朗国内的研究显示，由于房价上涨，又缺乏新建的低价住宅区，以致劳工都被迫撤出市区，甚至在基础较为稳固的落脚城市也待不下去，只能涌入这些位于市郊边缘的地区——于是这些地区的房价也就跟着节节上升，远远超出新进乡村移民的负担能力。住在这里的临时工已逐渐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把家人接过来同住，也不可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伊朗的城市规划师泽巴达斯特(Esfandiar Zebardast)提出警告，指称德黑兰的边缘社区等于一颗定时炸弹。“城市土地使用的限制以及僵固的城市界线导致伊朗的都市规划系统无法跟着人口的快速变化而进行调整，基础建设的投资也不符合需求，以致城市的低收入人口外流至市郊边缘缺乏服务的地区。”他写道。由于这个原因，目前已有约五百万人住在非正式而且不受承认的社区里，例如市郊边缘的贫民窟——这个人数在德黑兰当今已扩增至一千三百万的人口当中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仍然持续上升。

在此同时，伊朗的经济又崩塌在这些人的头上。在国营的工业产业与有限的贸易及投资之下，与政权关系良好的精英工作人口虽然不

乏工作机会,新进外来移民面临的却是一片就业真空。根据伊朗商会的统计,德黑兰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而且半数都处于失业状态当中,此外,教育虽是常见的穷人翻身管道,这个管道在伊朗却几乎不存在——由这点也衬托出政府有多么漠视落脚城市的需求。伊朗每年的大学招生数只有十三万左右,应届高中毕业生却有一百五十万人。

这种种的因素——人口涌入都市、土地价格上涨,以及政府严禁人民使用未经规划的土地——在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同时汇聚的情形,当时伊朗的落脚城市因此催生了一场改变世界的重大变动。

沙漠中的火花

从尔撒圣殿的屋顶往北朝着德黑兰的方向眺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达一公里的荒地、建筑工地与脏污的路边工厂,接着则是一排排外表相同的现代化低价公寓大楼。这个地方曾经是德黑兰最外围的边界,现在却已成为市郊,居民超过四十万人,而且本身还有十几座外围小区。这里正是伊朗革命的起始点,也是促成革命最强大的原因。

埃斯兰夏尔(Eslamshahr)是德黑兰的第一座落脚城市,至今也仍是最大的一座。这里原本聚集了许多狭小的土墙建筑,后来慢慢由砖墙建筑取代,电力则是从城市的电力网非法偷接,水也是从主要水管接引而来。这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由外来移民向私人地主正式购买而来(但这些地主没有分割名下土地的合法许可)。这里在上世纪 70 年代已出现一万栋房子,接着在 80 年代更激增至数十万栋。从一开始,埃

斯兰夏尔就形成条理井然但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社会与政府，为往后的所有落脚城市提供了样本，不但独立于德黑兰的市政当局和伊朗政府之外，而且经常与当权者抗争。

传统上，媒体一向认为 1979 年革命的引爆点在圣城库姆（Qom）。当时霍梅尼在 1978 年结束流放而返国之后，就是在库姆连同其手下的教士对国王巴列维发起猛烈的抨击。另外一个引爆点是德黑兰中央的市集，因为那里的富有商人在虔诚信仰与反现代主义的愤怒情绪驱使下，大力支持霍梅尼的运动。不过，这些事件其实都是在革命早已展开之后才发生的，而且这场革命如果单纯只是清真寺与市集的暴动抗争，就不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事件。这场革命是在接近尾声之际才套上了伊斯兰教的宗教色彩，而且最初的动机与肇因也和宗教无关。这是一场落脚城市的革命，主要原因乃是城市的房地产。

伊朗国王在 1963 年展开白色革命促成经济的工业化，当时德黑兰只是一座小城市，没有任何大型的贫民窟小区，而且伊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还是乡村。往后十六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一项非常值得学习的教训，从中可以了解政府对涌入城市的乡村移民处理不当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伊朗国王本来的目标是要开创“一个繁荣、健全、识字普及、住宅充足而且广泛城市化（百分之九十）的社会……工业用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劳动人口”，但德黑兰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成了世界上外来移民人口最多的城市，城市化增长率比加尔各答、孟买、墨西哥市及马尼拉都还要高。1956 年，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伊朗人口住在城市里；到了革命前夕，城市人口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五十。在这场巨大的人口变动中，国家完全没有认真重视移民的未来，政府也完全没有采取措施促使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更根本无意承认落脚城市的存在。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伊朗国王把城市化的崇高意图变成了一

场自我挫败的灾难。

白色革命是伊朗国王为了预防红色革命而先发制人的举动，因为当时在他的认知中，他的政权面临的唯一威胁乃是左派势力，而不是伊斯兰教徒。他采取的做法乃是试图在短时间内把西方启蒙时代经历过的变化实现于伊朗。“你们都必须迈开脚步奔跑才能跟得上我，”国王傲然宣称道，“过往的经济与政治封建制度都已经结束。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将直接享受自己劳动带来的成果。”他这项雄心壮志本身并没有错；实际上，他追求的目标正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所应该致力于的：基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经济体系、高度城市化的人口，以及在农业体系中摒弃封建制度而改采大量雇佣劳动力的高密度粮食生产方式，由此提高乡下地区的生活水平。

这项计划首先就在乡下遭遇挫败。伊朗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乡村居民，而且这些乡村居民又绝大多数都是小农，借着手工耕种生产自家所需的粮食，并且向通常住在外地的地主缴纳封建式的佃租。关乎大多数人口的农业改革看起来似乎不难，重点就是重新分配土地，让农业成为一项产业。土地改革在1971年完成之后，明显没有达成目标。质量最好的土地约有半数掌握在公务人员或军官手里，不但没有重新分配给农民，也没有工业化成为具有生产力的田地。地主借着贿赂官员而让自己的土地登记为工业化农场，实际上却用于其他用途，不然就是直接盗领补助，或是把土地中最贫瘠的部分分给农民。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只有少数人实行资本主义农业，雇佣劳工、使用机器，以及购置生产原料，例如化肥。政府并未鼓励现代化的生产技术。”

到了20世纪70年代，伊朗已是个粮食净输入国，而且依赖程度愈来愈严重。粮食进口量每年上升百分之十四，因此到了革命爆发的时候，全国已有将近半数的粮食都是进口而来。刚获得解放的农民无法

与进口商竞争，因此对政府、银行与私人钱庄的欠债愈来愈多。这种现象导致大批乡村居民出走，每年都有好几十万的农民与劳工离开乡村。“许多人摒弃了住在洞穴般的泥砖屋里两碗饭加一罐酸奶的规律生活，转而追求不稳定的都市生活。不过，都市生活虽然不稳定，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工却至少领得到最低薪资，”学者萨拉夫（Tahmoores Sarraf）在回忆录里写道，“因此，这项策略不但没有增加乡下地区的消费，反倒减少了乡下人口与农业产出。”到了1978年，伊朗已有三百万名工作人口从乡下地区迁入各大城市，若再加上这些移民的家人，则短短十五年间从乡下迁出人数就高达九百万至一千两百万。

这些村民抵达城市的时候，发现的却是一场空。伊朗国王斥资兴建工厂以及推行城市改造计划的消息因为经过大力宣传而广为人知，因此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来到都市，却发现德黑兰根本不欢迎他们，而且他们连单纯要在这里住下来以及送孩子上学都不可得，也就不禁深感茫然。伊朗国王创造了工业成长与城市化的假象，虽然建立了国家汽车工业，兴建了光鲜亮丽的市区建筑与大学，对于这个新社会的实际人口在乡下或城市的生计却毫不在乎。结果，成人不识字的人数因此上升，从1963年的一千三百万人增加到1977年的一千五百万人。

到了1979年，德黑兰的五百万人口已有百分之三十五居住在贫民窟、占地自建的小区以及临时搭建的社区，其中一百万人住在城市边缘新兴的落脚城市里。这些数字不断成长。为了让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面貌，巴列维政权致力于把占地居民赶出市中心，驱往德黑兰外围无人注意的郊区，而且经常不惜强制驱离。德黑兰市中心虽然出现许多巨大的建筑计划，但兴建的都是大学、军营、汽车工厂、政府大楼、旅馆与机场，没有多少钱花在兴建住宅或发展住宅区，唯一只有北方的中产阶级小区。

“高房租形成一道障碍，使得大多数人无法进入大都市的中心区域。”伊朗社会学家帕尔萨（Misagh Parsa）在一份研究革命肇因的报告里指出，“因此，贫民窟也就纷纷涌现于都市的郊区。德黑兰的市区边缘至少出现了二十四座大型贫民窟，容纳了数千个家庭……这些贫民窟的生活环境非常糟糕。房屋通常由家庭成员自行搭建，而且他们都只能购买价格过高的黑市建材。饮用水由私人企业供应，价格是市区的七十二倍。百分之八十的市政预算都用于为德黑兰北部的富有居民提供各项服务，贫民窟则不论自来水、电力、公共运输、垃圾收运、医疗服务、教育及其他各种服务都极为匮乏。”

伊朗虽在石油价格飙涨的十年间成为世界上首要的石油出口国——或者该说正因为如此——其经济却出现通胀现象，而且未能产生新的工作机会。到了1979年初，一名伊朗内阁官员估计德黑兰共有七十万人从事着没有未来的工作，例如在街头贩卖口香糖。城市地价无日不涨。在1967至1977年间，德黑兰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超过百分之两千。1975年，为了控制土地投机行为，政府禁止出售空地，结果此举又导致问题更加恶化。到了1977年底，德黑兰每天都有三千五百个家庭必须寻觅栖身之处。在德黑兰南部，单人房平均住进六个人。在1967至1977年间，居住在单人房的城市家庭从百分之三十六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三；在革命爆发前夕，更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德黑兰居民住在不适合居住的住宅里，通常都是贫民窟内的单人房。

这些数字使得伊朗政府颜面无光。1977年夏季，伊朗国王开始以推土机做出回应。到了夏末，贫民窟拆除计划在埃斯兰夏尔遭到激烈抗争，社区居民拿起武器对抗警察和推土机。不少家庭全部被活埋在拆毁的屋子里，但这个社区颇有组织：重拉电线，重新规划新市镇，一面对抗政府，一面也愈来愈迫切追求各种形式的新政府。

学者宾德(Leonard Binder)于 70 年代末期待在伊朗，他在事后写道："我认为反对伊朗国王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他对反对势力的强力打压，而是因为他过于天真的现代化方案破坏了人民的平静生活，而把他们变成了政治活跃分子。伊朗国王一手造就了一股平民反对势力，也为擎起武器对抗政府的右派与左派极端分子造就了许多支持者。"

始于边缘的内溃

1979 年革命是一场深深植根于落脚城市的事件。伊朗政治学家法拉兹曼德(Ali Farazmand)指出："在 1978 年走上街头参与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的人士都是乡下移民……这些生活条件愈来愈糟的移民，正是初期在大城市里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人群。革命的发动者，包括宗教与世俗人士以及左派与自由派，都把焦点放在城市的贫穷人口，因此也就以这些乡村移民为吸收对象……宗教领袖与自由左派政治组织者不但吸收这些移民，也吸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跌落于贫困线之下的社会底层与下层中产阶级人口。"也难怪，在那个时候，德黑兰的劳动人口已有百分之九十四出生于其他地方，而且通常是乡村。即便在德黑兰的大工厂里，尽管劳工都是蓝领精英，其中百分之八十却也都是前农民或是农民的儿子。

伊朗百姓对国王发动大规模反叛并不令人意外，却没有理由会转变成伊斯兰革命。一项研究针对这场革命的社会起源进行了详尽的探究，结果指出："参与革命起义的绝大部分人士都没有在任何方面表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奠基于原教旨原则之上的社会。"密切观察了该场革

命的社会学家巴亚特(Asef Bayat)表示:“大部分的贫穷人口对于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都显然毫无兴趣。”就各方面看来,这场革命理当是一场自由民主派向土耳其式的凯末尔主义或欧洲式的自由主义发展。

不过,霍梅尼这名教士却以最打动人心也最有力量的说辞向乡下移民承诺为他们提供栖身之处——实际上,他在1979年初发表的演说当中,一再向所有德黑兰居民以及所有的农民承诺他们将可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场伊斯兰革命深深受惠于这个阶级的努力,这个贫民窟居民的阶级,”他在那年二月表示,“这些德黑兰南部居民,这些所谓的脚夫,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位,全都必须归功于他们。所有人都必须拥有土地。”此外,他还说电力与水应免费提供给穷人。他的手下对这项承诺深感惊恐,而求他只要实施农村改革就好,并且警告说这样的承诺将促使更多乡下移民涌入城市。不过,他知道自己如果没有获得贫民窟居民无条件的支持,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他的信息通过清真寺迅速传播了出去,这是自由民主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没有也无法复制的人员招募网络。霍梅尼一面承诺免费土地与住宅,同时也刻意隐匿这场革命的本质,利用民族主义与民主的语汇加以包装,面对世俗群众就满口伊朗革命与共和国的口号,对于伊斯兰政策则避而不谈。伊朗人民在1979年三月的公投当中把压倒性的票数投给霍梅尼的政府,当时一切迹象都显示民众以为自己投票的对象是个标举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政党,只不过该党的领袖恰巧是伊斯兰教士而已。

随着革命的神权政治色彩愈来愈鲜明,不但否决了共和宪法、赶走了抱持自由思想的总统、处决了他的许多同僚,又把霍梅尼拥戴为永久在任而且具有无上权力的最高领袖,丝毫不怕中产阶级的愤怒与幻灭,

因为他的政权已获取了人数远多于中产阶级的落脚城市居民的忠心支持。当初下令推土机夷平埃斯兰夏尔的德黑兰前市长尼克帕伊(Gholamreza Nikpay)遭到逮捕,在革命法庭上迅速受到判刑,随即交由行刑队枪决处死,于是落脚城市的占地居民也就获得了他们的正义。

社会灾难

穷人听到了免费土地的宣言——不只是德黑兰的穷人,而是全国的穷人——于是因此带来了后果。不到几个月,白色革命期间的移民潮就成了全球前所未见的庞大洪流。一时之间,仿佛德黑兰所有的边缘地区都成了众人可恣意竞逐的对象。短短几年间,德黑兰的人口就增长了一倍以上。

我在德黑兰访谈了身为城市规划师的米特拉哈比比。她亲眼目睹了这些事件,也向我阐释了这波人口大迁徙不可避免的原因:“革命说服了一大群住在德黑兰以外的乡间人口到德黑兰来,因为他们宣称住在德黑兰的人可以免费获得土地,至于原本就在德黑兰拥有土地的人则可获得房屋。这就是为什么德黑兰的人口那么快就从三百万成长为七百万。因为大部分人被灌输了这样的想法,认为革命政府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支持遭受压迫的贫穷人民,因此他们开始这么想:我们只要到那里去,就可以得到土地。我们可以没收或占据土地,再开始盖房子,然后革命政府就会将其合法化。”

由于这项压力,加上两伊战争的军费不断上升,又由于市郊居民明显对宗教意识形态或宗教法明显不感兴趣,因此这场革命在不久之后

就把打击对象转向这些来自乡下的支持者。1983年,在德黑兰的官员乞求他宣布紧急状态之后,霍梅尼认定人口迁徙是一大社会问题,必须加以遏止。这样的态度与当初吸引城市贫民支持革命运动的说辞乃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更是对这些移民人口的潜在价值的彻底误解。如同巴亚特所写的:"穷人把迁徙视为改善生活的手段,官员则视之为社会灾难,是除了战争以外最重要的问题,并且是,革命运动与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重大威胁。"

往后二十年间,伊朗政府通过了五项巨细靡遗的法律以管制城市土地,其中大部分的规定都是限制城市土地的使用与交易。如此一来,政府即对土地的使用取得了事实上的独占权,从而导致价格上涨。政府也利用石油收入推行大规模公共住宅兴建计划,而且几乎全都盖成了苏联式的公寓大楼。不过,这种廉价住宅只提供给获得企业或政府全职雇用的员工,这项条件就排除了百分之六十的家庭。

如此一来,德黑兰的落脚城市居民被迫只能自求生存。这次带头的又是埃斯兰夏尔——他们自主成立了自己的行政组织,专为这个市区组成一个务实的市政府,对于当权的政府视而不见。年轻的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致力于把中世纪般的蜿蜒小巷改建成笔直宽敞的街道,工程师则努力改善这座城市的电力与供水系统。1986年,埃斯兰夏尔发布了该市的第一套发展计划。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黑兰政府为了遏止扩张,而把埃斯兰夏尔转变为正式的法人城市。埃斯兰夏尔的居民人数将近四十万,因此随即成为伊朗国内的前十大城市。这项举动产生了两个效果。第一,埃斯兰夏尔的地价因此飙涨。第二,对于许多打零工为生的贫穷居民而言,税金、水电费用、建筑标准及城市生活的其他支出已然超出了他们的负担能力。不久之后,埃斯兰夏尔也产生了其本身的落脚城市。阿

克巴·阿巴德(Akbar Abad)与苏丹·阿巴德(Sultan Abad)这两座新区域出现于其市郊之外,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不到一年,这两座村庄就都扩展成为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居民多达十一万人。

政府发动了一场庞大的贫民窟清除运动。单是在1992年夏季,就有两千栋住宅遭到拆除。占地居民与警方的冲突愈来愈激烈,令人回想起伊朗国王治下最动荡不安的那几年。埃斯兰夏尔发生动乱,出现了伊朗自从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暴动。其肇因乃是民众对政府调高郊区与市区之间的公车票价感到不满,因为落脚城市的居民大多在市区工作。尽管如此,这些抗议活动的反政府色彩却显得愈来愈浓厚。

伊朗政府无法压制埃斯兰夏尔外围的新兴落脚城市。现在,阿克巴·阿巴德与苏丹·阿巴德也已获得政府心不甘情不愿地赋予的合法地位。尽管如此,这两座区域并没有公园或学校,仍是灰尘弥漫的原始小区。我走访阿克巴·阿巴德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在一座庞大的小区里,众多的低矮土屋逐渐一一改建成四层楼的公寓建筑。这里的居民全部来自伊朗中部省份亚兹德(Yazd)的一个区。随着这些次区域逐渐取得合法地位,对于乡下移民也变得愈来愈遥不可及,其边缘也开始出现新的落脚城市——其中一座就是尔撒圣殿。

政府当初虽是借着向落脚城市居民承诺房地产所有权而得以掌握国家大权,但在内贾德执政期间却竭尽全力遏阻乡村移民定居于都市边缘。另一方面,为了避免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暴力冲突,政府也改采较为低调的策略,例如对城市郊区的空地大规模造林——摒弃武力,改由自然力量阻挡移民在这些地区落脚。这项做法的成效颇为有限。现在,伊朗已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德黑兰,市区内的居民多达八百万人,郊区人数恐怕更多。住在南部边缘的人口觉得自己没有管道能够融入伊朗社会,这种感觉确实其来有自:他们被迫只能永远生存在社会

的边缘。

在尔撒圣殿这类地区的街道上，这种现象已导致不满情绪渐趋高涨。乡村移民不再是过去观念中那种顺服、保守又信仰虔诚的民众。学者尼克帕伊（Amir Nikpay）与霍斯罗哈瓦尔（Farhad Khosrokhavar）从事详细调查之后，发现德黑兰的市郊居民对宗教政治深为反感。“这些年轻一代对于伊斯兰革命抱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尼克帕伊对我说，“他们不再是三十年前支持革命的那群年轻人了，这个世代对于革命价值观已毫无共鸣。他们仍然信仰伊斯兰教，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必须政教分离，而且政府的正当性不能来自宗教。”这是一个全新的市郊地区，城市化的程度丝毫不逊于市中心。这里的女性都在二十八岁才结婚，不再是 1979 年的十三岁；而且家庭也平均生育一点七个子女，不再像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七个子女。此外，这里也和市区一样，女性的教育程度高于男性。

伊朗政府一连串地重蹈当初国王的覆辙：把落脚城市视为威胁，而不是机会，也未能给予它们成长所需的物质或经济资源，却把注意力放在市中心的下层中产阶级，从而造成庞大的财富落差。政府虽然靠着石油赚进大把钞票，却无法为都市边缘的居民打通社会流动的管道。在这个外围的边缘地带，历史仿佛正在重演。这些富有耐性的保守民众并不愿为了单纯一句政治口号就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若是发现自己通往可持续的都市生活的路途遭到国家阻挡，那么他们的怒气就会再次爆发，并成为影响伊朗社会的核心要素。

佩塔雷,加拉加斯

发生在德黑兰落脚城市居民身上的遭遇,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都一再上演。也许从1789年的雅各宾党开始,起于富有中心的革命运动就都善于利用落脚城市居民的不满与挫折,将其转化为意识形态与人力支持的来源,但一旦获得权力之后就又再次抛弃这些社区。

最极端也最引人入胜的一个案例出现在委内瑞拉。该国在查韦斯上校(Hugo Chavez)于1999年当选总统之后即展开玻利瓦革命,承诺将建立一个专以落脚城市为关怀对象的南美政府。查韦斯政权把乡下移民聚居的贫民窟转化为政权正当性的象征,把都市边缘的居民煽动成一把革命的大火,从而在落脚城市里掀起了一场全新的危机。

要了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可以到佩塔雷(Petare)和当地的居民谈谈。佩塔雷是一座庞大的贫民窟,覆盖了加拉加斯谷地的上部斜坡一片密集的街道。加拉加斯的贫民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陡峭的一座小区。乡下移民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在这片理论上根本不可能居住的岩壁打造了立足之地,占据陡峭的斜坡搭建危险又昂贵的区域。

这里的居民——按照计算方式不同,人数介于四十万至九十万之间,从一开始就被称为查韦斯最热切的支持者,也获得了最丰厚的奖赏。墨西哥作家基耶摩普里耶多(Alma Guillermoprieto)指称这座贫民窟体现了查韦斯革命的本质:"佩塔雷……每平方英尺分布的查韦斯拥护者人数可能为全国最多,组织可能也最紧密。查韦斯充满雄心壮志的社会福利在佩塔雷推行的规模最大,因为他已将穷人化为他的实

质政党。因此,他的执政究竟成功或失败,都将取决于这座行政区域的居民。”

我们待会儿将会看到,这段话非常具有先见之明。委内瑞拉出现新式的落脚城市政策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石油国家出现大型落脚城市的时间比大部分国家都来得早。委内瑞拉是最早出现都市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在1961年已有百分之六十一居住在城市里。从1941至1961年,每年平均成长率超过百分之七,比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都要高。一如伊朗,委内瑞拉的政府也没有认真思考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就草率鼓励了超迅速的人口迁徙。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石油价格上涨为加拉加斯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于是政府也鼓励数以万计的乡村居民迁到都市,不但容许他们的土地侵占,偶尔会允许他们对自己占地自建的房屋取得所有权,藉此换取他们的选票支持。

委内瑞拉的经济几乎可说是城市转型的一大阻力。自1970年以来,粮食价格就受到《农业营销法》的规定,后来价格管制又在1974年涵盖了百分之八十的工业商品。除此之外,政府也对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财货补助,尤其是在粮食与汽油上(这项支出占了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七),并且实施严格的汇率管制。这些政策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持续不断,但由于这时已不再有大笔的石油收入充当后盾,因此政府也就不免债台高筑。这些严格的政策共同造成了几项后果:摧毁了农业产业、导致数十万人从乡村涌入加拉加斯,并且掀起高度通胀,从而摧毁了非产油经济。这么一来,又导致了两位数的失业率,就在市郊贫民窟的人口密度达到高峰之际带来一记重击。

1989年,政府为了取得紧急贫困贷款而被迫放弃石油补助,加拉加斯的贫民窟随即爆发长达数天的严重暴动,政府也发动强力镇压,形成加拉加斯事件。遭到士兵射杀的民众尸体都被抛弃在佩塔雷。这起事

件为查韦斯在 1992 年发动的失败政变埋下了种子，后来他在 1998 年当选总统也是因为落脚城市居民的支持。到了那个时候，佩塔雷急需国家的支持：加拉加斯无穷无尽的贫民窟已然不宜人居住，其纵横交错的污水道也对他们居住其上的山丘造成了伤害，导致道路崩塌，甚至有整座小区陷落于泥泞与粪便形成的河流当中。这些小区没有工作机会，犯罪也极为猖獗。

玻利瓦革命似乎正好切合落脚城市的需求，而查韦斯也相当幸运，发动这场革命的时候正值石油价格展开了长达十年的逐步上扬，使他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支持这场革命。到了 2003 年，查韦斯已确立了这场革命的招牌方案，也就是以城市贫民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服务计划。其中的关键方案包括为成年人口提供识字及技术训练课程的罗宾逊服务（Mission Robinson）与里巴斯服务（Mission Ribas），为贫民窟提供国家补助的廉价肉类、谷物及乳制品的梅考服务（Mission Mercal），在贫民窟提供免费医疗照护的小区服务（Mission Barrio Adentro），还有意图每年以十万间高质量住宅逐步取代贫民窟的房屋服务（Mission Habitat）。

在玻利瓦革命的头十年，无疑有大笔金钱投入加拉加斯的落脚城市，而且这些地区的居民也对他们获得的粮食、医疗与金钱补助深怀感激。但没过多久，这些社会服务即明显可见得对落脚城市最重要的需求毫无帮助：这些需求包括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以及晋升中产阶级的管道。佩塔雷的居民知道这些目标需要哪些手段才能达成，却从来没有人询问他们的意见。

他们随即意识到针对他们的贫民窟所推行的社会服务并未带来实际效果。免费的粮食与金钱补助虽然在补助期间减少了绝对贫穷的现象，落脚城市的居民却对于没有任何持久性的建设颇有怨言。有十五

万的房屋需要建造，但实际数不到三万五千，而且其中许多都是不合乎落脚城市居民需求的社会住宅公寓。政府从来没有为落脚城市提供机会，让其中的居民自行决定什么样的住宅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种长期投资从来不是政府致力于的方向，住宅方面的人均公共支出水平就不断下降，虽然查韦斯竞选总统期间也对此多有抨击，然而，这个趋势到了他执政的1999至2004年间仍然没有改变，总共下降了三分之一。

至于教育方案，广泛的研究显示文盲比例并未因此下降。作家罗森博格(Tina Rosenberg)走访了佩塔雷附近的一座贫民窟之后，对于里巴斯服务的运作方式深感讶异："里巴斯官员告诉我说，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训练是教师最重要的资格。在拉维加附近有一座接近山顶的贫民窟，叫做拉斯托勒斯，我在那里旁听了一场里巴斯的课程。官员向学生说明了注册方法与课业要求之后，地区协调员玛丽亚·库维洛接着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讲述一场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公投……事后，我们一起搭车下山。她下车的时候，我向她道谢。她的回应是：誓死拥护祖国！"

2008年底，佩塔雷终于起身反抗。连同其他许多贫穷的都市小区，佩塔雷也与革命运动反目成仇，不但在地方选举中让玻利瓦革命的候选人落败，也对社会服务的失败发动抗议活动。佩塔雷的国会议员查孔(Jesse Chacon)是查韦斯的知名盟友，就在选举中败给了社会民主派的反对党候选人欧卡利兹(Carlos Ocariz)。"许多人都对一再重复的老套厌烦了——该是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三十一岁的选民阿勒斯·艾格特说。他先前原是查韦斯的热切支持者，后来由于落脚城市未能发展成繁荣的小区而深感失望。"大家都不想再过贫困的生活了，"欧卡利兹对记者说，"这是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拉扯。"

基本上，查韦斯自己的革命方案，由志愿者和古巴的访问专家落实

推行，并以意识形态为其使命，经济或社会目标并非主要考虑。政府预算大量投入于补助消费活动，不但无助于改变基本条件，并且经常对有助于造成深层改变的方案造成排挤作用。因此，对于贫穷的乡下移民而言，这些方案并未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导致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在 1999 至 2006 年间，家里直接以泥土地面为地板的委内瑞拉住户比例几乎三级跳，从百分之二点五上升到百分之六点八；家中没有自来水的家户比例从百分之七点二提高到百分之九点四；体重不足的婴儿比例也从百分之八点四增加到百分之九点一。查韦斯虽然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上却减少了卫生、教育和住宅方面的公共支出比例，比起他发动政变之前的那几年还不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根据他的政权本身的估计，社会不平等在革命期间反而增加。有人将这场革命称为空虚成长：尽管石油主导的经济在查韦斯主政的头十年里每年呈百分之九增长，却未能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委内瑞拉的工厂有半数在 1998 至 2008 年间倒闭关门，主要是因为价格与外汇管制导致他们根本不可能做生意。

这项观点也获得沙德(Edmond Saade)的进一步证实。他是一位支持政府的学者，在加拉加斯经营资料研究公司(Datos)。在查韦斯掌权几年之后，他发现："虽然在加拉加斯周边的落脚城市改善了许多，购买力也提升了……(但是)由于他们的住宅、教育程度与社会流动性没有获得改善，所以也就无法成为经济体系的利害关系者：查韦斯政权——只是把大量的石油财富投注在各项服务与社会方案里。"碰巧在心生不满的政权支持者眼中，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与先前的政府完全没有两样：把靠着石油赚取的钱财注入经济，导致通货膨胀，摧毁贫民窟的创业机会，并且借着施舍都市边缘的居民赢取选票，而无视他们的真正需求。"玻利瓦革命虽然提出各种革命诉求，并且削减了民主制度，"经济学家

戈尔(Norman Gall)在一份令人赞叹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却显然只是延续着近数十年来导致委内瑞拉人民陷入贫穷的做法,亦即大量挥霍石油收入、缺乏组织以及失败的投资。”玻利瓦革命展开十年之后,这场南美洲落脚城市的第一场大革命已然失败,未能向乡下移民实现先前许下的承诺。查韦斯在支持度起伏不定的情况下,把注意力转向没收外资公司并将其国有化,完全忘了他当初承诺的住宅、发展以及贫民窟的繁荣。在佩塔雷,时间仿佛陷入了停滞。

穆兰德,孟买

我们在第二章见过的桑杰,在一年一度前往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村庄的返乡之旅结束后,又回到了孟买东北部位于穆兰德(Mulund)火车站外一条繁忙街道上的小茶店,晚上仍然睡在茶店后面那间大概只有两公尺宽、三公尺长的水泥房间。这里是个热闹繁荣的区域,贫民窟与下层中产阶级的公寓拥挤于一处。到了晚上,这名瘦小沉默但充满决心的二十岁青年和其他四名年轻人一起睡在小房间的地板上。桑杰的家当只有一条棉被、三套换洗衣物和一些证件,全都堆在房间的角落里。他平均一天的收入勉强只有一美元,这些钱全都寄回家乡的村庄。他在店里吃饭,空闲时间也几乎都待在店里。他每年只和家人见一两次面,都是在稻米收成季节或重要节庆的时候。这样的人生似乎相当脆弱而不稳定,也极为孤单寂寞。

不过,茶店隔壁的另一栋狭小建筑却仿佛是桑杰的另一个家,不但带给他温暖,也为他提供福利保障及人身安全。这里是个看起来颇为

古怪的地方，建筑正面的木墙板漆得像是漫画里的石庙入口，而且悬挂着旗帜和横幅，上面有个老虎的图像。这里兼具了社交俱乐部、会面地点、就业中心与福利办公室的功能。这里保障了桑杰的工作稳定，他可以在这里取得小额贷款以支付往返孟买的车资，并且在贫民窟的社交网络里取得自己的地位；以后他也可以在这里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或是找到贿赂对象，藉以取得摆摊做生意的许可或参加技术训练课程的许可。有一天，他和他的家人一旦真正成为都市人，他就可以在这里找到质量较佳的贫民窟住宅，获得污水管线的连接服务，并且和这里的人一起串联捍卫自己的家园，以免他们的贫民窟遭到中产阶级小区的扩张发展而拆除。此外，他在这里也最有机会对自己房屋底下的土地获得所有权。为了取得这样的同志情谊和支持，桑杰日后一旦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必须为这个组织捐助金钱，在选举期间参与竞选活动，在抗议或占据活动上出一份力；落脚城市一旦再次爆发动乱，他也必须愿意以暴力打压宗教及语言方面的少数族群。

这栋建筑是湿婆神军党的地方党部。湿婆神军党的党员多达好几十万，桑杰也是其中一员。这是一个种族运动团体、一个政党，也是一个犯罪组织，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掌控了这座城市。在这个期间，湿婆神军党已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性质、氛围，乃至城市的名称。在孟买各地，尤其在各个贫民窟里，总共分布了两百二十四个湿婆神军党的地方党部与一千个办事处，是各式各样活动的组织据点。这些活动包括社会工作、住宅援助、勒索及强取保护费、竞选活动，乃至暴力攻击非印度教的街头摊贩与胆敢在招牌印上英文的商店。这些激进行为都以捍卫马拉地语印度教徒的权益为名义，因此一般人也就把湿婆神军党视为一个深具威胁性的法西斯团体，不但让印度的世俗群众深感惊恐，也对穆斯林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暴力攻击。

不过，若把湿婆神军党单纯视为一个种族沙文主义的团体，就不免忽略这个组织在乡下居民涌入都市的人口迁徙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湿婆神军党不但是贫民窟的重要力量，也协助建立及维护了众多的落脚城市。今天，这些落脚城市不但是孟买的关键特色，其两千万人口更有半数以落脚城市为家。以湿婆神军党这么一个反对外人迁入都市的团体而言，其在落脚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许令人讶异。不过，在以暴力决定哪些人应被排除在这座巨大都市的落脚城市之外，哪些人又该获得邀请加入的过程中，湿婆神军党却成了人口大迁徙的典型政治运动组织：一个由下而上的法西斯团体，把乡下移民在都市生活中的艰苦挣扎以及稀少住宅资源的竞争转变为一项决定性的政治议题，不但足以塑造一座都市或一个城邦的命运，甚至足以影响整个国家。

孟买位于古吉拉特邦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交会处附近，前者以商业闻名，后者以农耕闻名。孟买向来是各种语言混杂的地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同住在一座都市里，以古吉拉特语和英语做生意，在职场与家中说马拉地语（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语言）和乌都语（穆斯林的主要语言），在街道上和商店里则通常说孟买印度语——这是印度国语的一种变异，其中有些词语和表达方式取自其他语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孟买繁荣的棉花产业吸引了数百万贫穷的马哈拉施特拉农夫涌入都市。印度在1960年决定根据语言分别而重新划分邦界之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范围因此扩大，并以孟买为首府，于是农夫涌入都市的情形又更为踊跃。许多马拉地语移民以为邦界的重新划分将可让他们成为主要阶级，却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的地位没有改变，虽然人口众多，却不是多数族群；不是最富有的一群，也不是最贫穷的一群；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当中更是和别人一样饱尝失业之苦。

社论漫画家萨克雷(Bal Thackeray)在1966年以一场公园里的抗议集会创立湿婆神军党,当时他愤怒与不满的对象乃是他的印度教徒同胞——他宣称来自古吉拉特及其他北方各邦的人口涌入孟买掌控企业,来自坦米尔那督(Tamil Nadu)及其他南方各邦的人口则攫取了孟买所有的白领工作。湿婆神军党的志工开始纵火焚烧南印茶店以遏阻这种外来人口的入侵,并且发动游说运动,要求限制土壤之子(这是他们对马拉地人的称呼)担任白领是一场反少数族群的运动,带有鲜明的中产阶级色彩,发起者同样也是都市里的一个少数族群,尽管人数众多,但和其他群体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外来入侵者。

不过,这场种族权利运动却在不久之后遇上了落脚城市的问题与机会。到了1965年,由于迁徙步伐不断加快,孟买出现了三千座以上的贫民窟,贫民窟的居民和街道上的游民也超过了一百万人。这个时候,他们首度被视为都市福祉的一大威胁,也首度成为一群具有关键力量的选民。对于落脚城市的居民而言,他们最迫切关注的议题就是可居住土地的稀少(而且,可居住的概念在孟买向来都是推到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以及如何才能取得这样的土地。这其实是土地占有权与住宅政策的议题,但湿婆神军党的领导者却轻易将其塑形为种族之间的竞争。20世纪70年代初期,该党开始进军贫民窟,募集乡下移民的“达达”(dada-即地方党部领导人,字面意思为大哥),派遣他们去侵占公共土地——一方面为迁入孟买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村民创造新的落脚城市飞地,另一方面也控制中产阶级住宅区开发者所需的土地,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付钱向湿婆神军党购买土地。

这些“达达”一面执行这种获利丰厚的特权,一面也在较为个人化的层面上成了真正的“大哥”。对于说马拉地语的乡下移民而言,湿婆神军党成了他们唯一的抚慰来源,也是他们在都市快速扩张的混乱当

中唯一的秩序来源。执政的国大党采取尼赫鲁式的种族和谐政策，在孟买达成的效果也相当不错，但现在却成了贫民窟居民眼中的威胁。招牌政策包括强制生育控制与贫民窟拆除活动，而且该党几乎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乡下的发展，城市在其眼中仿佛只是个不得不处理的麻烦事物。这些政策搞错了乡村人口迁徙的重点，也未能注意到印度人民整体而言并不想过着大家庭的农耕生活，只是缺乏跻身都市生活的管道而已。国大党以乡下为焦点的政策导致移民人口困在一种不是乡下也不是都市的尴尬处境当中，于是为湿婆神军党创造了介入的机会。社会学家帕特尔(Suiata Patel)在她研究这段时期的报告中指出：

"典型的乡下移民已然断绝了与乡村社群的连接，却尚未融入都市工业文化当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仍然需要相当于"乡村社群"的人际网络，因此也就开始和其他贫民窟社群的成员交流往来，在贫民窟里形成一个个地区性、种族性及宗教性的团体……湿婆神军党采取在居民住处组织群众的策略，相当有助于动员这群贫困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男性移民。对于缺乏全职工作机会的贫民窟年轻男性居民而言，湿婆神军党就代表了家庭，其地方领袖则成了"父亲"或大哥哥。湿婆神军党给予了他们认同感，在他们"闲晃"于街角的帕安幸商店之际，为他们安排了各项文化活动。湿婆神军党汲取了他们烦躁不安的精力，也帮他们表达了不受都市承认的愤怒。"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萨克雷的政党已成了贫民窟里的固定势力，却没有获得任何可见的政治或人口利益。不过，萨克雷倒是因此成为一大明星，人称"孟买卡彭塞"，吸引了不少忠实支持者。尽管如此，他的政党却已逐渐失去动力。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马拉地语民众的生活都已有所改善，因此不再把南方移民与古吉拉特生意人视为威胁。萨克雷明白自己需要找个更大的目标，并且采取更耸动的做法。他在

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思想中找到了他所寻求的对象。印度教复兴运动是一项印度教至上运动，认为印度教徒社群才是印度正统的亚利安人族群后代。此一思想在语言和种族分类上的混淆与德国的纳粹主义如出一辙(这两项运动都受到同一名欧洲思想家的启发)，于是萨克雷因此获得一股力量强大的意识形态，孟买为数众多的穆斯林社群也直接成为他现成的敌人，贫民窟里的印度教徒居民更是从此成为他的忠实选民，因为他只要稍微加以煽动，即可让这群民众认定他们的穆斯林邻居是与他们互相竞争的"入侵者"。

从这场运动开始之初，萨克雷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希特勒的肖像，旁边则是一张孟加拉国虎张牙舞爪的图片。1984 年，就在湿婆神军党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势力，第一场反穆斯林的大规模暴动也横扫孟买之际，他在一场访谈中说明了自己的反穆斯林运动其实完全仿照纳粹的第三帝国："我喜欢部分犹太人，他们有种战士般的精神……可是希特勒发现他们不但是个堕落的种族，而且也不守规矩"。他理解到："我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我的国家就站不起来。你也许会谴责那种行为——甚至我也会谴责那样的行为。那不是唯一的方法，什么毒气室之类的。我不喜欢。但你还是可以把他们赶出去——这种做法是没有关系的。不要责怪他。他只是想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而且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萨克雷邀请古吉拉特邦的居民和南印的印度教徒加入他的运动，以印度语和马拉地语发行报纸，并且凭空挑起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穆斯林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敌人：他们根本没有侵占马拉地语族群的工作或教育机会，也没有涌入孟买窃取工作机会。穆斯林在孟买立足已久，不但与印度教徒不遑多让，而且两者共同生活在这座都市里也已有数百年之久。不过，孟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却出现了一股

不同的氛围。1982年一场灾难性的罢工迫使纺织业转往国外寻找工资低廉的地区，因此孟买的大纺织厂就此纷纷关门大吉。突然间，劳动阶级当中的下层成员沦入非正式的服务经济里，不但必须撤出单房的廉价公寓而迁往贫民窟，也不再享有终生稳定的职业，只能借着兜售物品做小生意谋生。这样的生活不稳定又令人不安，于是强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政治论调也就得以吸引他们的支持。

这种情绪在女性乡下移民身上又最为强烈，因为她们在纺织业兴盛期间通常保有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自称为"短期离乡的妻子"。现在，她们却成了永久的城市居民，全职从事家事服务与零售业等工作，而且通常是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原本男性色彩浓厚的湿婆神军党，突然间变得对印度教工作妇女颇具吸引力。湿婆神军党的地方党部也非常乐于吸收这股支持力量，于是成立了妇女支会阿嘉迪（Aghadi）。社会家阿特雷伊·森（Atreyee Sen）花了一年的时间在湿婆神军党的妇女组织里卧底研究，发现这个政党利用从乡下迁徙到都市的人口建构了一道仇恨的意识形态。

"贫穷的贫民窟妇女之所以加入湿婆神军党凶暴的种族民族主义组织，原因是这种组织为她们提供了庇护的作用，让她们不至于遭受孟买的都市化、工业化与迁徙活动等现象所造成的"烧灼效果"……在湿婆神军党内，他们觉得自己拥有"健全的人际关系"；社群共同体的感觉已经因为乡村人口移民都市以及都市内部的迁徙而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马拉地主义"……大多数的妇女都对乡村社群生活的那种活力深感怀念，也似乎重新拾回了她们传统的群体认同感。因此，"阿嘉迪"为贫民窟的妇女提供了融入新的社会与政治网络的机会，让她们在这样的网络中得以消除在都市中生活的不安与疏离感。"

另一方面，男性人口从乡村涌入都市的迁徙规模在20世纪80年

代达到高峰。对于这些男性人口而言,一种选择是加入湿婆神军党的暴力帮派,借着参与各种暴力、驱赶或破坏活动以换取该党提供的各种协助;不然就是活在对湿婆神军党的恐惧当中,也很可能遭到该党的迫害。"一般的青年,尤其是缺乏种族及地域人际关系的少数族群——这种族群的人数愈来愈多——都相当仰慕湿婆神军党那种都会化的凶悍形象,"一名曾在该党内部从事实地研究的学者指出,"这个组织就和孟买一样强悍。加入这个组织可让人学习这个都市的习俗并且融入其中……因此,这个组织为外来移民呈上了一个选择:第一个选项是完全融入……第二个选项则是彻底的排挤。"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湿婆神军党已得以将这种二分法推广为遍及全市的意识形态。自从1985年获得市政选举的胜利以来,湿婆神军党即控制了孟买的市长办公室,并且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陆续掌控其他都市。到了1992年,党员人数已成长至三十万人,比孟买的警察人数还多(当然,许多警察也是该党党员)。这股强大的力量,加上萨克雷与地方上"达达"的狭隘思想,造成了一颗一触即发的不定时炸弹。

1992年十二月,这颗炸弹爆炸了。导火线却是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在印度东北部的北方邦一个偏远的角落,十五万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集结而成的群众摧毁了历史悠久的巴布里清真寺。在距离遥远的孟买,传言指称穆斯林为此展开了报复性的屠杀行动。后来,湿婆神军党决定举办游行声援那些因为捣毁清真寺而遭到逮捕的人。游行的地点刻意选在达拉维贫民窟的狭窄巷弄里,因为这里的八十万居民包括了为数不少的穆斯林。有些穆斯林对此发出怒吼,结果萨克雷顺势宣布全面开战。他发行的《真理报》深受贫穷马拉地人的欢迎,当时这份报纸就一再刊登消息,指称一船船的武器已从巴基斯坦运抵印度

海岸。接着，在一月九日，就在紧张情势达到顶点之际，《真理报》的社论更煽动暴民恣意屠杀。这篇显然由萨克雷亲自执笔的社论指出："在班地巴札、努沃巴札、东格里及派丰尼这些我们称为小巴基斯坦的地方，穆斯林已经举起了武器，决意消灭印度斯坦。这些人必须被就地射杀……往后几天将是属于我们的日子。"

接下来的时间里，愤怒的印度教徒暴民将孟买笼罩在恐怖当中：上千人遭到火焚、枪杀、殴打及溺水而死，其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印度教暴民纵火焚毁许多小区以及穆斯林占多数的工业区，还把至少十五万名穆斯林居民赶出孟买。暴动结束之后，孟买的地理形势已永远改变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再也不可能像过去数百年来那样比邻而居。湿婆神军党控制下的印度教贫民窟成了"管制小区"，是穆斯林避之唯恐不及的地区。暴动结束后，穆斯林随即发动炸弹攻击，这是印度首次出现伊斯兰恐怖行动，而这样的循环报复也一路延续了十年。几乎一夕之间，这座全球文化最多元的都市突然变得充满隔离。

尽管官方的调查结果指称湿婆神军党是这一系列暴动的罪魁祸首，并且挑起了其中最严重的暴力冲突，但该党仍然从暴动当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直到 2008 年，湿婆神军党才有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内的三名党职人员遭到逮捕入狱。）在 1995 年的选举当中，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与湿婆神军党所组成的联盟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胜选，终结了国大党数十年来的执政权。他们胜选之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把孟买的名称改为"Mumbai"——这是马拉地语和古吉拉特语的印度教徒传统上采用的发音，操持乌都语的穆斯林以及英语或印度语的民众（印度语民众包括了大部分的宗教少数族群）则惯于使用原本的。于是，这座都市就连名称都充满了隔离意味。接着，湿婆神军党又利用其执政权力创造实体上的隔离。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受害居民虽然想

要重建他们的贫民窟住宅，却遭到湿婆神军党掌控的市政府的阻碍。这些政府对不忠于该党的小区发动贫民窟拆除运动，其中许多都是穆斯林聚居的小区。1998年，湿婆神军党加入印度人民党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而得以进军国家层级的政治组织。由于全国民主联盟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相当宽容，因此湿婆神军党不但在孟买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暴力活动也不再受到惩罚。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湿婆神军党已取代了孟买的各种治理活动与公共服务——但服务对象仅限于该市的印度教徒居民。对于这些居民，重要的公共服务不再来自政府或公共部门的机关，而是直接来自湿婆神军党的政治组织及地方党部。“住在贫民窟里的湿婆神军党中阶政治人物，都被贫民窟的居民尊崇为他们的保护者，”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其中一名政治人物向居民承诺提供住宅，但不是因为他身为市府官员，而是因为他是湿婆神军党的地方党部领导人。他的政治地位还不如他在湿婆神军党内身为印度教徒领袖的地位来得重要。发放给选民的援助津贴来自湿婆神军党的经费，而不是政府财政机关……湿婆神军党在社会工作方面提供的服务包括托育中心、学校，甚至还为党员提供医疗协助。湿婆神军党的救护车穿梭于孟买的街道，新颖的车身与政府车辆的老旧模样形成强烈对比。”

桑杰·索卡迁居孟买就是湿婆神军党在他的村庄成立政党办公室所促成的结果。桑杰出生之时，他的家人对孟买根本一无所知。当时交通极为不便，而且他的家人虽然营养不足，家里种植的粮食却也还不至于让他们挨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湿婆神军党开始从孟买向外扩张势力，而在他们的村庄成立据点，从此和贫穷的农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湿婆神军党员挖掘水井、兴建学校、修筑道路，也为“土壤之子”提供协助，全都是为了维系马拉地人与印度教徒的纯净。村庄里开

始发展现金经济之后，桑杰的亲人以及他们的许多邻居都开始到都市寻求工作。湿婆神军党提供了各项协助，因为其乡村办公室与落脚城市里的地方党部关系紧密。为了排挤异族，萨克雷的政党让某些乡村人口前往都市的迁徙活动变得更容易也更有效率，从而促成落脚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湿婆神军党采取帮派式的组织，又缺乏整体一贯的结构，因此孟买在过去二十年间对于疲软无力的住宅政策以及阻碍乡下移民小区成功发展的贪污现象都毫无作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暴力冲突因此成为孟买意识形态方面持久不变的特色。2001 年，古吉拉特邦北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发起一场屠杀行动，杀害了两千名穆斯林；孟买的湿婆神军党员也参与类似的活动，杀害七百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穆斯林。这种暴力现象在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执政期间仍然持续不变，直到该政府在 2004 年下台之后也是一样。湿婆神军党还是继续掌控孟买，但也逐渐出现了变化。2006 年，萨克雷的部分亲人因为对他不满而另组马哈拉施特拉复兴军党，宣称放弃印度教复兴运动的政治思想与湿婆神军党的“官僚组织”，而回归该党崛起之初为马拉地人争取权益的激进立场。复兴军党立即就在孟买获得庞大人口的支持，从而在 08 与 09 年促成反英文招牌的暴动，声势甚至可能超越湿婆神军党。不过，复兴军党的组织形态、策略与落脚城市的选民却都与湿婆神军党几无两样。

这种由移民人口促成的种族运动，彻底改变了这座全球最大的落脚城市大都会的政治情势。在这种情况下，落脚城市于是获得有尊严的待遇，因为以贫民窟为基础的湿婆神军党让贫民窟居民得以享有土地所有权，也为他们提供了下水道及供水设施。不少具备足够资格的（印度教徒）贫民窟也获得了学校、诊所与公园等市政服务，而且不少措

施都合乎都市土地改革的最佳做法，把居民占地自建聚落转化为真正繁荣发展的小区。另一方面，在不属于那些特权族群的贫民窟里，各种最糟的情况如强制拆除贫民窟、以高楼大厦取代具有社会流动功能的落脚城市、对于基本卫生与健康需求的彻底忽视，以及犯罪帮派对各项服务的控制却持续不变，甚至更加恶化。这是一种危险的分裂式政治，具有掌控印度国家政府的力量。不过，印度各级政府如果从一开始就懂得重视落脚城市，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政治发展。非洲、南美与东亚各国的政府都应当仔细研究这项发展，因为乡下移民一旦遭到漠视，这种政治势力就会崛起以填补真空。

第八章

新城市与旧世界的冲突

空间的问题

金字塔小区,法国埃夫里

在巴黎以南一个小时车程处,可以见到一座座灰褐色的金字塔冒出于一条公路沿线的田野和森林里,犹如昔日科幻小说封面上的火星帝国遗迹。金字塔小区是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最大的一场建筑竞赛的产物,也是巴黎周围许多国家规划的乌托邦当中最具理想性的一座,当初兴建的目的在于为人数不断增长的法国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住处,因为政府认为这群人口想必无法忍受二战后极度拥挤的巴黎市区。然而,这些小区却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由一群特性完全相反的人口居住:为了成为都市居民而努力不已的来自乡下的非法裔劳工。一旦接近观看,这些金字塔就显得不那么梦幻,灰泥墙面布满雨水的痕迹,满是胎痕的水泥道路对于一万两千名金字塔小区居民没有带来多少保障,小区的中央广场则聚集着一群群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2005 年一个温暖的十一月夜晚,在其中一座广场的边缘,阿吉兹·弗恩关上他那间狭小商店的门扇。他的商店位于一座混凝土高塔的底部,夹在一间手机行和一家土耳其茶馆之间,店门口上方挂着一面生气蓬勃的招牌,上头的文字写着:二号:舶来品—食品—化妆品。阿吉兹是赞比亚人,现年四十六岁,身材魁梧,性情开朗,顶着一颗光头,全身的肌肤呈漆黑色,平日就在这里顾着自己的小店。这家店铺的墙面上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包括树薯叶、车前草根、非洲生发水、伊斯兰壁饰、汤锅、《爱探险的多拉》玩具、椰奶罐头、哈利熊软糖、瓦斯罐、接发发片、婴儿配方奶、公斤装的印度酥油、阿根廷腌牛肉、青豆与四季豆罐头，还有念珠。“黑人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阿吉兹的三十三岁继子尤瑟夫自豪地说。他比阿吉兹更豪爽，戴着银项链，穿着一件非常宽松的T恤，能够以各种语言招呼顾客，包括斯瓦希里语，德语、英语、法语更是不成问题。

金字塔小区只有这家商店。开店或经营各种小生意是落脚城市成功发展的必备条件，但在这里却是极度困难。这些公共住宅区没有多少空间可供私人使用。法国官方的规定更使得外来移民很难取得商用不动产的租赁权、营业执照以及信用贷款。购买公寓更是昂贵：这里的居民只能依照政府补助的金额租住房屋，除此之外几无其他选择。至于就业人口，三十岁以下的成人则可能不到半数；而且他们的工作地点都在金字塔小区及周围的埃夫里市以外，通勤距离相当长，通常是在巴黎另一侧的市郊工业区，搭乘的大众运输工具连巴黎市长都坦承“简陋得令人难堪”。

在这个星期二的夜晚，阿吉兹锁上店门，穿越光线黯淡的广场，向一群群不太自在的年轻人点头致意。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是他的顾客的孩子，每天晚上在父母回家之前都到广场上消磨时间。他沿着空空荡荡的人行步道走回住处，是一间中间楼层的公寓，位于一幢高大的金字塔内，和其他几幢颜色暗沉的金字塔一同矗立在一座水泥砌成的死水池塘边。

他的尖叫声回荡于金字塔小区当中。在前方一个熟悉的地点，他看到一股黑烟笔直升上紫色的天空。他迈开脚步，一面奔跑，一面发出痛苦的吼叫。他储蓄了数十年才买来的雷诺塞夫兰四门轿车停在路

边,引擎盖高高打开,引擎和车厢里不断冒出熊熊的火焰,浓密的有毒黑烟冲上数百公尺的空中,和巴黎市郊到处可见的蘑菇状黑烟融合成一团。在那个星期二夜晚,巴黎仿佛围绕在一个大火圈当中,只见贫穷的市郊高楼住宅区——即一般所谓的“市郊贫困地区”(banlieues difficiles)——有上千部车辆以及十几座政府建筑化为一团团的火焰。在2005年一段为期三个月的时间里,成群的愤怒青年纵火焚毁了将近一万部车辆和上百座建筑。法国政府因此宣布紧急状态,共有将近三千人遭到逮捕。国家认同的危机导致希拉克总统的政府陷入混乱,萨科齐则借机崛起。阿吉兹对这场危机非常清楚:在那年秋季,金字塔小区几乎每公里像是遭遇军事攻击一样,一队队的警察和暴动的青年对峙作战,空中满是一团团的黑烟。阿吉兹虽然知道这样的状况,却从没想到自己也会遭殃。

阿吉兹努力扑灭火焰,围在一旁的年轻人随即散去。他们消失在金字塔底部的阴暗空间里,但阿吉兹知道他们是哪些人。他拖着脚步走回公寓内弥漫着尿骚味的电梯,一面咒骂着那些年轻人。损失一辆车和其他受害者比起来也许没什么了不起,但重点是这项破坏行为所代表的意义。阿吉兹和其他许多和他一样的人都深切感觉到,这里已不再是个和谐团结的小区,他和他的邻居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已不再相同。

我在攻击行为结束后到他家找他。他的客厅宽敞明亮,最显眼的特色就是一部大屏幕电视和一组肥厚的大沙发。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他以颇为奇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当初虽然费尽心力才成为法国的一员,现在却不断咒骂这个国家:“我在法国的每一天,感觉就像住在一个大洞里,而且洞口上还盖着盖子。”他咒骂他的邻里和其中的建筑,也咒骂“外来移民”——这是他对那些年轻人的称呼。“那些外来

移民根本不晓得怎么在这里生活，”他说，“他们找不到方法好好在这里把孩子养大，所以就动用暴力。他们的状况让我觉得很生气。”

在外人耳中，这听上去有点奇怪。阿齐兹自己也是个移民。他在赞比亚的首度班珠尔市长大，原本在赞比亚国营航空公司的保安部门工作，后来因为公司给了他一个来到法国的机会，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抵达巴黎市郊。他之所以选择定居于金字塔小区，原因是这里的公寓颇为宽敞，也具有现代化的都市气息，而且同样的租金在巴黎市区只能租到非常狭小的住处。按法国的标准，他算是穷人；但以非洲的标准而言，他已算是富有了。他也寄不少钱回家供养他的另外六个子女。

另一方面，他咒骂的那些年轻人则根本不是外来移民。他们几乎全都出生于法国，深谙法国的语言和习俗，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和其他法国青少年几无两样，唯一的差别只有他们的住址、惯用的市郊俚语，以及他们的肤色。他们的愤怒不是外国移民的愤怒。法国本来就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其六千五百万人口有四分之一是外来移民的子女或孙子女，但法国社会从未因此出现紧张冲突。

2005 年的暴动也不是源自伊斯兰教徒的愤怒。那几个月的众多纪录，包括法国情报机构的调查结果，都显示没有任何穆斯林的讯息或动机渗入那些暴动活动。在法国出生的阿尔及利亚人后代当中，只有百分之四表示自己每年上清真寺的次数超过一次，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从来不上清真寺，可见他们和法国白人青年一样不重视宗教信仰。2005 年的暴动人士几乎全是法国公民，许多类似的研究也显示这些人的价值观与态度都和土生土长的法国年轻人没有两样，只是他们的“市郊文化”阻碍了他们融入法国的主流社会——实际上，这也正是暴动的重点所在。暴动群众与警方集体对峙的时候，经常都高举着自己的法国身份证。大众对于这场规模庞大（但几无发生致命事件）的暴动竟然没有

任何口号或讯息感到困惑不解，法国警方的情报机构也将这起事件称为一场没有领袖、没有宣言，也毫无组织的造反行动。不过，那些人手上的身份证就是他们的宣言，就是他们想要传达的讯息。这是一场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争取接纳的战役。

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们的父母和阿吉兹不一样，来到巴黎市郊以前原本是乡村居民。阿吉兹之所以称他们为"外来移民"，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来自乡下的移民，首度想要在都市定居下来。这正是金字塔小区及巴黎市郊各地绝大多数家庭所面临的状况。

如同其他五千万名欧洲人口，他们也是居住在落脚城市里。在2005年的秋季，这座欧洲落脚城市以极为猛烈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北非移民的子女成年以来，法国的市郊地区就经常发生暴动及暴力冲突。不过，这次的暴动却是此项发展趋势的终结：法国把一整个世代的未来彻底斩断，阻挡了这群人进入都市以及返回乡村的道路，于是数以千计的年轻人便以他们懂得的唯一方法做出反应。

长久以来，一般人常把巴黎市郊的小区以及西方世界其他类似的小区称为移民聚居地或少数族群飞地，并且将这些小区的缺陷与动乱视为种族隔离造成的结果。不过，只要从落脚城市的角度加以检视，即可发现金字塔小区及其他类似小区的特色其实不是种族孤立，而是极度的异质性。

社会学家华康德曾旗帜鲜明的证明法国的市郊小区完全不是像传统美国黑人聚居地那样的种族隔离地区，而反倒是一种"反种族聚居地"，其中居民的种族极为多元化——而且他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些小区是"高度边缘化"的地区，一直无法形成种族或其他任何形态的

社群。这些地区的特色就在于只有中度以下的种族隔离程度，而且缺乏任何人口的一致性或是文化的团结性……这些地区的居民所提出的要求主要都在于社会方面，重点不在于差异性或多元性，而是各种待遇上的平等对待、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乃至住宅与医疗。这些要求都是关乎公民权益，而不是种族身份。”

在暴动期间担任内政部长，后来又以强硬对付汽车纵火行为的铁腕作风赢得总统大选的萨科齐，对于这种现象所采取的做法就是投入更多警力维持治安，并且试图限制外来人口的迁徙，因为他认为乡下移民根本上就不可能受到都市的同化。然而，其他数以万计的法裔非洲人在法国以外寻得良好的营生，就足以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欧洲的落脚城市不是同构型的地区，欧洲大陆上有不少发展成果与繁荣程度冠于全球的乡下移民小区。即便在巴黎，市中心的贝尔维尔（Belleville）原本也是属于遭到拆除或遗弃而兴建成市郊住宅区的地方，今天却被视为一个由企业家精神带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混居其中的北非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口、东欧人口与亚洲人口都过着繁荣兴旺的生活，也顺利晋升为中产阶级。

法国的落脚城市不是种族聚居地。例如金字塔小区这个典型地区，就不但有大量的非洲人口，也有为数颇多的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土耳其人、埃及人与东欧人。阿吉兹店铺隔壁的那家土耳其茶馆是由一名成长于布列塔尼乡村的法国白人女性经营，在金字塔小区也有不少像她这样的人。这名茶馆老板娘虽然不觉得自己被困在这里，但这里的许多居民——分别来自三座大陆的十几个不同国家——都是从贫困的乡下地区来到这里，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子女被困在乡村与都市的半途上，进退不得。

乡村居民来到法国的都市郊区之时，都会遇到一种状况。市郊地

区的过渡文化是乡村与都市生活交融的丰硕文化，却冻结在初期的阶段，无法进展为恒久的成果，无法成长为对国家的经济与文化有所贡献的元素。这些地区的父母都顺利达成第一阶段的发展，一脚留在乡村，一脚跨进都市，一面从事低阶工作，一面寄钱回乡支持家人的生活。不过，他们却无法依据正常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无法经营小生意，无法购置自己的房产，无法融入都市社群，只能维持着孤立的状态。他们的子女虽然彻底受到都市文化的同化，却被困在原地难以脱身——部分原因是种族歧视，导致他们只因为自己的姓氏或邮政编码就无法取得工作或高等教育。不过，在这种"邮政编码种族歧视"的背后，乃是这些地区的现实状况：由于市郊地区的所在位置及其习俗制度，导致村民根本无从进展到下一阶段。一般通常把这种现象误解为文明冲突或欠缺同化的结果，实际上的原因却是乡下人口转化为都市居民这段过渡进程的停滞。

"问题是这个社会引导这些孩子把自己视为外来移民，"阿吉兹对我说，"法国需要他们，法国需要有人从事这种清洁与营造的工作。于是，他们就被困在金字塔小区，因为这里就是这个社会安排给他们的去处。他们的子女什么都没有。他们在这里出生，精通这里的语言，也具有工作能力，可是他们没有工作可以做。金字塔小区不是为了非洲人兴建的。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没有成立市集的地点，没有任何能够让乡村人口用来创业的东西——我觉得这里的建筑非常漂亮，问题是这里的年轻人一点都不尊重这座小区。他们抗拒这座小区，抗拒警察和政府，现在甚至也开始抗拒像我这样的人。"

在相隔两座高塔之外的地方，我另外访谈了一名充满自豪的法国空军退役军人。他名叫巴迪恩，出生于距离达卡十五公里处的一座小村庄，但在非洲与法国的大城市里接受教育。他对金字塔小区大部分

的非洲家庭更是表达了深深的挫折感。

“这些村民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就像巴黎人也觉得我很陌生一样，”我到他位于小区中心对面的小办公室拜访他，他语气平静地坦承，“塞内加尔人听到这里发生暴动，只觉得一头雾水——那里的乡村居民一旦搬到城市，就都变成了成功人士。那里的人际关系太紧密，不可能发生像这里这样的事情。在这里，他们的村民身份就是不会改变。”

奇怪的是，纵火焚毁阿吉兹车辆的那些年轻人也抱持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观点，认为暴动的肇因就是他们的家庭无法顺利从乡村人口转变为都市居民。2005 年的暴动群众绝大多数都是乡村移民的子女和孙子女。针对那年秋天的事件所进行的分析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但在暴动人士自己对那场暴动的认知当中，这点却是最主要的因素。我在事件发生后数周乃至数年期间里访谈了金字塔小区、克利希苏布瓦与四千城(Cite des 4000)等地的暴动人士，他们最常提到的都是从乡村生活过渡到都市生活的问题，以及阻挡他们达成这项转变的障碍。

毕竟，这场暴动乃是起于非洲村民的两名法国孩子的死亡事件——但大部分的报导都没有提及这两名死者的身世背景。2005 年十月在克利希苏布瓦为了逃避警察而躲进变电站，结果触电身亡的这两名男孩，都是人口大迁徙的直接产物。十七岁的吉耶·班纳是阿莫·班纳的儿子；阿莫在 1966 年从突尼斯杰尔巴岛的一座农村来到巴黎，从事清理下水道的工作。至于十五岁查欧赫，他的家人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毛里塔尼亚南部的沙漠村庄狄亚圭里来到法国。

有一名暴动人士对这起触电死亡事件的消息反应极为激烈，而且可能也涉及纵火焚烧阿吉兹的车辆。他是十五岁的马弗德，虽然身材削瘦，外表看起来慵懒亲切，实际上个性却极为强悍。他的父母来自马里共和国卡耶司市附近的一座村庄，当地因为沙漠化而导致土地无法

耕种。他的父母都在夜间工作，分别为劳工与清洁工，而他也很少见到他们。他说自己是个迷失的灵魂，白天在巷道里听饶舌歌手的歌曲，一面抽大麻一面和其他青少年闲聊打屁——话题通常围绕着他们付之阙如的地理认同。“我们当初来自某个鸟不生蛋的小村庄，现在又摆脱不了这里的这座村庄——我家总共有十个人，住在两个房间里，我爸妈没办法像以前在乡下那样谋生，我也没办法像法国人一样找到像样的工作，”他说，“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欧洲人。”车辆是社会流动与成功的象征，因此对于马弗德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纵火焚车也就成了一种意义鲜明的举动。

再经过几栋建筑，可以见到经常在广场上闲晃的穆萨·桑巴克斯。这名体格壮硕的十九岁青年声称他已和这里的街头断绝关系，即将离开法国前往伦敦，因为他已利用自己的职校学历在那里的一家旅店找到了工作——这种入门级的工作正是法国都市郊区的年轻人所无法取得的。社会学家曼库在 2005 年曾花了不少时间访谈金字塔小区的暴动人士，他说暴动群众约有半数都是像马弗德一样中途离开学校而沦入灰色市场的地下社会；另外半数则是像穆萨一样，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实用的技能，却对自己在法国社会中无法谋求良好的生活而深感挫折。

在暴动爆发前不久，穆萨的母亲阿莉玛·桑巴克斯带了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去探访她生长的村庄，是马里一个叫做马雷纳的小地方。她原本希望孩子们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归属感，因为她仍然认为自己有一天会搬回那里，只要等她赚够了钱，为家人买下比较大的房子即可。穆萨在村子周围走了一圈，只花了一个多小时而已。他见到了许多亲戚，大多数都住在小泥屋里，但他和他们实在找不到什么话可以说。他参观了一间教室，却听不懂课堂上的语言，对于当地的习俗也感到难以认同。“这些人是我的同胞，但我却不了解他们，”他说，“我因此了解到那

根本不是我的生活——我是欧洲人。”

从金字塔向外望，透过穆萨与马弗德的眼光，马里的村庄与巴黎大都会看起来都远在天边。不过，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原本的观点，也就是从乡村向内望：当初他们来到巴黎的时候，这些市郊地区在他们眼中看来是什么模样？这些村民为什么到这里来？欧洲的落脚城市为什么会陷入停滞？法国和整个欧洲为什么会涌入那么多的乡村移民？

穆萨的母亲阿莉玛在1984年来到这里，当时距离法国正式禁止外来移民入境已有十年之久。她的村庄里迁往巴黎的第一个人——这个头衔属于她先生所有——在移民仍然合法的时候就以劳工身份来到了巴黎。阿莉玛的家庭因为迫切需要收入，而在她二十岁那年把她许配给这个只短暂见过几次面的男人，于是他们也就在法国结婚了。如同她那个时代来自非洲乡村的女性，她也不曾上过学；她的班巴拉语非常流利，但几乎不会说法语。她的先生在1991年去世，就在她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在金字塔小区，将近四分之一的家庭都是单亲妈妈的家庭，而她也从此成为其中一员)。不久之后，她就开始到埃夫里的另一个角落担任办公室清洁工。她把三分之一的收入寄回村里，剩下的用于饮食和购买学校用品，所以根本没有钱可供储蓄。由于她的工作时间是在孩子放学之后，因此年长的孩子也就开始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她的孩子等于是在金字塔小区的街道和水泥广场上长大，陪伴着其他处境类似的非洲与阿拉伯孩童及少年。在这个父母缺席的世界里，许多孩子沦为不良少年，其他人则是陷入怨恨和失落当中。

“到了这里之后，必须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一件事，就是乡村一点都不像大都市，”在一个星期日，阿莉玛在她整洁的客厅里这么对我说。她的客厅同样摆着一组大沙发和一部大屏幕的卫星电视。只要她在家，电视播放的都是马里的节目；她如果不在，孩子们都看美国节目。

“在乡村，就算你带孩子的时候还需要一面工作，身边也有大家族的成员可以帮你忙。如果遇到麻烦，也可以找到认识的人帮忙。在这里，却是什么都必须靠自己，结果只能任由孩子在街头上游荡。你知道这样不对，也不免担心。每一天，每一秒，我随时都在担心。”

许多法国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乡村移民直接把他们的文化与习俗移植到都市里，而且没有理解到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不适合公共住宅区，甚至会有危险，因为没有关系紧密的社群能够帮忙照顾小孩。不过，这些村民深知实情并非如此。他们之所以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出于绝望。正如阿莉玛·桑巴克斯的经历所显示的，她根本别无选择。

2008 年冬季，我在埃夫里的“女性时代”妇女中心和十几名来自乡村的女性安排了一场会面。他们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包括印度、埃及与非洲各国，而且大多数都几乎不会说法语。不过，她们全都强烈表示自己不想过着像乡村居民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在街头上长大。而且，她们也一致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论在建筑或经济方面都没有提供他们摆脱过往生活方式所需的人际网络与机会。她们是在绝望之下才被迫退出都市生活。

“这里的确有歧视的问题，可是一般人都没有意识到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居住的市郊地区，居民没有能够与法国社会连接的社会网络，”三十岁的伊丝娜·霍席尼说。她的祖父母是阿尔及利亚移民，也是这座中心的经营者。“在法国，要上学或者找工作都必须拥有人际网络——光是寄履历是不够的。这就是市郊小区的主要问题，缺乏人际网络。这个问题非常大。”

缺乏人际网络是市郊小区本身造成的结果，是这些小区的功能与环境规划带来的产物。像金字塔小区这种大型高楼公共住宅区的一项矛盾之处，就是这种小区都有人口密度低的问题。最理想的都市小区

和落脚城市——建筑物通常只有二到五层楼高，而且直接位于道路旁边，一楼都是店面——人口密度都非常高。把为数那么少的人口散布在一座孤立的住宅区里，又没有可供居民自行搭设建筑物的空间，这里的居民必然无法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市郊小区的居民以及推出这些住宅区的政治人物都对这种建筑特色相当清楚。“把金字塔小区兴建得密度这么低，而且又只有人行步道，等于是扼杀了那个地区真正发展为城市的可能性，”埃夫里的社会党市长瓦尔对我说，“那里没有市区，没有商店和小生意凝聚整个小区。看看那里的建筑规划，整个都是非常笛卡尔式的。”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非洲村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度来到法国的时候，他们都自行兴建自己的落脚城市。法国在战后著名的“光荣三十年”间，由于大幅的工业化与成长，导致劳工严重短缺，而对外来移民产生需求，于是政府在没有明确移民政策的情况下就大量吸引外国劳工移入。好几十万的非洲人口从不久之前才刚独立的前殖民地涌入法国。为了避免这些人口连同家人一起永久定居下来，法国政府兴建了许多供单身男性居住的宿舍。一如世界各地的例子，这样的措施不论在道德或实际层面上都是一大失败。

许多北非劳工都对这些宿舍视而不见，只自行建造他们自己的落脚城市，在法国若干大都市的荒芜地区建立市郊贫民窟。到了 1965 年，至少已有二十二万五千人居住在这类聚落里。这些自行兴建的贫民窟当中最著名的产物就是曾任内阁官员的作家拜格。他的童年就在市郊一座泥土地面的简陋聚落中度过。查巴位于里昂一条河流的河畔，是个人口极为密集的地方，就像发展中国家里那些欣欣向荣的落脚城市，是“一座由简陋小屋聚集而成的贫民窟，屋子皆由木板和铁皮屋顶盖成”。他的家人自从 1947 年就住在那里，直到那座城市在 1968 年

连同其他许多类似的聚落被夷为平地，才依循政府的安排搬到城市边缘新建的水泥乌托邦。

这些新兴建筑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大量冒出。在 1956 至 1965 年间，法国政府每年至少兴建三十万幢公寓大楼，其中许多都是为了应对战后婴儿潮带来的大量人口，另外有些用于取代贫民窟，剩下的则是提供新进工人居住。这些公寓大部分都是毫无特色的长方体，栋与栋之间留下相当大的空间。金字塔小区是比较后期才规划的小区，目的在于矫正先前许多规划上的错误，以便吸引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迁往这些市郊的新兴工业区。不过，当时工业已开始转移至其他地方，另一波的乡村移民也开始涌入。1974 年的移民禁令实际上反倒增加了乡村移民的人数，因为当时许多外来移民都因此急着把家人接到法国团聚。

政府兴建的新建筑不但干净整齐，租金又低廉；超过半数的公寓都附有厕所，也不会造成大都市的拥挤。不过，这些住宅区的规划却没有预留任何空间让未来的住户做出贡献，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公寓的住户不一定都会永远保持着“工厂劳工”或“外国劳工”的身份。这些小区所没有意识到的一项重点，同时也是许多规划住宅所忽略的重点，就是这些住宅的住户可能是身在过渡阶段的人口，正在从一种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的过程中。这些住宅区完全没有这群过渡人口所需的工具：没有购置房产的可能性，没有创业的机会，没有连接大都会的便利交通，而且又因为人口密度不够高，以致居民也无从形成互利互助的有机社群。

公民身份的问题

克劳兹堡，柏林

我们在第六章提过的萨布里，是个因为从事激进活动被捕入狱，后来却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土耳其人。他当初从锡瓦斯的偏远村庄抵达伊斯坦布尔脏乱贫穷的市郊之后，经历了三十年的痛苦过程。对于和他同样来自乡下的其他两百多万移民而言，这样的迁徙之旅不但同样艰苦，而且甚至还更遥远。他们抵达的地点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而是更往西行，进入欧洲的核心。伊斯坦布尔外围的土耳其乡村移民与柏林市中心的土耳其乡村移民当初展开迁徙的起点一样，时间一样，怀抱的远大志向也一样，却因为他们抵达的落脚城市各自不同，也就被塑造成非常不同的样貌。

埃拉拉·拜兰在 1979 年才十五岁。她出生于锡瓦斯附近一座贫穷的村庄，是九名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父亲是面包师傅。一个星期五的午后，她的父亲把她拉到一旁，告诉她说她已被许配给一个大她十岁的邻居。这个邻居名叫默罕，不是特别有钱，也不是特别有才华，而且他出身的家族又以粗暴闻名。不过，他拥有一件远比任何嫁妆都还要有价值的东西：德国的工作签证。不消说，藉由这项婚姻，她的家人即可在西方世界取得第一个立足点，从而可能逃离这个以阿拉维人与库尔德人为主的村庄，摆脱这里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严重匮乏。

他们家族里的几十人迁往伊斯坦布尔市郊的盖奇康都，埃拉拉却加入了两百六十万名土耳其人及其子女的行列，在往后数十年间努力扎根于德国的落脚城市。

她的旅程相当漫长。接下来的八年里，她在面包店辛勤工作，默罕则不断往返于德国与伊斯坦布尔及乡村之间，表面上是为了谋求较佳的工作以及努力存钱，最后才在1987年回国将他们的宗教婚礼转为合法婚姻。"我不想嫁给他，"埃拉拉对我说，"可是我很为我的家人担心。"那年稍晚，她跟着默罕前往法兰克福，因为他在那里的一家汽车零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埃拉拉抵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怀孕四个月，也才知道她的先生原本娶了个土耳其裔德籍女子，两人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这场婚姻直到一年前才结束。这下她才终于了解默罕先前为何一直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两头跑，以及他为何拿得到罕见的德国签证。不过，她终究还是接受了这段秘密的过往，而和默罕一起搬进了简朴的工人宿舍。接下来几年的生活刻苦但稳定——默罕虽然每天晚上都会喝得酩酊大醉，但土耳其移民劳工的紧密社群遏制了他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埃拉拉待在家里，抚养子女，利用卫星电视收看土耳其的电视节目，并且服从默罕的命令，只专心做家事，完全没有学德语。

后来，在她怀了第四个孩子的时候，默罕决定该要进展到在德国立足的第二阶段，搬出宿舍，住往克劳兹堡的土耳其移民落脚飞地。克劳兹堡位于当时的西柏林，是邻近柏林墙的一个破败小区。不过，土耳其人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涌入这里，原因是这里的公寓空间宽敞、租金低廉，而且屋主愿意把房子租给土耳其人——当时土耳其移民在大部分的德国小区都备受排挤。他们搬到那里之后不久，柏林墙即告倒塌，柏林的繁荣中心也随之东移，直接跳过克劳兹堡，无人关注这片贫穷的小区，其中聚居着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环保人士以及都市中的

其他各种次族群，包括西方都市里为数最多的土耳其人。

默罕之所以选择克劳兹堡，原因是他在那里有些亲戚，希望在那里能够赚到更多钱。另一方面，埃拉拉对于比较不那么滞闷的都市环境也充满期待。不过，她说："我们一到那里之后，一切就开始瓦解了。"没有了法兰克福那些邻居的关怀，她先生的酗酒行为随即失去控制。"他虐待我，手边有什么就拿来打我，还会威胁要杀了我，而且说得非常认真。"她回忆道。默罕在那里创立了一家小小的搬家公司，没有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税，但也经营得不尽理想。此外他又和秘书外遇，生下了一个孩子。

1998 年，他们的长女因为出车祸而永久丧失工作能力。默罕不想和这个"残废"的女儿有任何牵扯，在她于汉堡接受治疗的一年间，从来不曾去探望过她。现在，她住在柏林的一家疗养院。埃拉拉在 2000 年带着孩子离开了她先生，和朋友一起住在一家收容所的单人房里。默罕仍然经常威胁要杀了她。2001 年，她终于成功离了婚。两年后，由于家族里一场延续已久的仇怨，默罕在埃拉拉公寓外的街上杀害了自己的表亲，然后举枪自杀。"我一点都不吃惊，只觉得松了一口气，"她说，"我知道他有一把枪——他拿那把枪威胁我很多次了。他常对我说他要杀哪些人——首先是那个表亲，接着是我，然后是他自己。我和他结婚的二十年真是一场噩梦。"

我之所以引述埃拉拉的经历，不是因为她的故事骇人听闻又深为极端，而是因为除了最后那血腥的结局之外——这样的悲剧在克劳兹堡的土耳其人当中颇为常见，而且在德国各地的土耳其移民落脚城市也都是如此。就硬件环境，这些小区不该充斥这样的贫困与暴力。相较于法国的都市郊区，德国的落脚城市显然相当理想：位于市中心，与德国的整体社群和经济紧密相连，也拥有充分的社会服务。不过，克劳

兹堡却没有发挥落脚城市应有的功能。这里的许多居民不但没有融入德国社会与都市生活，土耳其色彩与乡下气息却反倒愈来愈浓厚，距离社会中心也愈来愈远。

克劳兹堡的官员指出，当地土耳其人口婚姻破裂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八十。也难怪：根据德国外交部的研究，德国的土耳其女性有高达百分之四十九都表示自己遭到丈夫的肢体或性暴力凌虐；四分之一直到结婚当天才与自己的丈夫初次见面，而且百分之十七表示自己的婚姻是被迫的——强制婚配在土耳其已迅速式微，但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却为了顺应移民政策而重新采用这种做法。在这里，酗酒与暴力犯罪的比率远高于德国其他地区，而且居民也都不会说德语。一项调查发现，在柏林的土耳其人口所生的子女当中，有百分之六十三在上学的第一年完全不懂德语，而且百分之八十的土耳其父母因为德语不够好而无法参与学校座谈会。2001 年的教育调查发现，土耳其儿童平均落后于德裔同学两年。在克劳兹堡的中心地区，位于科特布斯大门地铁站周围的土耳其人聚居地，超过半数的土耳其人口都处于失业状态。克劳兹堡的土耳其居民不论哪个年龄层，失业率至少都是德国人的两倍。而且，这些土耳其人也纷纷回头向宗教寻求慰藉：德国的成年穆斯林人口(其中大多数都是土耳其人)有整整百分之二十九会定期上清真寺，比欧洲其他地方或土耳其都市地区的比例都还高。

德国媒体已习惯将克劳兹堡称为平行社会或都市乡村，因为其中未能融入都市生活的土耳其居民仍保有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包括在浴缸里宰羊祭祀、佩戴头巾、强制婚配，偶尔还会对行为不轨的女性施加耸人听闻的名誉处决，而且这种行为也经常登上德国媒体。这种形象已导致德国大众与领导人对“土耳其文化”深觉反感，许多人也因此认定土耳其人是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不可能融入欧洲社会，甚至进一步

认为土耳其也不该被纳入欧盟。

不过，一如大多数的落脚城市，克劳兹堡并不是移民人口故乡的翻版。柏林的土耳其人被迫以夸张丑陋的形态呈现故国的生活方式，其所奠基的原始传统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早已不复得见，在土耳其国民眼中就和德国人的眼中一样陌生。配偶凌虐与强制婚配的数据，都远高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调查结果，但安卡拉的人口其实有一大部分与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来自同样的地区。土耳其作家顾格(Dilek Gugo)指出，土国女性迁徙至柏林之后，“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遭到婆婆强迫戴头巾，还必须和丈夫的家人同住在一间公寓里，而且德国的土耳其人口竟然比伊斯坦布尔的居民落后了二十年”。安卡拉学者欧加尤兹(Mehmet Okyayuz)在柏林住了三十三年之后才回到土耳其，指称柏林的土耳其人“困在时空隧道里”。

女性在伊斯坦布尔外围的占地自建小区过得比在柏林的土耳其人小区还好。尽管这两处小区在宗教信仰与思想方面都比大都市来得保守，但土裔德国学者厄祖克伦(eule Ozuekren)与卡拉罕(Ebru Lrgoz Karahan)针对这两处小区所进行的详尽研究发现：伊斯坦布尔市郊的妇女不论工作、教育或是和外界接触的机会都比较高；土耳其的落脚城市通常是通往解放的道路，能够协助其中的居民“从失败者翻身为赢家”，而德国的移民小区则通常导向相反方向。

土耳其人来到克劳兹堡的时候，都会遇到一种状况，导致他们冻结在早已消逝的土耳其乡下生活当中。这不是土耳其社会的先天本质，也不是土耳其乡村人口迁移欧洲的必然命运。在法国，几乎所有土耳其移民的第二代都精通法语。在荷兰，房产持有率和向上社会流动都普及得多。在伦敦与斯德哥尔摩，土耳其小区都能够顺利融入都市的主流社会。一项研究比较了英国与德国的土耳其人口，结果发现双方

虽然出身于同样的背景，英国的土耳其人口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踏上与英国本土民众相同的职业路径，轻易融入工作人口当中。另一项研究发现英国布莱福德的巴基斯坦人口能够轻易藉由经营小生意而跻身主流社会，但克劳兹堡的土耳其人口却因为许可制度及银行政策而难以创业。这些人口无法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他们的土耳其出身，也不是因为小区的环境规划。克劳兹堡没有法国都市郊区的环境规划与交通问题；而且，如同许多落脚城市，这里的外来移民也仅是少数，只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简言之，这里面临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隔离。

德国的落脚城市所欠缺的元素，同时也是其中的大多数居民无法真正在德国立足的原因，就是公民身份，包括法律上与文化上的公民身份。在德国社会里，土耳其移民即便繁衍到了第三代，也仍然被视为短暂的客居人口或是“外国人”，导致他们也这么看待自己。正因如此，不论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也就都无意对落脚城市加以改善。这种态度反映了土耳其人向来无法取得公民身份的现实状况。到了 2001 年，土耳其人移民德国虽然已有四十一年的历史，而且人数多达两百五十万，却只有十七万人取得德国公民身份。每年归化德国籍的土耳其人比例从来不曾超过百分之三，就欧洲的标准而言实在低得惊人。由此可见，德国不仅有一大部分的土耳其人经过了四十年仍然无法成为德国公民，他们在德国生养的子女和孙子女也仍然属于土籍人口，尽管其中大多数人根本不曾见过自己国籍所属的国家。当今仍有不少国家认为自己国内的非技术性劳动力需求可以藉由短期劳工方案获得解决，德国的经验可算是一记当头棒喝。

德国的政策显然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免造就失灵的落脚城市，其中的居民不但无法在都市中真正立足，也不可能返回他们原本的乡村。这种排他现象始于 1961 年，当时德国经济欣欣向荣，造成庞大的劳动

力短缺,来自德国内部与东欧的劳工又因为柏林墙的出现而大幅缩减。那一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一个招工办公室,为柏林的晶体管工厂以及莱茵河的汽车制造厂募集劳工。根据 1961 年招工协议,这些劳工一开始被称为"Fremdarbeiter"(外籍劳工),后来则为了忠实反映这项政策的目标而改称为"Gastarbeiter"(客籍劳工)。第一年募得的劳工约有一万人,抵达慕尼黑一座特别隔离的火车站,然后由雇主安置在厂区内。这些劳工都认为雇主届时会再提供车票送他们回国。

这些土耳其"客人"应当在德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返回故国。当时德国人与土耳其男性都普遍这么认为,而且绝大多数的土耳其劳工都把目标设定在四到六年内返回土国,最好能够借着这段期间赚得的钱购置房地产、开店或者创立小生意。只不过,雇主必须先对这些工人教导专门技术与基本的德语,这么一来就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接着,他们又发现与家人分隔两地会导致工人的生产力降低,于是不到几年的时间,这些雇主就纷纷设法规避招工协议的规定,让工人在这里定居成家。另一方面,如同世界各地落脚城市的先锋,许多土耳其男性也发现要返回家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他们的村庄已对他们寄回的钱财产生了依赖,他们本身在德国也发展出不少人际关系,而且对后续的移民人口而言,他们更是一股社会与经济上的助力。

1974 年,德国摒弃了客籍劳工制度,并且正式禁绝所有外来移民。在那个时候,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口共有九十一万人。客籍劳工约有半数返回土国,剩下的人则在新兴的落脚城市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德国并不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政府也完全没有对他们过渡到都市或欧洲生活的转变过程提供协助,反正就正式纪录上而言,他们根本不存在。

由于德国完全没有移民政策，因此也就注定了该国的外来移民都是前来与家人团聚的人口，而且都以乡村居民为主。在往后三十年的“无移民”期间，又有超过一百万名土耳其人口合法迁入德国，其中许多人的出身甚至比原本的客籍劳工更加乡下、更加保守、更加贫困。这些人口绝大多数都住在都市小区。到了2002年，德国的土耳其居民已达两百六十万人，其中却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以劳工身份移入。超过半数都是这些工人接过来的配偶和子女，而且还有整整百分之十七——超过四十四万人——是这些家庭在德国出生的子女。这群人根本从来不曾去过土耳其，顶多是少数人曾经到祖国旅游过，但却无法取得德国公民的身份。

一群人若是展开了无可逆转的转变过程，从乡村生活逐渐过渡到都市生活，但他们所处的国家又不许他们取得公民的地位，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克劳兹堡的街道上，即可见到这种情形带来的经济与物质后果。这座城市的边缘是德国人的聚居地，充满了波希米亚风情，到处都是商店与咖啡馆，其建筑规划正适合最典型的都市生活。不过，在土耳其人聚集的中心地区，同样的街道却一片荒芜，死气沉沉，只有偶尔一家孤寂的旋转烤肉餐馆，或是一间慈善商店，且街上丢满垃圾，完全不像条顿人的特色。由于绝大多数的土耳其人都无法取得公民身份，因此按照德国法律也就不得经营生意，所以这里创业人口的比例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土耳其人居住区。更糟的是，在1975至1990年间，合法居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又必须在护照里盖上无法抹除的戳记，称为“移民障碍”(Zuzugssperre)，禁止他们定居在克劳兹堡及其他土耳其移民飞地。这项政策后来以失败收场，因为歧视导致土耳其人无法在其他地方租住公寓，克劳兹堡的经济活动也因此只能维持着地下化与非正式的特色，无法在德国社会生根发芽。

卡金·厄多安仔细观察了这种现象。他是来自锡瓦斯地区另一座村庄的阿拉维族的土耳其人，1973 年背着背包来到这里。他没有工作许可，在牢里待了一段时间，等待遣返，后来却利用大学入学资格留在德国，并且在学术上获得了相当成就。现在，他开了一家社会心理咨询诊所，协助克劳兹堡的居民调适在德国的生活。“依我估计，住在这里的土耳其人有百分之九十五来自乡下，也仍然保持着乡下人的心智，因为他们当初听到的说法是自己会返回家乡，而且是必须返回家乡，所以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学习德语以及适应这里的生活，”他对我说，“唯一阻挡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完全不认为自己有理由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当初他们被告知的都是说他们可以存一笔钱，再搬回家乡，然后跻身土耳其的中产阶级。我猜他们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的希望，才忍受得了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境况。不过，这种心态也阻碍了他们成为这里的公民……迁徙到土耳其都市的人比较有机会达成他们追求的目标；在这里，我则是不断遇到一个个的活死人。”

埃拉拉·拜兰入境德国的时候，正值一段始于 1976 年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入境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都不满十六岁，其他人则几乎全是女性，而且都是和新郎没见过几次面的新娘。今天，她和她的四个子女住在克劳兹堡一条荒凉街道上的一间小公寓里。她平日都戴着头巾——但她那三个德语流利的女儿却都不戴。她十七岁的儿子是个辍学生，几乎不会说德语，埃拉拉担心他已愈来愈像他爸爸。她的四个子女都不是德国公民。“有三个想要变成德国人，可是我叫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土耳其出身——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家乡放在心里，”她说。但她所谓的家乡，对她的子女而言却是一个他们只在夏天到那里的海滩度假的国家。“这里不是一个适合他们展

开人生的地方,我都这么对他们说。我有一天会回去,只希望他们会跟我一起走。"

柏林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都把这种政策造成的奇特行为视为"穆斯林"的习俗——包括女性戴头巾这类象征性的举动,以及强制婚配或名誉处决这类较为骇人的行为。不过,这种行为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欧洲的政策所造成的现象:是西方世界制造出来的伊斯兰保守主义。举例而言,强制婚配在土耳其逐渐式微的同时却在德国兴起,乃是一种无可避免也不难理解的发展。毕竟,就在外来移民逐渐融入经济体系之际,德国却突然阻绝了所有的外来移民。"这些人不是天生就有保守的思想或虔诚的宗教信仰,"厄多安医师说,"可是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实行保守与宗教的立场。"住在德国的土耳其男性有半数都在土耳其找寻配偶,即便到了今天也都是如此。他接着指出:"许多年轻人虽然在这里长大,却必须到土耳其找结婚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公民身份,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找到妻子。而且,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女子,一定都是来自信仰比较虔诚也比较保守的家庭。"这些女性虽然最不具备在都市立足的能力,却必须在自己也没有公民身份的情况下在都市里生育下一代。

在21世纪初始,德国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人口和其他移民显然必须成为永久居民:由于生育率低落,到了2050年,德国人口数将由目前的八千两百万下滑到六千万以下,届时该国的退休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都将因此崩溃,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也将大幅降低。政府发现这些"客籍"土耳其人——其中许多都已在德国繁衍到了第三代——虽然本身是个问题,却也能够解决另外一项问题。2000年,经过二十年来毫无成果的国会争论之后,德国终于修正了1965年的《外国人法》,让外来移民在德国出生的子女能够获得归化的

机会。现在，这些归化者的父母只要在德国住满八年，而且具有合法职业，即可取得公民身份。此外，德国也首度采用出生地主义的概念，任何人只要在德国出生，而且父母拥有合法居留资格，就有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

然而，这项政策虽然立意良善，结果却和预期恰恰相反。研究显示，德国的土耳其人口顺利归化的比例在1999年达到高峰，就在新公民法施行的前一年。新订立的公民法实施之后，归化德国籍的土耳其人数却反而下跌，原因是这项法律里有两个表面上看似无害的法条，实际上却导致土耳其人口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首先，法律规定申请归化者必须受雇于合法的正式工作——当初如果在1961年实施这项规定，自然算是合理的要求；但土耳其人已花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在他们的落脚城市里建立灰色市场经济，因此现在这项规定反而迫使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放弃自己的生计，或者避免申请归化。第二，法律规定归化德国籍的土耳其人在年满二十三岁之后必须放弃土国国籍，但这项规定显然忽视了落脚城市的文化现实。落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一方面是移民人口需要这种连接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则是乡村也需要移民人口寄回的金钱。德国不是让外来移民的地位符合于他们既有的生活状况，而是迫使他们做出选择：一边是他们长久以来在没有公民身份的情况下所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尽稳定，但已切实可行；另一边则是彻底放弃这些人际网络与制度，以换取合法的公民身份。

这样的问题不仅见于德国，在波斯湾的国家与都市更是严重，迪拜尤其是最醒目的例子。在迪拜的一百四十万人口当中，只有百分之十七是该国公民，剩下的人口有四分之三来自印度次大陆，除了少数短期劳工之外，绝大多数都在迪拜居住了数年乃至数十年之久，不但已在当

地成家，与经济体系的关系也密不可分。然而，这群人却没有购置房产、寻求医疗、领取退休金或享受其他福利的合法权利，也没有任何诱因吸引他们成为纳税人、参与都市的文化与发展。随着经济成长速度趋缓，失业率逐渐升高，目前迪拜已有发生德国式危机的迹象。

德国的政策仍在变化当中，而且目前有一群包括国会议员与文化界及媒体界著名人物的土耳其人不断施加压力，所以往后也许有机会把德国的落脚城市转化为真正能够运作的实体，至少可让第三代的土裔德国人享受得到。像克劳兹堡这样的地方，原本应该可以在德国社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像伦敦的砖巷、巴黎的贝尔维尔、纽约下东区，甚至伊斯坦布尔的市郊地区。德国的土耳其人口对于这样的对比了然于心。“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塑造了他们自己的居住区，”厄祖克伦写道，“他们投资于自己的住宅，运用自己的政治力，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居住环境……并且在社会中向上流动；一旦迁徙至柏林的人口则是在同一个时期从简陋的宿舍或旅社搬到众多家庭共居的住宅里。”艾拉拉·拜兰和她那四个不算德国人也不算土耳其人的子女，就这么困在那间租来的灰色公寓里，不知何去何从。每当有人把他们拿来和伊斯坦布尔的市郊居民互相比较，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羞辱。

空间与公民身份

帕尔拉，西班牙

即便相对于巴黎的马里人与柏林的土耳其人所经历的艰困体验，

林塞奈丁迁徙欧洲的旅程仍然严峻得多。这项移民之举原本是不该成功的。

他在1999年从他位于摩洛哥北部瑞佛地区(Rif)的一座山上小村庄出发,当时他只隐约听闻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西班牙有着一片就业荣景,而且有人愿意赞助摩洛哥的居民横越丹吉尔与安达卢西亚海岸间十三公里旅程的费用。

林塞奈丁是他家族里第一个踏上这场旅程的成员,全村也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那个时候,尽管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已有上千年的交流历史,横越直布罗陀海峡仍是一种相当新颖的行为——直到20世纪末,西班牙一直都是个封闭社会,是移民的净输出国。海滩上的那几个男子在每一艘粗陋的木筏上塞进几十个人,但他们对于航海技术、洋流、天气或移民都一无所知。他们的船只挂着一具不可靠的舷外马达,收了钱之后就把人赶上这些船只,然后送他们出海。每年都有数百人溺死,在海上饿死或被太阳晒死的更多,不然就是盲目漂流,最后才在奄奄一息之际抵达陆地,而且登陆的地点一样都是在非洲沿岸。这里经常都可见到冲上岸的尸体。

林塞奈丁幸运抵达了对岸。不过,他爬上陆地,乞求路过的车辆载他北上抵达西班牙的中部平原之后,真正艰苦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这个他不懂得当地语言的国家里,他不只是少数族群,根本是极为罕见:20世纪90年代,在这个人口达四千五百万的国家里,摩洛哥居民的人数只有几万人而已。

对于林塞奈丁和其他许多新进移民而言,他们唯一找得到的工作就是摘草莓。他在工作淡季的时候总是睡在户外,在巷道及沟渠里,而且他的柏柏尔人血统也无助于他找到遮风避雨的地方。“我当时过着像野兽一样的生活,”他回忆道,“在那些年里,我们是第一波来到这里

的移民,什么都不知道。当时我们也没有贫民窟可以去,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自求多福,找得到什么就吃什么,赚的钱都全部寄回村里。”

落脚城市改变了他的命运。这个说话轻柔、性情活泼的男子首次向我述说他的经历之时,我们的谈话地点是在他的肉铺暨超市,位于一栋小公寓建筑的一楼,在马德里南部郊区的帕尔拉市(Parla)。他和几个同村的居民以及亲人住在附近,已经成为房产的所有人,也是活跃的西班牙公民,不但精通西班牙的语言与文化,而且都是欧洲经济当中贫穷但积极的参与者,有些人是企业家,有些人是雇主,有些人是学生。

不论就环境外观或原本的规划而言,帕尔拉看起来都像是金字塔小区的南欧双胞胎:一片四散蔓延的低矮公寓建筑,像海市蜃楼一样隐约浮现在满布沙尘的平原上,借助通勤电车与马德里市区相连。这里原本是个二次大战后的市郊住宅区,却在不久之后被大量涌入的乡村移民所占据。这里在1960年还只是个人口只有一千八百人的农村;到了1978年,已有三万一千名西班牙工厂工人住在这里;今天,这里的居民将近十三万人,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南美洲或摩洛哥移民及其子女。一如金字塔小区,帕尔拉的居民也有百分之八十都在外地工作。

尽管如此,帕尔拉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这里的街道不像埃夫里或克劳兹堡那样荒凉空寂,而是繁忙热闹,沿街都是摩洛哥人经营的商店与咖啡厅。这里的年轻人似乎都充满了目标;在到处可见的五层楼公寓建筑里,一楼店面的鲜艳色彩与各种自行搭建的建筑也为这座繁荣的落脚城市增添了不少趣味。这里许多繁忙的街道与广场,似乎都融合了摩洛哥城镇与西班牙都市的最佳面貌。

帕尔拉与法国及德国落脚城市的潜在差异,就是这座城镇的政府在初期就已意识到这里正逐渐发展成一座落脚城市,也懂得这项变化所带有的意义。西班牙的国家政府同样懂得这一点,部分原因是西班

牙出现外来移民大量涌入的现象，比法国及德国晚了四十年。因此，该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繁荣促成外来移民以创纪录的速度大幅增加——在1990年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到了2008年已达百分之九点六，即四百五十万人——但西班牙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天真地以为这些从乡村迁入城市的移民会自动转化为适应良好的城市居民，也没有像德国那样以为这些人口只是不需要重视的非公民。反之，西班牙为这些人口的公民身份与繁荣发展做出了投资。后来，西班牙遭到经济危机袭击的时候，这些投资很可能预防了一场灾难。

这项对落脚城市的投资并不是立即出现。在外来移民从1991年开始涌入以来，西班牙最初也曾经尝试关闭边境、禁止移民入境(尽管该国的经济在当时已对技术性及非技术性劳工产生了大量需求)。20世纪90年代期间，西班牙开始发展出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的落脚城市，也逐渐产生同样的问题。那时候，帕尔拉的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西班牙公民，通常都过着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当时这里有一套地下经济，犯罪率也居高不下，并且吸引了西班牙右翼激进组织与北非民族主义势力在此发展。

西班牙总理萨巴德洛(Zapatero)及其温和左派的社会党在2004年当选执政之后，随即推出欧洲第一套针对落脚城市所制订的政策。该国首先在2005年试图移除公民身份的危险障碍，采取的做法是施行一项特赦方案，让将近七十万名不存在于正式记录上但是拥有全职工作的移民踏上取得完整公民身份的进程。这项政策并不新颖。自从1986年以来，西班牙已发布至少四次特赦，最后更在2000年立法创设一项永久机制，为具有全职工作的外来移民赋予公民身份。(这项法律虽然遭到右翼的人民党政府反对，却还是获得国会通过。)萨巴德洛在2005年公布的法律可说是个收尾的措施，目的在于确保西班牙落脚城市的

所有居民都能够成为合法的纳税公民。

接着，西班牙又在2007年与塞内加尔政府合作推出了另一项更具雄心的方案，目的在于遏阻危险的非法渡海行为，并且终结西班牙的非法外来移民。藉由特赦措施把“非法”移民合法化的做法，虽然在战后的许多西方国家都出现过，但西班牙的方案却是一种新尝试，目的在于把合法化变成一种事前的选项，把乡下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纳入就业体系里。在这项方案下，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非洲人能够获得工作许可，以合法身份进入西班牙工作一年。如果雇主延长雇佣契约，这些工作人口即可将家人接过来，从而踏上取得公民身份的进程。这项措施的用意在于避免其他欧洲落脚城市的破碎家庭与地下生活现象，西班牙的经济也得以获得每年五十万人的生力军，又不至于在城市郊区萌生出一个遭到边缘化的阶级。

这项方案带来了立即而且强烈的效果。突然间，落脚城市的居民开始能够购置自己的公寓、出租店面、创立小生意、成立家庭，而不必遭到国民地位不明的障碍。外来移民的子女以西班牙国民的身份上学，摩洛哥小区（以及许多中南美洲移民聚居的小区）也实际上转变为具有多元文化的西班牙邻里。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繁荣带来的是活跃的公民，而不只是忙于赚钱的失根的外国人口；后来，西班牙也因此能够以理智而人道的方式面对经济崩溃与失业危机，而不至于使城市郊区陷入浩劫。

“那件事改变了一切，”林塞奈丁在一个星期二一面忙着包装顾客的肉品，一面这么对我说。合法化实施之后，他住处附近的摩洛哥人全都争先恐后地买下了自己的公寓住宅。“那个措施让我们获得了和帕尔拉的西班牙居民平等的地位。突然间，我们也可以创业、买房，甚至兴建自己的房屋。”不过，西班牙政府颇具远见（或者该说是懂得借鉴邻

国的经验),知道开放公民身份与房产持有权虽是至关紧要的一步,却不足以让落脚城市获得长期的成功。他们明白政府必须为落脚城市提供实际上的物质协助,并且通过实质措施让这些小区的居民清楚感受到政府的存在。于是,萨巴德洛政府在2008年推出一项为时两年、耗资二十亿欧元的方案,促使乡下人口成功转型为城市居民。这笔资金投注的对象包括特殊教育、移民接纳与调适,以及就业协助。此外,方案中也包括了各项实施于落脚城市的计划,诸如寻找及兴建住宅、普及社会服务、提供专门针对移民的医疗照护、协助女性融入社会、促进平等待遇、推动小区参与及小区建构。就某些方面而言,这项方案比先前的措施更具争议性,因为一般民众都因此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外来移民及其后代所获得的社会服务在贴心程度上都优于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就连最贫困的西班牙人也得不到那么好的服务。结果,这种不平等的印象甚至成为2008年全国选举的一大议题。不过,在紧接着那场选举而来的经济浩劫当中,西班牙的落脚城市并没有陷入危机。经济崩溃发生之后,外来移民虽然遭遇了极高的失业率,像帕尔拉这样的地区却没有沦为社会动荡的中心,原因是外来移民的整体社群已建立了稳固的商业网络与支持体系。由于摩洛哥人是西班牙的公民而不是外人,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成为一股地下威胁。

“我们知道德国与法国有不少边缘化的地区,其中的外来移民都觉得自己不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明了自己还有时间事先应对这项议题,”萨巴德洛政府的移民事务发言人赫尔南多(Hernando)表示:”我们花这些钱就是为了在外来移民人口众多的地区强化社会公共服务,并且创造各项必要的服务,调和宗主社会、落脚城市与移民本身……有些服务也许不受本国人的认同,但只要合乎法律规定,这也就是我们对这些服务的唯一要求。现在,这些外来移民都在这里合法工

作，缴纳的税金也资助了一百万西班牙人的退休金。他们是我国福利计划的财务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和其他西班牙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与生计。”

西班牙经济在2008年陷入衰退，不但比欧洲其他地区都来得早，衰退幅度也更大，原因是西班牙沿岸和市郊地区的房地产投机泡沫破裂。结果，该国的应对措施乃是以新颖的方式翻转了庇护政策。由于大部分的落脚城市居民都已取得合法地位，西班牙于是为失业以及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提供现金给付，请他们返乡至少两年，并且保证他们届时回到西班牙可以取得合法居留权。由于五百万名既有的外来移民获准能够把家人接过来而不必受到惩罚，因此西班牙比较容易扫荡非法移民（因为正当的家庭团聚不会被诬指为“非法”），而且移民输出国——特别是摩洛哥——也因为移民寄回祖国的资金不会受到影响而乐于和西班牙政府合作。2009年，非洲移民乘船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希腊没有这种公民政策，结果同时期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帕尔拉成了欧洲极不寻常的特例，是个认知到自己是落脚城市的落脚城市。这里的市攻厅原本是一座令人昏昏欲睡的鱼鳞板建筑，到了20世纪末才增建一栋通风良好的现代化大楼，充分发挥管理移民事务与协助乡下人口转型为都市居民的功能。其中的融合局提供法律服务、就业与住宅协助、口笔译服务、语言教育，以及女性服务和摩洛哥人居住辅导。这里的城市建设不是像其他市郊城市的那种美观但是缺乏连接的公园及亭阁，而是一条连接帕尔拉数十个地点的大众电车轨道，和一套能够在二十分钟内抵达马德里市中心的高速列车系统——这个运输链接使得帕尔拉的经济得以和大都市产生交流。帕尔拉兴建了许多住宅大楼、中型公寓及低矮的连栋房屋，全都由移民社群直接参与设

计，一楼都有店面空间，也为居民设想了购置房产的管道，而且住宅密度也够高，足以保持街道繁忙，为小生意提供足够的顾客流量。这里仍是个贫穷的地区，也不乏贫穷和移民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这里仍然弥漫着一股乐观与机会的气氛：这里的居民并没有受困。

一项重要研究发现，在西班牙出生的摩洛哥移民子女都能充分融入西班牙的语言和习俗，更胜于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西班牙为摩洛哥及其他非洲移民提出的移民政策虽然晚了十年，却允许他们把家人一起接过来成为西班牙公民，所以他们的子女不必在单亲家庭或者由移民政策造成的强制婚配家庭中长大。拉丁美洲移民的迁徙过程则比较有可能造成家庭的离散。

林塞奈丁和他太太生了五个女儿，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九岁，全都是在西班牙出生，也全都拥有公民身份。其中年纪较大的孩子，不论在身份认同、行为举止及自我认知上都已是彻彻底底的西班牙人，而她们的同侪也是这么看待她们。“一般来说，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都被当成西班牙人看待，而不是摩洛哥人，”他说，“对于在这里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里非常混杂，非常开放。你可以在这里起步，政府也会给你协助。所以，只要你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在这座城市里获得成功。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已经在这里立稳了脚跟，也觉得我们归属于这里。”

第九章

迁徙的终点：从底层到中产阶级

不再被排挤的邻里

佳丁·安吉拉,巴西圣保罗

在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早晨,马佳赫斯夫妇贝德罗与丹尼斯都在他们位于圣保罗南部市郊的白墙小屋里起床,冲杯意式浓缩咖啡,浏览一下网络上的新闻头条,把他们的两个孩子从电视和计算机前拉开,催赶他们去上学,然后打开大门,开车上班。他们把各自的标致轿车倒到街上,贝德罗一面瞥了一眼对街的一个地点。那是个他已经看了一辈子的地方:一座位于大道中央的小公园,是这座高度密集的小区当中仅有的少数绿地。现在,只有一个酒鬼盘踞着那座公园,是贝德罗以前的一个同学,因为运势不佳而穷困潦倒,晚上就睡在公园里的长凳上。二十年前,贝德罗就读于街道末端的中学,当时他每周一早晨都会行经这座公园,而且经常都会看到至少一具身上布满弹孔的尸体被人丢在那里,死者大多都是他的同校学生,甚至也有他的朋友。在几年期间,这种现象几乎每个星期都可见到。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凶杀案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悲惨的贫穷与孤立则是这种现象的背景。

1996 年,佳丁·安吉拉(Jardim Angela)以身为全球最暴力的小区而闻名。实际上,这座"法维拉"的居民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心知肚明,所谓全球最暴力的小区云云只不过是外界终于认知到这种状况而已。1976 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废的公共用地,只有蜿蜒崎岖的主要街道沿线

矗立着几间移民搭建的简陋小屋而已。到了20世纪末，这片山丘地的居民人数已超过二十五万，每年的凶杀案更是多达三百零九起。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青少年，死于当地的帮派斗争当中。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这里的凶杀率高居巴西全国第一，最高记录为每十万人有一百二十三人被杀，危险程度甚至高于大多数的战场。有些凶杀案是青少年帮派斗殴造成的结果，也有不少是由宪兵造成——他们每隔几个月就会发动突袭，开枪攻击帮派团伙、逮捕及刑讯青少年，甚至从事暗杀行动。此外，还有私人的行刑队，由当地的生意人雇佣现役与退役警察组成，专门杀害造成麻烦的帮派分子。这座小区的房地产价值低于零，因为这里只有一堆破败的小屋，在商店与服务纷纷迁离、犯罪行为成了主要活动之后，就几乎根本无法住人。一般人只能靠着吸毒和酗酒忍受这里的生活，婴儿死亡率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高。佳丁·安吉拉因此成了危险贫民窟生活的同义词。贝德罗·马佳赫斯人生中最脆弱的时期就困在这座小区的中心，父亲逝世，家庭贫困，女友怀孕，他自己又没受过什么有用的教育。按照当时的情势看来，他显然也势将成为另一个失落的移民。

贝德罗在1971年出生于农家。他们住在巴西内陆的敏纳斯州(Minas Gerais)北部的贫穷区域，当时巴西的人口大迁徙正迈向高峰。1976年，他的家人离开乡村，利用他父亲到圣保罗的季节性迁徙管道，在该市的南方边缘参与了一场土地入侵活动。这是一项风险相当高的举动。他们挑选的土地邻近于圣保罗两座饮水来源湖泊的其中一座，而且该市向来习惯于强制驱离水源区的占地自建小区。不过，当时巴西的军事独裁政府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因此没有本钱发动城市战役；而且这里涌入的人口极多，所以也就形成了足够的反抗力量。贝德罗的家人紧挨着邻居的房子搭建了一间木屋，位于这座“法维拉”的主要山

丘，是山坡上一个接近山脚的地点，环境比他们原本住处还糟。他们家的木屋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的土地战争当中多次被圣保罗官方夷为平地，他们却还是待了下来。这座都市既无法彻底驱离他们，也不能正式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于是将他们隔离起来，把他们困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境地里，没有任何服务，也没有正式的市民身份。

佳丁·安吉拉在初期原本带有一股乐观的气氛，生活环境远优于乡村，而且也有工作机会。“当时这里是个被人遗弃的地方，”贝德罗对我说，“很多空地，到处都有宽敞的空间可以让孩子玩耍。”当地的金属加工业与一家庞大的自行车工厂则为成人提供了工作。当时这里有盗接的电力，但没有自来水、下水道、铺面道路，和周围的城市地区也没有公交车或是其他任何交通连接。此外，圣保罗也不承认这些房舍的土地所有权。1976年，贝德罗一家人刚在这里立足，威亚纳市立学校也正好成立，是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就位于那座小公园的山顶上。往后二十年，这所学校就是政府在“法维拉”里唯一的恒久代表。1982年，贝德罗的人生遭遇了重大挫折，父亲去世，母亲因此被迫到学校当起煮饭工，但这项收入也不够她养活三个儿子。就在他的家庭苟延残喘的同时，他们周围这座成长迅速的小区也似乎开始崩溃瓦解。

20世纪70年代乡下人口移民都市的大迁徙潮所奠基其上的工业经济，是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封闭经济体系中操控经营的结果。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切都宣告瓦解。就在军政府向民主转型踏出跌跌撞撞的一步，这套人造经济也随着同时发生的货币、财政、通膨与银行危机而崩溃。在那整整十年间，巴西几无经济活动，政府也没有财务资源能够支持新兴的城市小区。那是个衰败的时期。对于佳丁·安吉拉以及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周围的其他数百座新兴“法维拉”和占地自建小区而言，这样的组合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新进移民才靠

着贷款刚开始兴建房子，突然间却失去了工作，也没有任何资源能够创业。这些小区和它们依附的大都市甚至连最基本的连接都还没建立起来，所以突然间遭受失业困境的移民人口根本不可能到法维拉以外找寻工作。

"状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得很糟——许多家庭的父亲都失业，所以母亲就被迫成为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当时在威亚纳学校担任教师的朱莉列德·茂格说，"许多爸爸开始酗酒，我们每天又只能让孩子在学校里待四个小时，所以第二代的孩子都没有人照顾，也无事可做，就这么成长为青少年。贫穷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又根本没有政府介入提供帮助。孩子常常饿着肚子上学，也没有制服可以穿，我们还得想办法照应他们的吃穿。家庭崩解，所有人都没有工作，而且情形还不断变得愈来愈糟。"

贝德罗·马佳赫斯正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亲眼目睹自己的同学转向犯罪行为。刚开始主要是偷窃——对象都锁定在运送水和燃料到小区里的卡车司机，因为他们大概是唯一会进入"法维拉"的外人。接着，到了80年代末，犯罪活动变得愈来愈严重——年纪较大的青少年开始学着美国电影的剧情，组织了"布隆克斯"和"忍者"这两个帮派，不但贩卖古柯碱，也互相争斗。情况变得愈来愈残暴。他们完全是地方帮派，没有涉及国际性的古柯碱贩运；但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组织比较松散，也比大型帮派还要暴力。他们为了区区几美元的债务就可以下手杀人。"从1992年开始，在几年的时间里，这里每个礼拜都有孩子遭到杀害，有时候是每天——尸体都被丢在那个广场上，我经常看到死者是我们的学生，"茂格女士说。她在暴力臻于高峰之际当上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当时学生人数共有两千五百人，而前一任校长离职之前，甚至在学校里遭到帮派分子殴打，被打掉了满口牙。

“有一个家庭共有七个兄弟，一年内就有五人被杀。我知道一定要有人采取行动，于是我在夜间也保持学校开放，让孩子能够在校园里玩耍……我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待在学校里，不管他们有没有上课，不管我们做了什么，重点是让他们待在学校，不要到外面互相残杀。这里没有政府，没有警察，只有我们。”

贝德罗徘徊在帮派的边缘，一直没有真正加入，但也备受吸引。一天早晨，在上学途中，他的朋友奇哥满脸兴奋地走到他身边。“我做了个梦，”他说，“我要杀了卡洛斯。”当时奇哥已是个收钱办事的杀手。他杀害了卡洛斯，把尸体丢在小公园里。他在第二年又杀了三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学校里的同学，但最后他自己也成了公园里的弃尸。就在暴力犯罪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之际，贝德罗因为成绩低落而在学校留级了一年，但他说原因是老师教得不好。接着，他在十八岁那年得知女友丹尼斯怀孕了。他没有工作资格，也没有任何前途。他准备辍学，而唯一的就业机会就是加入布隆克斯帮。“我不想加入他们，”他说，“我一定要帮他们杀人，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吸毒，可是当时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他们想拉我进去，我也没有其他选择。”

贝德罗和丹尼斯在一个周六上午向我讲述了这段经历。在我们谈话的同时，他们正开着丹尼斯的标致轿车，载着全家人从他们位于佳丁·安吉拉中央的住家前往最近的一家购物中心。这项活动已成了他们全家人的习惯，周六上午就到购物中心采买物品，中午再到美食街用餐。他们十七岁的女儿卡希雅是一所私立学院的一年级生，想要主修时装设计。她在熊猫快餐专柜点了她的午餐。十四岁的维陀就读于一所私立高中，今天没有点平日常吃的麦当劳，而是选择了份量比较丰富的巴西餐点。他们借机和我练习从私人教师那里学来的英语，讨论他们最喜欢的手机品牌与社交网站。他们两人的英语学费一个月要八百

美元，一年上八个月。丹尼斯谈及他们全家人的下一个重大变动：她和贝德罗刚支付了总价三分之一的首付款，买下一间六万三千美元的三房公寓。他们未来的新家位于一幢十八层楼高的公寓大厦的八楼，就在这家购物中心旁边，在这个包括佳丁·安吉拉在内的“法维拉”群落边缘。那幢公寓大厦所在的住宅区含有政府资助的“法维拉安置住宅”公寓，一栋栋窗户狭小的低矮蓝绿色建筑。也有像他们买的大型公寓，位于现代化的玻璃墙面大楼里，有着宽敞的阳台，诉求对象是较有经济能力的“法维拉”居民。这些人一方面想要待在自己原本居住的小区里，邻近于自己的朋友、亲人和营业地点，同时又想享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与更多的保障。往后几个月，他们将继续住在公园旁的那栋白墙房屋里，那是丹尼斯母亲名下的房子。佳丁·安吉拉正值一波房地产繁荣潮，住在“法维拉”顶端的居民都纷纷搬进新建的公寓，住在山丘底部的居民则买下他们搬出的房屋。这波繁荣潮的收益也资助了小区里的创业活动。

贝德罗是巴西落脚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员。过去十年，他经营了一家信息科技顾问公司，位于佳丁·安吉拉之外，为一家跨国品牌公司提供网络硬件服务。他和他太太两人的年收入合计介于三万至三万五千美元之间——就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而言，算是相当宽裕的中产阶级收入。这样的薪水让他们得以把两个子女送进私立学校、拥有两部车与各种现代家电、服装、玩具、享有宽带网络，还可累积足够的储蓄购置房产。他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和许多落脚城市居民一样，就是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和亲戚同住以节省住宿支出。

我挑上贝德罗和丹尼斯，不是因为他们是罕见的特例，而是因为他们在佳丁·安吉拉的一大群少数族群当中算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自从当初这座“法维拉”陷入暴力以来，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已然诞生。

根据不同说法，这座小区共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口赚了足够的钱而得以拥有房产。这里仍是一座贫穷的小区，大部分的人口都以合同工的方式从事货运司机、家事佣仆、建筑工人或电话服务员等工作（很少有人失业），吸毒在某些区域也仍是明显可见的问题。不过，现在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里的主要街道在过去是一片孤寂的饮酒场所聚集地，现在却热闹不已，满是家具和家电商行、餐厅、冰店与房屋装修卖场。这里平均每个住户拥有一点五部电视，三分之一拥有DVD播放机，半数拥有手机，三分之一拥有轿车，百分之十四拥有计算机，而且这百分之十四当中又有半数申办了宽带网络。现在，这里的房屋全都是砖造建筑，三分之二都曾扩建或装修过，约三分之一则是外墙重新粉刷过（粉刷上漆不论在世界各地都是可支配收入的象征）。

在这一切现象的背后，又潜藏着更重要的改变。首先，暴力犯罪与帮派不再是这里的主要特色。在1999到2005年间，佳丁·安吉拉的凶杀率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三点三，并且还持续降低，目前位于南美洲中产阶级小区的水平。布隆克斯与忍者这两个帮派也早已式微。尽管这座城市的古柯碱贩卖已受到一个全国性帮派的控制，从而减少了帮派之间的斗争，但大多数清楚状况的观察者都认为，帮派在这座小区里销声匿迹乃是经济发展直接造成的结果。手机盗窃与持械抢劫是当前最常见的犯罪行为，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则是机车事故。第二，这座小区现在已和城市建立了紧密连接，“法维拉”里不但有公交车通往邻近的通勤电车站，也设有许多政府机关的办事处。第三，自从2003年以来，这里的居民都已合法拥有自己的住宅，原因是自从一位富有远见的圣保罗市长把土地所有权列为优先施政项目以来，将近三分之二的居民都投资了钱财装修房屋。第四，现在这里的居民已有创业的管道，因此小区里到处都是商店、百货、信贷公司与小型工作坊。这里的居民仍

然贫穷，也有大批年轻人（主要是男性高中毕业生）仍然困在靠着打零工糊口的艰苦生活中。不过，"法维拉"里已开始出现一群引人注目而且可长可久的中产阶级，大幅改善了这座小区的环境，连最贫穷的居民也得以获益。移民在此立足的进程虽在20世纪80与90年代期间猝然遭到阻断，现在却已回到了正轨上。

佳丁·安吉拉的转变值得仔细检视，因为这项发展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关键问题：怎么样才能在一个世代里从乡下生活顺利转型为中产阶级的都市生活？或是在两个世代的时间内达成这个目标？毕竟，这正是落脚城市的核心功能，也是亿万人从乡村迁往都市的唯一目的。因此，我们对于这项成果该怎么达成竟然几无所知，也就不免令人困惑不解。走访了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之后，可以清楚发现这种转变通常无法在一个世代里完成，而一旦如此，就会带来残暴而猛烈的后果。不过，我们也可清楚知道乡下移民认为这种转变乃是常态，而且预期这种转变的发生。在佳丁·安吉拉，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进程可能遭到哪些障碍的阻挡，以及该怎么排除这些障碍。

在1996年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达成这种转变的管道。大豆与甘蔗农民当初为了实现梦想而建立的佳丁·安吉拉，到了他们的子女这一代已沦为一座致命而孤立的小区。这群第二代移民对都市生活无法得其门而人，和乡村又没有任何连接。他们在文化上属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与自我期许都远高于他们的父母，但他们所处的世界却仅仅把他们视为没有人要的村民后代。在茫然失措又毫无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自相残杀。"当时我在这个社区每天都会看见两三具尸体，"当地神父杰米·克罗说。他到这里之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必须担负起埋葬一整个世代的工作。"当时如果要去喝杯饮料，常常一出门就得跨过一具尸体，而且当天的报纸还丢在他身上——可是你早已经见

怪不怪了。很多孩子，而且是年纪很小的孩子，都跟我说他们的人生不值得活。这种情形一定要遏止。”在大部分的巴西人眼中，佳丁·安吉拉仿佛遭到了某种邪恶力量的控制，仿佛那里的居民天生就具有暴力、贫穷和怠惰的倾向。

不过，佳丁·安吉拉的一群热心居民愈来愈清楚意识到，这种状态并不自然，也不是无可避免。他们拥有改善自身境况的渴望和意志力，却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付诸实践。随着暴力现象在1996年达到高峰，又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于是许多人开始聚会讨论，并且一致达成这个结论：佳丁·安吉拉的问题不在于什么邪恶力量，而是因为缺乏正常城市应有的制度与功能。

贝德罗·马佳赫斯比大多数人更早理解到这一点。在他十八岁那年，丹尼斯意外怀孕，他本身的学业也陷入危机，以致原本就在帮派边缘徘徊的他几乎已经决定一脚踏入犯罪生活。他对犯罪活动毫无兴趣，内心的道德感甚至对这种行为深觉排斥，但为了女儿的未来，他什么都愿意做，而佳丁·安吉拉贫瘠的经济环境显然没有其他选项可供他选择。就在这时候，他的哥哥向他提出了一个机会：到他的理发店当理发师。他哥哥在经济情势还没那么糟的时候开了这家理发店，到了这时则是这座落脚城市里少数还没倒闭的小企业（主要是因为经营理发店的资金门槛极低，也不需要和外界有所连接。）“那份工作救了我，”贝德罗说，“我因此不必卷入坏事，也让我存下了一笔钱，而得以贷款学习电脑。”经由落脚城市里的密集网络与人际关系，贝德罗展开了新人生，以教育、财务信用与企业家精神为基础。他找到了晋升中产阶级的管道，而且这条管道直接穿越了落脚城市的中央。

佳丁·安吉拉的居民有没有可能全都在做着同样的尝试？这是小区领袖在当时提出的问题。随着暴力现象达到高峰，这座“法维拉”的

小区领袖也开始在学校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小区的问题。长年来一再遭到圣保罗、敏纳斯州乃至国家的漠视，佳丁·安吉拉已发展出了本身的草根市政府，原本只是为了紧急应对数百名孩童死亡的现象，后来则逐渐演变成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举行于学校的会谈后来被称为“捍卫生命论坛”。就在这座法维拉因为暴力猖獗而恶名昭彰之际，这些会谈的参与者原本只有学校教职员、少数警察和杰米神父（他是最早召开这种会谈的人士）；接着，随着暴力现象的消息广为传播，国际救援组织也开始伸出援手，并且派人参加会谈；最后，市政府与州政府代表也加入了其中。不久之后，数以百计的居民也都开始出席。佳丁·安吉拉的民众对于小区的需求都抱有一致的看法：首先是安全，接着是教育，然后是与圣保罗市区的充分连接，包括实体上与经济上的连接。

“学校成了第一个真正中立的地区，第一个公共空间，”朱莉列德·茂格说，她的学校原本只提供每天四小时最基本的教导——落脚城市的学校通常都是如此，不是私立学校就是规模小得可怜，所以也发挥不了什么社会流动的效果。后来，借着游说政府与救援组织提供资助，他们建立了这所学校，使其较能应对落脚城市的需求。“我们必须向民众灌输观念，让他们知道学校是政府机构，代表了官方的权威，所以孩童都必须上学，也必须遵守校规。我们把这所学校变成了小区的一部分。接着，我们开始为具备初中一二年级学历，而且想要在人生中重新出发的成人和青年举行夜间课程。”这些课程获得的回响非常热烈，以致学校的全部十五间教室都必须在夜间开放。事实证明教育深受欢迎，不只是想要避免帮派生活与吸毒的孩童追求教育，就连过着犯罪生活的人也渴求教育。“很多孩子都辍学，在十二或十三岁就开始贩毒——然后，到了二十或二十一岁，才意识到这种生活其实不好，所以又回到学校寻求未来的出路。”

最鲜明也最受当地居民赞赏的改变，是安全程度的提升。以前，这里的警方其实是如假包换的重武装军事部队，从外面的堡垒基地搭乘装甲车侵入小区，把这整个地区视为“敌对区域”，所有的居民也都是潜在的敌人。他们经常在夜间发动突袭，逮捕、格杀，然后撤离。毒品犯罪是他们唯一的打击对象。当地居民不但怕帮派，也怕警方，甚至对警方的畏惧更甚于帮派，因为帮派的杀手至少还是邻居或亲戚。这里的居民确实有充分理由对警方抱持疑惧的态度：20 世纪 90 年代初，数百名宪兵因为在“法维拉”里涉及数千起仇杀及委托杀人案件而遭到起诉。

随着暴力现象达到高峰，有些出生于“法维拉”的警察开始觉得自己对于小区内的贫穷与孤立也必须负起部分责任。警方把落脚城市视为隔离区域，每隔一段时间就入侵扫荡，等于逼着这些小区只能不断往内缩，不断自相残杀。1998 年，在捍卫生命论坛多年来施加的压力之下，警方终于展开了一项极度大胆的实验。他们在佳丁·安吉拉设立一座警察局，有着大窗户和敞开的门口，并且把车辆削减到只剩两部，驻扎当地的两百名警察都以徒步方式挨家挨户巡逻——这是巴西前所未见的情形。他们发展出了一套以小区为基础的治安维持哲学。这种概念在富有国家虽然已是陈腔滥调，在巴西却是非常新颖的观念。

“在我当警察的头十五年里，我总是以积极猛烈的方式打击犯罪，因为那是我唯一懂得的方式，”达维·康席说。他曾是个态度强硬的宪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参与捍卫生命论坛，结果深深着迷于论坛上提出的观念，现在负责领导佳丁·安吉拉的小区警力。“当时有许多冲突，我也参与了不少枪战……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作风。现在，我和身边的人有更多的交流来往。他们还是不完全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和他们面对面互动，到他们家里去，向他们说明警察不只会动用暴力打

人。尽管我们以前确实是这样，但警察其实还有其他的功用——这是一件进展很慢的工作。”

这样的发展对于贝德罗那个世代的大多数成员而言虽已太迟，但他子女的邻居和同学却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佳丁·安吉拉是圣保罗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法维拉”里从事政治组织的那几年造成了改变，较为开明的市政府与州政府也因为理解到这些小区是重要的投资而愿意给予协助。此外，圣保罗在2003年通过一项全面性的枪支管制法律，佳丁·安吉拉的小区警力也随之积极执法；同一年，一位深具远见的市长认识到交通运输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于是为圣保罗边缘的各座“法维拉”规划了便利的公交车与通勤电车服务，并且为贫穷的劳工提供价格低廉的乘车票卡；诊所和街道照明都陆续设置；微型贷款机构开始在这些小区设立，提供贷款保证；小型企业法律获得松绑，使得“法维拉”居民更容易利用自己的房地产价值进行创业；而且，企业家与政府机关也设置了各种场所，推广“法维拉”地下文化中的音乐与舞蹈，同时也从中获利。对于落脚城市的第三代而言，他们突然有了待在家乡并且努力改善小区的诱因。

“第二代成长在一个没有过往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父母的那种乡下背景，也看不到未来，”曼索(Bruno Paes Manso)说。他是圣保罗的学者暨作家，曾经分析过”法维拉”暴力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他调查之后发现，圣保罗的犯罪率在21世纪初之所以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不是警方的执法措施，也不是帮派趋向组织化，而是经济的发展。由于“法维拉”里开始出现正当工作机会，数以千计的帮派分子于是放弃了犯罪生活。“他们虽然走上犯罪的道路，却都抱有着‘我不要我的儿子也陷入这种命运’的心态。这些第二代居民从来没想要过这种生活，只是遭到环境所迫。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感觉就像是监狱一样，没有

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第三代则深深融入了都市的经济与文化。便利的交通、市区的工作，嘻哈音乐及运动——这种种元素让他们拥有了过往与传统，让他们有能力谈论自己的出身与未来。你经常会听到他们说：'我出身乡村，我出身奴隶阶层，我出身原住民社会，而且我不想在二十五岁以前丧命，因为我是圣保罗市民。'他们正在开创一种新的认同。"

贝德罗与丹尼斯的子女没有任何的恐惧或绝望：他们是满怀雄心壮志的圣保罗少年，热爱佳丁·安吉拉的音乐与文化，但完全不关心移民的经济或习俗，也不在乎上一代耗费了多少心力才为他们争取到正常的生活。我看着即将成为他们新家的那排公寓大楼，问了十七岁的卡希雅对于和先前的邻居一同住进这座高科技的城堡有什么看法。她是否期待位于八楼的新家窗外的景观？"不会，"她对我说，"那里的景观没有多好。虽然有一座公园，可是中间还隔着好几座法维拉。"

本书基本上探讨的是社会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从乡村迁往城市向来都是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行为，目的在于提升家庭的生活水平、收入与生活质量，凭借的主要工具则是落脚城市。城市的穷人虽然必须忍受拥挤的居住环境与各种羞辱，却还是优于乡下穷人的生活，而且落脚城市的居民都认为贫穷只是一种暂时的状况。不过，建立落脚城市只是乡下移民在这段精心筹划的旅程当中的第一步。他们投注了自己的一生，牺牲一整个世代的收入与平静生活，绝不只是为了从一种型态的贫穷转换到另一种型态的贫穷。落脚城市的居民不认为自己是"穷人"，而是成功的都市人，只是必须先经历这个贫穷的阶段，时间也许长达一个世代。

落脚城市如果要发挥功能，一定要先创造中产阶级的成员：也就是一群拥有相当程度的收入与存款的家庭，能够创业、雇佣员工、购买及

装修住宅、把子女送上大学，并且拥有持续不变的生活品质，让他们和他们的邻居藉此摆脱纯粹只求糊口的生活。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他们能够促成社会与政治稳定，因为他们会把移民小区和都市的制度及组织链接起来，从而开辟一条管道，让居民拥有额外的选择，而不一定只能沦入犯罪以及边缘化非正式经济的就业依赖当中。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可以让新进移民及其子女看到，迁徙不会让人永远陷在不公的环境当中；只要努力找寻出路，愿意投注心力，就能获得可长久的富足生活。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通常能够诞生出商业和政治领袖，从而改善社区中所有人的生活品质。经济学家德尔劳夫(Steven Durlauf)已经证明指出，贫穷小区里的中产阶级，就算规模不大，也能够产生"邻里回馈效应"，使得为子女投资高等教育的做法成为一种行为常态。而且，落脚城市一旦出现中产阶级，也有助于改善移民来源乡村的生活水平、为乡下地区的非农产业提供资助，并且催生平行的乡下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落脚城市造成乡村与都市的平等化之后，即可终结乡村人口迁徙都市的现象。

对于乡下移民而言，晋升中产阶级并非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是历史上的常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期间，这种现象在欧洲与北美的城市历历可见。如同我们先前看到的，这种现象普遍可见于当今发展得比较成功的西方落脚城市，在发展中国家的落脚城市当中也同样观察得到。土耳其的盖奇康都小区培养出一群新兴的内部中产阶级，现在已支配了整个国家；不少原本贫陋的"法维拉"——例如里约热内卢的荷西尼亚地区(Rocinha)——都已发展成吸引人的中产收入人口聚居地，圣保罗的"法维拉"更是带来了消费与工业的繁荣以及新形态的国家政治。孟买周边地位比较稳固的贫民窟——例如达拉维——现在的内部经济规模已达数亿美元；而在这些有如迷宫般的小区当中，我也见

过不少工厂雇佣着四五十人，并且为大家族资助计算机科学教育。

今天的佳丁·安吉拉正是这种中产阶级落脚城市的绝佳范例。根据巴西衡量家庭财富与消费标准的五等分位法（其中A等代表国内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E等则是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包括佳丁·安吉拉在内的“法维拉”地区人口至少有百分之十四属于生活宽裕的B等中产阶级，只有百分之三十一属于仅次于最贫穷人口的D等，超过半数都是C等的下层中产阶级。相比较于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变化实在是极为巨大。这种转变模式一再出现于圣保罗的各个落脚城市，从街道上那些多采多姿的商店、服务与小型企业即可看得出来。

尽管如此，这些地方的成就在全球而言仍算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许多落脚城市都无法为第二代居民提供晋升中产阶级的机会，不论他们多么努力工作或是追求教育。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已经危及经济成长与政治稳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罗斯科夫(Rothkopf)把这种忽视落脚城市的做法称为一项大规模的错误：“除了印度与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引人瞩目的国家出现了令人欣慰的中产阶级成长之外，我们在建立中产阶级的表现上实在非常糟糕。中产阶级不但是稳定的基础，也是新兴国家摆脱经济盛衰循环问题的解药。”

要了解这项挑战的本质，首先必须明白我们——以及迁入都市的乡下移民——所谓的“中产阶级”代表什么意思。定义中产阶级的一种方式是指出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是挑出收入介于全国所得中位数的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一百五十之间的家庭。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Milanovic)针对全世界从事了这样的统计，把全球六十七亿人口划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下层阶级”：家庭年收入低于四千美元，这个数字正是巴西的全国所得中位数；另一个则是“上层阶级”：家庭年收入超过一万七千美元，这个数字正是意大利的全国所得中位数。下层阶级占

了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上层阶级为百分之十一；至于全球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年收入介于四千美元与一万七千美元之间的住户，也占了百分之十一。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可以由他们扮演的角色以及自我认同加以定义。尽管今天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是薪水较高的工厂工人与计算机操作员，而不是传统的资产阶级，但他们有一项重要的共同特色，乃是有能力运用自己的储蓄和投资扭转自己未来的地位。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是能够在横跨多个世代的时间里，以可长久的方式轻易照顾饮食、居住与交通上的需求，也持续具备为了投资未来成长而进行借贷(以及事后还款)的能力与意愿：不但能够累积存款与资产，让子女接受教育，并且能够攒集足够的资源以从事创业、扩建房屋或购买车辆，而不必牺牲原有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要达到这种程度的稳定与舒适生活，所得水平通常就在米兰诺维奇所定义的范围。尽管每个地区各自不同，但家庭年收入介于五千至一万五千美元之间大概就是晋升中产阶级的门槛所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世界经济自由化之后的二十年间，中产阶级的成长幅度理当比实际上要大出许多。就当时超乎寻常的经济成长来看，加上人均收入的增加与生活水平的提升，按理说应该要出现更多的社会流动现象才对。2006 年，万事达卡公司的经济学家预测亚洲将在 2010 年前“暴增”十亿名中产阶级消费者，家庭年收入皆超过五千美元，其中六亿五千万人出现在中国，三亿五千万人出现在印度。当时，印度与中国达到这项收入水平的人数分别为一千两百万与七千九百万，因此预测中的成长乃是指数型成长，而且产业也将获得同等的回馈。“收入一旦超越五千美元的门槛，边际支出随即转移为休闲消费，包括出外用餐、私人旅游以及购买车辆等等，而这些行为将产生

重大的商业与经济冲击。”万事达卡公司发表的研究指出，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呼应了这项估计。不过，实际上却出了问题。生活水平虽然确实有所改善，尤其是对于赤贫人口而言，但历经二十年的长期繁荣之后，许多当初一开始就徘徊在中产阶级边缘的人口却还是不得其门而入。这些深受挫折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乡下移民的子女。

在一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所进行的重要研究当中，来自美国著名智库的三名经济学家检视了世界各地所得的统计数据，结果发现转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体而言对贫富两个极端的所得族群都有正面效益——穷人与富人的时运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初始都大幅提升(穷人主要是因为城市化)。不过，他们的结论指出“中等族群受到的影响好坏参半：有些地区的社会向上流动因此增加……但另外有些地区则反倒出现更多不确定性与社会向下流动。”举例而言，拉丁美洲的大多数人口都因为自由化而获得收入增加的效益，但中等所得家庭的经济不安全感却也随之提高。这项研究把一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大致上指的是缺乏高等教育及家族关系的成员(亦即落脚城市的第二代居民)描述为‘卡在不上不下的困境当中’。”

在许多地区，这种“不上不下”的状况导致一个世代的一大群人口无从晋升中产阶级。地理学家尼曼(Jan Nijman)研究孟买的社会流动状况，结果发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相对于总体而言，中上收入阶级成长，中下收入阶级缩减，贫穷阶级则些微扩张”——也就是说，在那十年间晋升中产阶级的人数比每年涌入都市的穷人还要少。他仔细研究新出现的住宅购买者之后，发现“几无向上流动的现象”；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住宅购买者都是房产持有者的子女，不是外来移民的子女。那些年收入介于五千至八千美元之间的人口，原本应该晋升中产阶级，却无法购置住宅。在这期间，其他形态的成长虽然相当普及，但在印度

及其他地区，晋升中产阶级却变得困难重重。

问题不在于市场，而在于政府应对的方式。政府在当初应该积极介入，协助刚在城市立足的贫穷民众找出跻身中产阶级的管道，但许多政府在这个时刻却毫无作为。这是一项财政计算上的重大错误。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接纳市场经济，许多国家于是实行了极度紧缩的支出政策——有时候是因为国际货币组织以此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但有更多案例是因为这些国家首度对国际资金市场开放，因此想要展现自己在总体经济方面的纪律。不论如何，结果就是许多国家都未能投注资源促成国内中产阶级的发展（并且藉由落脚城市消弭贫穷现象）。到了21世纪，这些国家仍在为这项错误付出代价。

“这些社会忽略了中产阶级发展的几个关键维度”，美国经济学家舒温格（Sherle Schwenninger）说。他曾在2007年与同事共同主持一项大型研究，发现全球中产阶级的发展已陷入了停滞。“这些社会发展房贷市场的脚步相当缓慢，以致中型企业未能获得发展的助力：这些国家都忽略了以国家支出充实基础建设，”他对我说，“经济的太多区块都遭到了忽视，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担负着关注公共财政的沉重责任。”

这些政府忽视的经济区块正是落脚城市所需的部分。许许多多的分析都发现，社会流动未能顺利发生的地区，就是因为欠缺必要的制度与功能，以致落脚城市无法发挥效果。

佩尔曼（Janice Perlman）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协助了南美洲许多迁往城市的乡下移民，很早就意识到落脚城市的经济中心与充满动力的本质。后来她又回去探望她当初协助过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子女。“从不识字的乡村农业（或渔业）生活迁徙到识字的城市劳动生活，对于

原始访查对象或他们的父母而言，是社会经济流动方面的一大跃进，”她指出，“过去三十五年来，城市服务的集体消费以及家用品的个人消费都出现了大幅改善。”不过，“尽管原始访查对象的子女在教育程度方面获得大幅提升……这样的提升却没有完全反映在工作上。”值得注意的是，她发现落脚城市的居民回头投资教育的比率低得惊人：像圣保罗的马佳赫斯夫妇那样花钱送孩子上私立中学或大学，并不保证他们一定能够晋升中产阶级。佩尔曼发现巴西乡下移民的子女确实有许多人已成为中产阶级，但却必须摆脱落脚城市才能达到这样的成果。在原本的移民人口当中，现在有百分之三十四住在落脚城市以外的合法住宅持有人，已然晋升中产阶级。这群人口的子女有百分之四十四是中产阶级，孙子女则有百分之五十一。不过，他们必须拥有大学学历才能突破父母辈的职业选择限制，但能够进入大学的人数极少。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导的另一项大型研究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中产阶级成长，原因是这些国家拥有稳定的汇率，吸引了长期的资金流入，也因为这些国家直接针对落脚城市进行了不少建设：能够支持小型企业的金融制度，加上代价合理的长期贷款，以供贫穷的消费者购置住宅、寻求高等教育以及发展基础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一项针对发展中国家收入状况的研究，检视了本世纪头十年中产阶级未能成长的背后因素，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虽然投注资源发展高等教育，却排挤了贫穷阶级所需的小学及中学资源，导致教育福利独厚既有的中产阶级，而把移民家庭排除在外，并且削减了社会流动。此外，这项研究也发现提供穷人子弟就读的小学与中学产生的教育成果不尽理想，因为最佳的教师与教育资源都位于落脚城市之外。

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最早意识到贫穷的根源不在于缺乏金

钱、财产、才智或野心，而是欠缺“门路”——也就是成为真正的公民所需的工具或机会。这项概念在发展领域中已获得广泛沿用，但最足以证明这项概念的地方就是落脚城市。落脚城市居民改善生活的意志力最为强烈，但他们却也最欠缺门路，在经济的平滑崖壁上找不到能够抓握的凭借。如同我们先前所看到的，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创业以及接受教育的门路。社会一旦提供了这种门路，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可从此发展出来。民众一旦发展出有效的自我治理，拥有安全保障，也享有信贷与都市的各项便利设施，政府又对小区提供积极协助，这些门路就会自然出现，一如佳丁·安吉拉的情形。在落脚城市的居民以及许多观察家眼中，实现这些门路的另一个关键，乃是完全拥有自己所居住的土地。

帕拉博夫妇的家

孟买

我在帕拉博一家人晋升中产阶级的那一天结识了他们。他们在晚春一个雾气弥漫的慵懒早晨醒来，一家四口一同蜷缩在地板上。他们住了六年的这个住处是一间光线黯淡的一室户廉价公寓，是个面积只有六平米的水泥方块，上覆铁皮屋顶，整洁的地板位于一块高高的烹饪平台底下。他们在屋外的狭窄走道与邻居打招呼，把最后仅剩的物品打包搬上一辆等在门前的小卡车，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来到邻近一座

绿意盎然的小区。

他们的目的地是和平公寓，一幢外观老旧的灰色混凝土大楼，房龄已有二十二年。看着这幢公寓大楼逐渐接近，三十六岁的苏哈席妮·帕拉博兴奋地向她的孩子保证他们一定会喜欢上这个新家。“往一边只要走五分钟就可以抵达火车站，往另一边同样只要走五分钟，就可以抵达一座很好的寺庙。”她对十八岁的普拉提克与十一岁的罗翰说，但她其实不需要这么安抚他们。她和个性沉默、年纪大她十六岁的曼诺哈结婚十八年，在这段时间里不断努力要让全家人摆脱贫民窟，晋升真正的中产阶级。今天这次搬家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梦想成真的时刻。这一天到来的时间比他们预期的晚了许多，而且他们能有这一天完全必须归功于贫民窟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一会儿之后，他们终于体会到了中产阶级与外界隔绝的宁静生活环境。这里的大理石地板仿佛一望无际，还有为了不同用途而隔出的房间，和邻居之间有厚厚的墙面相隔，而且有自家专属的卫浴。

在廉价公寓，他们必须到屋外才能洗澡，而且每天只有上午两个小时供水；在这里，只要扭开水龙头，随时都有水可用。按照孟买房地产的术语，这是一间 1bhk 公寓，面积约六十个平方，隔成三个房间，一间卧房，一间客厅，一间厨房，而且有采光良好的大窗户。对于帕拉博一家人而言，这个新家最令人震惊也最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地方，是屋里的寂静无声。他们再也听不到周遭邻居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室内的空气也不再回荡着整个小区的嘈杂笑闹。他们一停止说话，室内就陷入一片静谧。曼诺哈对此深感不习惯，于是打开了新买的二十六寸电视，转到一个正在播放宝莱坞音乐剧的频道，调高音量，就这么一面开着电视一面说话。

他们在一个月前买下这个地方，但搬进来之前决定在贫民窟多待

四个星期，而且是为了一个非常具有中产阶级色彩的原因：苏哈席妮变卖了她所有的金饰——尽管传统上金饰都会留给子女结婚使用——价值达一万美元，并且把这笔钱用来整修这间肮脏老旧的公寓。他们拆掉一面墙，装饰新的琉璃石，把瓷砖地板换成大理石，还请她担任木工的表亲为天花板安装新颖美观的装饰条和灯具。他们夫妇谈及这样的装潢可以让他们住得舒适又体面——住宅的体面是贫民窟居民非常重视的价值观——也提高房产的价值。他们刚花了四万两千五百美元买下的这间公寓，经过这样的装修，日后若要出售即可开出更高的价钱。

这是个相当雅致的住家，但还不算是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家庭收入在三年前才跨过中产阶级的门槛，当时曼诺哈在一家电子仪器公司找到了一份担任客车司机主管的工作。他在十四岁那年从马哈拉特拉邦中部的村庄来到孟买，原本睡在街道旁，后来靠着同乡村民的人际网络住进贫民窟。苏哈席妮出生在一个落脚城市家庭，善于交际，并且拥有超乎常人的自信。她自从十八岁结婚之后，就按部就班地致力于让家人摆脱贫民窟。

靠着曼诺哈六千六百美元的年薪，绝对不足以达成这项目标。帕拉博夫妇遇到了在世界各地落脚城市都极为常见的两个问题：房地产市场不自由，遭到区域划分、租金管制与持有限制等规范严格控制；而且信贷市场也不成熟，只有高收入族群能够享受房屋贷款。第一项限制导致开放商没有意愿去建造适合下层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住宅（而且孟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发现，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买得起房子）；第二个问题则导致帕拉博夫妇无法取得任何住宅贷款，尽管他们已经准备了一大笔首付款。把这公寓卖给他们的房屋中介博德告诉我说："这座城市里有很多穷人都想买一间三房的住宅，但他们通常都买不到，不是因为没人能够兴建这种住宅，就是因为供给太少，导致价格超出他们的

预算。这里完全没有入门级的住宅。”

因此，帕拉博夫妇又多等了三年的时间，才得以利用他们的储蓄和收入买下一个家。在这段期间，苏哈席妮花了好几个月走访银行与中介、研究政府法规以及找寻工作。最后，他们借着孟买房地产市场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面向，才得以达成目标。如同落脚城市的许多居民，帕拉博夫妇也是从最低等级的居住水平逐渐往上爬，后来才买下了贫民窟的简陋小屋。他们把原来的房产都保留在手里，包括最早的一间九平方米多的棚屋，以及后来的三十平方米的廉价公寓，藉此赚取房租收入。他们的第一间住处得以收取每个月三十五美金的租金，第二间住处则可收得七十美元。加上苏哈席妮在一家人造珠宝首饰店的兼职收入，他们的家庭年所得即趋近于八千美元——也就是能够取得贷款的水平。和世界各地晋升中产阶级的人口一样，他们发现只靠一份收入绝不可能跨越这个门槛，而必须有两份，甚至三份收入。这种现象使得这些传统社区里的女性得以拥有相当程度的经济与社会力量，也使得儿童托育服务成为落脚城市里极为重要的条件。

即便拥有这么多收入来源，购买房屋仍然一点都不简单。不论任何形态的房贷，帕拉博夫妇都不符资格。印度的银行在借款方面极度保守，尽管该国因此得以安然度过 2008 年的信用紧缩危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却也因此被排除在房产市场之外。于是，他们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数百万家庭一样，以购买家电的名义申请利率比房贷高出许多的消费贷款。而且这样还不够：正如孟买常见的现象，除了合约上的购买价格之外，他们在台面下还得向卖主支付几千美元的“黑钱”。

为了在中产阶级取得一席之地，这个家庭必须利用房产赚钱，并以令人咋舌的复杂方式操作极高的财务杠杆。这么做虽然让他们拥有了一间住宅，但他们的有产地位却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他们每月

的固定支出包括两百美元的贷款、十五美元的住宅维护费用、普拉提克就读大学的学费八十美元,还有罗翰就读高中的学费十二美元,加总起来大约等于曼诺哈的月薪,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应对灾害或挫折的余力。"我们过得很辛苦,因为我们必须借那么多钱,收入只能勉强应付支出,"曼诺哈说,"我们真的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儿子身上。"在房间角落的计算机上练习着 Java 程序的普拉提克听到这句话,不禁惊慌地瞥了我们一眼。

马佳赫斯与帕拉博这两家人在城市里立足的成功经验,就和伊斯坦布尔的萨布里·柯席吉特及伦敦的特福德一家人一样,秘诀都在于完全而合法的房产所有权。这样的所有权不但让他们拥有稳定的住处,也获得了一个抵押贷款的来源。落脚城市居民能够晋升中产阶级,通常都是凭借着房地产的价值。

这种价值如果只是幻象,社会流动就会因此陷入停摆。落脚城市的大部分居民虽然都是为自己的住处付了钱,并且认为自己是全权所有人,但许多人的所有权却都不合法,甚至也不稳固。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政府机关或私人机构的驱离,而且他们的房产也不具备正式财务价值,所以无法进行杠杆操作以资助其他活动。一项研究估计指出,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阿拉伯国的发展中城市,介于百分之二十五至七十之间的城市人口都是住在没有明确所有权的土地上。

在过去二十年来的许多政治人物与经济学家眼中,落脚城市的一大问题就是房地产所有权。他们认为这就是社会流动问题的起点与终点。这项辩论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致力于将该国在都市周围占地居住的数百万乡下移民转变为房地产所有人。他成立了许多正式化委员会,把落脚城市的土

地所有权转化为正式房契，而且民众只要写几份表格，就可以在短短几天内创立小型企业，不像先前要等上好几百天的时间，填写好几十份表格。这是一种让赤贫民众融入经济体系的做法。1989年，德·索托在一部著作里描述了这一过程，并且为这部著作取了个深具挑衅性的书名：《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这个书名指涉的对象是“光辉道路”游击队(Shining Path)，原本是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后来成为秘鲁政治上的主要反对势力。如同其他许多革命势力，他们也借着动员落脚城市里深感挫折受困的第二代居民从事暴力活动，而对国家的健全造成威胁。他在书中指出，只要赋予市郊地区的乡下移民房地产所有权，并且简化创业程序，就是终结贫穷、建立中产阶级的绝佳方法，远优于光辉道路的激进做法以及民粹政府由国家驱动的官僚式解决方案。

德·索托传达的信息造成了戏剧性的效果，不仅在南美洲，在美国华盛顿更是如此。他的方法成了发展中世界各国政府的正统做法，数以亿计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口也可能因为他的影响而取得稳固的土地所有权。有两个因素促成了他这种做法的普及：第一，他在推动这种措施的初期，对大多数形态的国家再分配都持反对态度，这种立场深得当时美国共和党政府的欢心；第二，他的观念也获得立场保守而且亲美的秘鲁总统藤森大力倡导。

20世纪90年代期间，在《另一条道路》的鼓吹之下，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及其他致力于消弭贫穷的机构于是将“正式化”一词奉为圭臬。他们终于把注意力转向落脚城市，并且找到了一项解药：住宅所有权。德·索托的智库——自由与民主学会——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咨询，推广正式化的观念，数十个国家都在20世纪90年代采用了这个机构的建议，为占地居住的人口赋予产权契约。2000年，德·索

托又出版了另一本更畅销的著作：《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tial*)，在书中提出这项惊人论点："第三世界与前共产国家的贫穷人口所持有但非合法拥有的房地产，其总价值至少达八点三兆美元。"他指出，只要让穷人对自己的住宅取得正式所有权，从而解冻这笔资金，造成的经济效果将相当于核爆炸，瞬间释放出极为大量的闲置资金，而得以在西方与东方世界建立新的中产阶级。

他的观念在部分地区非常成功。我们先前已经看过，巴西为占地居住人口赋予土地所有权，结果大幅减缓贫穷现象，并且产生了一群中产阶级。土耳其把乡下移民在市郊地区自行建造的盖奇康都住宅大量合法化并且赋予居民所有权，结果催生了一群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带来了经济与政治的复兴。此外，许多研究也发现，在泰国、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与秘鲁等国，赋予所有权使得穷人拥有更多金钱进行投资，也减轻了取得及持有土地的沉重负担。印度也有不少城市因为采用这类方案而获得一定程度的成果。

但在其他地区，单纯赋予土地所有权却无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哥伦比亚与墨西哥，土地所有权并未让人更容易取得贷款(不然就是虽有帮助，却没有人加以利用)。在约旦，所有权并没有提高居住的安定性，也没有创造更多的投资。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项针对这类方案所进行的研究发现，所有权反而削弱了新进地主的安全感，导致他们面对政府与企业只能采取守势。在加纳与尼日利亚进行的其他研究则发现穷人如果在不必缴税的非正式经济体系当中保持着占地居民的身份，有时候反倒能够过着比较好的生活。有些研究更指出，正式化虽然为大量的贫穷人口提供了晋升中产阶级的管道，但对于最贫穷的人口却反倒有害，因为他们甚至连踏上这个管道的资源都没有，结果就流落街头或者赤贫的乡下生活。

即便是原本的秘鲁经验，一开始也没有获得极佳的成效。经济改革虽然在贫民窟里短暂造就了一群中产阶级，但藤森狂热推行的手法却导致了人称“藤森震撼”的现象。恶性通膨虽然因此获得遏止，国家财政也恢复平衡，但秘鲁人民却饱尝工资下跌、粮价上涨与贫穷现象增加的苦果。有些落脚城市居民虽然得以跨入中产阶级，却有更多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都市人口反倒陷入贫穷。明显可见，单纯的土地所有权并非摆脱贫穷的保证，而是必须还有其他要素的配合。从我观察过的数十座落脚城市的经验来看，土地所有权显然极为重要，也是乡下移民及其后代广泛渴求的目标。但如果没有政府资助的各种昂贵服务与支持，土地所有权能够发挥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这项结论已获得世界各地的研究证实。这些研究显示，要促成社会流动，不但需要赋予所有权的措施与健全的市场，还需要国家的积极支出与介入。一份分析报告指出：“落脚城市需要福利导向的政治意志与力量，经济关系的正式化在其中虽然具有重要地位，却绝不足以构成充分的基础。”美国的一项研究也指出：“真正的居住安定必须受到地方学校与工作机会、医疗机构、供水与下水道服务以及运输网络的支撑。此种必需品和便利设施构成的综合体可为房地产赋予价值。如果没有附属的服务与基础建设，单纯的所有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由这种措施以及许多家庭的经验——例如巴西的马佳赫斯与印度的帕拉博这两家人——我们可以归结出一项对社会主义左派与自由市场右派都不讨好的结论：要促成社会流动，为贫穷的乡下移民开创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就必须对民众广泛持有的私人资产开放自由市场，也必须有个强大而且具有决断力的政府愿意重金资助这项转变。这两项条件一旦齐备，改变就会随之发生。

第十章

在都市立足扎根

密集度，自发性，独立自主

斯洛特瓦特，阿姆斯特丹

默哈默德·马拉欧赫在阿姆斯特丹的西霍普机场踏出起飞自马拉喀什的班机，搭乘火车抵达阿姆斯特丹西部市郊，对眼前一片葱绿的几何图样深感讶异。他的故乡是摩洛哥北部山区的一座村庄，村里尽是泥土砌成的低矮小屋；后来他又在马拉喀什嘈杂混乱的外来移民飞地住过；所以和先前的居住经验比较起来，眼前显然是一片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

在他眼中看来，这里就像是一座小孩的模型城市，满是看起来不尽真实的树丛绿地，仿佛是用乐高积木和绿色毛毡铺成。为了与阿姆斯特丹以密集繁忙著称的市区形成对比，斯洛特瓦特这个规划住宅区满是一幢幢低矮宽阔而且排列整齐的公寓建筑，建筑之间都隔着大片绿地，而且每一幢公寓周围都环绕着一排草坪和树木，然后才是宁静蜿蜒的街道。此外，这座小区和喧闹的市中心还隔着一大片森林公园，只有几条高架道路从中穿越而过。当初荷兰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兴建斯洛特瓦特与面积更大的奥维图瑟区（Overtoomse）以取代遭到轰炸摧毁的工业区。这里原本是荷兰劳工的通勤住宅区，除了狭小的公寓之外，只有主要道路上看得到几家商店，以便保有住宅区的宁静，避免商业与资本主义的摧残。建筑与建筑之间都有许多为行人辟建的公共广场。

如同欧洲各地的许多市郊小区，这里的规划也是受到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与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的启发，认为良好的生活必须依据功能而严格划分工作、居住及娱乐的区域。严格的区域划分因此落实于这些小区。在建筑效果图里，公共广场上分布着一簇簇互相交谈着的白人群众，仿佛相当享受室外的环境。

“一开始，这里看起来非常完美，”默哈默德说，“就许多方面而言，这里也的确是个居住的好地方。可是我在斯洛特瓦特才住了几个星期，就发现这里其实有着很严重的问题。这里成了外来移民的监狱，完全与外界隔绝。”默哈默德从摩洛哥来到这里从事学校教师的工作。他在1992年抵达的时候，斯洛特瓦特的四万五千名居民约有半数都是摩洛哥移民（还有不少土耳其少数族群），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偏僻乡下的瑞佛山区，也就是他的故乡。这些移民自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陆续抵达，在这个以生育率低著称而且经常出现高就业荣景的国家填补劳动力短缺。

“我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里的孩子几乎都不会说荷语——没有人能够协助我学习这里的语言，而且他们也没有学习荷语的理由和动机。”接着，一如大多数来到这里的访客，他注意到的下一个现象就是公寓阳台上到处都可见到圆盘状的卫星天线。这正是荷兰人所谓的小耳朵城市：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都市孤岛，通过电视与马格里布（Maghreb，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五国统称）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保持联系，与荷兰则几乎毫无连接。默哈默德对国立学校的硬件设施及教学质量之低下震惊不已：只有最差的教师愿意到这里教书，结果导致这里的教育水平下滑，非移民居民则纷纷到小区以外的学校就读。出生于摩洛哥的年轻人有三分之一从高中辍学，不但找不到工作，也不具备工作能力，因此极易走上吸毒与犯

罪的道路。这些人聚集在公寓大楼之间那些荒凉冷清的公共广场与林间空地，导致整个小区变成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犯罪率高得令人咋舌，居民觉得自己被困在这里，而且又孤立无援：光是从一栋公寓走到另一栋就是一段漫长恐怖的路程，更别提往返于斯洛特瓦特与阿姆斯特丹。默哈默德对于自己居住的这座小区因为状况不佳而与荷兰社会断绝联络深感不安。对于这种环境所产生的宗教次文化更是惊恐不已。沙特式宗教的激进禁欲虽然从来不是摩洛哥乡村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却极为盛行。荷兰访客来到这里，看到斯洛特瓦特的阿拉伯人以小牛脑为食，女性穿着罩袍，而且对虔诚的信仰要求极为严格，于是认定这些居民冥顽不灵地坚守乡村生活，并把这种顽固不变的原始文化强加在城市之上。

默哈默德深知实情并非如此。斯洛特瓦特的保守文化不是摩洛哥乡下地区的文化，也不是荷兰的都市文化，而是一种混杂而成的新产物，是一群受困的人口所创造出来的移民文化。“社会体制一旦把一群人排除在外，迫使他们只能在外面观看着这个体制，却无从参与其中，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在学校里一面看管着阿拉伯学童，一面这么对我说，“这里的居民生活在两种文化的矛盾当中，不得归属于任何一边。他们父母的文化不欢迎他们，学校也没有协助他们融入周遭的社会。我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都一心想要成为荷兰人，可是在这里根本没办法达成这样的目标。他们和荷兰没有任何接触，只好自己发明了这种新文化。这种情况不论对他们还是其他人都没有任何好处。”到了21世纪，这种引人不满的孤立状态终于掀起抗争，从而对荷兰社会与国家的核心造成威胁。

默哈默德·马拉欧赫对于移民第二代青年茫然孤立的人生深感忧心，而荷兰遭受的威胁正是源出于这么一名年轻人。布耶里（Moham-

med Bouyeri)在 1978 年出生于斯洛特瓦特，父母都是乡下移民。他在高中时期辍学，结果发现自己无法融入经济体系，又与婚姻破裂的父母极为疏离，从而迷失在斯洛特瓦特的内部执迷当中。2003 年，仍然住在斯洛特瓦特的他投入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怀抱，把一群自命为殉道者的人士组织成一个深深信奉宗教激进主义的团体。2004 年十一月二日，他展开行动，对备受争议的电影导演特奥·梵·高(Theo van Gogh)发动伏击，朝他开了八枪，接着又割断他的喉咙，再用一把短刀把一本五页的小册子钉在他的尸身上，小册中号召杀害若干高阶政府官员。斯洛特瓦特爆发的这项暴力行动对荷兰社会与政治产生了黑暗而深远的影响，反外来移民的极右派政党因此得以在选举中攻城略地，这项议题也长年支配着荷兰政治。默哈默德忧心地看着自己的社区变成西欧最令人惧怕的地区。他的学生也仍然不断陷入和布耶里一样的陷阱。他们不是加入犯罪帮派或深怀不满的清真寺，就是成群游荡在斯洛特瓦特宽阔开放的公共广场与空荡荡的绿地上，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这座城市当初以乌托邦为目标的设计规划更是一大嘲讽。

布耶里的罪行也在地方层面引发一种新式的政治发展，并且催生了一种不同的落脚城市。遭到梵·高尸身上那本小册子点名的阿姆斯特丹市长科恩(Job Cohen)，明白这是移民未能立足所造成的政治发展。就在这时候，斯洛特瓦特的不少外来移民也意识到，他们的落脚城市长久以来一直都是由社区以外的人士加以规划管理。于是，他们开始追求自我治理。马克奇(Ahmed Marcouch)是斯洛特瓦特市议会第一位来自小区内的议长。他在 2006 年当选之后，随即打破一般人先入为主的观念，推行了乡下移民希冀已久的许多措施：强化警力与治安，成立取缔帮派的巡逻队，以及一支吓阻逃学青少年的自行车骑警；扫荡地下清真寺与极端主义组织；并且游说政府改善学校与公共服务的品

质。他与科恩会面，结果这两人虽然分别是前摩洛哥村民与犹太裔荷兰律师，却一拍即合，为斯洛特瓦特带来了令人震惊的转变，试图抹除这座小区过往的一切。

在梵·高遇害五年后，斯洛特瓦特成了一大片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工程吊车、挖土机和粉碎机。不再有整齐匀称的规划，不再有宁静蜿蜒的巷道，不再有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绿地；取而代之的是嘈杂热闹、充满店铺的市场广场，供车辆与行人通行的笔直街道，以及一幢幢的建筑，地坪、设计与高度都各自不同，全部密集聚在一起，外墙面对街道，上层为公寓住宅，地面楼层则是商业空间，后方还有游乐场地与购物商场。这座由建筑构成的垂直峡谷是新小区规划最激进的一个角落，看起来犹如 20 世纪 20 年代的工业仓储区，也正是斯洛特瓦特这种绿意盎然的乌托邦住宅区在当初所要取代的高度密集城市小区。

先前，斯洛特瓦特是一座从直升机上鸟瞰或者从城市规划师的观点看来相当美观的小区。不过，阿姆斯特丹却突然转向，决定把这里变成一座在乡村移民眼中看来适宜居住的地方。这里的住宅变得密集许多，不只是因为居民希望如此——这的确是他们的强烈盼望，为了安全、便利与商业等因素——也因为政府认为人口密度提高有助于社会的凝聚和繁荣。区域限制已几乎完全废除，因此零售、轻工业与商业服务都可与住宅杂处于一地。商业及执照核发的法律都已放宽，所以民众要开店或开公司就不必再经历太多的文书作业，甚至也不必具备完全的公民身份。

此外，原本的社会住宅公寓旁又增建了公寓大楼，价格虽然超出第一代摩洛哥与土耳其移民的经济能力之外，年轻的荷兰夫妇与部分的移民第二代与第三代却可能负担得起。这是刻意规划的结果，目的在于和既有的都市文化建立一个联系接口，吸引想要买房的中产阶级进

入这个小区，期望能藉此产生混合交融与相互影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有些住宅大楼在一楼推出了价格非常低廉的工作室空间，以供创意行业使用，盼能吸引年轻的市区企业家与艺术家进驻，从而促成外来移民与艺术家的交流，产生像伦敦的老斯毕塔菲尔德以及曼哈顿下东区或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德派普(De Pijp)与乔丹区(De Jordaan)那样的活力。简言之，这是一项强力推行的措施，盼能复制当初在大城市的商业与工业区所产生的城市幸福：藉由把斯洛特瓦特营造成那些成功地区的模样，也许能够扭转这座落脚城市发展失败的命运。

这种措施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是能够化解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方法，但科恩告诉我说，从他先前处理外来移民的危险飞地所获取的一项重要经验，他认定充满暴力与威胁性的种族文化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产物，源自设计不良的城市形态或经济结构。“我认为，”他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元素的关系，种族元素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也不会那么重要……我认为阿姆斯特丹的种族隔离问题和收入水平和能否融入社会有关，而不只是种族背景的问题——在移民当中，低收入迫使他们住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这也正是他们受到隔离的唯一原因。”他抱持着强烈的环境决定论，认定意识形态与态度是物质环境形塑而成的结果。只要改变这座小区的外观与形态——让这里变得不那么整齐、规划得不那么严谨、不要一切都事先决定好——就不但能够让这里和阿姆斯特丹建立实质与经济上的连接，也能够解决落脚城市失灵的其他不少根源问题。这么做将可创造一套内部经济——开始先以地面楼层的商店与服务为基础，最后终将产生一群下层中产阶级。这么做将可发展出一个运作良好的房地产市场，让生意经营成功的移民人口能够买下自己的公寓。如此一来，又可从市区吸引一批外来的中产阶级。理想上，这批外来中产阶级将能够和新兴的移民中产阶级交流融

合，从而解决落脚城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学校的低下质量。小区里一旦出现融合各个种族的学生群体，而且父母又都具有影响力，学校自然就会受到鞭策，必须拿出更好的表现，吸引最优秀的老师。

这项称为“新西方计划”的方案确实深富野心，但目前要判断是否能够成功还嫌太早。斯洛特瓦特的犯罪率已经有所下降，但帮派仍然猖獗、宗教激进主义与贫穷等问题也依然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这项“去规划”的重大投资将可带来正面的结果。这种做法在阿姆斯特丹曾经奏效。实际上，这种做法曾经在更大规模的情况下发挥效果，成功转化了另一座危险的小区。

在科恩主导下，位于阿姆斯特丹东南方的庇基莫米尔（Bijlmermeer）经历了一大转变，许多人皆称之为现代史上最大幅度也最猛烈的落脚城市转变过程。这座小区兴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斯洛特瓦特同样采用乌托邦式的规划理念，但规模更加庞大，共有三十一幢占地极广的十层楼公寓大厦，建筑之间都保留了宽阔的空间，在这片完全摒除商业活动的绿地与公共空间里容纳了六万居民，且由一条绿色地带和市区隔开。这里从来不曾有过成功的机会。这座小区在物质与心理上都孤立于城市的社会及经济之外，结果吸引了许多来自前荷兰殖民地苏里南的乡下移民以及荷属安的列斯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口。小区中有一大部分成为荷兰历史上第一座黑人占多数的城镇，而且整座小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居民是出生于荷兰的人口。这些种族群体和他们的小区成了凶杀、吸毒、游手好闲的贫穷人口与随机暴力事件的同义词。庇基莫米尔是外来移民立足失败的重大案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 80 年代初期经常被描绘为欧洲最危险的小区。数十年来，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设法改善这座小区的外观、管理、卫生及治安，但这些措施都没有意识到庇基莫米尔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乡下移民

缺乏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管道，在城市里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立足点。

最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阿姆斯特丹终于实行了富有远见而且手段激进的城市去规划措施，分前后两波拆除了所有的公寓大厦，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型公寓高楼，而且每幢公寓都有自己的花园，也拥有部分街道，并且在建筑物之间设置划分松散的区域，以供商店及小生意进驻，从而形成热闹而杂乱的市集。除了这项耗时十年的工作之外，政府也在阿姆斯特丹东南角落扮演了全新的积极角色，其基础包括一支强而有力的地方安全巡逻队，以及一个专为企业家提供支持并且为青年提供职业训练的市政组织。新建的地铁线促使这座小区发展为繁荣的商业及娱乐中心。到了 21 世纪初始，庇基莫米尔已被称为全国热门地点，也是网络城市的核心。这项改建方案也结合了一项目标明确的措施，致力于为外来移民在荷兰出生的子女改善教育及工作机会。现在，苏里南移民第二代人口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和收入水平都与荷兰人相当，而且他们的子女也都被认同为完全的荷兰公民。

在斯洛特瓦特四处林立的工程机具背后，目的就是要复制庇基莫米尔的成功经验。表面上看来，摩洛哥与土耳其乡村移民的处境虽然非常危急，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保持乐观。第一代移民虽然困在一个文化与经济的深坑当中，但他们的子女却拥有扭转落脚城市命运的特质，只要物质环境与政治方面的变革能够产生效果。虽然斯洛特瓦特的第二代居民约有四分之一都是高中辍学生（比例较出生于摩洛哥的第一代移民稍低），也可能终生过着缺乏工作能力、仰赖福利救济与社会住宅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已有大量的第二代人口顺利接受了高等教育：荷兰的摩洛哥裔青年（大部分都居住在像斯洛特瓦特这样的落脚城市）整整有三分之一都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这个比例是非移民背景的白人荷兰公民的两倍。这群高教育程度人口几乎可以确定必

然会形成一群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把斯洛特瓦特转变为完全不同的样貌，前提是这里必须成为成功人士愿意留下来协助下一代外来移民的地方。

荷兰人对于他们的落脚城市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作为？首先，他们强化了落脚城市的“密集度”。在城市规划的领域，“密集度”指的是一片既定土地上的人类活动量。直到最近之前，大部分的城市规划官员都认为穷人面对的最大威胁是拥挤、密集与混乱。因此，“低密度开发”被视为创造舒适住宅区的关键要素。许多城市采取的解决方案就是严格的区域划分与用途区分，并且利用道路与公共空间降低人口密度与土地使用的密集度。

区域划分与土地使用许可的概念至今仍然深受城市规划师的喜爱，因为他们大部分仍然认定城市应该明确划分为居住、商业与轻工业等不同区域，而且区域之间应该尽量不重叠。然而，世界上发展最兴盛的城市小区，都不是低密度或高度区域划分的小区。举例而言，曼哈顿的黄金地段、伦敦的肯辛顿与切尔西、巴黎的第六与第七区，都是人口密度极高，土地使用也极为混杂的地区。在发展比较低落的小区，贫穷的外来移民总是受困于低密度与高度区域划分的规划方式，无法从事自发性的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城市重新规划，欧洲对于惨遭轰炸摧毁的大城市所进行的重建，以及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英两国的城市重新规划运动，采用的都是这样的思考原则。不过，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城市愿景已显然遭遇了重大挫折。城市里低密度的计划住宅区不仅严重落后，也未能出现经济发展。这些小区的兴建时间正值发展中世界的乡下人口大量迁徙至城市，而这些移民一旦来到西方，就都只能住在这些发展失灵的小区当中。

除了高度密集的人类活动之外，成功的落脚城市也必须为居民提供自发性发展的空间。在新进移民聚居的小区里，一片土地上也许需要同时有住宅、商店、小工厂、聚会场所、礼拜堂，或是其中任何几项元素的组合，而且必须不断变化与演进。今天西方大多数的城市居民都明白市中心的核心社区必须具备自发性、有机性与弹性等特质。可惜的是，新进移民聚居处却很少拥有同样的创意，而且这些小区的规划者仍然一心认定房产与土地的用途必须严格界定划分。

我们已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到这种区域划分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投注了大量时间研究及欣赏这些大型区域规划师的作品，后来在 1958 年被派往报道费城的贫民窟改建计划。那项大规模改建计划就采用了严格的区域划分、低住宅密度与宽广的公共广场等概念，兴建了许多高楼大厦。"效果图看起来很美好，画面上还有许多小小的人，"她在多年后对我说，"后来我实地走访了那个地方，看起来就和效果图一模一样，问题是没有图画里的那些人。我在方圆几个街区的范围里只看到一个人，一个小男孩，神情落寞地踢着一个轮胎。"这座新小区的居民全都返回仅存的一小片旧小区（一座发展失败的非裔美国人落脚城市），坐在 19 世纪连栋房屋的前门阶梯上聊天。改建之后的公寓大楼以及毫无特色也毫无用处的公共广场，已不再能够让他们从事这样的社交聚会活动。旧小区虽然贫穷简陋，却因为人口密集、商店与住宅混杂于一处、充满私人空间、建筑与街道之间又无所隔阂，而具有人际交流、守望相助与创业的可能性。这也正是低密度住宅区绝不可能拥有的潜力。从一开始，新小区的居民就清楚知道这里会成为所谓的"规划住宅区"，其中的居民毫无在都市中立足的希望。

雅各布斯对于这项发现深感震惊，于是写下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

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指出城市小区应该被当成有机个体看待,必须依据居民的希望成长、变化以及发展各项功能,不该对用途、密集度或变化施予任何限制。这种自由而且有机的城市化观点受到许多人的认同,例如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证明了密度与集中的重要性,而建筑师暨城市规划师纽曼(Newman)也在1972年的研究报告《防卫空间》(Defensible Space)当中指出,密集而且与街道紧密相连的私有空间可以创造出自我监督与保障安全的社群精神。这些观念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城市思想家,对西方城市在20世纪70与80年代重振城市核心的作为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城市核心已经不再需要外力的介入引导。当今最需要这些解放观念的地方是住满了外来移民的都市边缘地带。雅各布斯针对这些市区小区写道:“当前的任务是提升城市人口的都市生活,只盼这些人口的住处具有足够的密度和多元性,能让他们拥有充分的机会发展都市生活。”在巴黎的市郊贫困地区、北美市郊外围区域的公寓住宅区、许多英国城市的公共住宅与德国都市的集合板块建筑,都很少见得到稠密的住宅、居民的自发性与用途的多元性。可叹的是,这些地区却正是乡下移民聚居的地方。改变这种僵化的观念不但必须耗费昂贵成本,而且非常困难,但由此带来的效益也非常高:大胆改变可能带来新兴的中产阶级,因循苟且则可能产生遭到排挤的社群,充满暴力又满怀愤怒。今天,有些城市已开始付出这样的成本。英国作家科曼(Alice Coleman)在1985年的研究著作《乌托邦城市的审判》(*Utopia on Trial*)探讨了庇基莫米尔及其他欧洲规划住宅区的孤立设计对社会流动造成的伤害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疾病”,结果阿姆斯特丹与伦敦的政府开始拆除这些住宅区,代之以比较具备有机性与连接性的规划。在

阿姆斯特丹的这些改建区域，在重新注入了活力的东伦敦，在马德里的新市郊，在多伦多市区的公共住宅区以及欧洲与北美的其他少数小区，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改变：人口更为稠密，规划较具弹性，小区也出现了自发性的发展。

现在，斯洛特瓦特终于能够自立自主了。这里一旦由占多数的乡下移民人口自行治理，就跟着出现了变化。这座小区的第一要务是治安。首位出身乡下移民的议会主席成立了"街头滋扰巡逻队"，也就是小区便衣警察团体，专门对付小罪犯以及成群结伙在街头上游荡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不但令人望而生畏，也阻碍了小型企业的发展；此外，巡逻队也负责执行逃学法规。斯洛特瓦特的第二要务是学校教育。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一项举动，就是新成立的内部政府施压阿姆斯特丹，要求终结小学与中学的隔离状态（主要是因为荷兰裔居民都把子女送到斯洛特瓦特以外的学校就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移民人口退缩至充满排他性的穆斯林学校）。提高学校质量的用意在于吸引各种不同人口。"我们想要建立一套制度，让民众对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小区，乃至对自己本身引以为傲，"默哈默德·马拉欧赫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好，变成荷兰人。现在，我们不再受困于两种文化之间，而是能够左右逢源，利用横跨两种文化的优势创业或接受教育。这是个开端。"

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只要一旦发展出有效而且关系良好的内部政府，即可将自己从贫穷陷阱变为通往成功的道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纳拉扬和同僚一起从事的一项重大研究发现，贫民窟社区一旦从内部发展出有效而且不腐败的民主政府，就会在各个重要领域获得改善——包括治安、医疗、卫生、交通。他们也发现，国家政府或大都市的政府对这类小区的资源投入，重要性其实比不上贫民窟居民自己所发

展出来的个人动力。毕竟，他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想要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

土地，连接，治安

卡拉伊尔，孟加拉达卡

马克苏达女士在天亮之前就从她那间由铁皮和木头搭成的小屋子出发，穿越一条条犹如迷宫般蜿蜒交错的狭窄小径，到湖畔行沐浴礼，接着搭上一艘站满了人的狭长竹筏，横越这座满是污水的湖泊进入市区，然后再沿着满是车辆的道路步行一段漫长的距离，抵达一家位于水泥库房内的血汗工厂，在里面缝制衣物十个小时，夜幕降临之后才下班回家，返回卡拉伊尔（Karail）这座人口稠密又嘈杂脏乱的社区。三十二岁的马克苏达容貌姣好，神情严肃，每天晚上都躺在床上，呆呆望着铁皮搭成的天花板，一面思念女儿一面啜泣。

她在九年前从东南方的贫困乡村来到这里，身上带着家人存下的一笔钱，心中怀着在社会中向上攀爬以及在成衣工厂里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梦想。卡拉伊尔提供了她所追求的目标：这里的人口密集程度与混乱程度都远高于达卡的其他贫民窟（而且经常淹水），但因为经济繁荣，通往达卡的交通又颇为便利，所以构成了开创新生活的基础。一切原本都相当顺利，但后来担任人力车夫的丈夫却离开了她。马克苏达虽然是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没有了先生的协助和收入，她就无法在

这里养育女儿，赚的钱也不够提供女儿吃穿以及白天的托育费用。于是，她只好把八岁大的女儿，也是她唯一的伴，送到慈善学校——实际上是孤儿院。她们每个月见一次面。“我之所以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做这样的工作，原因是我必须找到方法把女儿接回来，然后送她到学校接受教育，”马克苏达一面搓着手，一面对我说，“她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唯一的心思，我唯一的梦想。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为什么会让她沦落到这样的处境。”

马克苏达的一生，她追求成功的一切努力，在一瞬之间才发现原来都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她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也都有同样的发现。住在隔壁的嘉茨娜·乌札尔原本也过得不错，但他们的家却在几年前遭到洪水淹没。她和家人只能躲在天花板的梁上，眼睁睁看着家中的财物全部被水冲走。至今她的子女还会做噩梦，梦到毒蛇漂进他们家里，而且又因为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梦境内容也就显得更加逼真。嘉茨娜和她先生的噩梦更糟，因为他们的存款全都没了(贫穷的孟加拉国民众都习惯把嫁妆储蓄藏在床垫底下)。

高尔山(Gulshan)是达卡最热门的住宅区。从这里的公寓大楼往外望，卡拉伊尔就位于地平线上，只见众多的铁皮屋顶覆盖着市区湖泊上的一座狭长半岛。我刚到这里的时候，高尔山的居民虽然每天都看得到那片贫民窟，却似乎没有人知道那里该怎么去。在这些比较富裕的孟加拉国人眼中，卡拉伊尔似乎是个稠密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口聚居地，或者该说像是大都市的寄生物：远远只可见到数以百计的人影抓着孩子在湖里洗澡，或者钓鱼，或者生火做菜。聚居在这片稠密区域的人口介于一万六千至两万人之间，所有人的住处都彼此紧邻，以致屋顶和屋顶间完全看不出空隙。

经过一番探索之后，我在高尔山的高楼之间发现了一座隐秘的湖

畔小湾，停泊着数十艘狭长的竹筏。我交给船夫一枚硬币，战战兢兢地踏上一艘木筏，横越那座恶臭的湖泊，踏上满是垃圾的彼岸之后，卡拉伊尔那看似一整片的灰墙也就显露出许许多多狭小的通道，蜿蜒于木头墙壁和铁皮屋顶之间，每条通道都差不多只有一公尺宽。穿越这些巷道之后，即可连接到比较宽广的泥土街道，是从外面看不到的。街道两旁满是店铺，还有各种服务业与小型工厂。我路过一家理发店、几间DVD出租店、一座人满为患的电玩游乐场、数百个饮食摊贩、一整区的五金商行、干货店铺、烧陶窑、木工坊、金属工厂、塑料模工厂，以及雇佣了数十名员工的成衣制造厂，全都是由碎石片和废弃物搭建而成。数千名儿童赤脚跑在街上，如果不是涌入两片泥土空地玩耍，就是到唯一的一家电玩游乐场去。这些孩子都没人照管，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必须到湖泊对岸的市区从事缝制衣物或家事服务的工作。在这里，儿童托育及小学的资源都少得可怜。

在一条巷道旁的水沟里，可以看到十几根口径一公分多的水管。这是当地居民自行设置的淡水供应系统，以这些水管连接远处的自来水总管，水管如有破损就以胶带修补，因此每隔几公尺就可见到水沟里喷出细密的水雾，而且不时都可听到喷水的嘶嘶声。每条水管供应五至十个住户的用水，收费系统则是相当复杂。电力（这里的所有居民都享有电力）和有线及卫星电视（收视家庭达三分之二）的网络也同样复杂。不论在小巷道或是简陋的小屋里，日夜都可听到各种声响，包括牲畜、音乐、电视、烹饪、儿童玩耍、邻居讨价还价或高谈阔论、婴儿啼哭、引擎运转和缝纫机的噪音，还有家庭争吵以及泼水的声音。这里有着细腻的组织，也充满了丰富的活动，脆弱但是实在。

卡拉伊尔看起来不宜人居，但这里却住满了人。他们不但是自己选择了这个地方，而且是用尽努力才来到这里。这座小区建立于20世

纪90年代初,所在位置是属于市政府水电发展局所有的国有保护地。这里的居民都受益于孟加拉自从21世纪初始以来长达十年的权力真空。他们利用这段没有政府的时期涌入这座稠密的岛屿,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政府干涉。为了住进这里的房屋,许多人都必须付出相当高的房租。我访问的居民,大多数都说他们是从其他落脚城市小区搬到卡拉伊尔来的,尽管那些小区的居住条件比这里好,但卡拉伊尔却更接近于许多良好的工作机会。这里大部分的居民都在成衣工业工作,不然就是在高尔山的中产阶级公寓里担任佣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工厂与电子业的工作可以找。

有时候,这些工作机会可以让人迅速获得成功。乌札尔·米亚是个二十一岁的男子,身材高瘦,蓄着一头蓬乱的长发,神情举止显得很有耐心。他在十一个月前随着父母从库尔纳区(Khulna)来到这里。库尔纳是个贫穷又易于淹水的地区,位于西南方的恒河三角洲。当时他们家状况极糟,他们的稻田因为经常遭到咸水淹没而变得无法耕种。以前,乌札尔也会在特定季节前往达卡赚取现金收入补贴家用,而在一间办公室学会了基本的配线技术。后来,一名同村的友人带着他们一家到了卡拉伊尔,并且在小区厨房周边帮他们找了一间两房小屋,乌札尔也就立即在邻近的一座数据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配置以太网络线。这份工作的月薪为五千塔卡(七十五美元),比大多数成衣工人的收入还高。他父亲卖掉了他们的田地,然后利用所有积蓄在贫民窟里开设了一家卖菜的小店铺,每个月约可赚进七十五至一百美元。两房小屋的租金是二十五美元,水电费用则是房租的两三倍之多(一如其他地方,贫民窟居民支付的水电费是全市最高的),但他们已不再需要寄钱回村庄,所以也就能够储蓄。乌札尔说他希望能够学会更高深的电子技术,但他不太确定该怎么达成这项目标,因为他的同事大多也是

来自乡村的移民，同样没有多少都市经验。“我想做些其他事情，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这样的希望，”他在炉灶前对我说，“不过，就算我们有了比较多的钱，我们也还是会在这里继续住上几年。现在这里已经算是相当平静了，不像早期犯罪那么猖獗。现在，住在这里真的很不错。”

不过，卡拉伊尔却有太多人都陷入了贫穷的陷阱，而像马克苏达和她的邻居那样沦落于骨肉分离或丧失所有存款的困境。卡拉伊尔有潜力成为成功的落脚城市，却因为缺乏支持而显得摇摇欲坠。这里几乎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唯一的例外是援助机构挖掘的水井，以及选举期间到处可见的竞选海报。（这座贫民窟在 2008 年的选举中支持后来胜选的民盟党，因此前途颇为看好。）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的孩童，都必须横越湖泊到高尔山这座中产阶级小区里的一所学校上学；而且卡拉伊尔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儿童托育设施或托儿所。没有国家的介入或者房产所有权的保障，小小的意外就可能毁掉个人的一生，造成危险的不稳定性。许多人就是因为遭到意外的灾害，尽管拥有良好的工作，却不得不空手返回乡村。

如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卡拉伊尔也可能有机会发展为成功的落脚城市，但无疑迫切需要外来的帮助。这里因为缺乏重要的基础建设，以致无法建立关键的便利设施。许多基础设施的成本都非常高：例如稳固而且防洪的房屋地基与道路的铺面；学校及托育设施；卫生、下水道与排水系统。在既有的贫民窟里建构这些设施又比小区存在前事先建设来得昂贵（后者是西方常见的做法）。对于孟加拉这么一个贫穷又充满贪腐的国家而言，这种支出更是难以想象。

面对像卡拉伊尔这样的地方，政府与各式机构的传统反应一向都是以推土机将其夷为平地，而且通常都是在黎明展开行动。所幸，卡拉

伊尔的居民并未遭遇这样的命运。达卡市政府显然打算实行比较深思熟虑的做法。2009年，官方宣布把卡拉伊尔纳入一项耗资五百二十万美元的计划，由英国国际发展部与孟加拉国的非政府组织共同推行。这项计划将通过基础建设与发展小型企业，试图改善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并且减少贫穷现象。不过，这项计划的具体细节尚未决定；届时这项计划所确立的方向，有可能协助卡拉伊尔的居民把这座小区转变为一个协助外来移民在都市立足并且获取成功的繁荣中心，也可能导致这里陷入更深的孤立与穷困。

在当今这个外援的价值与效果都备受质疑的时代，落脚城市正是少数仅存的管道，能够让国际协助真正产生长久的效果并且转变居民的人生。扭转这些小区的命运（或者为他们本身的网络以及自治机构提供扭转命运的工具）将是一项特别成果丰硕又稳固的援助投资，因为健全的落脚城市将可服务好几个世代的外来移民，并且为都市与乡下的贫穷群体带来不只一项的效益。这么一来，即可在乡村与城市双双减少贫穷现象、提高生育率，同时也因为人口集中于城市而产生有益生态的效果。就许多方面而言，落脚城市正是能够让外援发挥效果的一个管道。

不过，世界各地对于什么样的措施最有益于这些小区却充满了茫然。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对这些社区的功能缺乏了解。然而，只要一旦把这些小区视为落脚城市，具有一套在辩证上彼此相关的乡村与城市功能，就比较容易设计政策以促成这些小区的成功发展。

任何改善落脚城市住宅的措施都免不了一项根本的矛盾。一旦对贫穷的非正式小区投注资金并且赋予官方的认可，就会提高这些小区的价值。而这些小区的价值一提高，各项便利设施也更为充足，吸引的人口就不再是乡下移民，而是来自核心市区的下层中产阶级。就某种

程度而言，这种现象确实有其益处：由此造成的社会融合能够吸引创业资金与利润丰厚的消费市场，让落脚城市的发展变得更容易。不过，对于未来的乡下移民而言，这么一座小区也可能因此变得遥不可及。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过内罗毕基贝拉的例子，住宅改建方案一旦把居住水平提高到法定最低标准，即可能导致房价上涨，超出乡下移民的负担能力。不过，当今不少改善贫民窟的措施都不会过度扭曲市场(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可让贫穷居民获益于房价的提高)。这类措施大多数都涉及乡下移民的直接参与。其中一种措施以土地为起点。大多数的贫民窟升级计划之所以需要非常高昂的成本，原因是这些计划都必须在既有的小区当中兴建基础设施与稳固的地基，而这样的工作本来就极为不易。把非法而且非正式的自建住宅转变为所有权明确的合法房产，并且具备坚固的质量与良好的卫生条件，是一项极为艰困的工作，这点我们在第二章探讨里约热内卢的圣马塔改革方案之时就已提过。亚洲与南美洲许多备受赞誉的贫民窟升级计划，涵盖范围其实都只有少数的指标性地区，原因就是所需的公共投资非常庞大。任何落脚城市改善方案的成功关键，都在于必须找出适当的机制，利用土地价值的提高为改善方案提供资金来源，同时也对乡下移民产生支持效果。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如果能在乡下移民涌入城市而大量兴建房屋之前预先介入，大部分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事先解决，不仅成本较低，乡下移民的生活质量获得改善的幅度也会更大。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具有远见。面对问题，坦承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现象不但无可避免，而且就许多方面而言其实有益。

如果要目睹这种观念最强烈也最有效的落实成果，就应该到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东南端走访一番。在那里，一片位于深谷边缘的低矮丘陵农地正铺上一条条道路、装设一根根的电线杆、开挖一段段的公用设

施坑道,并且把土地分隔为一小块一小块。这项计划称为乌斯梅(Usme)新城市计划,用意即在为目前还没动身出发的乡下移民建造一座未来的落脚城市。这种做法称为“地点与服务”,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深受世界银行官员的喜爱,后来却普遍不再采用,原因是预先规划土地导致土地价值大幅扬升,以致贫穷的乡村移民根本负担不起。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于是改用其他成本更高的贫民窟升级方案。不过,波哥大的新城市计划(以及巴西阿雷格里港与哥伦比亚佩雷拉等地的类似方案)却翻转了这种做法,改采一种柔道式的土地开发策略,把房地产投机活动倒转过来,反而有益于乡村移民。这项计划将在九百公顷的土地上设置地基,可供二十万新进移民兴建五万三千栋住宅。之所以挑选这个地点,原因是这里接近波哥大市区,不但有利于居民搭乘廉价快速的既有通勤电车,下水道与供水管也不必延伸太长的距离。

乡下移民可取得具有各项基本设施与完整所有权的地基,而且价格和不具合法性的偏远空地相差不大。另一方面,地主虽然只能取得微不足道的农地征收租金,却可分得规划后的建设用地以供使用或出售,因此他们也能分享地价上涨的好处。藉由这种方式获得的私益虽然比不上自行开发土地,风险却也比较低。国家必须事先支付开发费用,但可在部分土地上兴建购物、商业与住宅设施而于事后回收这些资金。因此,借着预支未来繁荣发展的成果,这么一座落脚城市即可具备较佳的质量,并且能够成长为兴旺的人口聚集中心,拥有自己的中产阶级。

卡拉伊尔要采用这种做法虽然已经太迟,但仍可利用其他价值获取工具协助既有城市小区里的贫穷人口。许多贫民窟改建计划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是那些计划只把居民迁人看似质量较佳的住宅,却忽略了落脚城市的重要功能。在卡拉伊尔这种地区,原本的贫民窟住宅虽然

脏乱简陋，却具备“弹性”这项重大效益：房间与楼层都可按照家庭的需求而增添，而且部分空间也可以用来经营商店或小型工业，从而带来创业收入。这种住宅也和住户网络、交通路线以及促成富裕和持久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密不可分。在经过规划的公寓住宅区里，不论设计得多么周详，通常也还是不免丧失这种特质，因此居民通常不愿迁入纯粹只是个房子的住处。

不过，这种现象同样也可以翻转过来。在孟买，若干公寓住宅安置计划因为以下几个原因而受到贫民窟居民的支持（甚至由他们主动提议）：因为既有的贫民窟住宅位于危险、狭小、陡峭或易于淹水的地点；因为既有的贫民窟与大众运输设施缺乏连接，或者交通不便；因为既有的贫民窟邻近于危险或气味恼人的工业，例如皮革鞣制工厂。在这些例子当中，研究人员发现贫民窟居民之所以愿意搬迁，不只是因为居住质量可获得显著改善，更因为住宅的转售价格会比较高。我们先前见过，贫民窟居民和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样，也乐于抵押住宅投资获取创业贷款或换取较佳的住宅（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的渴望可能比西方中产阶级更为强烈，因为房产通常是他们唯一的资产）。孟买的贫民窟居民有百分之八十五“拥有”自己的住宅，尽管这些产权不一定合法。而这些屋主都乐于参与这种改善居住质量的算计活动。在某些案例中，贫民窟居民甚至乐于以一个家庭两百美元的头款（这笔金额相当于他们数个月的收入）买下改建计划所兴建的公寓，藉此搬进未来具有财务价值的住宅里。

建筑的大小通常是关键所在，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小区一旦繁荣发展，经常会出现一排排一楼为店面的五层楼建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展，原因是这种建筑形态正适合自治的小区。菲律宾裔加拿大学者拉奎恩曾对各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提出贫民窟改善的建议，他认

为没有电梯的五层楼公寓是极为理想的设计，不但能够提高密度，也能维持社群人际网络的紧密。“到了一个阶段，光是具备各项便利服务还不够，而必须提供居民可以接受的住宅。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电梯的五层楼公寓，”他说，“公寓大楼一旦超过五层楼高，就需要电梯、电力与卫生设施，因此价格也就会超出居民的能力范围。但刚好五层楼的高度，就可以多出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以供经济发展。”

尽管如此，当今许多最成功的贫民窟改善计划却都是奠基于一种成本高昂但相当可靠的做法，也就是对既有的贫民窟住宅进行改建、合法化以及供应各项便利设施。这种做法可以逐步施行，先在一项计划中增建下水道，在另一项计划中装设路灯，再以另一项计划补强地基——这就是巴西的“法维拉”与土耳其的盖奇康都小区所采用的改善方式，由历任政府陆续筹措小笔金额推行个别计划。不过，里约热内卢的圣马塔小区所采取的做法也有优点。在那里，卢拉总统发动了快速而昂贵的全面干预措施，由保安部队带领政府各部门进驻贫民窟小区，从事全面性的改造。这些改造措施都具有互相支持的效果，同时推行可确保既有的居民取得所有权，避免较为富有的外来人士赶在改善措施完成之前收购房地产。

明显可见，单靠房产价值的提高并不足以让乡下移民顺利在城市立足。乡下移民除非因为经营小企业成功而存有大笔积蓄(这种现象偶尔可见，也应该通过乡下发展措施促成这种现象的普及)，否则迁入城市的外来移民仍然需要国家的协助。落脚城市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也是自由市场从来不会提供的要素——就是成为正常都市小区所需的工具。

下水道、垃圾收运及铺面道路都是显而易见的必备条件，也只能由外来力量提供。不过，在贫民窟居民明智的看法当中，更重要的元素其

实是公交车：价格低廉而且时间固定的公交车服务，经常是小区繁荣与否的关键。一般人也许会以为排名第二的元素是电力与自来水，但这两者在贫民窟居民眼中根本算不上优先要素。他们通常会设法弄来自己所需的水电，而且正式的水电费用对贫穷住户而言可算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另外一项同等重要却经常遭到忽略的条件则是路灯。路灯装设费用不高，却对治安与房价都可造成具体影响。圣保罗有一座“法维拉”社区的道路全部装设了路灯，在夜间看来就比许多贫民窟那种黑暗阴森的模样显得安全许多，不论对访客或居民而言都是如此。

明智的市政府会利用成本回收机制资助这类改善措施，把一小部分的高价地段开发为商业、零售或中产阶级房地产，为新装设的便利设施提供资金。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必须先投入一笔资金，才能把贫民窟转变为健全的落脚城市。若要永久终结世界上的贫穷现象，最有效的做法大概就是对卡拉伊尔这类看似不宜人居的地区进行投资，促成其未来的发展。

仅求生存还是重振健全的城市？

松克里夫公园，多伦多

艾迪娜·赫秋萨虽然搭电梯已经有几个月，却还是不习惯，也觉得不太踏实，宁可爬楼梯。今天，她打算到伊克巴超市买些肉类，她先生希拉尔陪着她出门，轻轻拉着她的手按下电梯按钮。她在几个月前搬

进这间位于九楼的公寓之前，生活中唯一的电器就是一颗裸露的白炽灯泡，照着他们住处地面上的沙土，苍白的光芒穿越壁板，透入厨房底下圈养大型牲畜的地下畜槽。现在，她已迁居到地球的另一端，住在这座满是高楼大厦的稠密小区里，但即便已在这里住了几个月，生活中的收银机、提款机和市公交车在她眼中仍然显得极为吓人。

另一方面，伊克巴超市则是一大慰藉。这家空间宽敞的商店由明亮的荧光灯照明，地上堆着一包包沉重的稻米和谷类，货架上摆着一排排的香料，艾迪娜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自在，而且在店里的走道上也经常可听到熟悉的达利语。她和她先生经常到这里购物。希拉尔已学了不少英语，足以应付城里的生活，但艾迪娜还在小区中心上初级班而已，也只出没于松克里夫公园的街道，因为这里举目所见皆是来自亚洲的乡村移民。尽管她还几乎听不懂英语，她的七个子女却已讲得相当流利，而且他们只爱吃披萨，不吃香料饭，也不愿上清真寺。他们经常谈及要在年满十八岁之后搬出家里，这种行为虽是北美的习俗，看在他们父母眼中却深深不以为然。

希拉尔至少还有过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他儿时的家乡是阿富汗东北部邻近塔吉克边界一座叫做瓦尔纳(Varna)的小村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他还小的时候，他们村里只有四间房屋。后来好几年的时间里，他都随着季节更替而在喀布尔与塔吉克等地迁徙工作，到了1990年才返回瓦尔纳与艾迪娜结婚。那个时候，瓦尔纳已有十五间房屋，周遭则是一片荒漠。2001年，由于塔利班派系之间的斗争导致这座村庄沦为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于是他们只好被迫逃亡海外。在那之前，艾迪娜一直都只住在瓦尔纳。不过，希拉尔从喀布尔的友人那里听闻了一座名为多伦多的城市，据说那里的市区边缘有个适合他们去的地方。他们逃到塔吉克与巴基斯坦之后，随即渡海展开都市迁徙之旅。

艾迪娜与希拉尔穿着雪地靴，蹒跚地走在围绕着松克里夫公园中心的椭圆形大道上，周遭林立着战后兴建的公寓和单层楼的购物广场。这座小区通往市中心的交通相当便利，所在地原是赛马场，位于多伦多市区边缘一座林木茂密的谷地旁，原本是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士兵而建。艾迪娜和先生一同穿越伊克巴超市宽广的停车场，一面整理着头上的头巾。超市的土耳其旋转烤肉专卖柜前满是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与印度人。在成堆的米袋之间，艾迪娜被一个名叫玛丽安的三十岁女子拦了下来。她同样也是以达利语为母语，几个星期前才来到这里。她比艾迪娜年轻，没有小孩，在喀布尔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徘徊在这家超市里，神色紧张地找阿富汗同乡搭讪。她热情地向艾迪娜打招呼，问她是否愿意和她谈谈。

玛丽安说她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和她母亲、哥哥、哥哥的太太还有他们的三个子女一同住在一间两房公寓里。这是松克里夫公园常见的居住形态。这里的阿富汗家庭通常在客厅铺着一张大地毯，周围摆着许多坐垫，还有几只一再添加茶水的茶壶，全家人则睡在卧房的地板上。玛莉安至今仍无法把她先生接过来。“你的先生在这里?”她颇为唐突地问道，“他是怎么来的?”艾迪娜同意和她一起喝茶聊天。阿富汗人的人际网络已逐渐成型。艾迪娜相当羡慕巴基斯坦与印度人，他们在她所住的那栋公寓里盘踞了好几层楼，以垂直的形态复制了他们的乡村生活，也善于运用他们的人际关系，毫不迟疑地跨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鸿沟，利用各种方法把子女送进最好的学校。不过，就目前而言，光是研究移民申请文件以及上英语课就已经够她忙了。

玛丽安向他们道谢之后，随即前往新圆环，展开下午的值班工作。新圆环是一排商业区，其中几家店面贩卖二手衣物，按照大小、性别与季节分类展售。来自印度次大陆的移民首度面临加拿大的冬天，都喜

欢到这里选购他们需要的衣服。不过,新圆环真正的功能,则是为玛丽安这样的人提供经营小生意的训练:记账与盘点、零售空间租赁与执照取得、成立法人组织与税金。这排商业区由政府补助经营,其商业训练方案是一次雇佣数十名外来移民。对玛丽安而言,这是她与这座城市的核心经济首度搭上关系。在这里的两万五千名居民当中,她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能学得一技之长或自行创业,从而购买房子,脱离这个小区。

不过,就当下而言,她还无意离开松克里夫公园,甚至也无意搭乘公交车和地铁到多伦多的市中心一游。她虽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受过教育,却和初次接触都市生活的艾迪娜相同,认为她们目前还不该到椭圆形大道以外的地方。"在松克里夫公园,我们觉得自己就好像还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一样;可是我们一到市区去,就突然间身在加拿大了,"玛丽安说,语气中对于加拿大充满了敬畏与神往,"就目前来说,这里的人都对我们很好,我也比较喜欢住在外来移民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可以帮忙。"

松克里夫公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依照认知角度的不同,这里可以是通往都市生活的跳板,也可以是个充满孤立和贫穷的危险地区。这座小区确实相当贫困,是多伦多这座富裕都市当中最贫穷的地区。一项研究指出这里的家庭年收入平均为两万美元,另一项研究则指出这里的贫穷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这里的公寓大楼几乎全是私人出租公寓,根本不可能由住户买下来;而且,一个月一千一百美元左右的租金也不算便宜。此外,这里也存在着种族隔离的现象,高达百分之五十一的居民在家里以亚洲语言为母语,白皮肤的欧裔加拿大人在这里仅占极少数。因此,从静态观察的角度来看,松克里夫公园只能算是个贫穷的种族聚居地。

对于欧洲、北美洲与澳大利亚的政府而言，这正是落脚城市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要花费金钱与物力投注于这种充满了贫穷与种族孤立的地区？如果种族融合与经济繁荣是政府追求的目标，那么边缘人士聚居的落脚城市显然带来了相反的结果。不过，松克里夫公园却完全没有遭到这样的认定，不论是居民、当地机构的政府官员，乃至多伦多市政府，都没有以这样眼光看待这座小区。这里一直是个相当热门的地区，空房率几近于零，而且总是有许多人等着要住进这里的公寓。住进这里的居民通常来自乡村，并且持续保有相当惊人的纪录，普遍都能够在一个世代内晋升中产阶级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如同其他许多成功的落脚城市，松克里夫公园能有这样的成果，似乎也是因为这里来自国外的贫穷乡下移民都密集聚居在一起：人口的密集聚合促使这座小区发挥融合的功能，成为外来人口融入都市生活的平台。

松克里夫公园是个建立人际网络的地方，是乡下移民跻身中产阶级城市生活的过渡地区。不过，居民一旦成功转型之后，通常会搬迁到其他地方去。杰哈德是个出生于巴勒斯坦的加拿大人，目前主管松克里夫小区办公室，也就是这座落脚城市事实上的自治机构。这个机构非常繁忙，为贫穷的外来移民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过去，”他说，“松克里夫向来是个跳板或门户社区，外来移民在这住个几年，努力工作，然后就在其他地方买下别墅或比较大的公寓，搬出这个小区。现在，许多人则开始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安顿下来。这里的人口流动率已不像过去那么高，也不再那么频繁。现在，这里已不是个会让人觉得被困住的地方，住在这里的居民都觉得非常自在。这里不再是移民旅程的中继站，而是目的地。”

杰拉德指出松克里夫公园这种门户城市的矛盾处境：这种小区愈是成功，表面上的贫穷率就愈高。这些小区的居民如果能够在一个世

代以内搬往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宅区,这里就会不断涌入来自贫穷乡下地区的新进移民。如果不仔细观察个别居民的发展历程,就不免误以为这些小区的贫穷与隔绝现象一直没有改变。过去半个世纪从来,松克里夫公园的居民大体上都得以在社会中向上爬升。这里原本供士兵居住的平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到公寓大楼取代之后,整座小区也就立即跟着成为一座纯粹的落脚城市。首先来到这里的是希腊人与马其顿人,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一个世代,建造东正教的教堂(其中有些矗立至今),随后在市中心的希腊区或市郊外围买了房子,陆续搬了出去。接着来到这里的是古吉拉特印度人与信奉什叶派以及玛利教派的东非人口,后者率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建造了小区里的清真寺。后来,哥伦比亚人与智利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 20 世纪 70 与 80 年代短暂居住于这里,然后就在市区买了房子。今天,这里有为数颇多的菲律宾人,还有几个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庞大群体。这里最新近的外来移民是阿富汗人,他们是加拿大在 2006 年开始积极参与阿富汗战争所带来的产物。

"松克里夫的所有居民都是刚起步的城市人门居民,大家都还在辛苦奋斗,"四十二岁的席玛·卡特里说。她最近才刚搬出松克里夫公园,在邻近的邓恩米尔斯市郊小区租了一间低矮的公寓,以便把她的子女送进那里比较好的中学。她来自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Haryana)的一座乡村,自行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并且在印度接受了大学教育,才迁徙到加拿大。她在松克里夫公园住了几年,在一家化妆品工厂内从事低微的工作,一面设法让自己的能力资格获得认可。她说,社区内的人际网络帮助她达成了目标。"在松克里夫,你只要一出门,就会遇见其他同样在努力奋斗的人。你可以在熟食店和邻居交谈,他们会和你交换信息。"

外来移民之所以会聚居在这里(尽管加拿大实行了若干措施,希望把外来移民限制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这里绝大多数的外来移民却都出生于乡村),不是因为这里与外界孤立隔绝,而是因为这里和周遭的市区交通极为便利。这里有四通八达的大众运输路线,有一所大型小学,还有良好的工作机会与适合创业的地方,只需低廉的租金与创业成本。尽管如此,这里仍只是个理想的过渡地点,居民顶多只住上一个世代,就会搬到其他地方去。杰拉德主管的社区办公室提供许多语言的语言教程、文化适应、税金与小生意等方面的协助,目的在于促使居民成功转型至城市生活。这是一座深富自知之明的落脚城市。

松克里夫公园成为一座成功的落脚城市并非偶然。其他许多由外来移民聚居的市郊公寓楼小区都未能顺利发展,松克里夫公园却能获致这样的成果,原因是这里受到国家的大量投资与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地理学家针对松克里夫公园的居民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发现几乎全体人口都怀有极高的满意度。加拿大的其他外来移民门户地区,尤其是市郊外围的偏远地带,与市区缺乏交通与经济连接的小区,居民的满意度就低落的多。另一方面,松克里夫公园也具有都市村庄的正面隔离作用。调查发现:“希望的气氛为当地提供了建构社会资本的基础。外来移民得以开展事业,融入当地生活的发展曲线也充满光明,公民与归属的感受也更为强烈。”这群地理学家总结指出,种族聚居(有些人也许会把这种现象称为种族隔离)使得这里的外来移民能够享有“差异化的公民身份”,让他们得以参与所谓的过渡文化。

这座高度组织化而且刻意建构的落脚城市是一种新形态的地区,能够在有限程度上解决北美洲面临的危机:最能够接纳新进移民的小区,亦即市中心那些人口稠密又贫穷的小区,已经受到先前的移民大幅发展改善,以致新进的移民愈来愈被排挤到市郊外围。过去一个世纪

以来，在类似多伦多这样的都市，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大体上都是一种自发性的现象，由居民主动达成。因此，政府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必须介入乡下移民过渡至城市生活的过程，而且意识到这点的时候通常为时已晚。

多伦多可能是全世界最能完整见到这种旧式落脚城市的地方。多伦多的都会区共有六百五十万人口，其中吸收的外来移民人数居西方世界之冠：加拿大（人口数为三千三百万）每年约涌入三十万名外国移民，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都落脚于多伦多。长达一个世纪以来，这些移民人口全都来自乡村，也依循北美洲典型的连锁式移民模式。来自特定村庄与地区的移民都会住进特定的街道、街区、邻里和地区，聚居于环境不佳的租金低廉小区，通常举目所见皆是维多利亚式的连栋房屋。他们在这些地方建立互相支持的人际网络，成立许多商店与小型工厂，购买及改善当地的住宅，利用房贷与房地产当做资金来源，然后搬进市区内较为昂贵的居住区，不论这些居住区是其他种族还是其他类型人口的聚居地，并以房东及企业家的身份为下一波的移民提供协助。我在这些中国人、印度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加勒比人、韩国人、希腊人与巴基斯坦乡村人口的聚居地当中住了几十年：他们在自己的种族区域里各自建构了完整的阶级制度与企业网络，他们本身的金融、交通与媒体组织，以及具有影响力的精英族群。有时候，事业有成的居民会留在小区里，改善自己的住宅，有时候则会搬出种族聚居的市中心区，迁入种族市郊小区，形成长条状的种族聚集地，从外来移民抵达的地点向外延伸。这种互助循环造就了真正的落脚城市中产阶级，其偏好通常足以主导地方与联邦层级的政治决策，使得外来移民的立足过程成为加拿大政治当中持久不衰的中心议题，不论哪一党执政都一样。这种现象与巴西及土耳其颇为相似。

那种旧式的聚居形态已不再是主流。市中心那些老旧的落脚城市确实仍然不断有新进移民迁入,也仍提供许多的租赁住宅:葡萄牙人的小区内发展出安哥拉与莫桑比克移民的聚居地;中国房东把房屋租给越南人,接着越南人也在更北方建立了他们的聚居地。不过,最大批的外来移民,包括来自乡下的大量人口,现在都居住在城市边缘,他们的小区盖得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通勤市郊住宅区。研究显示,多伦多市区聚居的都是已经成功立足的外来移民,过着繁荣富裕的生活;市区周围则环绕着一大片孤立的贫穷小区。这些小区通常免不了斯洛特瓦特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包括空间规划、区域划分与交通运输等问题,而且也可能和斯洛特瓦特出现同样的社会问题(2006年,在密西沙加(Mississauga)的翠谷这座孤立的通勤小区,警方侦破了一项精心策划的宗教恐怖行动计划)。松克里夫公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解决方式:投注大笔资金兴建公寓大楼式的社区,以促成迅速顺畅的过渡转变。只可惜,松克里夫公园的成功只是个例外。

我们再也不能期望西方世界的落脚城市自行形成并且自我管理了。20世纪初与战后时期的移民潮——是乡下人口涌入城市的首波移民潮的尾声,而且这波移民潮主要来自欧洲——正是教育、地方政府、大众运输及都市基础建设的公共支出大幅扩张的时期。重工业退出市区之后,随之产生了低价住宅区。居民可以买下房屋并加以装修,当成家庭的资金来源。今天,事先形成的优良小区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已不再是必然的现象。随着经济再次扬升、人口成长趋缓、未来几年即将需要新一波的低技术移民,北美与欧洲的城市应事先注意乡村移民的需求。

落脚城市不论发展得多么成功,都不免引发若干令人不安的问题。花费公共资金建造及维系这类移民聚居飞地算是明智的做法吗?我们

是否应该设法让新进移民直接融入核心社会？住满乡村移民的低价城市小区真的是接纳、融合与立足城市最佳的管道吗？这些小区是否应该受到鼓励与提倡，还是政府应该设法避免大移民潮在环境质量较为低落的城市空间形成新进人口的聚居飞地？

世世代代以来的看法，都认为外来移民必须四散分布才算成功。但我们如果认同落脚城市，就等于是放弃了这种长久以来的观点。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与芝加哥社会学派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的城市同化理论，其基础就是建立在对落脚城市的初步理解上。在那个乡下移民大量涌入美国都市的时期，帕克分析了美国各大都市(尤其是芝加哥)，结果认定移民一开始都密集租住在房价低廉的贫穷市中心区，但他们唯有在脱离种族聚居飞地而四散进入主流社会之后，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并且成功地在都市立足。这项理论认为，这些市中心小区的单一种族性质，以及这些小区和都市其他地区的隔离状态，正是造成贫穷的原因。帕克写道："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性。"

不过，在落脚城市里，外来移民也同样有可能在经济与文化方面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实际上，最近的大量学术研究显示，种族"聚集"可能是促成社会与经济融合最有效的管道。英国学者佩奇(Ceri Peach)、费尼(Nissa Finney)与辛普森(Ludi Simpson)对看似具有种族隔离现象的小区所进行的检视，带来了最具挑战性的论点。他们针对塔村与布莱福德这类恶名昭彰的落脚城市飞地进行详细检视，结果发现这些小区和没有种族聚居现象的小区比较起来，并不会更易于陷入贫穷或社会孤立的状态；而且在这类地区——也就是落脚城市——四散进入种族混居的中产阶级小区的人口，大致上就相当于从国外涌入这些落脚城市的人口数。"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之所以一直处于贫穷的状态，乃

是因为一再接收新的(贫穷)移民。"

此外,与媒体营造出来的刻板印象恰恰相反,种族隔离的现象可能有助于遏阻凶暴的极端主义。佩奇和费尼检视了移民人口中的宗教恐怖活动,结果发现这种现象在落脚城市居民当中少见得多。2004 年至 2009 年间在英国因为恐怖行动罪名被捕的七十五名疑似基地组织成员当中,只有十七人来自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百分之十八的小区,占多数的四十二人都居住在穆斯林人口比例低于百分之六的地区。在斯洛特瓦特与英国利兹的毕斯顿(Beeston)这类发展不健全的落脚城市当中,幻灭的第二代居民确实也有可能发展出极端的宗教激进运动。2005 年七月发生在伦敦的自杀炸弹攻击事件,四名炸弹客当中有三人就是来自毕斯顿,但种族聚居和恐怖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也就是说,恐怖主义也同样可能出现在落脚城市以外的地区,甚至在其他这些地区还更容易出现。根据一般的观察,落脚城市文化当中紧密交织的人际网络通常有助于遏制最危险的极端主义。实际上,不论在中东还是西方世界,乡下移民聚居的飞地都不是宗教激进运动主要的发生地。荷兰社会学家巴亚特针对伊朗与埃及的这类小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结果发现落脚城市极少成为"暴力、犯罪、社会混乱、极端主义以及宗教激进主义的温床"。反之,他发现落脚城市乃是"争取(城市)市民身份与融入都市生活的重要地区"。他的研究发现,宗教激进主义的中心主要在于下层中产阶级小区。这些小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曾受益于国家主导的经济,后来却竞争不过新进移民建构的非正式经济而败下阵来。宗教狂热主义与乡下人口涌入都市的迁徙活动并没有什么关联。

落脚城市最关键的矛盾现象,就是其中的居民全都想要摆脱落脚城市。一种方法是赚了一笔钱之后,把家人和乡村人际网络迁出落脚

城市;另一种方法则是把自己的居住地转变为比较好的小区。有些落脚城市——例如松克里夫公园——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不断吸引新进移民,而且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不过,大部分的落脚城市如果顺利发挥了功能,结果总是造成自己遭到遗弃。现在,在北美与欧洲的许多都市,落脚城市都成为备受喜爱的新居住区,例如洛杉矶的兰巴特、曼哈顿下东区、伦敦的斯毕塔菲尔德、巴黎的贝尔维尔与多伦多的奥星顿,都成为年轻毕业生(其中有些人也是原本居住于这些落脚城市的住户的子女)偏好的居住地。这些年轻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正是这些地方具有充满活力而且足以转变都市的落脚城市社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波涌入都市的移民创造了大部分西方都市的核心小区;战后的第二波移民正在打造新一代的居住地以及新一代的文化。这种反向吸引力目前正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在重庆、孟买、伊斯坦布尔、开罗与圣保罗的落脚城市,正如西方的落脚城市也同样难以避免这些地区的落脚城市所遭遇的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发展过程都大同小异,涉及的也都是同类型的人口,唯一的差别只在于财富与资源的多寡。21 世纪的大迁徙潮之所以具有胜过 19 世纪那波迁徙潮的优势,原因就在于当今的世界已然了解良好的落脚城市是什么模样。上一波迁徙潮发生的时候,这些发展良好的小区都是意外形成,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太多的人道灾难。这一次,我们既已知道乡村移民的涌入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就应该事先预期并且充分计划,通过投资促成他们在都市的发展。

落脚城市带给我们的终极教训,就是这种小区不会单纯附加在都市的边缘,而是会成为都市本身。至于是以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方式达成这样的结果,则要看我们如何介入。哲学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把乡村移民对都市紧抓不放以及两者之间的撞击描述

为富有活力的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anism)的核心,也是全心接纳他所谓的赋予生机的交互感染,"我们要拥有自己的家,并不需要固定的社群和一套同构型的价值体系,从来就不需如此。文化纯粹性是种自相矛盾的概念。"在这项论点的最后,他引用了作家拉什迪所提出的自我辩护。拉什迪写下小说《撒旦诗篇》之后,遭到伊斯兰教令的追杀,而追杀他的那群伊朗文化纯粹主义者,当初就是借着操纵德黑兰那些汇集多元文化的落脚城市而得以掌权。面对这样的生命威胁,拉什迪对自己的作品提出辩护,指称《撒旦诗篇》就是一座落脚城市,正如其内容中提到的许许多多落脚城市,正如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这本书"歌颂混杂、不纯、交融与变化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正是人口、文化、思想、政治、电影及歌曲进行各种新颖而出乎意料的结合所带来的结果。这本书欢悦于杂种化,惧怕纯粹的专制性。混合、杂烩,加点这个、掺点那个,正是新奇事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这是人口大规模迁徙带给世界的无限可能,我则试图拥抱这样的现象。"

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有效发挥功能的落脚城市缓慢殖民既有的都市(正如失败的落脚城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溃烂与焖烧之后,也可能对既有的都市展开暴烈的侵略)。都市发现了落脚城市之后,就必须加以面对,在幸运的状况下则可学会加以接纳。昨天那些陌生的乡村人口与外来移民,不但会成为今天的都市商人,更将成为明天的专业人士与政治领袖。没有这样的变化,都市就会停滞而死亡。在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的无谓争论背后,乡下移民正以实际行动突围进入世界各地的都市。正如每个移民家庭的经验所显示的,这些大量聚集的人口一心只想被接纳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家庭甘于承担精心计算过的风险,把自己的命运赌在房产与教育以及朋友和陌生人的慷慨帮助上。这样的赌注要获得预期的成果,政府就必须投注资金给予协助:落脚城

市在短期内必须投入高昂的成本，刚开始所消耗的公共资金远大于它们的产出。然而，三百年来的都市历史已然证明这样的投资非常值得，不但可带来庞大的收益，也可避免可怕的损失。这些移民家庭如果被驱出都市，或者受困于社会的边缘，或是遭到都市拒绝赋予市民身份或资产的所有权，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威胁，导致社会必须付出更大的成本。在未来数十年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冒险迁入都市的乡村人口数将创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本世纪将是城市化的最后一个世纪，不论其发展是平顺或颠簸。当下这个时刻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若能善加把握，即可将这波最终的移民潮转变为一股长久进步的力量，促成贫穷的终结，造就可长可久的经济，改善乡村居民的贫困生活。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再忽略那些位于都市边缘的贫陋社区。

致谢

本书封面上的作者虽是标示着我的名字，但唯有在许许多多人的鼓励、合作和详尽的帮助之下，这部著作才有可能涵盖如此磅礴的地理范围，并且探讨如此罕见的话题。在撰写本书的三年里，我一方面走访十六个国家的三十座城市与乡村，记录人口朝城市迁徙的复杂现象，另一方面又担任着一家大报社的分社负责人，因此必须仰赖一群实地考察人员。他们参与这项写作计划的热情和专业超乎我之上，让我深为感动。他们费尽心力带我到他们的城市与国家里，让我见识其中不为人知的角落，为我提出重要的引荐与切中要害的批评，而且不吝扮演慷慨又迷人的东道主。这些人包括深圳的 Han Yi、重庆的 Fan Lixin、达卡的 Amirul Rajiv、孟买的 Mrinmayee Ranade、柏林的 Nao mi Buck、德黑兰的好朋友，巴黎的 Genevieve Oger、马德里的 Peter Sotirakis、东伦敦的 Benjamin Zeitlyn、圣保罗的 Ali Rocha、洛杉矶的 Katia Portillo-Vali 和多伦多的 Julia Belluz。我在伦敦的主要研究人员 Joanne Shurvell 坚持不懈又充满激情和创意，对大英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二十几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刻表、众多资料库的内容与迅速变迁的出版物都了若指掌。另外还有不少人为本书的研究与构想提供了宝贵的协助，包括 Craig Saunders, Marjan Farahbaksh, Celia Donnelly, Nahrain Al-Mousawi, Carl Wilson, Stephanie Nolen, Anna Olejarczyk 和 arbara Hui.。

早在我开始认真为本书展开研究工作的多年之前，我经常语意不

详地和别人谈及一本探讨城市郊区变迁故事的书，而搞得别人摸不着头脑。即便在当初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总是乐于聆听，而且对这项写作计划的理解似乎比我还要深入。他就是 Michael Schellenberg，加拿大 Knopf 出版社的副社长。他和他在加拿大兰登书屋的同事，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这项写作计划的潜力，而他们的努力也大幅扩张了这项计划的规模和完整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本书的构思与写作期间，我也获得了纽约 Pantheon Books 的 Andrew Miller 提供详尽而热情的协助。在本书的欧洲篇章，我获得阿姆斯特丹 De Bezige Bij 出版社的 Pieter Swinkels 和 Floor Oosting 提供了许多极度有用的建议和资料。John Pearce 一开始就鼎力支持本书的写作，而且扮演了一位极为罕见的角色，也就是愿意提出批评的经纪人。他默默的激励与提出的各项建议，促使我想出了本书的书名，并且将书中的重点放在国家人口的迁徙上。

不过，若不是我有幸能够服务于《环球邮报》，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环球邮报》将这种由宽广的角度探索全球反战趋势的做法视为其一项使命的重要部分。国际新闻编辑 Stephen Northfield、总编辑 Edward Greenspon 和 John Stackhouse，还有前《焦点》杂志的编辑 Cathrin Bradbury，都鼓励我运用自己的时间和他们拥有的资源，深入探究迁徙、城市化与社会流动性的重大议题，并且建议我不必着急，把我的报纸专栏当成思想实验室，探究各种看起来足以主导下一个世纪的观念与发展。就许多方面而言，本书乃是见证了这些观念与发展为传播媒体带来的新闻形态与辩论内容。

此外，我一切的成就都必须归功于我的终生伴侣 Elizabeth Renzetti。如果没有和她分享人生的特殊与乐趣，这一切都根本无从想象。

参考资料

1 ON THE EDGE OF THE CITY

1 From Cardoso's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Janice E. Perlman,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Urban Poverty and Politics in Rio De Janeir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xii.

2 This was the message most commentators took from one recent popular book on such districts, Mike Davis'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6). Davis provides a more nuanced view of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the arrival city in an earlier work, Magical Urbanism: Latinos Reinvent the US City (New York: Verso, 2000).

3 UNFPA, "An Overview of Urbaniz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in U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8).

4 UNFPA,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7: 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Urban Growth"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07); UN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to 2300"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4).

5 UN—HABITAT,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08/2009" (Nairobi: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08).

6 Suketu Mehta, 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 (New York: Knopf, 2004), 15. Mehta's memoir offers one of the most detailed and important chronicles of the modern arrival city.

7 Jerry White, Lond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Vintage, 2007), 107.

8 UN—HABITAT,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2008/2009."

9 UN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9), "World Population to 2300."

10 Dilip Ratha, Sanket Mohapatra, and Zhimei Xu, "Outlook for Remittance Flows 2008—

2010"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2008); FE Report, "Wb Study Forecasts $10.87b in Remittance Earnings this Fiscal," Financial Express, July 30, 2009.

11 This nadir of Tower Hamlets was chronicled in detail by Keith Dovkants, "The Betrayed: An Evening Standard Special Investigation," Evening Standard, January 1995.

12 Divya Sunder and Layli Uddi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angladeshi and Pakistani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London Secondary Schools," InterActions: UCLA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3, no. 2 (2007).

13 A good comparison is found in Irena Kogan, "Labour Market Careers of Immigrant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5, no. 4 (2004).

14 Nissa Finney and Ludi Simpson, "Sleepwalking to Segregation"? Challenging Myths About Race and Migration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9), 127.

15 Geoff Dench, Kate Gavron and Michael Young, The New East End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6), 134.

16 Lucinda Platt,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The Life Chances of Britain's Minority Ethnic Communities" (Bristol: The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2005).

17 Joachim Brüß, "Experiences of Discrimination Reported by Turkish, Moroccan and Bangladeshi Muslims in Three European Cit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4, no. 6 (2008).

2 OUTSIDE IN

1 Sudha Deshpande, "Migration to Mumbai: What Do the Census Data Show?" Loksatta (2003). English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Deshpande.

2 Johannes Jütting and Juan R. de Laiglesia, eds.,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is: OECD, 2009).

3 An excellent comparison of life under a "formal" work economy versus an almost completely informal one in Mumbai—and the benefits of the latter—is found in Sudha Deshpande and Lalit Deshpande, "Work, Wages and Well-Being: 1950s and 1990s," in Bombay and Mumbai: The City in Transition, eds. Sujata Patel and Jim Masselo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Deepa Narayan, Lant Pritchett, and Soumya Kapoor, Moving Out of Poverty: Success from the Bottom Up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9).

5 Cecilia Tacoli, "Rural - Urban Interactions: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0, no. 1 (1988).

6 Ronald Skeldon, "The Evolution of Migration Patterns During Urbanization in Peru,"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67, no. 4 (1977): 405.

7 Charles Tilly, "Migr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in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 Policies, eds. William H. McNeill and Ruth S. Adams (Bloomington: Indiana, 1978), 53.

8 Saad S. Yahya, "Unmaking the Slums: Emerging Rules, Roles and Repertoires," Stetson Law Review 36 (2006): 131.

9 Patrícia Mota Guedes and Nilson Vieira Oliveira, "Braudel Papers 38: Democratization of Consumption: Progress and Aspirations in São Paulo's Periphery" (São Paulo: Instituto Fernand Braudel, 2006).

10 UN — HABITAT, "The Challenge of Slums: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Nairobi: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2003), 9.

11 Martim O. Smolka and Adriana de A. Larangeira, "Informality and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n Urban Policies," in The New Global Frontier, eds. George Martine et al. (London: Earthscan, 2008), 105 - 107.

12 L. Jellinek,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a Jakarta Street Trader," in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ed. J. Gug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lan Gilbert, "Urban and Regional Systems: A Suitable Case for Treatment?" in Cities, Poverty and Development (Second Edition), eds. Alan Gilbert and J. Gug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 Perlman,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1, 15, 243.

14 Jorge Rodriguez and George Martine, "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The New Global Frontier, eds. George Martine et al. (London: Earthscan, 2008), 362.

15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Washington: IBRD, 2009).

16 UN — HABITAT,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5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6), 24.

17 Chen Hong, "Disgruntled Workers on the Move," China Daily, Jan. 18, 2008.

18 Xinhua, "Tsinghua Professor: Big Chinese Cities Need Slums for Migrant Workers," People's Daily, Apr. 15, 2008; Fiona Tam, "Mayor Aims to Put Shenzhen at Top of Mainland's Welfare Leagu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 15, 2008.

19 Soutik Biswas, "India's 'Biggest Slum Demolitions,' " BBC News

20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Unseen Majority: Nairobi's Two Million Slum-Dwellers"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9).

21 Marie Huchzermeyer, "Slum Upgrading in Nairobi within the Housing and Basic Services Market,"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3, no. 1 (2008): 22.

22 Gary Duffy, "Brazil's Battle for Shanty Town Residents," BBC News,

3 ARRIVING AT THE TOP OF THE PYRAMID

1 "West Adams—Mapping L. A. ," Los Angeles Times,

2 Dowell Myers,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Transition in South Central Los Angeles, 1990 to 2000: Working Paper" (Los Angeles: USC School of Polic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02).

3 Dowell Myers, Julie Park, and Sung Ho Ryu, "Dynamics of Immigrant Settlement in Los Angeles: Upward Mobility, Arrival and Exodus" (Los Angeles: The John Randolph Haynes and Dora Haynes Foundation, 2005), 8 - 9.

4 Dowell Myers, "Demographic Dynamism and Metropolitan Change: Comparing Los Angeles, New York, Chicago and Washington, DC," Housing Policy Debate 10, no. 4 (1999): 924.

5 Myers, Park, and Ryu, "Dynamics of Immigrant Settlement in Los Angeles": 4.

6 Mike Davis, Magical Urbanism: Latinos Reinvent the US City (London: Verso, 2000), 51 - 55.

7 Rickard Sandell, "Immigration: World Differences" (Madrid: Real Instituto Elcano, 2007);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Overcoming Barriers: Human Mobil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Paris: OECD, 2007).

8 AFP, "Apec Warned of Critical Labour Shortages," Nov. 10, 2009.

9 VECCI, "Task Group Report: Workplace Futures" (Melbourne: Victorian Employer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2009); ABC News, "Business Group Warns of Labour Shortage," 2009; Mark Pownall, "It's Not Plain Sailing on Skilled Migration," WA Business News, Nov. 5, 2009.

10 CFIB, "Business Barometer," 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Nov. 4, 2009.

11 Christian Joppke, "Why Liberal States Accept Unwanted Immigration," World Politics 50, no. 2 (1998): 266.

12 AFP, "Apec Warned of Critical Labour Shortages."

13 Jason Gilmore, "The 2008 Canadian Immigrant Labour Market: Analysis of Quality of Employment"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2009).

14 Garnett Picot, Feng Hou, and Simon Coulombe, "Chronic Low Income and Low—Income Dynamics among Recent Immigrants" (Ottawa: Statistics Canada, 2007).

15 CIC, "Annual Report to Parliament on Immigration, 2005" (Ottawa: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2005).

16 Jeff Dayton—Johnson et al., Gaining from Migration: Towards a New Mobility System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2007), 20.

17 Picot, Hou, and Coulombe, "Chronic Low Income and Low—Income Dynamics Among Recent Immigrants."

18 Dennis Broeders and Godfried Engbersen, "The Fight against Illegal Migration: Identification Policies and Immigrants' Counterstrategies," 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tist 50, no. 12 (2007): 1592.

19 Audrey Singer, "Twenty—First Century Gateways: An Introduction," in Twenty—First Century Gateways: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in Suburban America, eds. Audrey Singer, Susan W. Hardwick, and Caroline B. Brettell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20 William H. Frey, "Melting Pot Suburbs: A Census 2000 Study of Suburban Diversit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21 Ivan Light and Michael Francis Johnston, "The Metropolitan Dispersion of Mexican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1980 to 2000,"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5, no. 1 (2009).

22 Robert A. Murdie, "Diversity and Concentration in Canadian Immigration: Trends in

Toronto, Montreal and Vancouver, 1971 - 2006" (Toronto: Centre for Urban &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8).

23 Marie Price and Audrey Singer, "Immigrants, Suburbs and the Politics of Reception in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in Twenty—First Century Gateways, 150 - 51.

24 Neal Peirce, "Outreach to Immigrants: A Suburb's Exciting New Way," Nation's Cities Weekly 32, no. 19 (2009): 2.

4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VILLAGE

1 Martin Petrick and Ewa Tyr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f Subsistence Farms in South—Eastern Poland: Social Buffer Stock or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IAMO Forum (Halle, Germany: 2004).

2 Poland achieves only 21 percent of the EU average gross product per hectare of utilized agricultural land for crops. See Hilary Ingham and Mike Ingham, "How Big Is the Problem of Polish Agriculture?" Europe—Asia Studies 56, no. 2 (2004): 215.

3 Robert R. Kaufman,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Protection: Lessons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1, no. 1 (2007).

4 Ingham and Ingham, "How Big Is the Problem of Polish Agriculture?" 222 - 23.

5 Dilip Ratha, "Revisions to Remittance Trends 2007," i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5 (World Bank, 2007).

6 For a moving account of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is mass family displacement, see Fan Lixin's film Last Train Home.

7 A new social security system launched by Beijing in December 2009 will take many years to implement and may prove fiscally impossible to apply fully. See Howard W. French, "Pension Crisis Looms for Chin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 20, 2007; Ariana Eunjung Cha, "In China, Despair Mounting among Migrant Workers," The Washington Post, Mar. 4, 2009.

8 James Kynge, "China's Workers Enable Village Consumer," Financial Times, Feb. 26, 2004.

9 Rob Young, "China's Workers Return to Cities," BBC News, Sept. 8, 2009.

10 Michael Lipton and Qi Zhang, "Reducing Inequality and Poverty During Liberalisation in

China: Rural and Agri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Policy Options" (Brighton: PRUS Working Paper no. 37, 2007); OECD, "Review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China" (2005).

11 Ran Tao and Zhigang Xu, "Urbanization, Rural Land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for Migrant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3, no. 7 (2007): 1,309.

12 Srijit Mishra, "Farmers' Suicides in Maharashtr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pr. 22, 2006.

13 Debarshi Das, "Persistence of Small—Scale, Family Farms in India: A Note,"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16, no. 3 (2007); Srijit Mishra, "Agrarian Scenario in Post—Reform India: A Story of Distress, Despair and Death" (Mumbai: 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7).

14 Katy Gardner, "Keeping Connected: Security, Place and Social Capital in a 'Londoni' Village in Sylhet,"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4 (2008).

15 Tasneem Siddiqui, "Migration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of the Poor: The Bangladesh Case," i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Poor Policy Choices in Asia (Dhaka: RMMRU, 2003).

16 Katy Gardner and Zahir Ahmed, "Place, Social Protection and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A Londoni Village in Biswanath" (Bright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Globalisation and Poverty, 2006). A revised and expanded version appears in Gardner and Ahmed, "Degrees of Separation: Informal Social Protection, Relatedness and Migration in Biswanath, Banglade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5, no. 1 (2009).

17 Deboarah Fahy Bryceson, "Deagrarianization and Rural Employ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 Sectoral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24, no. 1 (1996); Vali Jamal and John Weeks, "The Vanishing Rural - Urban Gap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27, no. 3 (1988).

18 See, for example, Robert Fishman, "Global Suburbs," in First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 (Pittsburgh: 2002); Elisabeth Rosenthal, "Chinese Town's Main Export: Its Young Me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6, 2000.

19 Roger Ballard, "A Case of Capital Rich Under—Development: 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Successful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Mirpur,"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37, no. 49 - 81 (2003): 41.

20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of the farm—size issue is found in Michael Lipton, L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perty Rights and Property Wrongs (Abington:

Routledge, 2009), 65 - 120.

5 THE FIRST GREAT MIGRATION

1 Jeanne Bouvier, Mes Memoires, ed. Daniel Armogathe (Paris: Editions de la Découverte, 1983),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Mark Traugott, ed., The French Worker: Autobiographies from the Early Industrial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67 - 81.

2 Tilly, "Migration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58.

3 William H. McNeill, "Human Migration: A Historical Overview," in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 Policies, eds. William H. McNeill and Ruth S. Adam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6.

4 Mary Dorothy George, London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cago: Academy, 1985), 25 - 26.

5 William H. McNeill, Population and Politics since 175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0), 9 - 10.

6 Olwen H. Hufton, 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1750 - 17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99 - 101.

7 George Rudé, "Society and Conflict in London and Pari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18th Century (London: Wm. Collins, 1974), 35 - 36.

8 Rudé,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Parisian Insurgents of 1789 - 91," in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18th Century, 104 - 109.

9 McNeill, Population and Politics since 1750, 11.

10 Rudé, "Society and Conflict in London and Pari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53 - 55.

11 S.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asant Society," Theory and Society 9 (1980); Patrick Svensson, "Peasant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wede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0, no. 3 (2006).

12 Jonathan David Chambers and G. E. Minga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750 - 1880 (London: B. T. Batsford, 1968), 104.

13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 - 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 This is also very well documented in Graham Robb, The Discovery of France (London: Picador, 2007).

14 For claims of Britain's superior living standards, see Tom Kemp, Economic Forces in French History (London: Dobson, 1971); Charles P. Kindleberger,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51 - 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For more recent, nuanced arguments about this distinction, see Patrick Karl O'Brien, "Path Dependency, or Why Britain Became an Industrialized and Urbanized Economy Long before Fra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IX, no. 2 (1996): 213.

15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16 Joseph Rykwert, The Seduction of Plac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78.

17 John Burnett, ed., Useful Toil: *Autobiographies of Working People from the 1820s to the* 1920s (London: Allen Lane, 1974), cited in White, Lond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06.

18 White, Lond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07.

19 Anthony S. Wohl, The Eternal Slum: Housing and Social Policy in Victorian Lond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172.

20 Richard Dennis, "The Geography of Victorian Values: Philanthropic Housing in London, 1840 - 190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5, no. 1 (1989).

21 Cited in Andrew Miles, Social Mobility in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England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9), 1.

22 David Mitch, "Literacy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Rural Versus Urban Victorian England," Historical Methods 38, no. 1 (2005); Jason Long, "Social Mobility within and across Generations in Britain since 1851," in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Conference (Oxford: 2007).

23 Aside from the previously cited works by Andrew Miles and Jason Long, see Sara Horrell, Jane Humphries, and Hans—Joachim Voth, "Destined for Deprivati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2001); Kenneth Prandy and Wendy Bottero,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obility in Britain and Ireland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ology 34, no. 2 (2000); Paul Lambert, Kenneth Prandy, and Wendy Bottero, "By Slow Degrees: Two Centur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obility in Brita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2, no. 1 (2007), www.socresonline.org.uk/12/1/prandy.html.

24 Jason Long and Joseph Ferrie, "A Tale of Two Labor Markets: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Britain and the U. S. since 1850," e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2005).

25 Leslie Page Moch, Moving Europeans: 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65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9.

26 Timothy J. Hatton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What Drove the Mass Migrations from Europ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1992); Dudley Baines, Migration in a Matur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 Cited in Richard Harris, Unplanned Suburb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1 - 25.

28 David G. Burley, "Review of Richard Harris, Unplanned Suburbs,"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Online, March 19, 1997, http://www. h—net. org/reviews/showrev. php? id=841.

29 Richard Harris, "Chicago's Other Suburbs,"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84 (1994).

30 Elaine Lewinnek, "Better Than a Bank for a Poor Man? Home Financing in Chicago, 1870 - 1930," in Market Culture Colloquium at Yale (New Haven: 2004).

6 THE DEATH AND LIFE OF A GREAT ARRIVAL CITY

1 Orhan Esen, "Self—Service City: Istanbul," metroZones 4 (2004),

2 Elvan Gülöksüz, "Negoti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Urban Land in Istanb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6, no. 2 (2002).

3 Şükrü Aslan, 1 Mayis Mahallesi (Istanbul: Iletisim Yayinlari, 2004), translation by Belmin Soylemez.

4 Morris Juppenlatz, cited in Lisa Peattie and Jose A. Aldrete — Haas, " 'Marginal' Settlem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Advocacy of Policy and Evolution of Program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7 (1981): 158.

5 Umut Duyar—Kienast, The Formation of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Münster: Lit Verlag Münster, 2005), 7 - 10, 96.

6 Tahire Erman, "The Politics of Squatter (Gecekondu) Studies in Turkey: The Changing Representations of Rural Migrants in the Academic Discourse," Urban Studies 38, no. 7 (2001).

7 Ozcan Koknel, quoted in Nicholas Gage, "The Violence of Extremism Grips Turkish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1978.

8 "New Turkish Rulers Give Ministry Aides Broad Civil Power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4, 1980.

9 John Kifner, "Ankara's Slum Dwellers Grateful for Coup,"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9, 1980.

10 Amnesty International, "Turkey: Human Rights Denied"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88).

11 Aslan, 1 Mayis Mahallesi, 197 - 218.

12 Duyar—Kienast, The Formation of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9.

13 Jim Bodgener, " 'We'll Halve Inflation'—Interview with Turgut Ozal," Financial Times, May 23, 1988.

14 Duyar—Kienast, The Formation of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11.

15 Esen, "Self—Service City: Istanbul."

16 Duyar—Kienast, The Formation of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123.

17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u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64 (2003): 104 - 109.

18 Binnaz Toprak, "Religion and State in Turkey," in Contemporary Turkey: Challenges of Change (Istanbul: 1999), 5.

19 Ali Çarkoğlu and Binnaz Toprak,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a Changing Turkey" (Istanbul: TESEV, 2006).

20 Esen, "Self—Service City: Istanbul."

21 Ayse Bugra, "The Immoral Economy of Housing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2, no. 2 (1998): 311.

22 Zafer Senocak, "Turkey's Corset of Moderation," Die Welt, July 24, 2007.

23 Esen, "Self—Service City: Istanbul."

7 WHEN THE MARGINS EXPLODE

1 Esfandiar Zebardast, "Marginaliza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pontaneous Settlements on the Tehran Metropolitan Fringe," Cities 23, no. 6 (2006).

2 Robert E. Looney,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Elmsford, NY: Pergamon Press, 1982), 264.

3 Ali M. Ansari, Modern Iran since 1921 (Harlow: Longman, 2003), 147.

4 Misagh Parsa, 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Piscataway, NJ: Rutgers, 1989), 73.

5 Tahmoores Sarraf, Cry of a Nation: The Saga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1990), 25.

6 Parsa, 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78.

7 Asef Bayat, Street Politics: Poor People's Movements in Ir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43.

8 Leonard Bin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1973 - 78*"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1980), 163.

9 Ali Farazmand, The State, Bureaucracy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Iran: Agrarian Reforms and Regime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9), 198 - 201.

10 Parsa, Social Origins of the Iranian Revolution, xii.

11 Bayat, Street Politics, 159.

12 Ansari, Modern Iran since 1921, 221.

13 Bayat, Street Politics, 101.

14 Zebardast, "*Marginaliza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pontaneous* Settlements on the Tehran Metropolitan Fringe," 451 - 52.

15 Amir Nikpey, Politique et Religion en Iran Contemporarain (Paris: L'Harmattan, 2003); Farhad Khosrokhavar, "The New *Religiosity in Iran*," Social Compass 54, no. 3 (2007).

16 Alma Guillermoprieto, "The Gambl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 20, 2005.

17 Based on Venezuelan government spending figures reported at www. sisov. mpd. gob. ve and OECD population figures, and tabulated by Info Venezuela News.

18 *Daniel Ortega and Francisco Rodriguez*, "*Freed from Illiteracy? A Closer Look at* Venezuela's Misión Robinson Literacy Campa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7, no. 1 (2008).

19 Tina Rosenberg, "The Perils of Petrocrac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 4, 2007.

20 Fabiola Sanchez, "Traditionally Pro — Chavez Slum Turns to Opposition," Associated Press, Dec. 5, 2008.

21 Francisco Rodríguez, "An Empty Revolution: The Unfulfilled Promises of Hugo Chávez," Foreign Affairs (Mar. /Apr. 2008).

22 Indira A. R. Lakshmanan, "Critics Slam Venezuelan Oil Windfall Spending," The Boston Globe, Aug. 13, 2006.

23 Norman Gall, "Oil and Democracy in Venezuela," Braudel Papers, no. 39 (2006).

24 Sujata Patel, "The Popularity of the Shiv Sena: Urbanis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Asian Studies Review 19, no. 3 (1996): 44.

25 Bal Thackeray, "I Still Believe in Dictatorship," 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 Feb. 19, 1984, cited in Mary Katzenstein, Uday Singh Mehta and Usha Thakkar, "The Rebirth of Shiv Sena: The Symbiosis of Discursive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 2 (1997): 379.

26 Atreyee Sen, Shiv Sena Women: Violence and Communalism in a Bombay Slum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7), 26 - 30, 90, 180.

27 Gérard Heuzé, "Cultural Populism: The Appeal of the Shiv Sena," in Bombay: Metaphor for Modern India, eds. Sujata Patel and Alice Thorn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3 - 34, 219. Italics from source.

28 Cited in Kalpana Sharma, "Chronicle of a Riot Foretold," in Bombay: Metaphor for Modern India, 284.

29 Sikata Banerjee, Warriors in Politics: Hindu Nationalism, Violence and the Shiv Sena in Ind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54.

8 THE NEW CITY CONFRONTS THE OLD WORLD

1 Michèle Tribalat, ed., Cent ans d'immigration, étrangers d'hier franÇais d'aujourd'hui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INED, 1991), 65 - 71.

2 Piotr Smolar, "L'antiterrorisme, selon le patron des R G," Le Monde, Nov. 11, 2005.

3 Alec G. Hargreaves, Multi — Ethnic France: Immigratio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04.

4 Several majo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cond—generation African immigrants in France are fully integrated, including Michèle Tribalat, De l'immigration à l'assimilation : Enquête sur les populations d'origine étrangère en Franc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6); C. Lefèvre and A. Filhon, eds. , Histoires de familles, histoires familiales (Paris: INED, 2005).

5 Estimate of arrival—city size derived from OECD, especially Rainer Münz et al. , "What Are the Migrants' Contributions to Employment and Growth? A European Approach" (Paris: OECD, 2006).

6 Loïc Wacquant, Urban Outcas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284. Italics in original.

7 Nicolas Sarkozy, Testimony (Petersfield: Harriman House Ltd, 2006), 63 - 65.

8 For example, see Patrick Simon, "The Mosaic Pattern: Cohabitat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Belleville, Paris," in Minorities in European Cities, eds. Sophie Body—Gendrot and Marco *Martiniello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2000).*

9 Sophie Body—Gendrot, Police et discriminations raciales : Le tabou français (Paris: Editions de l'Atelier, 2003); Tribalat, De l'immigration à l'assimilation.

10 Brice—Arsène Mankou, Pour une France multicolore : L'exemple d'Evry (Paris: Cultures Croisées, 2005).

11 "Zus: Les Pyramides," Délégation interministérielle à la Ville,

12 Azouz Begag, Shantytown Kid (Le gone du Chaâb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45.

13 Divorce rate: Interview with Kazim Erdogan. For other figures, see Claus Mueller, "Integrating Turkish Communities: A German Dilemm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5, no. 5 - 6 (2006). For unemployment, see Berlin—Kreuzberg—Kottbusser Tor, Soziale Stadt,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Urbanistik, www. sozialestadt. de.

14 *Leyla Gülçür, "A Study o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buse in Ankara, Turkey," in* WWHR Reports no. 4 (Istanbul: WWHR, 1999).

15 Dilek Gügö, "Germans Can Be Also Turks, Says a Berlin Author," Turkish Daily News, May 15, 2007; Robert Collier, "Germany Copes with Integrating Turkish Minorit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 13, 2005.

16 Şule Özüekren and Ebru Ergoz Karahan, "Residential Careers of Turkish (Im)Migrants at Home and Abroad—the Case of Istanbul and Berlin," in ENH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jubljana: 2006).

17 Şule Özüekren and Ronald van Kempen, eds., Turks in European Cities: Housing and Urban Segregation (Utrecht: ERCOMER, 1997), chapters 6 and 8.

18 Kogan, "Labour Market Careers of Immigrant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19 Roger Boyes and Dorte Huneke, "Is It Easier to Be a Turk in Berlin or a Pakistani in Bradford?" (London: Anglo—German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dustrial Society, 2004).

20 Günther Glebe, "Housing and Segregation of Turks in Germany," in Turks in European Cities: Housing and Urban Segregation, eds. Özüekren and van Kempen, 124.

21 Kogan, "Labour Market Careers of Immigrant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440.

22 An excellent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is found in Ruth Mandel, Cosmopolitan Anxieties: Turkish Challenges to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1 - 54.

23 Glebe, "Housing and Segregation of Turks in Germany," 125.

24 Merih Anil, "Explaining the Naturalisation Practices of Turks in Germany in the Wake of the Citizenship Reform of 1999,"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 no. 8 (2007): 1366.

25 Özüekren and Karahan, "Residential Careers of Turkish (Im) Migrants at Home and Abroad—the Case of Istanbul and Berlin."

26 Francisco Javier Moreno Fuentes, "Evolution of Spanish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North African Migration to Spain," Studies in Culture, Polity and Identities 6, no. 1 (2005).

27 Niki Kitsantonis, "E. U. Systems Fail to Stem the Flow of Migran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19, 2009.

28 Rosa Aparici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econd and 1. 5 Generations of Moroccan, Dominican and Peruvian Origin in Madrid and Barcelon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3, no. 7 (2007).

9 ARRIVAL'S END

1 It has become commonplace to claim that in 1996 the United Nations or one of its agencies

declared Jardim Angela "the most violent place in the world." In fact, no such declaration was ever made. Rather, Brazil's crime statistics that year, which included neighborhood breakdowns for the first time, were seized upon by media, including a UNESCO newsletter, because the neighborhood's homicide rate was dramatically higher than any other place for which such rates have been recorded. The "world's deadliest" claim became a working assumption among governments and NGOs.

2 Nancy Cardia, "Urban Violence in São Paulo"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0);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y Come in Shooting: Policing Socially Excluded Communities"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5).

3 Mota Guedes and Vieira Oliveira, "Braudel Papers 38: Democratization of Consumption: Progress and Aspirations in São Paulo's Periphery," 11.

4 Some of his analysis can be found in Bruno Paes Manso, Maryluci de Araujo Faria, and Norman Gall, "Diadema: Frontier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Sao Paulo's Periphery" (São Paulo: Fernand Braudel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2005) and Bruno Paes Manso, O Homem X: Uma Reportagem Sobre a Alma Do Assassino Em São Paulo (São Paulo: Record, 2005).

5 The nature of poverty as a strategic passage rather than a permanent state is analyzed in detail in Narayan, Pritchett, and Kapoor, Moving Out of Poverty.

6 See, for example, the findings of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by Walter Russell Mead and Sherle Schwenninger, The Bridge to a Global Middle Class: Develop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rwell, MA: Kluwer, 2002).

7 Steven Durlauf, "Neighborhood Feedbacks, Endogenous Stratific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Dynamic Disequilibrium Modeling, eds. William A. Barnett, Giancarlo Gandolfo, and Claude Hilli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o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 middle class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see Steven Pressman,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LI, no. 1 (2007).

8 Guedes and Oliveira, "Braudel Papers 38."

9 David Rothkopf, "Pain in the Middle," Newsweek International, Nov. 21, 2005.

10 Branko Milanovic, "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8, no. 2 (2002).

11 Rasheeda Bhagat, "A One—Billion Middle—Class Deluge from India. China by 2020," The

Hindu Business Line, Jun. 29, 2006. For a similar analysis using different consumer data, see Diana Farrell, Ulrich A. Gersch, and Elizabeth Stephenson, "The Value of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The McKinsey Quarterly (2006).

12 Nancy Birdsall, Carol Graham, and Stefano Pettinato, "Stuck in the Tunnel: Is Globalization Muddling the Middle Class?" (Washington: Center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0), 1, 8, 14.

13 Jan Nijman, "Mumbai's Mysterious Middle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0, no. 4 (2006): 758.

14 Mead and Schwenninger, The Bridge to a Global Middle Class.

15 Janice E. Perlman,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Revisited: The Case of Favelas in Rio De Janeiro, 1969 - 2003"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05), 16, 20.

16 Mead and Schwenninger, The Bridge to a Global Middle Class.

17 Eduardo Zepeda et al., "Changes in Earnings in Brazil, Chile and Mexico: Disentangling the Forces Behind Pro—Poor Change in Labour Markets" (Brasilia: IPC—IG [UNDP], 2009).

18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A. Durand—Lasserve and L. Royston, Holding Their Ground: Secure Land Tenure for the Urban Po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Earthscan, 2002), 3.

20 Hernando de Soto,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21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London: Black Swan, 2000), 35. A number of critic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is number is unverifiable.

22 L. J. Alston, G. D. Libecap and B. Mueller, Titles, Conflict and Land Use: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Rights on the Brazilian Amazon Frontier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 G. Feder and D. Feeny, "Land Tenure and Property Rights: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 (1991); O. J. Lanjouw and P. I. Levy, "Untitled: A Study of Informal and Formal Propertry Rights in Urban Ecuador," The Economic Journal 112 (2002); K. Deininger and J. Chamorro, "Investment and Equity Effects of Land Regularisation: The Case of Nicraragu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30 (2004);

E. Field, "Property Rights and Household Time Allocation in Urban Squatter Communities: Evidence from Peru," in Second Urban Resarch Symposium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3).

24 Alan Gilbert, "On the Mystery of Capital and the Myths of Hernando de Soto: What Difference Does Legal Title Mak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02); A. M. Varley, "Private or Public: Debating the Meaning of Tenure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6, no. 3 (2002); O. M. Razzaz, "Examining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 Informal Areas: The Case of Jordan," Land Economics 69, no. 4 (1993); J. M. L. Kironde, "Understanding Land Markets in African Urban Areas: The Case of Dar Es Salaam, Tanzani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4 (2000).

25 Robert E. Smith, "Land Tenure Reform in Africa: A Shift to the Defensive,"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3, no. 3 (2003).

26 A. Antwi and J. Adams,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Informal Urban Land Transactions in Accra, Ghana," 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 20, no. 1 (2003); M. M. Omirin and A. Antwi, "Informality, Illegality and Market Efficiency: A Case for Land Market Deregulation in Accra and Lagos" (London, 2004).

27 R. Home and H. Lim, Demystifying the Mystery of Capital: Land Tenure and Poverty in Africa and the Caribbean (London: Glasshouse Press, 2004); Bishwapriya Sanyal, "Intention and Outcome: Form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Regional Development Dialogue 17, no. 1 (1996).

28 Staffan Granér, "Hernando de Soto and the Mystification of Capital," Eurozine, no. 13 (Jan. 19, 2007): 6.

29 Donald A. Krueckenberg, "The Lessons of John Locke or Hernando de Soto: What If Your Dreams Come True?" Housing Policy Debate 15, no. 1 (2004): 3.

10 ARRIVING IN STYLE

1 Gerben Helleman and Frank Wassenber, "The Renewal of What Was Tomorrow's Idealistic City, Amsterdam's Bijlmermeer High-Rise," Cities 21, no. 1 (2004); Ronald Van Kempen et al., eds., Restructuring Large Housing Estates in Europe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5).

2 Helleman and Wassenber, "The Renewal of What Was Tomorrow's Idealistic City,

Amsterdam's Bijlmermeer High—Rise," 8.

3 Maurice Crul and Liesbeth Heering, eds. , The Position of the Turkish and Moroccan Second Generation in Amsterdam and Rotterda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63 - 85, 166.

4 Doug Saunders, "Citizen Jane," The Globe and Mail, Oct. 11, 1997.

5 William H. Whyte, City: Rediscovering the Center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Oscar Newman,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6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221.

7 Alice Coleman, Utopia on Trial: Vision and Reality in Planned Housing (London: Longwood, 1985).

8 Narayan, Pritchett and Kapoor, Moving Out of Poverty, 223 - 72.

9 Recent exposés of the failure of aid include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 (London: Allen Lane, 2009);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For a more balanced discussion of the flaws and potentials of foreign aid, see Paul Collier,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Smolka and de A. Larangeira, " Informality and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n Urban Policies. "

11 María Mercedes Maldonado Copello, "Operación urbanistica Nuevo Usme: provision de suelo urbanizado para vivienda social, a partir de la redistribution social de plusvilias" (Bogota: The World Bank, 2005): Lucgom, "Operación Nuevo Usme se desarrollará en 20 años megaproyecto en Usme, para frenar el crecimiento desordenado del sur," El Tiempo, July 21, 2009.

12 Vinit Mukhija, "Upgrading Housing Settlem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Impact of Existing Physical Conditions," Cities 18, no. 4 (2001).

13 Jan Nijman, "Against the Odds: Slum Rehabilitation in Neoliberal Mumbai," Cities 25 (2008).

14 Heather Smith and David Ley, "Even in Canada? The Multiscalar Con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of Concentrated Immigrant Poverty in Gateway Cit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8, no. 3 (2008); United Way, "Poverty by Postal Code: The Geography of Neighborhood Poverty" (Toronto: United Way of Greater Toronto and the Canadian Council on Social Development, 2004).

15 Smith and Ley, "Even in Canada?" 708.

16 Mohammad A. Qadeer, "Ethnic Segregation in a Multicultural City," in Desegregating the City: Ghettos, Enclaves & Inequality, ed. David P. Varaday (Albany: SUNY Press, 2005); Kristin Good, "Patterns of Politics in Canada's Immigrant-Receiving Cities and Suburbs," Policy Studies 26, no. 3/4 (2005).

17 J. David Hulchanski, "The Three Cities within Toronto: Income Polarization among Toronto's Neighborhoods, 1970 - 2000" (Toronto: Centre for Urban &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7).

18 Robert E. Park,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2).

19 Ceri Peach, "Good Segregation, Bad Segregation," Planning Perspectives 11 (1996); Ludi Simpson, Vasilis Gavalas, and Nissa Finney, "Population Dynamics in Ethnically Diverse Towns: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Immigration," Urban Studies 45, no. 1 (2008); Ludi Simpson, "Ghettos of the Mind: The Empirical Behaviour of Indices of Segregation and Diversit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70, no. 2 (2006).

20 Finney and Simpson, "Sleepwalking to Segregation"?; Simpson, Gavalas, and Finney, "Population Dynamics in Ethnically Diverse Towns: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Immigration," Urban Studies 45, no. 1 (2008).

21 Asef Bayat, 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 5, 171 - 84.

22 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London: Allen Lane, 2006), 112 - 13;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 - 1991 (London: Granta, 1991), 394.